

巴黎第七大学精神分析学院
北京大学回龙观临床医学院
合作项目

UFR d'Études Psychanalytiques
Université Paris VII-Denis Diderot
en coopération avec
Université de Pékin Hôpital Hui Long Guan à Pékin

DE LA PSYCHANALYSE III
**中法精神分析培训
实务教程III**

QU'EST-CE QUE LA PSYCHANALYSE
什么是精神分析

Guy Le Gaufey
[法] 纪·勒-枸菲 著

Huaqing Liu Jie Yao
刘华清 姚 洁 编译

清华大学出版社

纪·勒·构菲 (Guy Le Gaufey)

精神分析家，法国精神分析界临床与学术研究权威。拉康嫡系弟子，法国“拉康精神分析学校”创始人之一并兼两任校长。

姚洁

精神分析师，临床心理师，巴黎第七大学精神分析学院临床心理学硕士(成人精神病理)、“医学与精神分析”深度研究硕士，博士在读。

杨甫德

主任医师、教授，北京回龙观医院（北京大学回龙观临床医学院）院长，北京市心理危机研究与干预中心主任，世界卫生组织心理危机研究与培训合作中心主任。

菲第·本斯拉马 (Fethi Benslama)

精神分析师，巴黎德尼·狄德罗大学精神分析学院院长、巴黎人文院院长及创始人

庞宇

副主任医师，北京回龙观医院（北京大学回龙观临床医学院）副院长，中国音乐治疗协会副理事长，中国心理卫生协会科普专家，中国EAP联盟理事。

刘华清

主任医师、教授，北京回龙观医院（北京大学回龙观临床医学院）心理科主任，曾在世界卫生组织心理危机研究预防与培训合作中心从事自杀、同性恋等项目研究。

清华大学出版社数字出版网站

WQBook  中文
www.wqbook.com

ISBN 978-7-302-45925-5



9 787302 459255 >

定价：69.80元

DE LA PSYCHANALYSE III

中法精神分析培训 实务教程III

QU'EST-CE QUE LA PSYCHANALYSE

什么是精神分析

Guy Le Gaufey

[法] 纪·勒·构菲 著

Huaqing Liu Jie Yao

刘华清 姚 洁 编译

清华大学出版社
北京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侵权举报电话：010-62782989 13701121933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法精神分析培训实务教程. Ⅲ, 什么是精神分析 / (法) 纪·勒·构菲著; 刘华清, 姚洁编译. —北京: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7

ISBN 978-7-302-45925-5

I. ①中… II. ①纪… ②刘… ③姚… III. ①精神疗法—教材 IV. ①R749.05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066434号

责任编辑: 肖军 王华

封面设计: 常雪影

责任校对: 赵丽敏

责任印制: 沈露

出版发行: 清华大学出版社

网 址: <http://www.tup.com.cn>, <http://www.wqbook.com>

地 址: 北京清华大学学研大厦A座 邮 编: 100084

社总机: 010-62770175 邮 购: 010-62786544

投稿与读者服务: 010-62776969, c-service@tup.tsinghua.edu.cn

质量反馈: 010-62772015, zhiliang@tup.tsinghua.edu.cn

印 装 者: 三河市金元印装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170mm×235mm 印 张: 18.75 字 数: 255千字

版 次: 2017年4月第1版 印 次: 2017年4月第1次印刷

印 数: 1~2000

定 价: 69.80元

产品编号: 070902-01

项目总监

菲第·本斯拉马 (Fethi Benslama)
杨甫德

学术顾问

纪·勒·构菲 (Guy Le Gaufey)
庞宇

项目策划

刘华清 姚洁

现场执行

刘艳 魏晨曦 徐仁
李玖菊 胡娜

原始录音整理

徐仁 魏晨曦 艾霞 孙晓峰
彭静 李斌彬 潘杨

诚挚感谢

黄峥博士 费小懿博士 孙春云副教授
丛中教授
史占彪博士
彭静舞动治疗师

avec toutes nos reconnaissances à
Dr. Zheng Huang, Dr. Xiaoyi Fei, Pr. Chunyun Sun
Dr. et Pr. Zhong Cong
Dr. Zhanbiao Shi
ainsi que
Institut en Psychologie de l'Académie Chinoise des Sciences

“ La passion majeure chez l'être parlant...
n'est pas l'amour, ni la haine, mais l'ignorance ”.

Lacan (1973)

“言者最大的热情……非爱非恨，
乃视而不见、听而不闻。”

拉康（1973）

序 言

在“中法精神分析治疗连续培训”第三期圆满结束半年后，我拿到了这本书稿，不是很厚，却能感受到它沉甸甸的分量，那是种承上启下的厚重感。因为从达成合作意向，到项目的培训成功施行，这几年来汇聚了许多人的心血，最终得以凝结并记录在本书中；而说它启下，则是希望这本书作为阶段性的总结，能够为精神分析取向的心理治疗师开启无限的可能性。

一年前，法国巴黎第七大学精神分析博士、学院院长霍夫曼教授来北京回龙观医院进行第三次讲学。在充分交流过程中，我们双方在临床精神分析取向心理学研究生培养及科研工作等方面签署了合作协议。我们愿意发挥各自的优势，积极推动精神分析治疗在中国临床的广泛应用，并最终服务于心理障碍患者和有心理健康需求的百姓。

之所以与我院展开合作也并非偶然。北京回龙观医院是国家首批精神医学临床重点专科医院，在医疗、教学、科研、康复和健康促进等方面，在首都乃至全国精神卫生界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北京回龙观医院于1996年成为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教学医院，2015年成为北京大学回龙观临床医学院。医院不但承担着多所高等院校的教学任务，同时还是北京市精神科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基地。目前，医院为北京大学硕博研究生培养点、华北理工大学和内蒙古科技大学的硕士点，几年来培养了大批精神卫生专业博士、硕士，每年来自全国各地的进修医师也是络绎不绝。依托于这样一个大型平台，我们也一直在寻找合适的合作项目，尝试专业、新颖、与临床紧密结合的教学模式，这次与法国

巴黎第七大学的合作也是机缘所致。

为什么选择精神分析呢？这其中也是综合考虑了临床应用和教学需求的因素。多年的临床工作让我意识到，专科医院主要沿袭了生物医学治疗模式，遇到重性精神疾病、人格障碍、顽固的神经症患者等，药物治疗往往起不到根本性作用，在恢复社会功能和远期预后方面并不理想，还有可能诱发患者的病耻感和社会退缩现象。精神分析发展至今，不仅是一种心理治疗方法，还是对人类行为和人格动力探讨最深的理论，是深入洞察和理解患者的情绪、情感、意识和潜意识的工具。其实精神病学的研究，同样需要更好地揭示人类精神现象的本质，在解决即时治疗与控制的同时，要尽快解决并探索人类异常精神现象在病患身上特殊的原因、形成机制、发展规律，从而寻求真实的预防效果，为良好的社会生存环境及中国未来的人类集体生活质量，打下健康的精神层面基础。在这样一些考虑下，以北京回龙观医院的专业实力和影响力，我们有责任探索并推广精神分析治疗理论和实践在中国的临床一线研究与尝试，这也是我们大力支持本项目开展的动力之一。

仔细阅读这本书，读者就会发现它的独特之处。它的内容比一般理论讲授要生动鲜活得多，但又不同于故事演绎。我个人的感觉是，它就是一次对话，一次中法精神分析之间原汁原味的对话。如果读者静下心来去体会，你甚至能感到如临现场般的与老师和学员们在一起交流，因为老师们不是在讲理论，而是将精神分析的态度融入细节中，把自己多年的经验无私地和大家分享。我们不愿阻碍这种分享，所以我们尽可能像搬运工一样，将这种平实、亲近的分享朴素地呈现出来，使其中蕴含的动力自然地流向读者。因此，当读到纪·勒-构菲教授对精神分析治疗的理解时，你可能也随之将人类遇到的心理问题的理解提升到更高的层次；而伴随整个阅读过程所出现的困惑和被激发出的问题，其实也是读者为本书内容拓展出的新空间。所以我建议读者以空杯的心态进入这场交流和分享，试着让它扰动你，给这种扰动留一些空间，相信它会回报你

一次精彩的体验。

本项目的负责人姚洁博士和刘华清主任及其团队为此次合作以及本书的写作倾注了大量的心力，清华大学出版社肖军和王华老师在本书出版过程中提供了及时而无私的帮助，在此一并致谢。

俗话说，众人拾柴火焰高。本书可以说是中法精神分析相遇的结晶，我非常期待再一次的相遇，期待着重逢时碰撞出更加绚丽的火花。

世界卫生组织心理危机研究与培训合作中心主任

中华医学会精神医学分会副主任委员

中国心理卫生协会全国理事会副理事长

北京大学回龙观临床医学院院长

北京回龙观医院院长

杨甫德

2017年1月1日

引 言

十年前，我们相遇在北京。

为了成功举办中法精神分析培训班，我们诚恳地挽留住来来去去的法国同行，创造出所有可能的条件，使多种形式的试验性交流得以一年年、一步步地实现。

上海的纪淞是一切的开始，她在 2007 和 2008 连续两年里，全力在北京和上海组织了与精神动力师合作的团体体验活动，从身体维度入手。“倾听”自己身体的静与动，在语言之先。为准备这一系列的活动，在巴黎，大雪天，巴黎第七大学的同学张晓燕和自愿参与尝试的 14 位在法中国人，积极促成了三场试验性演习，帮助法国同事寻找不同语言与文化的工作状态、提供客观而积极的反馈。

当北京与上海的小范围尝试终于实现，某位媒体朋友说：“你们的做法就像我在北京回龙观医院采访时的感觉一样！”终于促成我们的相遇。一拍即合。

尊重事实，其实早已是传统中国人从小的教育和各自摸索成人的过程中，真正向精神分析开放的基础。文化的，也是个体的。

2008 年夏天，真正的接触开始。每一轮，我们都一反惯例，以中方的个案陈述及体验为先，以便“听”到尽量少受影响的原始信息。法国教授干预有时候放在第二时间，有时只穿插在陈述与体验中，点到为止。

信息，永远不可能被摸到真正的“原始”。只是，宣称“我们现在开始做

精神分析”，缺乏真正可能的保证。

就这样做做、停停。在北京和巴黎，在各自日常的工作与责任中继续着。要经过那样的过程和时间，“我们现在还听不到的是什么”才逐渐显现，并开始轮廓清晰地取代某些“怎么办”。真正的项目开始形成，已经是五年。

这些实验性接触，是今天课程的来龙去脉；它们的调整还在课程过程及研讨中继续。计划三年，作为“培训与讲学”的第一个“尝试”系列。

三年，是为每位“受训”的学员，也有这个“做做、停停”的时间，愿季季花开的课程（声音、文字、图像所激发的象征与想象）能陪伴好每位学员的生活与实践，锻造出属于他（她）自己的“身体”：他（她）的临床实体，以及他（她）可以与人共弦的“乐器”。

初次相遇，因此是这样一个开放的“问题”，一种临床的实情：它是承担起工作责任时，不可避免的第一挑战；却很实际地，永远都是眼下要迈出的新一步，再日常不过的每一个时刻。

在现场的内容设置上，我们以两条主线交错进行。而文字有自己的优势：念的人可以随时放下，在另外一个时间里再拿起来。

纪·勒·构菲老师的培训现场是移情、是双方共振的珍贵结晶。所摘录的提问与交流部分只是文字所能记录的一个极小的部分。老师们感谢现场学员的充分参与，对现场提问的质量、积极饱满的工作状态，始终记忆犹新。

已经有好友告诉我们说：有些篇章很难读。但这类文字，从来都是给人读读、放放，放放再读读的。这些文字能提炼出我们十几年、几十年的好东西。也许是我们这里唯一能说的。

像所有具有实验性质的早期工作一样，本资料与我们的操作设置本身，必然同时暴露着我们的盲点。感谢来自全国的学员们如此投入于这样一个主客观条件均有局限的共同探索，相信诸位同行、病友及家属的指正、进一步的切磋与探讨，会给这些未及思考之处、尚未解决的难点和错误，写入真实而具体的

开拓意义。

我们始终幸运地得到诸位前辈、挚友，和我们家人如一的支持与理解。祈望工作的逐步进展，可以见证我们对他们的由衷感激。

编译者

2017年3月1日

目 录

Contents

第 1 讲 整体介绍	1
1 个人经历（精神分析师与其所知关系的自身实例）	2
2 能指 / 所指	4
3 初始框架	8
第 2 讲 象征符号	12
1 荣格的“象征符号”	13
2 琼斯和弗洛伊德的“象征符号”	16
3 拉康有关信号的概念	18
4 问题 1：“进入语言”	20
5 问题 2：“语言”和“象征符号”	21
第 3 讲 结构问题	22
1 9 个点的连线游戏	22
2 非欧几里得几何（“公理式”问题）	24
3 “数学基础危机”（能指 / 所指脱离的问题）	27
4 “象征维度”与“被划掉的大 A”	28
5 临床上的几个坐标	30
6 问题 1：病人的希望，是“船”还是“活着”？（自杀问题） ..	31
7 问题 2：为什么“不回应”会有“爱的效应”？（“万能”概念） ..	34
第 4 讲 信号	38
1 索绪尔的信号	38
2 所指的存在	40
3 “事后”概念（精神分析的诞生）	42

4 问题：“幻想”从何而来？	46
第5讲 弗洛伊德的“我”	50
1 对比阅读的必要性（拉康研讨会文本的历史）	50
2 弗洛伊德的“意象”	52
3 “我”	54
4 “压抑”与“原始压抑”	57
第6讲 拉康的“主体”	59
1 “镜像期”的历史	60
2 无知的主体与“被假定—知—主体”	64
3 问题1：什么是“切到一个好的位置”？	67
4 问题2：“主体”这个词是不足的	68
5 问题3：中国主体	69
6 问题4：主体的两个维度	72
第7讲 幻想与对“空”的恐惧	74
1 “幻想”在法国	74
2 “小他者”（克莱因的“类分裂—偏执位置”与“抑郁位置”）	76
3 “客体 a ”与对空的恐惧	78
4 圣物与“接触”的逻辑	79
5 同属“事件”	81
第8讲 菱形的价值	85
1 “幻想”公式中菱形的价值	85
2 问题1：坠落的恐惧（晕眩、移情的症状）讨论	88
3 问题2：幻想是否是一种功能？（青少年及性问题）	90
4 问题3：大他者与小他者的区分	94

第 9 讲 进入倾听	97
1 什么是“冲突”？	98
2 “职业秘密”与“私人秘密”	101
3 普遍陈述与特殊陈述（从理论到精神分析实践的关系）	103
4 精神分析的“案例”	105
5 问题 1：“我”的“最低痛感原则”与“快乐原则”	106
6 问题 2：主体与主观的探讨	107
7 抑制的问题	110
第 10 讲 什么是精神分析的临床案例	113
1 无名氏的历史故事	113
2 再述主体与案例	116
3 精神分析的理想案例	117
4 问题：评判性的吸收	118
第 11 讲 精神分析中的基本规则	122
1 从催眠术到精神分析术	123
2 决定性的宣布	125
3 基本规则的复杂性	127
4 单复数的移情	128
5 目标—意象	130
6 问题 1：“分析结束”的探讨	132
7 问题 2：关于“维持好分析师在话语中的位置”的探讨	134
第 12 讲 现场提问互动——精神分析不同于心理治疗 的是什么？	136
1 问题 1：精神分析与心理治疗	136
2 问题 2：占星问题	140

- 3 问题 3: 传播精神分析的危险 142
- 4 问题 4: 禅宗之切 144

第 13 讲 关于“怎样成为精神分析师 (第二基本规则)” 的现场互动 148

- 1 柏林模式 149
- 2 分析终止的问题 151
- 3 拉康学校的经历 153
- 4 帕斯或“过”这个流程 (La passe) 154
- 5 问题 1: 为什么要这个靠“偶然”运作的流程? 158
- 6 问题 2: 探讨“自己的标准” 160

第 14 讲 精神分析的临床与实践 163

- 1 问题 1: “通关可有通过率”? 164
- 2 问题 2: 收费问题的探讨 165
- 3 问题 3: 中学心理教师的自杀危机干预 169

第 15 讲 不同群体的精神分析师 174

- 1 Passe 流程中的声望问题 174
- 2 Le Cartel: 卡而代尔工作小组 175
- 3 小组人数 176
- 4 问题 1: 频率设置 177
- 5 问题 2: 拉康“性关系不存在”之解 181
- 6 问题 3: 小组人数 185
- 7 问题 4: Passe 中路人的选定 187
- 8 问题 5: 网络可以做分析吗? 188
- 9 问题 6: 俄狄浦斯情结的效应 189

第 16 讲 能说“不”，才算能会说“是”191

- 1 问题 1: 关于 GLG 老师的两个私人问题191
- 2 问题 2: 假期里病人怎么处理?193
- 3 问题 3: 精神分析师的离婚率的讨论195
- 4 问题 4: 分离焦虑197
- 5 问题 5: 丢钥匙的故事200

第 17 讲 意思与涵义、适用问题203

- 1 问题 1: 弦外之音与庖丁解牛203
- 2 问题 2: “有语言”和“有话语”209
- 3 问题 3: 作为客体的空210
- 4 问题 4: 意思和涵义发生在所指层面212
- 5 问题 5: 话语的音乐213
- 6 问题 6: 适应性问题215

第 18 讲 诗的韵律、移情之爱218

- 1 问题 1: 诗的节奏算不算能指?219
- 2 问题 2: 关于“缝隙”219
- 3 问题 3: 事物与规律221
- 4 问题 4: 回到“切”222
- 5 问题 5: 督导与分析224
- 6 问题 6: 移情之爱225
- 7 问题 7: 两场分析之间, 分析师怎样调整自己的状态228
- 8 问题 8: 每场分析是否要做笔记230

第 19 讲 出位、算命、撒谎231

- 1 问题 1: 有关“出位”(acting-out)231
- 2 问题 2: 关于给来访者“留作业”235

3 问题 3: 沉默的分析师如何能“承载”话语?	236
4 问题 4: “镜像是所有对象的原型”	238
5 问题 5: 借用易经做精神分析	239
6 问题 6: 我的学生撒谎了吗?	240
7 问题 7: 底线	243

附录 1 偏执者所未成

245

1 弗洛伊德, 1938 年	246
2 闪回	252
3 从移情到爱情	259
4 单数移情的阳具价值	263

附录 2 闭幕式

269

第1讲 整体介绍

大家好，非常感谢！我们将在此共度五天的时光，对你们来说，可能会很长，对我就更长。真还没做过这样的事。

（我）经常会做整个周末的讲座或研讨会，两天、两天半，都可能，但从没连着做五天的。

我之所以会接受这样一个邀请，是因为自己的事业与人生进入了一个特殊阶段。

你们看得出来我已不再年轻，但作为精神分析师，我接待第一批病人的时候很年轻，才28岁。现在67岁，快40年了。40年来我所做的，就是接待病人，从周一到周五，日复一日，年复一年。

早先十年，也同时在精神病院工作，因为我对精神病始终很有兴趣。私人执业肯定不比在医院，遇到精神病病人的机会少得多。但我终究选择了私人执业，而且一直笔耕不辍，首先就是为了理清自己的思路。

我因此接受了这个五天的邀请，希望能简单明了地就这些年写下来的东西，做个部分整合的阐述。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得先简略讲讲我的个人经历。

实际上，涉及精神分析与精神分析师，这里有个极为关键的要点：理所当然地，分析师应该知道很多事、很多理论，但比这远远重要得多的，不是他知

道些什么，而是他与自己的所知保持着怎样的关系。

我希望这一点，在座各位心里是清楚的，因为这绝对是基础——当一个人站到你们面前，泛泛地讲精神分析，维持不了多久，就会转成谎言。

我因此将用这五天的时间跟大家探讨一些相互之间非常不同的主题。有些跟精神分析的实践直接相关，另一些却毫无关系。我希望你们不会对此感到失望。因为精神分析的临床，不单纯是用精神分析的知识来构筑的。

举例来说，今天下午我会讲到数学史上的某个细节，乍一看，跟精神病、神经症毫无关系，但我们马上开始涉及的问题之一，就是有关“符号、象征”（symbole）的本质问题。

有关这一问题，首先就是在数学界发生了一些非常重要的事，之后才是所谓的“结构主义”。而结构主义对我年轻时所接触到的精神分析有过很大影响。这个精神分析，是我在实践中自始至终的依托。

今天上午后半段时间，我都会讲象征符号，这只是其中一个很小的例子。我会兜个圈子，用这些并非精神分析所固有的东西，来更好地解释雅克·拉康（板书：Lacan）是怎样重新思考弗洛伊德的工作的。

1 个人经历（精神分析师与其所知关系的自身实例）

拉康对弗洛伊德的重新思考，对我来说，是个关键。如果没有拉康，我可能不会从事精神分析，也就不会站在这里。

是因为拉康带给精神分析一种特有的风格，才使我对这种事物本身产生了兴趣。这种风格非常尊重“是什么”，让弗洛伊德这样写，其表达却完全建立在另外的坐标体系中。

值得重申的是，拉康从未以弗洛伊德的叛逆者自居。从1953—1980年的

研讨会，他前十年所做的，主要就是点评他用德语原文念的弗洛伊德。晚年时，他曾揶揄说：“我是弗洛伊德派的，你们想做拉康派，是你们的事。”

讲到我自己的经历，我开始从事个人分析是1971年，三年后以精神分析立业，是拉康1964年成立的巴黎弗洛伊德学校（板书“1964 E. P. F.”：École Freudienne de Paris）成员。拉康自己在晚年把这个学校解散了。

在我看来，那是个很明智的决定。

我们当时被召集在一起，就这一决定做了两次投票表决。两次我都投了“赞成”。拉康从头到尾都是学校的校长，谁都不能取代他这个位置。取代没有任何意义。

就这样，从1980年开始，本来隶属于这个学校的各个小组都各成一派。我和四个朋友做了第一份拉康派的杂志，叫《滨海地带》（板书：1981 Littoral）。——这个词本身不是精神分析术语，但它是我们用来表明立场的一种方式：我们在某个什么的边缘。我们用这一方式来支持精神分析本身：精神分析的实践，是一种“边缘”的实践。

你们现在听我这样说，可能会觉得有点儿玄。希望五天之后，会明朗一些。

做出这份杂志之后，我们五个又与走得比较近的，大致四十来人吧，共同创建了我们自己的学校。这是第一家以“拉康”为名的精神分析学校，在1985年。（板书“1985 E. L. P.”：École Lacanienne de Psychanalyse，拉康精神分析学校。）

现在，我想介绍一下这几天的大概计划，好让你们一路下来遇到术语的时候，不会感觉失落。

我们每天会讲评一个重点术语。比方今天，我马上就会从“象征符号”的本

质研究入手。在雅克·拉康的教学中，很有特征的一点就是他会拿法语中的一个普通词汇，比如 *symbolique*（“象征”，是个普通名词）来作专业术语（我们选择“象征维度”这个翻译）。但这个词一旦成为术语，却完全是另外一回事。

我刚刚跟大家说过，今天下午，为了展开象征符号（*symbole*）或象征维度（*symbolique*）这个概念，我们得从数学与逻辑学兜个圈子。但愿你们在接受这种方式的时候，不会有太大的困难。因为远距离研究拉康的人，以为拉康就是“弗洛伊德+索绪尔”，那是错的。我将试着论证给你们看为什么是错的。当然，拉康曾以索绪尔的研究为依据，尤其是对所指和能指的重要区分……（学员：“索绪尔？”）

费尔迪南·德·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ssure）是位语言学家，法国语言学界最重要的人物之一。他的《通用语言学教程》（《*Cours de linguistique générale*》）1923年才出版，却彻底改变了法国语言学的面貌。他定义了“信号”（*signe*）的本质，将它视为所指在上、能指在下的一个合并……

我得知你们是否清楚这些概念，因为对我来说，它们是基础。（现场：“不清楚……”）这我没料到。那我们就先在这里停一下吧。

因为拉康对索绪尔的研究做了个决定性的颠倒，要理解这个颠倒，“信号”这个概念首先得非常清楚。

2 能指 / 所指

让我们先就这两个概念达成一致：所指（*Signifié*），写法是 *Sé*（板书），是想法、念头那类的东西，是无形的。能指（*Signifiant*）呢，写作 *Sa*（板书），有具体材料，或者说，是物质化的、有声音的、有其结构或构造的。

就像我在黑板上写的，对索绪尔来说，一个信号是所指在上、能指在下，有个圈把它们这个整体隔离出来。索绪尔的“信号”因此要同时是这四

个东西：所指、能指、两者之间的横杠，以及这个将它们当作整体隔离出来的圈。

拉康看上去像是在引用索绪尔，却做了完全另一回事，甚至颠倒了索绪尔：他将能指放到上面，保留横杠，所指放在横杠下面。再也没有什么圈圈了，信号不再自成一体，横杠的价值也从此不同。

拉康总结说，在信号的功能运作中最为重要的，不是所指而是能指。我加一句，这么说的时侯，他是彻底把自己看作是弗洛伊德派的。

姚 洁：老师这么解释，大家明白吗？

现 场：明白！是无意识……是……

GLG：不是无意识不无意识的问题。

在《梦的解析》中，弗洛伊德揭示出梦的运作就像个谜。或者，通常来说，弗洛伊德坚持认为，监察者在梦中所干涉的不是想法。监察者不改变所指，它改变的是能指。

学员 1：老师在说索绪尔和拉康之间有个所指和能指的颠倒，但首先应该明确什么是所指、什么是能指。

姚 洁：我们正在讲，不急，我请先生再给我们讲。但是，在座有没有同学愿意帮我们先解释一下？

学员 2：我来重复一下什么是所指。它是个念头，是无形的、物质化的……

现场（好几个学员同时）：不对，不是物质的……

学员 3：老师说，所指是个念头，所以是无形的。念头不是个东西，这个是所指。再讲能指，（它）是具体的东西，包括符号、

画面、声音、图像。但如果我没有理解错的话，我觉得正好相反。我们都知道，术语是翻译过来的。所以我很想知道，会不会实际上是另一回事？因为对我来说，能指似乎是想象出来的什么东西……（现场的交头接耳盖过了他）

姚 洁：等一等，我们先听这位同学说完好吗？（对提问学员）能不能把您认为的能指再给我们讲一下？

学员 3：我认为能指才是无形的、想象出来的。（这两个概念应该是反过来的。（现场很多声音）

姚 洁：我把这两个词的中文写在黑板上？

学员 4：我想问个问题，这是不是一个图像？

姚 洁：问题不在这里。先简单解决术语翻译这个层面吧。这两个词都有个共同的部分，是“指”，在法语里就是“signifi-”。“能指”有个“-ant”，就像英语里的“-ing”，大家知道是表示进行时或动名词，是这个“正……着”的状态在中文译成了“能”这个性质，组成“能指”。字对字来说，成为“可以指”或“有这个能力来指”。但指什么？指向哪里呢？用拉康的写法来说，我们不知道。所指呢，结尾是这个“-é”，表示被动，等于英语里的“-ed”……

G L G：“Signified”。

姚 洁：Signified，英语。被指的那个……

学 员：“所指”。

姚 洁：“所指”！好比“所说”“所唱”，是“被说的”“被唱的”。翻译其实很好，雅而达。但在我们耳朵里听着，却很容易混。再加上中文有另外一个问题，是所指 signifiant、信号 signe、象征 symbole，都可以翻译成同一个词“符号”，完全区分不开。所

以，在索绪尔或拉康的公式里，整个的这个 **signe**，我们权且用它的另一个翻译，叫它“信号”，但要知道，中文完全可以是“符号”甚至“记号”^①。信号中有这个 **signifié**，我们心里知道有什么，但不一定表达得出来，是“所指”；一旦有所表达，就是这个 **signifiant**（能指）出来了。这样解释可以吗？

学员 3：我能不能也“表达”一下？（现场笑）比方“蓝色”，就是能指……

学员 4：你又说反了！

学员 3：但从语言系统来说，是无形的。所以被表达成“蓝色”……
现场（杂乱地）：都反了！

学员 3（笑）：拉康也是反的……

GLG（也笑）：问题是，要真正把能指和所指分割得一清二楚，是不可能的。不存在一点点起码的能指都没有的所指；也没有哪个能指，不带哪怕一点点的所指。

这是理论上的区分，但也是非常临床的。我马上可以让大家来感觉一下。

我猜用中文跟用所有其他语言一样，总有些病人是不喜欢说专用名词的。他们会说“我最要好的朋友”“我好朋友的哥哥”“我邻居的表弟”，而不说他们的名字，因为专用名词负载着动机。

在逻辑学中，这是众所周知的“定义描述”与“专用名词”之间的区别。有时候，两者都能指示同一事物，拥有同一参照，但它们的“情感”价值是不同的（现场困惑）。

^① 如季广茂所译《从结构到解构：法国 20 世纪思想主潮》，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4 年版。译者注。

不要担心，整个上午我们还会回到这些问题上来，可否让我先讲完对这五天框架的整体介绍？（现场笑）

3 初始框架

如果今天（第2、3、4讲）我们能就“象征符号”达成一致，明天，周六，我打算在上、下午（第5、6讲与第7、8讲）分别攻克两个不同的问题，近距离研究“主体”（Sujet）与“客体”（Objet）这两个在精神分析与哲学上都同样关键的术语。

在所有的语言中，再没有比这两个概念更为经典的了：主体，说话的那个，和客体。

雅克·拉康最为敏锐的思想之一是认为：如果我们不从这个基础出发，弗洛伊德的信息就会很快落入一潭浑水，变成无法理解的东西，跟很多其他大同小异的治疗手段混为一谈。自足于用经典概念的主体与客体来做精神分析的传播与实践，会无可抗拒地把精神分析转变为心理学。

心理学有时候是个很精彩的东西，但不是精神分析。精神分析理论的来源另有其方法，不同于心理学。

我昨天^②说过，精神分析一直都和精神病学维持着某种接近，但它与精神病学也是不能混为一谈的。弄懂雅克·拉康讲学的好处，恰恰在于他能避免把精神分析拖入心理学，或这种与它如此接近、被人叫作“精神病学”的医学中。

周六就是上午讲主体、下午讲客体了。

这里的主体和客体，在拉康将它们转化为精神分析术语时，已彻底修改了

^② 指2013年10月30日讲座前一天，刘华清主任应纪·勒·构非先生的要求，在回龙观医院特地组织安排的先生与医护人员及学员的见面会。译者注。

它们习惯上的意义。

在弗洛伊德那里想要原封不动地找到它们是不可能的，这是事实。但这是一种解读弗洛伊德的方式。在我看来，极尊重弗洛伊德文献。

简单地给大家举一个例子，明天再做进一步展开：在弗洛伊德，有个“冲动对象”（l'objet de la pulsion）是什么的问题。我们会看到，拉康就“局部对象”（objet partiel）这个概念所发展出来的意思，在弗洛伊德那里是没有的，却解释了弗洛伊德对 objet（客体、对象、物）这个术语的选择。

我们也会就此看到，objet 是个危险而复杂的东西。

周日（第9~12讲），我要讲讲“精神分析临床”这个我认为很成问题的大问题。我猜，这种说法在你们这里应该也是可以接受的。

我毫不怀疑有一种医学临床或精神病学临床的存在，但实现这种临床的条件非常具体。要知道，精神病学的临床，就像所有医学临床一样，是“三足鼎立”的：有病人和他所表现出来的种种信号、有临床医师和他的实践经验，还有学员（进修医生？）和他所拥有的书本知识。临床医师要做的，就是指点学生去看，这个病人所显示的信号与他书本上学到的东西如何地不对应。大家同意吧？

那么，它跟精神分析的区别是一目了然的：在精神分析里，少了一个元素。这里永远只有两个人。

没有橱窗、没有那种单面看上去像是玻璃的镜子，电视侦探片里那种。

所以，要想把一场场分析里两个人之间所说的，拿来当作是“取自临床”，是真的很难。因为两个人里，不管是哪一个把分析里已经过去的，拿来给我们讲故事，我们都不得不相信。

讲这类故事的，通常是分析师，即所谓案例陈述。但今天，偏偏还有很多病人写书讲他们的精神分析（现场笑）……精神分析师或病人会对外描述已经

在分析里过去的事情，这事实将整个分析这件事弄得很可疑。我因此很反对所谓的“临床案例”这类流行路线。

分析师以“案例”为由讲述他们和“病人”（patient^③）之间发生的事情，他们这么做的时候，用的是医生之间碰到一起讲“病人”（malade^④）的通常模式。然而，精神分析师的“病人”是不存在的！

我给大家顺带说一句：如果说，弗洛伊德有时候也会用“病人”这个词，他却从未给过一个固定的什么叫“有病的”定义。对弗洛伊德来说，常态与病态之间的所谓根本区别，不是个有据可考的东西。所以，不存在这头是分析师，那头是病人。精神分析师们曾是病人，病人们成为精神分析师，我们很难将他们隔离开来。

我在周日会更为详尽地解释这些。

周一要讲的（第13~15讲），如果我能这样命名的话，是“不同群体中的精神分析师”。我们跟病人一起的工作有多孤独，我们就多么地不能单独作为精神分析师而存活。于是，一个新的难题出现了，是我们通常赶紧想要忘掉的：我们无法知道谁是精神分析师。

至少在法国，“精神分析”这个官方头衔是不存在的，没有“精神分析师”这个学历或职称。不同精神分析学校的分析师们总在互相争执，却只有这一点是统一的：他们不要官方职称。其缘由我在一开始就跟大家讲得很明白：重点不在于精神分析师拥有的知识，而在于他与自己所知之间的关系。

这一点将他与心理师和医生区分开来。

当我们掌握了一种专业知识，我们就是医生或心理师。是好医生还是坏医

③ 有忍耐力的、宽容的；有毅力的，坚韧不拔的；有耐心、能等待的；询诊者；哲学上动作或行为的承受者，对应于 agent 施动者。译者注。

④ 源自 maladie，“病”。译者注。

生另当别论，医生就是医生。在法国，任何时候我都可以知道谁是医生，谁是心理师，因为这些职业类别都有分别对应的国家文凭。但我没本事告诉你们在法国有多少精神分析师。事实上，完全没有概念。

再说呢，还有些精神分析师在社会上是记者、精神科医师、教授、运动员，却每天会接几个做分析的病人。他们跟我这个每天只干这一个活儿，就是接病人的，一样都是精神分析师。我不能把他们看作是业余精神分析师，不存在这么回事。他们做的事涉及移情，他们接受移情运作，跟全部时间用于分析的精神分析师比，不多也不少。

所以，就社会现象而言，精神分析师真的有点复杂。这也是为什么在社会学领域中，这一课题至今都没有较为严肃的研究。因为一位社会学家要做的第一步工作，就是要建立他的对象群体。碰上精神分析师，他做不到。

这会是我们在周一要做的部分工作。

结束这场介绍之前，还有个方法问题要讲一下。

开始的日子里，我会讲很多。跟你们的讨论当然也很重要，但不会花很多时间。时间越往后，越会多给讨论留出时间（第16~19讲）。到最后一天，周二，我不再讲课，我们一起讨论，我和你们、你们彼此之间，我希望是这样。

好吧，休息之前，你们对我刚才的介绍有没有什么问题要问？

（没有问题）

2013年11月1日上午

第2讲 象征符号

我们准备好来讲“象征符号”了？

幸运的是，我有雅克·拉康一篇非常特殊的论文来作依据，标题是：《论厄尼斯特·琼斯的“论象征主义理论”^⑤》。姚洁跟我说拉康的论文在中国已有翻译，你们应该能在拉康文集中找到这篇文章。

文章很珍贵，是一篇非常严肃的评论，针对琼斯1923年的《论象征主义理论》。琼斯那篇文章是对荣格非常严厉的批评。不是因为荣格在“力比多”问题上与弗洛伊德背道而驰，而恰恰是认为荣格有关象征符号的概念与弗洛伊德有关无意识的发现格格不入。

因此我将从这个有关“象征符号”的问题入手，开始我们五天有关精神分析的介绍。它从精神分析运动之初就已经是个核心问题了。而到了拉康，就进入到“象征符号”这个概念的第三阶段：荣格是第一个阶段，为弗洛伊德辩护的琼斯是第二个阶段，拉康是第三个阶段。

当然，这些有关象征符号的概念总在互相混淆。证据呢，早在弗洛伊德《梦的解析》(L'interprétation des rêves)就能读到。

在某一次《梦的解析》再版时，弗洛伊德添加了一个章节，讲的是梦中典型的符号与象征。比方说，你要是梦到一把伞，就意味着“阳具”。带有这一章节的再版刚一发行，就有人——我记得是位匈牙利诗人，说：“好吧，要是

^⑤ Jacques Lacan, 《A la mémoire d'Ernest Jones : Sur sa théorie du symbolisme》 ou 《Sur la théorie du symbolisme d'Ernest Jones》, *Écrits*, Le Seuil, 1966, pp. 697-717. 译者注。

我梦到一个衣橱，就意味着女人的性器官。那要是我梦到女人的性器官，是不是意味着衣橱呢？”这是个幽默的方式，试图揭露这类符号与象征纯属蠢话。

也有弗洛伊德派的人很不高兴书里加了这一章节。

因为书中所有其他的章节：梦的工作、梦中的抑制、梦中的监察者，都和这类象征符号格格不入。弗洛伊德说：“我很遗憾，但这也是事实。梦不仅仅是弗洛伊德式的，它们可以不服从我所构想的有关梦的科学。有时候，它们用的就是这类象征符号。”

所以，不管我怎样尽力区分有关象征符号的三个不同阶段，一定要记得这三种不同的思想互不相斥：在我们的头脑里，它们互相混淆着，尽管在定义和运用中，截然不同。

1 荣格的“象征符号”

荣格对象征符号的概念是跟着希尔贝艾尔（Silberer）走的。我想这个名字你们可能很陌生。希尔贝艾尔当时研究的是催眠式思维，研究人在入睡前那一刻的思维。荣格自1909年开始经营弗洛伊德交付给他的 Imago 杂志，他是受弗洛伊德所托的第一个非犹太人，那本杂志上就曾几次刊登希尔贝艾尔的文章。

琼斯认为，就象征符号而言，荣格没有自己真正独创的理论。希尔贝艾尔才是真正提出这一理论的人，荣格仅仅满足于将它用于实践。所以，他要同时批判荣格和希尔贝艾尔。

那么，这既是荣格的，同时又是希尔贝艾尔的符号与象征理论，究竟是什么呢？

这是最容易介绍的，而且就历史而言，这类理论早在欧洲16世纪文艺复兴时期就已经存在。它认为某些东西能从自身发展出一种涵义，自己就表示着什么，指示着什么。比方，蛇表示着“性”这个想法。诸如此类，有一连串的

原始符号或象征，是对整个人类成立的。荣格终其一生投入于人种学研究，去探访印第安人、墨西哥人或其他人种，有部分的原因是为了这个：他想要验证整个人类通晓同样的原始象征符号。

让我给你们讲一个他自己在《我的一生》（《Ma vie》）中讲到的小故事吧。

记得他是去塔拉乌马拉（Tarahumaras）探访那里的印第安人，爬上一个梯子，到一个谷仓，跟他们聊天。在某个时候，印第安人的首领问他：你的图腾是什么？荣格是瑞士人，他回答说我们瑞士人没有图腾。

之后，人们爬下梯子散去。

所有的印第安人都是面朝空处下梯子的，只有荣格，很自然地跟我们大家一样，面朝着梯子下来。

这一天，他穿了件套头衫，绣有一头熊。印第安人就对他说：“所以它是你的图腾！因为只有熊是这样下梯子的。”

这实在是荣格式“象征符号”最绝妙的说明。

如果我们说一个人“他是头狮子”，用希尔贝艾尔 / 荣格的理论来说，就不是比喻，因为“狮子”说的就是“勇敢”，就好像“蛇”说的就是“性”。整个象征符号理论，涉及的就是物与念之间的这种一一对应。

琼斯的那篇文章认为，跟着这类象征符号走，只会脱离弗洛伊德为我们所开辟的路。

我认为他完全有理，而且很深刻。人们经常说，荣格拒绝弗洛伊德有关性的想法、有关幼稚性的想法，实际上更根本的，是他跟不上弗洛伊德关于符号与象征的理念。

很遗憾的是，因为 1913 年荣格和弗洛伊德之间突如其来的分手，对精神分析造成了不小的灾难。荣格的离去，致使精神分析在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对

各种形态精神病没有兴趣。究其原因，荣格曾是苏黎世伯格茨利精神病院（Burghölzli）的精神医生，有大量的精神病、精神分裂症方面的临床经验；而第一代的弗洛伊德派人，普遍对精神病不感兴趣。

我们晚一点会看到，拉康正好相反。早在成为精神分析师之前，他是精神科医生，是从对精神病的兴趣开始的。他在那篇有关偏执的医学博士论文之后，才投身于精神分析。

我曾整整十年，每星期去听他在圣安娜医院主持的病例演示。我可以向你们保证，拉康完全不会混淆他所从事的精神分析工作与他所受的精神科教育这两件事。

他一生都持续对精神病抱有强烈的兴趣。

所以，荣格有关象征符号的概念比较简单。我希望你们已经理解它所涉及的是什么：一事一物，对应一个普遍笼统的想法（现场没有反应）。

姚洁：大家也许有疑问？我听说在广州有荣格取向的精神分析？

学员：我想问个问题。荣格强调的是集体无意识，所谓的“原型”，他更强调的是人类普遍拥有的那一部分，那个部分是一一对应的……

姚洁：老师刚刚提到这一点。

学员：但有一点我不明白，为什么你们说荣格的取向是精神病的取向？

姚洁：是他接的病人大多是精神病人……呃，让我先翻译过去。

GLG（笑）：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他想要从人类之初去找到所有人类的共同点。对，这涉及的是“集体无意识”，完全正确。

有关精神病的兴趣，很大程度上与他是精神科医生有关，他在伯格茨利有很多的精神病住院病人。伯格茨利是20世纪初瑞士的一个精神病诊所、

精神病院，很高档、很贵，住过一些非常有名的人。

但我并没有讲他有关象征符号的概念形成与他对精神病的兴趣之间有任何直接关系。OK（可以吗）？这是两件不同的事。

现在，对琼斯和弗洛伊德来说，象征符号是个什么性质呢？

我们讲“琼斯和弗洛伊德”，因为琼斯不是为他自己辩论的，他为弗洛伊德辩论。

2 琼斯和弗洛伊德的“象征符号”

琼斯指出，在有关象征符号的本质问题上，弗洛伊德提出了一套划时代的理论。他是有道理的。

我刚刚跟大家提过，荣格定义象征符号的方式早在文艺复兴时期就风行一时，那是16世纪的事。而完全另一套有关信号的概念，将在17世纪的欧洲，在法国诞生——该世纪中叶，出了一部再版50次的巨著，叫《波尔·罗亚尔的逻辑学》（《La logique de Port-Royal》）。

我跳过所有细节，包括谁是波尔·罗亚尔。但在这本书里，有个关于信号的定义极简单，却是个全新的概念：“信号为某人代表着某事物”（Le signe représente quelque chose pour quelqu'un）。

琼斯重提这个定义，并用希尔贝艾尔和荣格有关蛇的例子，辩论说：蛇本身并不代表性的想法，蛇代表着阳具，是阳具代表着性。所以，从来就有一连串的信号。一个信号传递到另一个，另一个再传到下一个，再下一个……

这一点清楚吗？这个可能无穷延续的系列的概念？

琼斯将科学知识的进步，描述成信号的多样化。

为了讲清楚这一点，他编了个故事，说是起初要讲一片“绿叶子”和一片

“黄叶子”，用的是两个完全不同的词。之后，用了两个不同的词来说“绿”和“黄”、同一个词来说“叶子”。琼斯认为用他所维护的弗洛伊德的“象征符号”概念及古典思维来说，这就是“科学的”进步。

他举的另一个例子——当然也是完全杜撰的，是这么个说法：起初，“太阳”就是“父亲”，就像所有崇拜太阳的宗教所确认的。但接下来，语言开始允许我们将“太阳”与“父亲”做出区分：热源、光源、星座，等等。所有这些科学用语都用来更好、更精准而客观地指示“太阳”这个事物本身。

我不知道这么讲够不够清楚？这些论证令琼斯得出结论说，弗洛伊德本人很自然地关注科学思想的模式；弗洛伊德的无意识，在对人类本质的发现中，迈出了新的一步。

但在这套新理念中，一个大问题很快就冒了出来。

我们做了一连串一个比另一个更清楚的信号，但哪一个开始的那个呢？面对这样的一个延续，应该要有一个初始概念！如果在蛇的这个位置上，实际上是阳具，那么阳具这个位置上，是什么呢？琼斯不得不杜撰，制造出“具体的阳具”（*phallus concret*）这个概念。——在这里，拉康笑话他说，哪里都没见过这玩意儿！

这恰恰是整个弗洛伊德有关信号概念的问题。他的“信号”，是一系列的“意象”（*représentations*，再呈现、代表）。

如果你们已经念过《禁忌与图腾》（《*Totem et Tabou*》），应该知道依据同样的理论模式，弗洛伊德杜撰了一个有关“图腾”之父的现代神话。那个被儿子们杀死的父亲，不是任何人的儿子，他是作为所有人类的父亲出现的。好比琼斯那个“具体的阳具”，两者性质相同：它们都是理应在某一系列之初的那个元素。

弗洛伊德和琼斯，命中注定般地需要一个根源，好支撑起他们的整个系列，避免落到“无穷”的理性灾难中。

学员：我念过一篇文章说，科学家需要有个假设。这个假设是个原点，这个原点再往前，我们是没有办法认真追究的。如果我没有理解错，这就像是佛教中的生死轮回。

GLG：我现在没办法就此做任何展开。我写过一本书来比较，一边是弗洛伊德与牛顿，另一边是拉康和爱因斯坦。主要的原因，是因为牛顿在他的物理学说里，需要一个原点。这个事实令他对整个宇宙的起源也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古典思维的整个模式，在同一种知识的构筑中都需要一个原点，但这随着20世纪的到来，被彻底改变了。——回到拉康的“象征符号”理论，他指出，琼斯的理论很漂亮，但他的原点完全是幻想性质的。

我不知道这些思考够不够让你们明确琼斯的立场？我们可以再回来讨论。但现在，允许我给大家介绍一下拉康的（有关信号）概念。

下午我会用更多一点的时间来展开讲，但我们从现在就先开始（讲拉康有关符号的概念）。

3 拉康有关信号的概念

拉康在能指/所指的问题上很直接。他敏锐地感觉到对索绪尔来说，所指是最关键、最重要的。他却相反，（他认为）所指只是能指的后果、效果。

要知道，雅克·拉康的一个基本思想就是，孩子契入语言时，失去了某些东西。这是个内涵丰富的理念，在临床上也一样，但很难理解吃透。我们可以将它与弗洛伊德所谓的“原始对象的丢失”（la perte d'objet initial）——乳房的丢失，联系起来。

这一丢失，拉康没有把它跟断奶联系在一起，而是联系到孩子投入到语言关系的这个事实上。所以，这个失落的客体（对象/物）……跟任何客体（对

象/物)都不像(现场茫然)。——要说出、命名一个事物,先得要放手它、失落它,好在语言中重新找到它们。这失落的物,哪里都找不到却又无所不在,拉康把它叫作“阳具”(phallus)(现场茫然)。

姚洁: 跳得太快了,是吗?

GLG: 很好,很好!应该要好好地从小难度的东西开始。为了你们可以安心一点,我来讲个小故事吧(已经听到松了一口气的声音)。

鉴于我既不能像荣格那样给你们看蛇,也不能像琼斯弄出个“具体的阳具”来,我没这本事,就请听这个故事吧。

一位老人有17头骆驼,临死的时候,他得把这些骆驼分给三个儿子:老大分 $\frac{1}{2}$,老二分 $\frac{1}{3}$,老三分 $\frac{1}{9}$ 。法定如此。

他当然很烦了。因为不能把骆驼一分为二分给自己的孩子,这也是法律严厉禁止的。他只能把骆驼整个地给他的孩子们。所以他不知道该怎么办了:17的一半不存在。怎么办?

他去找了邻居,跟邻居借了头骆驼来。

现在,老人有了18头骆驼。他给老大 $\frac{1}{2}$,9头;老二 $\frac{1}{3}$,6头;老三 $\frac{1}{9}$,2头。 $9+6+2$,等于17,他把借来的骆驼还给邻居,热情感谢(已经有人笑)。

姚洁: 我相信这故事大家听过,可是没想过它有什么意思。

GLG: 这第18个骆驼,就是“阳具”。它只是用来实现操作的。

这是我目前能跟你们说得最具体的拉康意义上的阳具：这是个想象维度上的东西，能使象征维度的操作得以可能，但这象征维度的操作，却会在现实维度引发实际的后果。

所有这些使拉康可以想当然地规避“原始”问题：在这样的操作里，没有原始问题。想象说整个人类之初有个父亲，就科学观来说，比较荒唐。所以，拉康在这个位置上，试着定义一种象征维度的操作，所谓“父式比喻”（la métaphore paternelle），为的是，当有孩子的时候，可以有“父亲”产出，或不产出。

在这个概念里，父亲的产出，并非出于有孩子存在这个唯一事实，而是在母亲的话语里。如果孩子能明白，母亲除了他，对别的事情也有兴趣，那么，就可能有父亲。

现在，我相信是讨论的时候了，你们说呢？我们有5分钟的时间来理清“父亲”这个问题，应该足够了。

4 问题 1：“进入语言”

学员：我们讲到孩子、孩子投入到语言，“所有人都满足了”。为什么都满足了？

GLG：不是这样的，让我来明确一下。

为了满足自己的种种需求，孩子得学会要。我们就教他怎样正确地要，这要很长时间，很难，不是每次都行得通的。

就这样，孩子学会了区分他的满足，把它们延迟到略晚一点的时候。当然，他也就此发现了语言的快乐、语言游戏，但涉及他自身需要的满足，他得进入到直接满足之外的其他游戏中去。

这种间接满足是基本失落的另一个名字，它是由进入语言来实现的。

我们都已经忘了这个，但我相信是它让我们对某种诗的形式特别敏感：那是对这一时期的朦胧记忆。

我们完全不知道失落的是什么，但我们知道我们失落了它。

5 问题 2：“语言”和“象征符号”

学员：这是不是说，语言也是一种象征符号？

GLG：语言是由象征符号造就的。

荣格的象征符号，是某些信号；而对琼斯来说，几乎所有的信号都可以成为象征符号；拉康呢，有些能指符号多多少少比其他的要成功一些，但不存在荣格意义上的象征。或者说，一切都是象征。因为只要你一开口说话，你就契入了这个“阳具”的原始失落中。

这是眼下我能做的唯一解释。拉康说的是：怎样指明我所想说的呢？这样的时候，我只能先说点什么。换言之，只有经过能指的考验，才可能把我想要针对的所指引入。

比方有时候，有人会试着说：“知道我想说什么了吧？”——可你说出来呀！一说就丢了！这有点像是能指的宿命（现场始终困惑的表情）。

姚洁：这样解释行吗？……不行？

GLG：好了，时间到了。

2013年11月1日上午

第3讲 结构问题

下午要讲的，人们一般不会指望从精神分析师那里听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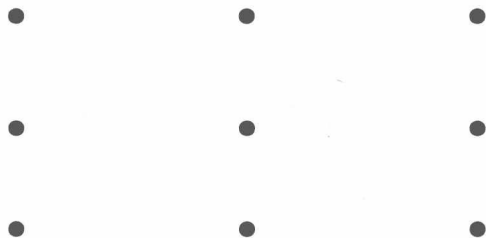
我已经跟大家解释过，想要理解雅克·拉康教学的根本，常常需要兜很大的圈子。因为他不满足于重述弗洛伊德已有的教学或文献，而是作为时代之子来接受弗洛伊德的。

鉴于同样的原因，（因为）我不是雅克·拉康，我不得不加入一些他没有讲过的东西。不是喜欢把事情复杂化，正好相反，是想把它们变得更明确、更直接。

为了帮助你们理解这一点，我给你们介绍一个小游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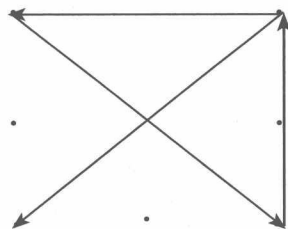
1 9个点的连线游戏

9个点，这样排列：



它们代表着一定的结构，因为每个点之间存在着一定数量的关系。

假定这就是雅克·拉康的教学，游戏规则如下：我们得用一笔连接所有的点，不能超过四条直线（演示）。一、二、三、四？不成。一、二、三……不成，行不通。怎么好？（现场议论。某学员：“所以是要一笔连续的！”）



You're right! You're right. (你说得对！你说得对。)

唯一的解决方式是这样的：

一、二、三……三、四。OK（对吧）？

所以，要创立两个新的点。

这并不犯规，因为我没有动过原先9个点的秩序结构。但有了这两个新的点，我从此可以用旧秩序中所没有的一个新的结构来介绍原先的9个点。

如果你们能接受这种看问题的方式，那现在就能比较容易理解为什么我要去找某些其他的知识点：这些点，雅克·拉康虽然了解，但从未直截了当地讲过。

传统上喜欢把雅克·拉康捆绑在已成法国之过去的“结构主义”名下。这是事实，同时又是谬误。因为随便捆绑什么到这一秩序下，都存在着勉强的成分。

在结构主义运动中，有些法国人的大名，如列维·斯特劳斯、罗兰·巴特、米歇尔·福柯，等等，却很少有人解释：这个结构主义运动本身，怎么就会发生？人怎么会有这样的想法，认为结构会比它所集结的客体更为重要？为什么结构关系会变得比客体本身重要？指出这一点并懂它，非常关键。

比方说，在列维·斯特劳斯的人类学中，是婚姻关系在调节着他所研究的不同社会之差异。从婚姻关系出发，他用一种几乎就是数学的方式，在研究着大千世界的社会结构。

对于这一类事情的研究，通常总是数学家们走在最前沿。首当其冲的是大卫·希尔伯特（David Hilbert）。

2 非欧几里得几何（“公理式”问题）

希尔伯特是位非常重要的德国数学家，1943年离世。他于1885—1890年开始了数学研究，并于1899年发表了一部非常著名的作品，叫《几何基础》（《Les fondements de la géométrie》）。

他在书的前言宣称：我们习惯称作“点”“线”“面”的，也完全可以叫作“啤酒”“杯子”“桌子”。这些物体的属性完全不依赖于它们的本质，与它们的名称更加无关，而是取决于它们之间所保持的关系。

希尔伯特因此成功地将整套欧几里得几何归并到很少的几个公设中，由此建立了被称作“公理式”的方法。

在他之前，早在19世纪中叶，德国数学家黎曼（Riemann）和俄国数学家罗巴切夫斯基（Lobatchevski）也曾发展出两种新几何，每一种都与欧几里得的几何不同。这三种非欧几里得几何的区别之一，就在于它们各自用到的一个公理非常不同。

我相信你们对几何知识足够了解：在一个平面上，通过一个点只有一条直线与已知直线平行。多少个世纪以来，数学家们想要验证这一属性却从未成功。因为他们的验证都不得不重新从这一真理出发，尽管它是否是真理还未得到论证。

因此，这是一个“公设”，换言之，无法验证，因而要求对话者接受。

就“什么是公设”的本性问题，再没有比中世纪一个叫伊本·西拿（Avicenna）的哲学家说得更好的。

我想你们知道亚里士多德的无矛盾律？（不知道）不可能不知道！（某学员玩笑地：“忘记了！”现场笑）无矛盾律取决于这样一个事实：如果你否定一个否定，那就等于是一个肯定。

伊本·西拿就说，要是碰上你的对话者不接受这个定律，你是没办法验证给他看的。所以你就只有烤了他的双脚，直到他讨饶承认烤和不烤不是同一件事。也就是说，表面上看最抽象不过的定律背后，有着身体的投入。

所以，理解所谓公设的本性很重要：它是一种本身无所谓真假或成立与否的宣称，但只要你不接受，就玩不下去了。

学员：是不是也就是公理啊？

姚洁（对 GLG）：能不能区分一下公设与公理？

GLG：不是这么讲的。

到现在为止，我混淆了公设与公理。实际上，它们之间有个陈述性的区别。公设是我要求你接受的；而公理呢，虽然我肯定，但还要你接受它才成。

相反，我现在要在“公设 *postulat* / 公理 *axiome*”与“定理 *théorème*”之间非常清楚地划分出不同。

如果你正确地从一个或几个公理出发，推演到一个定理，这个定理会在公理的保护下，被宣称为成立。

我给你们举一个简单的例子。

在欧几里得几何中，所有三角形的角度总和为 180° ，这是个成立的定理。如果你接受“从一个点出发，只有一条直线与已知线平行”这个公理或公设，你就不得不接受它。黎曼和罗巴切夫斯基从他们各自的角度出发，却分别做出与欧几里得不同的决定。

黎曼几何：经过直线外一点，没有任何直线与该直线平行；而罗巴切夫斯基几何说，经过直线外一点，会有无穷条直线与已知直线平行。所以，经过一个点，一个是零平行，另一个是有无穷的平行线。最终造成的结果之一：对黎曼来说，一个三角形里，三个角的总和大于 180° ，而对于罗巴切夫斯基来说，小于 180° 。

这都成立，重点要选对自己的几何。比方说，在有人居住的这个世界里，欧几里得是最好的。我们在学校学的是这个，建筑师用来造房子的也是这个。相反，研究无穷小的物理学家，通常来讲，他们偏爱罗巴切夫斯基，如果我没弄错的话。而研究天文的，考虑的是宇宙的本质和极大，偏向黎曼。但没有一个人能在绝对的条件上说，哪一个就比别的好，比别的更“成立”。

你们看，这会把所谓“真理”的概念弄得何等的多样化！

所以，这里有个思路上的危险，因为你们很可能会滑入最绝对的“相对主义”中，说：实际上根本就没有最终真理。但这立马就是个矛盾。因为在你宣称“世上没有最终真理”的时候，这个宣称本身正试图成为最终真理。所以，相对主义，也不是个靠得住的思考体系。逻辑上靠不住，伦理上靠不住，我要加一句，政治上也靠不住。所有这些，都将取决于你们对公理/公设的选择。

但有时候，当我们称为“精神分析”的这个长程工作接近尾声时，会认出病人最为关键的幻想。也就是说，是从什么出发，他会认为这个是好的，那个是坏的。没有一个“好的”能对整个人类成立，包括最基本的东西。在加入汉莎同盟的那些波罗的海的沿海城市，阿姆斯特丹、拉埃、鹿特丹，有个格言说：“航行是必需的，活着未必。”要想活着，你就得航行，但没有人是被迫一定要活着的。粗粗地看个大概的话，这句话几乎对整个人类都成立。

3 “数学基础危机”（能指 / 所指脱离的问题）

好了，现在我们要进入数学史上的一些细节。我估计你们不一定知道，除非有人已经在某些哲学研究中遇到过这段历史：就20世纪西方思想史来说，这是很基础的。

我要讲的，是“数学基础危机”。它围绕着三个名字展开（板书（以下略））：Frege（弗雷格），Hilbert（希尔伯特）和Russell（罗素）——英国的哲学家和逻辑学家。

在1892年，弗雷格出了本书，叫《算术基础》（《Les fondements de l'arithmétique》）。你们看，那是个以基础为依据的年代，有个《几何基础》，又有这个《算术基础》。两位作者——希尔伯特和弗雷格，他们都是德国人，还有过书信往来。

弗雷格在他的《算术基础》中，试图将算术基础完全变成逻辑学的。几年过去，他很高兴，确信自己已经成功。但到了1902年，他收到一封无名小辈写来的信。一个叫伯特兰·罗素的年轻人指出，在他这套理论构建的过程中，某个环节上有个令人无法修正的矛盾。弗雷格回复年轻人说：确实如此，这简直是灾难。整个理论构架就此落水！而绝大多数的数学家依然从这套理论出发，都还在无忧无虑地继续着研究，浑然不知在算术的核心有个严重的问题，已经是肯定的。而算术本身，又属于所有数学的核心——所有的数学，包括最为诡辩派的，事实上都建立在实数的秩序上。

我不可能在这里更深入地讨论这些事情细节，但我想给大家讲讲希尔伯特的一手“回刺剑术”，是这个动作让他找到了一个非常古怪的解决方法，最终得出一个完全出乎意料的发现。

多年来，希尔伯特一直在做其他方面的研究，但到了1922年，他决定要

解决上面所说的理论架构中存在的这个问题，就给他的学生们布置了一个工作流程，要论证数学是有能力论证出它不是矛盾的。——我开始从你们脸上看到，你们在问我，我们要走到哪里去？

我们要往一个非常简单的方向去寻找解决办法，我写在黑板上。加法有个属性，叫“可交换性”（commutativité）：

$$a+b=b+a$$

无论次序如何，这么过来也好，那么过去也行，结果相同。

但这里涉及的“*a*”得是随便什么数字，“*b*”也是随便什么数字。而“随便什么数字”，就意味着会有无穷的数字。一旦进入无穷，罗素向弗雷格所指出的矛盾就出来了。

希尔伯特的解法是：我们切断它，我们将单纯研究数学公式，不再拿实际数字作参照。——大家还记得前面我们关于能指 / 所指的讨论吧？在“加法可交换性”这个例子里，“*a*”或“*b*”是能指。当我写“*a*”，这个“*a*”的所指，可以是随便哪个数字。希尔伯特的建议是：单纯研究这些数学文字，不考虑数字本身。

这样一来，他就做出了一个在他之前从未有人做过的动作：隔离出后来被拉康所冠名的“象征维度”（symbolique）。

4 “象征维度”与“被划掉的大A”

拉康提出的“象征维度”这个概念，是认为我们有可能研究只有能指秩序本身的句法，而不像传统经典的做法，依据与它们相关的所指来研究。“象征维度”是能指，而且只有能指，与所指完全脱离。

你们应该记得，在索绪尔的“信号”中，有个横杠。这横杠既分开又联合着上下，我不能在索绪尔的“信号”中脱离所指与能指。

我不知道拉康是否对希尔伯特的论文有所知，非常可能，但我不能肯定。我只知道拉康跟一个叫纪伯（Guilbault）的朋友讨教过，这个纪伯是很棒的数学家。可以肯定的是，从1953年拉康研讨会开始，拉康说的就是 *du symbolique*，是阳性的（我们译“象征维度”作为专用名词）。而在此之前，法语里说到同一个词时，用的都是阴性 *la symbolique*（我们沿用普通名词“象征”）：拉康用的是阳性 *du symbolique, le symbolique*（现场没有明显反应）。

我理解。因为在英语中，也没有阴阳性。但在法语中，阴阳性非常重要。两性的区分，在法国，对法国人来说，首先是语法上的区分。

我们可以说，希尔伯特建议的这个计划想要证明，任何时候，我们都不会在算术演绎中得到这类结论，说：1 跟 1 是不同的。一旦得到论证，我们就可以确立算术的基础，因而确立所有数学的基础。——从一个成立的说法出发，经过正当推理，我们必然能得到一个成立的陈述。

然而，六年过去，当一个非常复杂的论证终于告一段落，在1931年，一位非常年轻的维也纳逻辑学家恰恰做出了一个相反的论证。库尔特·哥德尔（Kurt Gödel）论证出所谓的“算术之不完备定理”（*l'incomplétude de l'arithmétique*，如二阶逻辑就没有完全性定理的事实）。在我看来，是这直接联系着我跟你们介绍过的主题本身，你们在拉康那里看到的写法，在法语中被称作 *grand A barré*（被划掉的大 A）。

这是个很复杂的写法，因为它一边呈现出我们所谓的大他者、大 A 的存在，拉康自己常常将它称为“能指的宝藏”（*le trésor des signifiants*）——这完全是个狂想，意思是说，人所能制造的所有能指，都能归于其中；但另一边，

这写法也是在讲述这样一个简单的事实：当孩子进入语言，他在这个维度中要做的很多。

亏得有这个无边无涯的能指整体或集合，人类才能进入到涵义之中。想知道“大他者”对一个人来说的本性，得到这里来找。

这是我投入到这段历史过程的原因。我想让你们对拉康所依据的是什么，能有点概念。不管他有意还是无意，到了他那个时代，已经有可能去思考一些在弗洛伊德的年代毫无概念的事情。

作为结束，我将依据刚才讲的这些重新确定几个非常临床的坐标。我希望你们能看到事情是怎样环环相扣的。

5 临床上的几个坐标

拉康有篇非常重要的文章，很短，你们一定能在拉康文选中找到，叫《阳具的涵义》（《La signification du phallus》）。你们看，这标题是怎样紧扣着我们前面所讲的：涵义是阳具，阳具是涵义。对拉康来说，两个词几乎就是在说同一件事。

我直接地回到那个“小孩子”上。

孩子进入到语言，以便要到让他满足的对象（客体或物）。在第一时间，当然，他获得了满足。但很快，他要来的这个对象或物，这馈赠，就很值得被当作爱的证据。照料过两三岁或四岁以前孩子的，应该很了解这种要的游戏，孩子要的，不仅是得以满足的对象，而且还要爱的对象。更微妙的是，孩子很快就明白了一件事，那就是他者，可以回应他，或不回应他。这更加强了爱的效应，如果我能这么说的话，加强了他所求的这份爱的效应。

但到了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拉康给这“爱的满足”运动又加上了新的一步。孩子不满足于拿到爱，他还要这爱有个保证。他要确定这爱就是给他的、只给他一个人的。这时候，就对谁都是个灾难了。因为这时候发生的，是所有爱情故事中所发生的：越想要确定你的爱，它越不成功。爱的证据，只在我们不再要这些证据的时候，才真正出来。这一点通常女人们要比男人清楚得多。

好，开始讨论吧。

6 问题1：病人的希望，是“船”还是“活着”？（自杀问题）

学员：我们讲到船、河，我想到我的一个病人曾对我说，他是真的不想活了。我尽管跟他讨论过活下去的希望，可是这希望究竟是“船”还是“活下去”？我觉得精神分析师给的，不是船，但活下去也不是病人想要的。

姚洁：这个问题很好。刚才看大家都没有什么反应，我就猜我们没弄明白为什么老先生要给这么个例子。（对GLG）我能不能跟大家说，如果他们不明白，是因为这说法在他们看来，不太逻辑？

GLG（对姚洁）：不是。是他们总想着，活着是最重要的事情。是这个想法错了，告诉他们吧。

学员：但我想问的是，这个病人是来说他的希望的，这个希望是“船”还是“活着”？我的问题在这里。

GLG：多谢！这让我容易回答多了。

当一个人对您说“我不想活了”，他正将自己投向您。这是最重要的。如果您太快想要说服他，他应该活下去，您正承担着切断与他沟通的风险，给错

他所要的。为的只是尊重您自己的理想，而不是他的。

我曾对一个非常想自杀的人说，我看不出他想对自己做这个删除有什么特别的不妥，我在等着他的下一场分析。这是我当时能跟他说的一切。我很有运气，下一场，他还是来了。

但这不是事先想好，来跟他玩的。他有可能再也不来了。

他已经毅然决然地想要自杀，他只是想要再赌一赌这样做的风险。我于是跟他说，好吧，我们一起赌这一把。这多少有点儿撒谎，因为我没有任何想要自杀的欲望。但在他所遇到的这生之绝望中，我想要陪他走得尽可能的远。

我想再加一句跟我自己相关的。当我在精神病院工作时，我跟三种精神病的典型都打过交道：精神分裂、偏执、抑郁。精神分裂者，很让我吃惊；偏执者，让我倍感兴趣；但抑郁者，我真是非常爱他们。

我曾是个忧郁的孩子，我肯定自己曾经抑郁到极点。但他们所投射出来的种种世界末日的形象，在我的感觉里，是种极端的真相。这就是为什么我那么支持汉莎同盟城市的那句格言。因为要活下去，得工作，得出航，但谁也没强迫谁活着。

当然，我这么说是错的。反过来才是事实：所有人都在强迫你活着。你父母、社会、你的朋友们，所有人都让你不得不活下去。但你看得很清楚，这都是为了他们的利益。有时候，你对他们的利益真的厌倦了，这时候，几乎所有人都可以是有点自杀倾向的。（现场沉默良久。）

学员 1: 最后一句是什么？我没听清楚。

GLG: 当你反应过来，旁人要你活着，因为这是他们感兴趣的。有时候你会厌烦起来，对他们的兴趣完全没有任何兴趣。清楚吗？

学员2 (高声地): 我想问一下老师, 他那样说了之后, 有没有真的自杀的?

GLG: 没有没有, 这个没有。(现场笑。)

姚洁: “这个没有”。换言之, 那句话本身不是操作上的王牌。

GLG: 不是不是。那句话, 我总共只讲过一次。它不适用所有有自杀倾向的人。我从未再说过同样的话, 但我说那句话的精神, 有时候还会真实再现。

姚洁: 那句话传递的信息是: 决定自杀还是不自杀, 在您; 但在这一场生存的困境中, 我会陪您走到尽可能地远——“我在等着您的下一场分析”, 和您一起继续工作下去。

学员2: 我也碰到过这样的个别案例。我非常担心, 这个人如果他真的自杀了, 对我来说, 我就不能再在这个行业上混下去了。

GLG: 该来的总要来的。如果您让活着走在欲望的前面, 这总会来的。我们真的不能强迫他人活着, 即使是为了精神分析获得最大成功。

学员2: 我的问题是这样的: 有没有更好一点的说法? 因为这样的一句话说出去, 万一病人不来了, 媒体会曝光, 我就混不下去了。(现场一片嘈杂, 对提问学员说话、互相交头接耳。)

GLG: ……是, 可能的(现场笑), 这是要担的一个风险。我已经拿数学把你们闷坏了, 该讲点自杀之类可消遣的东西。

当然, 会发生有些病人一去不回头, 再也没有回到他们的……彻底地不再回到他们的分析里来。我自己碰到过一次, 还是二十来年前, 我记得非常、非常、非常清楚! 就不讲了。

学员 3: 我很想说，这类病人，重度抑郁，老师一直都是用精神分析的办法吗？让他们躺下做治疗？

GLG: 不，不。

我用这个想自杀的人做讲解时，绝对不是在讲抑郁症病人。

我再另外给你们一个自杀成功的例子吧，你们可以看到临床状况的多样性。她绝对不是抑郁症病人。

我第一次接待这个病人时，她跟我讲了一些非常搞笑的事。她说：“我见了一堆的精神科医生，他们都觉得我很抑郁。”然后，她加了一句：“我一点儿都不抑郁，我是绝望。”她很有道理。她一点都不抑郁，很活跃，经常笑，但她是绝望到了极点。这个案子，绝望最终赢得了全局。几年后，我输了。我失去了她。

7 问题 2：为什么“不回应”会有“爱的效应”？（“万能”概念）

学员: 关于那个孩子，他不停地要，不停地要，不停地要。我就不明白，为什么“不回应”会有“爱的效应”？

GLG: 这是极为重要的一个点。比拉康在这个位置所强调的还要重要。因为在我看，孩子所发现的是：这个大他者可以满足他，也可以不满足他。

我希望你们在中文的表达里，也有同样的区分：“能不做”和“不能做”是不同的。这肯定很清楚，因为所有的语言都需要这个区别。所以，能“做”又能“不做”的这一个，就能“一切”了。一切有赖于他的意愿。而意愿是我们不能事先了解的东西，它是“随心所欲”或“喜怒无常”。人类的冒险，是

从这里开始的。这个大他者可以“随心所欲”，我所有的满足就都维系于他了。该做什么，才能满足“母亲”这个大M？不是永远都很清楚的。孩子无法很确切地知道母亲要什么。

因为这个缘由昨天我跟你们讲到了精神分析师的欲。这跟母亲的欲有一点点相同。病人无法知道确切来讲你想要什么，是非常重要的。所谓的燃料是这个，在我看来，这是精神分析这场历险所需要的汽油。

我现在要回到先前在准备这几天讲座时，有意放在一边不打算去碰的事。就我那点皮毛知识来看，在中国的传统和思想里，“万能”（la toute-puissance）这个概念即使存在，也不太重要，但它却完全是西方传统的基础。因为上帝的首要属性，就是成为这个“万能”。（现场没有明显反应。）

GLG（对姚洁）：“万能”这概念似乎一点都不清楚？

姚洁：在我看来，是您认为在中国没有这个概念，让大家不知如何定位。忽然这样冒出个“万能”来，说中国没有，他们理解不了。就像我曾问过您的：为什么菩萨就不是万能的呢？

GLG：不是，佛不是法力无边的。

学员1：中国也有“万能”。

姚洁：中国是怎么说的呢？

学员1：什么都能做，没有什么是他不能做的，所有的权力。

GLG：不是，等一下……

学员2：我打断您一下：“万能”在中国，是伟大的、光荣的、永远没有错误的（现场笑）。

GLG：不对。这是强大。

姚洁（对GLG）：这学员没有明说……

GLG (对姚洁): 我明白。

学员 1: 中国的环境……环境…… (其他学员: 以前的皇帝是……)

GLG: 不要找了。

这些都是“强大”或“有势力”。比方说,美国是强大的,中国是强大的,但这跟“万能”毫无关系。要让你们能略微感觉到它指的究竟是什么,我得给你们讲个故事。

这是旧约里约伯 (Job) 的故事,故事是这样的。

在天上,有上帝也有魔鬼。魔鬼说:“随便什么人,我都能让他做出有罪的事。”上帝说:“随你说吧!但碰上我忠诚的造物约伯,你就做不到。”

学员: 是“小辫子”。

姚洁: 什么?

学员: 魔鬼说:“我能抓住随便什么人的小辫子。”上帝说:“除了我的使徒约伯,你抓不住他的的小辫子。”

GLG: OK, OK (好吧,好吧)。

故事接下来是这样的:

魔鬼将各种不幸抛到约伯头上,约伯就想不通了。究竟出了什么事?因为他是上帝最忠实的使徒,他做了所有该做的事。

然后来了三个他的朋友,姑且我把他们称作“心理治疗师”。

第一个试着说服他终究还是有罪的,他一定还是做下了坏事情;另一个说,他也许什么都没做错,但他身边的人做了,他是在替他们偿还那笔债;而

第三个说他不够谦虚，说这是自大的结果，他也许并不是上帝最好的仆人。

约伯对他们说：“走吧，你们！什么都帮不到我！”他继续抱怨着：“为什么我的命这么苦？！”

这时候，上帝出场了。在一篇大论中，他描述了自己所有的美轮美奂的壮举，创世的所有美好：山川、河流、鲜花、岁月、星辰……所有，非常、非常长。结束时，约伯呼喊出：“我知道，我永远都不能明了你是什么！”

这就是“万能”的基础。

不是上帝强大，无所不能，虽然他是强大而无所不能的，而是约伯没有任何资本或手段、才能或方式（moyen），可以拿来弄清楚为什么上帝要做或不做这个。

“万能”，在于对大他者之欲的浑然无知、无从懂起。

这在西方传统中，是非常重要的，但其定位非常具体。

2013年11月1日下午

第4讲 信 号

作为听众，我不太喜欢做讲座的人拼命想讲很多东西，所以自己就尽量不要像他们。我偏向回到前面已经讨论过的东西上。

多亏你们就“能指”与“所指”的区别所提出的问题，我察觉到忘了跟你们讲很重要的一点：费尔迪南·德·索绪尔所介绍的信号究竟是什么？

1 索绪尔的信号

这正是我们在第一版《语言学基础课程》中所能找到的一个图示。你们可以看到索绪尔从“信号”这两个字听到的是什么。

这里是所指，“树”。下面是能指，斜体写的是拉丁语“树”，这些字母：*a、r、b、o、r、e*，是能指。上面这个也是用字母写出的，但不应该总去读它，是所指，被指的什么，“树”这个念头。而这里画的呢，在第一版《课程》里被称为“参照”：一棵树。

这图示假定的，是“能指”会指定“所指”，该“所指”又联系到“参照”。但事实上，索绪尔从未写过这个。《基础课程》是他的学生们根据课堂笔记整理出来的。第一版的时候，他们以为加上这么个小小的树的图案，能帮助人们理解“所指”能带出“参照”。但它与索绪尔在语言学研究所迈出的全新一步、决定性的一步，恰恰相反。

索绪尔提出“目录品名表”（*nomenclature*）这个概念，之后在政治上相当

知名，指的正好是在他之前，人们经常将语言视为一系列的名词，里面每一个都指示着外部世界的一个对象。而索绪尔说，不对。一种语言，在他看来，首先应该在自己的结构中被研究，脱离于它对客体及客观世界状态的指示。道理是很简单的。要知道，语言与它所指的真实对象之间究竟有些什么关系，语言学家一无所知。在“树”这个所指与“那些树究竟是些什么”之间，语言学家未见得就能比旁人多讲得出些什么。

我昨天跟你们讲到希尔伯尔也曾做出的一个决定性举动，建议不去考虑各种算式中的字母所指示的具体数字，只研究纯粹的数学文字。我们保留他与索绪尔之间的所有区别，仅就理论而言，两者做出的动作，性质是一样的：尽管他们似乎互不了解对方的工作，却都选择了研究信号系统内部的逻辑实质，而不考虑它们在教育范围中的所有属性——在希尔伯尔，是具体的数字；在索绪尔，是具体的世间万物及世界的种种状态。

处在这个位置上的索绪尔做出了一个很大、很大的认识论上的决定，就像希尔伯尔一样。正因如此，人们认为他是真正地开辟了语言学的新纪元。

索绪尔之前，曾有过一些知名的语言学家，其中包括德国的洪堡（Humbolt），都没能摆脱这么个完全自然而然的念头，你们这么想，我也是这么想的，那就是：话总在指示着事物。好比“衬衫”，指的是我身上穿着的这个东西。这是真的，但就语言学来说，没有太大意义。清楚吧？

只有在很好地理解了索绪尔在语言与它所指事物之间脱钩的这个操作，拉康才有可能脱离信号与事物的关系，来考虑信号这个问题。他之所以能颠倒索绪尔的写法，将能指放到上面，正是因为所指对他来说，几乎什么都不是。他甚至在某个时候用了下面我要给你们讲解的这个形象，来解释所指的运作。

2 所指的存在

我相信中国农村应该也有这种我们叫桶泵（pompes à godets）的东西，西班牙语叫 noria，是用来泵水的。转盘上吊着一系列的桶，转起来就带桶下去舀到水。（学员：是踩的！）对！再从水底上来，在最高处翻身，再下去。每个木桶轮流在做同一件事：下去舀到水，从水底上来，颠倒时抛出水，再下去。理解吧？

拉康呢，就创了个词，叫 signifiante，相当于这故事里的水。这水，是木桶（也就是说“能指”）要下到井里去找的。水桶将它带到地表，在它一个翻身的时候，是这个颠倒，会做出一个“所指”（现场：啊！）。我得说……

学员：这很有趣，但我们不知道这有什么意思。

GLG：很好，了不起（bravo）！

我做过不少的符号学研究。从严谨的符号学观点、信号运作的观点来看，这是一套很难得到验证的理论。因为它几乎就是在说，一种语言，永远就只是些能指，而所指几乎永远都是同一件事，同一个 signifiante 的碎片，永远就只是些水，没有特殊形态，即使每一个桶都可能不同于其他。事实上，“能指”的一个严格定义就是：它有别于所有的其他。

但我不能相信，所指就没有一点点起码的个体性。这种信念并非来自精神分析实践，而是得益于我做翻译的经验。

算起来已经超过 25 个年头了，我从未停止过从英语到法语的翻译。有时候是诗集，有时候是小说，更经常的是论著，如美国出现的同性恋研究（Gay and Lesbian Studies）。翻译的实践，尤其是诗歌翻译，让我切身体验到某些我

将试图为你们描述的时刻：会有些这样的时候，我很清楚英语表达的所指，但翻译过去，在法语里却找不到能跟它对应的。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在电视上看到过，比方奥林匹克运动会，跳水运动员从高台跳下？电视上有时候会倒片来重播刚才的镜头，像是运动员倒着从水里出来，上到跳板倒着走回去。你们看，那跳水运动员这样“呜喻！”一下，没碰到水，就倒回到他的跳板上去了。理解吗？这形象正是我的感受：一下子找不到法语，赶快！赶快！我就回到英语里来了。

我从这里得出一个信念：没人能够光是在所指这一个层面待得了很久。他得很快整合到能指层面，在那里能说、能沟通，能跟他人或自己讲话。即使最隐私的想法，都在语言里形成、在语言里找到它们的能指。但我不能就此得出结论说，存在的只有能指。我感觉不得不承认，所指是存在的，没有它们，翻译这个操作就无法想象了。

这是为什么拉康有理由很确定地认为，能指的存在是某种极度迅速的一闪而过，快到我们都没有概念，因为涉及语言的神经元活动过程极其迅速。

但近年来科学上对大脑的认识，尤其在记忆运作上的研究进展，多少跟你们刚才给你们的描述一致。如果你们对人脑神经元运作的新进展感兴趣，也许知道：如果我这么做或那么做，被投注的神经元并不完全一样；如果我想要抓住这个杯子，或者我只是把手伸向杯子，大脑神经元的活动并不相同。这就是说，意向性（intentionnalité）这个之前尚属纯哲学的概念，现在变成了一个科学与技术的问题。也许恰恰是这类东西，随着时间的推移，会改变精神分析的形象。我看得很清楚，投身于精神分析的那些年轻的精神科医生与我们这一代的精神科医生，对“记忆”的概念已经完全不同。

我们顺带可以看看“意向性”与“所指”之间的关系：意向性，就其涵义来说，是个矢量，一个展望，包含着甚至直接就是未来，并非一切都在纯粹的

现在，是这一秩序上的什么，这种“瞄准”的秩序，呈现于“能指”的功能运作中，值得被称作“所指”。

现场：……那么，新一代呢？

GLG：新一代？

姚洁：新一代的精神科医生？

GLG：啊。

他们对“记忆”很自然地有个不同的概念，这会让弗洛伊德理论中的一个基础——“事后”理论，变得复杂。（姚洁：“事后”在国内似乎还没有概念⁶。）我来给你们解释一下，讲讲在精神分析的初起，弗洛伊德怎样首创了“事后”这个概念。

3 “事后”概念（精神分析的诞生）

“事后”概念（l'après-coup）第一次出现，是在弗洛伊德 1897 年写给他朋友弗里兹（Fliess）的一封 40 页长信里。

他与弗里兹有过很长时间的书信往来，十年里，几乎每天一封信。这些信 1950 年出版，成为最早的弗洛伊德文献之一。我希望有或者将会有中文的译本，因为想要理解精神分析的诞生，这些书信是非常重要的。There is a splendide édition in English（有个英文版本，非常出色）。

在这封信的中间位置，弗洛伊德讲到艾玛（Emma）这个案例。

⁶ 但丛中老师早在 2008 年就从救灾援助的实践出发，相当细腻地做出了自己的思考，清晰表明了立场。参阅丛中《救灾与文化》：http://blog.sina.com.cn/s/blog_49cf793d01009a4x.html，译者注。

艾玛这位年轻女子表现出一种典型的恐惧症：她不能一个人独自去买衣服。很简单的“去买衣服”这个念头，就足以令她焦虑。她对弗洛伊德说：“噢！我知道为什么。12岁的时候，我跟妈妈去买衣服，店里有两个年轻伙计，其中一个笑了。”

弗洛伊德回答：“我听不懂。”——你们看，这不是个创伤理论的信奉者，没有用不愉快的记忆来解释疾病。

创伤理论在我们这个星球上到处流行，既在精神科也在其他领域。它的错误，是太过直接地因果对应了。人们以为它的诞生归功于精神分析，拿童年性创伤去解释一切，事实上，根本不是那么回事，甚至完全相反。

弗洛伊德对艾玛说，应该有别的事。“告诉我您现在想到了什么？”

她开始的时候回答：什么都没有，我什么都没想到、什么都没看到。弗洛伊德那时候离催眠师还不太远，他没做催眠，但把手放在艾玛额头上，做了个暗示，说：“应该还有另一个记忆。”

一件事情开始的时候，总是那么的美好：这个操作成功了！——你们今天千万不要去做同样的事，不会成功的。失灵已经有一个世纪了（全场笑）。

但在那个时候，随之而来的记忆是这样的：8岁时，艾玛去一家杂货铺买糖果，年迈的杂货铺老板想对她动手动脚，去摸她的下面时，笑了。

事情发生后，艾玛回到家，什么都不明白。她并没有很特别地受到什么创伤，什么都没对家里说，谁都没带她去过警察局。

但弗洛伊德说：“这就对了，这是第一事件。并不在于这事情本身带有多少性的意味，而是因为杂货铺老板‘笑了’。”你们记得，艾玛讲述的第一记忆，关键就在那两个小伙计里的一个，笑了。这恰恰是弗洛伊德那个阶段所称的：一个 Übertragung（德），移情。——“移情”概念产生时，并不是病人对分析师的感情，而是情感从一个意象到另一个意象的过渡。

手上有了这些回忆，有了两个记忆场面和后续的恐惧表现，弗洛伊德这时

就可以找到他创立自己理论的位置：在一个人的历史中，“性”有两个时间。

对记忆场面的理解是建立在这样一个事实之上的：当第一场景发生，孩子保留了记忆。但究竟发生了什么？她不知道。孩子没有任何资本或手段、才能或方式（moyen）可以弄明白。艾玛既不明白年迈的杂货铺老板对她私处的兴趣，也不明白为什么他要笑。但很清楚，她留住了这个问题：可是究竟发生了什么？

几年后，没有任何特殊事件将第一场景带到意识层面，身上青春期的来临让她明白了当年不曾明白的。所以，她是“事后”明白的，几年之后，才明白她8岁时发生了什么。但这“事后”，也同时是“压抑”这个机制发生的时间。因为在艾玛的叙述中，她自己完全没有意识到，在小伙计的笑与老头儿的笑之间，有任何关联。

两个场景围绕着“性”这个特征而互相扣在一起，却是很清楚的。涉及的小伙计，艾玛说过“他让我喜欢”。

弗洛伊德于是跟自己说：“很好，这就是了！我明白这恐惧里究竟发生什么了。因为这恰恰跟我在《梦的解析》中所描述的一样，跟梦的运作一样。”

弗洛伊德1921年在《梦的解析》所添加的注解里，有一条这样写道：人总是对梦很有兴趣，但他们所感兴趣的，从来就只是“表现出来的梦”，换言之，梦的表面文字。

他继续说，幸运的是，现在某些精神分析师知道了在表现出来的梦之下，有“梦所潜伏的思想”。但不幸的是，我将他们的注意力吸引到这些潜伏思想的存在之上，他们却制造着跟旁人一模一样的错误，无非颠倒而已。他们以为，唯一重要的，是梦所潜伏的思想。

弗洛伊德说：根本不是！重要的，是这些潜伏的思想以何种方式被转化为表现出来的梦。一个原本很危险的想法，是怎样被转化为平淡无奇、好像什么意思都没有的？在这里，有整个监察者所做的功，在梦的酝酿过程中，是决定

性的。

你们看，回到艾玛的故事，他感觉正在做同样的事。年迈的杂货店老板那个场景，是在“潜伏的思想”这个层面的，而什么意思都没有的笑，却使得艾玛可以在两个场景之间做出“移情”。于是，为了能成功躲过再次落入这笑，避免带出她最终明白了的第一场景，她就再也不能一个人去商店。

为的是躲过那些与性相关的感觉反复出现。是那些感觉，在“事后”给那个起初只是神秘的场景抹上了“色”。

这是“事后”理论的第一个例子，你们会在“狼人”一案中，找到更多的展开。在那个案例里，弗洛伊德真的给出了“事后”概念的全部外延。

我希望所有这些能帮助你们更好地理解弗洛伊德意义上的“事后”概念，将它与创伤理论做出区分。我们可以将精神分析的诞生，记在这个“事后”理论诞生的日子上。

因为你们知道，直到这个日子之前，是弗洛伊德自己最早建立起有关歇斯底里的创伤理论。

他那时候认为，歇斯底里症病人是真的曾经受到家长或教导员的诱骗。他就在维也纳一家精神科的治疗机构做了个调查，派了他的第一个学生，叫加特利（Gatell）的，带着问卷，调查了100个被确诊为歇斯底里症的病人。100个病人里，95%宣称曾被性滥用。弗洛伊德就对自己说：这不可能。他会重新审视自己的创伤理论，部分原因是这个。

而他的“事后”理论，让我们这样推想：童年幼稚的性之后，随着生殖性的来临，幻想的形成重新演绎了曾经发生过（或不曾发生）的事情。所以，不管是哪种模式的创伤理论，都忘了病人对发生的事做出演绎的这一主观时间。

然而造成创伤的，恰恰是这演绎，而不是当初那一事件本身。

这能让你们理解，为什么有些悲剧性因素并不造成创伤，而病人自己一些很简单的反思，有时候，甚至完全是局外人的随口一说，都会变成他终生的创伤。

就这样了（现场长时间的沉默）。

姚洁（笑）：该你们了（沉默继续）。大家都睡过去了，还是陷入了沉思？

GLG：你们都睡过去了？被我的声音催眠了？这真要命！

学员：刚才听了老师说的话，我特别想鼓掌，因为我觉得听着特别过瘾：太清楚、太透彻了！（掌声爆发）

4 问题：“幻想”从何而来？

学员：根据“事后”理论，不管童年有没有过创伤，都有个幻想。这幻想创造或演绎、重新演绎，引发症状。那么这幻想是从哪里来的呢？在这个演绎和内部的精神结构之间，有没有什么联系？

GLG：多谢，非常感谢！您让我有机会就整个精神分析历史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做一个明确的解释。

你们肯定知道，弗洛伊德发明了一个“精神现实”（*réalité psychique*）。他说，有一个 *Wirklichkeit*，“客观事实”（*réalité effective*）……*Wirklich* 的意思是 *true*，实实在在的。那是些历史性的事实，有根有据的事实。在此之上，他加上了 *Neben*，“旁边”还有个 *Psychische Realität*，“精神事实”，精神活动中的事实，心理上的事实。

那些跟在他后面的弗洛伊德派，深陷其中而不能自拔，说是客观事实对我们弗洛伊德派是不重要的，唯一重要的是精神事实，是幻想。

拉康从来就不同意这个说法。他晚年甚至主张，精神事实或宗教事实是一回事。弗洛伊德派的人捏造了“俄狄浦斯”这个宗教，成为信奉和遵守这种教规的人。我在这一点上，与他的看法完全一致：幻想是很重要，但世上不单单只有幻想。如果你们能用心阅读弗洛伊德，就会看到，他从未完全放弃他的创伤理论。

如果用同一个例子，今天跟昨天、跟昨天之前一样，总是有年幼的孩童在被性滥用。对某些人来说，这将是一个很恐怖的创伤，另一些人却完全不受影响。但它却触及当今一个炙手可热的问题。

我想象得出，在中国应该跟在其他地方一样，保护儿童的问题给司法部门带来很大的压力，但在法国和美国，走得更远。最近几年，法国有过不少司法惨案、冤案，很多人被告、被审判，扔进监狱五年或十年。即使案子中告过他们的孩子自己，都已经最终说出“我很抱歉，这完全是我杜撰的”。

今天，同性恋已不再被视为有罪，再好不过，但恋童癖却顶替同性恋，成为罪大恶极，所有涉及其中的人都必须严惩，因为是“绝对的坏”。

所有的社会都很喜欢世上存在着“绝对坏”这个概念。在基督教传统中，魔鬼是用来做这个角色的。但我相信你们也有，你们有你们自己“绝对坏”的理念。

所以，回到刚才提出的问题，我可以很清楚地告诉你们：“幻想”的发现改变了我们看问题的立场或位置，改变了事情的状况或局势，但并没有改变相关问题的数据和已知条件。

为此，我得跟你们讲解一下弗洛伊德对什么是“幻想”解释得最为精到的那本书，那是他对达·芬奇的一个分析。

列奥纳多·达·芬奇（Léonardo Da Vinci），这位大画家、大发明家，曾讲

到自己的一个童年回忆，年幼到不可思议。因为照他自己说来，是他还在摇篮中的事情。当然，这是位天才，可终究是……夸张了一点。

我们有理由相信，谁都无法留住语言开始之前的记忆。有人说能的，但我们没必要强迫自己去相信他们。所以，弗洛伊德着手将这记忆当作幻想来揭示，从达·芬奇的一张画出发。不是蒙娜丽莎（la Joconde），是表现童年耶稣被圣母玛利亚抱在怀里的那张……好吧，这些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在这时候，弗洛伊德说，幻想由那些“小小的真实的什么都不是”（法：petits riens réels；德：Nichtigkeiten）制造而出，它们被“私密的动机”（法：motif secret；德：Geheim Motiv）组织、选择，并组装。

当我们比较深究细节地接近弗洛伊德，这类情况有时候会显得够单调的。我刚刚跟你们讲到的幻想，正是他有关梦的说法。你们知道，对弗洛伊德来说，梦是由他所谓的“白日梦残余”（restes diurnes）所组成的，经常是对当天的记忆。这些白日幻想的记忆残余，被“童稚”的欲拿来，经组织而成为梦。

就此观点来看，幻想的制造完全相同：几乎总是有些现实的元素在，但完全不等于说，被描述的场景就真实发生过，要看你们这些临床实践者、精神分析师如何来发现、解析，与其相关的这个“私密的动机”究竟是什么。

一旦这“私密的动机”成为话语中发生的事件，在你们和你们的病人之间得到沟通，那么这些小小的“什么真实都不是”（les petits riens-réels）就会重新变成它们原先小小的、真实的“什么都不是”（les petits-riens réels），而你们，也许可以找到病人以梦或“记忆之屏”（souvenir écran）的方式将它们组织成幻想的原点。

最为通常的情况，幻想是以完美的叙述单元呈现的，经常被放到一个句子里说出。但一经分析，它经常与梦一样具有异质性，会解体而重现潜伏其中的不同组成部分。这些组成部分能帮助我们猜测到监察者曾做过的动作是什么。

你们很清楚，要想解析一个梦，尤其当它表现为相当好的叙述性情节时，与其再在这个情节上超载新的解析，远不如请病人将梦切分为碎片，一个碎片、一个碎片地去拿，避免陷入叙述整体的影响之中。这个整体只是弗洛伊德称为“次生酝酿”所得出的结果，它自己也是监察者的一个副产品。

弗洛伊德经常说，梦比我们所能相信的要疯狂得多。要想解析一个梦，就得与叙事的结构斗争，还给话语这个可以疯狂的机会。接下来的两天我肯定会用更多的时间来给你们讲讲所谓的“基础规则”（*règle fondamentale*），也就是说，邀请病人按他思路本身的无序，“来什么说什么”。这个由弗洛伊德创造、备受拉康尊重与扩展的基础规则，在精神分析的实践中，完全是决定性的。

病人阻抗的重头，就在于以叙述的方式组织他的思维。

（掌声）

2013年11月1日下午

第 5 讲 弗洛伊德的“我”

今天上午，我想给大家推荐一个很实用的练习，是我很喜欢的。我们将就同一件事，做两种不同思维模式的比较。在精神分析的教学中，有个很常见的问题就是我们每次只看到一种理论。所以人们很快就忘了：针对同一个对象，从来就不会只有一个观点。

比方说，举一个跟我相关的例子。当我想要用法语阅读弗洛伊德时，很难，因为那时候能找到的法译本很糟。我于是去学德文，想用德文阅读弗洛伊德。很不幸，我的德文不足以真正独立地去读懂他，于是我不停地研习两种不同版本：法译本和德语原文。

多亏这文本上的不同，我可以自问：就这件事而言，为什么弗洛伊德是这样讲，而不是另外那种说法？我向你们保证，这种阅读方式让我对弗洛伊德的解读达到了单独念一种语言所无法到达的深度。

我补充一段关于拉康教学的历史性信息，一段拉康研讨会的历史。我猜你们应该不知道，所以要讲其中一个部分。

1 对比阅读的必要性（拉康研讨会文本的历史）

由于我不想太进入细节的历史原因，雅克·拉康在 1953 年开始了他的研讨会。他是 1901 年生人，那年他 52 岁。

课程首先从圣 - 安娜医院——巴黎最大的精神病医院开始，用的是法国精

神分析协会（la Société française de psychanalyse）的名义，该协会当时正处于即将被国际精神分析协会认可的过程中。研讨会每周一场，每场两个小时。拉康通过这次研讨会讲述了他对精神分析的理解，并开始做他解读弗洛伊德的研习。

要知道，那时候的法国人已经不再读弗洛伊德了，大家转而读的是弗洛伊德的弟子。弗洛伊德被认为太过日耳曼、太复杂，最好去阅读那些糟透了的法文版本，尤其是法国人的阐述与评论，看那些东西，事情就简单多了。

拉康直接对这种现象做出了反应。他说：应该阅读弗洛伊德本人的文字，忘掉那些关于弗洛伊德的阐述与评论。这个倡议也是我想要给你们的：如果谁对拉康感兴趣，不要光是听别人讲拉康，要亲自去阅读拉康。

我要讲的这个历史性的重点是：从最初的研讨会开始，拉康就用了一个打字员。这个人在现场打字记录她所听到的，然后回家整理成文字。在这里说过的，将会被铭记、刻写下来。那个年代做出这样的决定，还是很少见的。

那时候还没有录音机。所以，在打字员能听到并能理解的、她在整个研讨会过程中所记录的，一直到她最后能落成文字的，中间有无数次出错的风险。即使15年、20年来，拉康用的是同一个打字员，她最终所定下来的稿子还是错误百出。而拉康，尽管每周收到打字稿，却从未纠正过它们。20年过去，到了1973年，始终是这个情形。研讨会却一个跟着一个，堆放打字稿的柜子很快就满了。

拉康名声大噪，令一家很大的法国出版社在1966年找上门来，想出版他从研讨会出发而写的文章。这些文章同样出得很成功。所以几年后，同一家出版社想要出版研讨会的文稿。这就要有人去校对打字员手上出来的那些错误累累的稿子了。

拉康把这个任务交给了他的女婿雅克-阿兰·米勒（Jacques-Alain Miller）。1973年，第一本有关研讨会的作品出版，拉康现场第11期的研讨会记录是法文版的第一本书。拉康派的分析师从此打成一团，想弄清楚雅克-阿兰·米勒有没有道理这么或那么誊写。大家都知道这些文字的基础是那些打字稿。所以

你们看，对拉康感兴趣的法国精神分析师们，跟我对弗洛伊德感兴趣、手上却只有糟糕译本时，碰到的是同样的困境。

我想研究拉康，就会是这种情况：我当然对雅克·阿兰·米勒出版的官方版本很有兴趣，但这些书是不肯定的，某些句子甚至是错的。所以，每次当我真的想要拿某个句子作依据时，得去拿打字稿对一下，推敲它曾怎样被记录。

同样地，你们最起码也可以做两个不同翻译版本的比较。不是每个字去钻牛角尖，因为这得放大量的工作进去。但当你们想要用某句话或某个段落作依据，那就是时候了，去做吧：对比不同版本！

这么长的引子之后，我将为你们介绍什么是弗洛伊德的“我”（moi，常规译“自我”），然后会讲什么是拉康的“主体”（sujet）。在中文里，“我”和“主体”是两个不同的词吗？

我问这个术语上的问题，是因为我用西班牙语做讲座时，碰到过在西班牙语里，主语的“我”和宾格的“我”是同一个词。德语跟西班牙语一样，同一个词 Ich（板书），“我”。如果我把它名词化，就成为 das Ich，宾格的“我”。而法语呢，在 je 和 moi（主宾格的“我”，好比英语的 I 和 me）之间，即使都是第一人称，有着极大的分别。

但在进入“我”与“主体”之前，我得先给大家理一理，什么是弗洛伊德的“意象”（représentation），什么是拉康的“能指”（signifiant）。

2 弗洛伊德的“意象”

德语里“意象”这个词，是 Vorstellung：Vor- 是“前-”，-stellen 是“放、置”。我打算先跟你们讲讲，“意象”这个概念为什么会在西方变得如此重要。

因为我相信在这一点上，你们跟这三种文化没有任何相同的传统。

你们将会看到，从英语的 the idea 到德语的 Vorstellung, représentation 实际上定位在怎样复杂的一个交接点上。(姚)洁现在有许多活儿要干了。

La représentation 首先是指一出戏，当我们“给出一个 représentation”，就是“表演”，当它发生，就是“上演”。我怀疑在中文里，会完全是另一个词，但停留在法语 représentation，还有第二个意思，与宗教有关。

在法国和欧洲，16世纪曾有过一次巨大的宗教分裂，发生在天主教与新教之间。令两派分道扬镳、沉重到人们为此而相互厮杀的关键点之一，是要知道圣体究竟是耶稣的身体，还是只不过“代表”(représentait)耶稣的身体。这极其重要，因为耶稣曾说：“这是我的身体，这是我的血。”

新教的人于是说：“他讲的是隐喻，这面包和酒只是代表他身体和血的符号 (signe, 信号)。”昨天我跟你们讲到，应该给予象征符号它所应有的重要性。你们看，曾经有过那样一些年代，人们真的会为这些事而互相残杀。Représentation 的第二个意思，我们就叫它宗教上的意义吧。

它的第三种意思涉及政治，这又得归功于英国人。临近16世纪末，英国人有了这么个想法，认为某些人可以在议会上政治性地代表另一些人。这念头在今天已经习以为常，对你们和对我都一样：我们都是被我们的代表代表着的，我们的议会代表通过我们的选举而产生。这是 représentation 的第三个意思。

中文中有相对应的吗？全国人大和人民代表？知道了。

最后呢，représentation 的第四个意思，是哲学上的。它是我对某事物的想法，我头脑中对某事物的再呈现。你们明白为什么对大多数在西方做哲学的人来说，一个 représentation 必然是意识层面的？因为它得跟某个主体相联系，要这个主体来想到它，而弗洛伊德却提出个“无意识意象”的概念。

当他提出他所谓的“动态无意识”(l'inconscient dynamique)这个概念时，

这个概念不是简单的“不是意识的”。动态的无意识，是另一层面的运作……

姚洁：能不能给我们略微解释一下？有些人将它理解为机械模式的“动力”^⑦。

GLG：啊，我解释一下。我在说 *dynamique* 时，脑子里是弗洛伊德用的德文 *dynamische*，但他想说的并不是这个意思……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弗洛伊德知道得很清楚，“无意识”（*unbewusste*）不是他创造的词。已经有很多哲学家说过，意识是一回事，还有很多念头是意识所不能及的。换言之，他们通过跟意识的关系来定义“无意识”，好像所有人都知道“意识”是什么。而今天我们知道，最难以定性的一个东西就是意识了！

弗洛伊德呢，认为自己发现的是跟“非意识”不同的一个什么。他认为自己发现了一种原始的组织形式，这是他所谓的“无意识”。弗洛伊德的无意识有它非常具体的意思，是指意象在这一层面的运作，完全不同于它们在意识层面的运作。

你们看，弗洛伊德所定义的这种“无意识”中，究竟有什么？主要的（但不仅仅！）就是些意象！所以，提出这一“无意识”的同时，他就发明了“无意识意象”这个概念。从哲学角度来说，概念上是矛盾的。

这没让他觉得有多不方便，但要理解是谁在操纵意识与无意识的意象，他就得找到一个施动者，很具体地，这个操纵者，被他称为“我”。

3 “我”

我很坚持这一点：“我”对弗洛伊德来说，不是一个自然的实体。

^⑦ 翻译“动力”的好处，是可以得到“力比多之动”这层意思。译者注。

我们想都不用想，就认为再没有比“自我”更自然的了，每个人都有个“自我”，等等。这个“自我”，什么都知道，在小说、剧本里，到处可见，而在弗洛伊德这里，则要具体得多、确切得多。

我昨天跟你们讲到过艾玛这个案例，在这个案例出现的那篇文章中，艾玛的故事在第二部分，而整个第一部分的前20或22个章节中，有一章就叫 *Einführung des Ich.*（为了引介“我”）。

这里，我需要你们拿出全部的注意力。

弗洛伊德首先认为在大脑神经系统中，有些直接的和原生的链接，他称之为“原生系统”（*système primaire*）。我们一时还不能说这个原生系统所涉及的是“意象”，因为那还是个极为生物学的观点：弗洛伊德那时候不是心理师，他是神经科医生。他认为，通过感知觉会有一些的（能）量从外部世界而来，这些量，以“纯联系”（*pure association*，同“纯联想”）的规律，在神经系统中扩散。

姚洁：能不能为我们解释一下，在这个神经系统的层面，什么叫“纯联系”？

GLG：联系或联想（*l'association*），是链接、连接。

如果你们有一定的神经学知识，会知道神经元是通过我们叫作“突触”（*synapses*）的这种东西来相互连接的。当能量到达一个神经元，就会通过突触传递到其他神经元上去。这是弗洛伊德所称的“纯联系”，机械联系。

但这个系统的整体，会遵循一个绝对必要的原则：它得将痛楚维持在最低值。要做到这一点，就得锁住某些会制造痛楚的联系（同“联想”）。这一定让你们觉得非常复杂——的确复杂！但正是在这个时候、这个位置上，弗洛伊德

发明了或者更确切地说，“引入”了“我”这个概念。

“我”，他说，是一定量的神经元持续不断地被投注，它们自我闭合、自成一体。这个“我”的第一功能，就是抑制某些原生过程。这不是我们每个人能对“我”所产生的第一想法，却是弗洛伊德整个思想的出发点。

我们可以说，就某种方式而言，这个“我”很必需，但弗洛伊德实在没给它太高的评价。比方在《梦的解析》里，某个时候弗洛伊德在讲到这个“我”时，说它是那种特殊的小丑，叫“奥古斯特”(Auguste)的，不做什么大事，却老是跑到台上，自以为所有的掌声都是给他的。只要一出戏里刚刚有人做了什么得到掌声，奥古斯特就来了，鞠躬、致谢，好像是他刚刚演完整场。这不太光彩，跟我们顺理成章地认为“我”多少有点重要、有点尊贵，实在对应不上。

我要指出相当值得注意的一点：弗洛伊德用了完全相同的一个动词 *Einführung*，“介绍”或“引入”，1897年给这个“我”、1914年在他《为引介自恋》(《*Einführung des Narzissmus*》)一文中，提出“自恋”这个概念。

事实上，这个“我”还有另一个很关键的功能：它是感知与意识之所在。因为它有抑制原生过程的能力，对弗洛伊德来说，它就对“精神装置”(l'appareil psychique)握有实质性的操纵力。

所以，你们看弗洛伊德的这个 *Ich*，有多么模糊不清！一方面，如果我在德语中将它名词化，变成 *das Ich*，我就将它转化为小丑，没什么大不了的；另一方面，*Ich* 又是主格的“我”，是指使动作行为的主体（同“主语”）。

打个比方——我借此结束关于这个知识点的介绍，“压抑”(refoulement)这个在弗洛伊德的世界里相当关键的概念，其过程就非常依赖于“我”。

4 “压抑”与“原始压抑”

“压抑”是施加于被“我”判断为与它互“不相容”的那些意象上的，这是弗洛伊德的用词。

弗洛伊德在这一点上非常坚持“被压抑的”不是简单的与性相关的意象，而是被“我”判定为不能相容的意象，不管这意象出自什么名头。

在压抑的动态过程中，“我”是有资本因而有所作为的，因为它自己就是被大量投注的神经元。它能在原生系统做出干预，把这些意象推回去——或者，不如这么说：那些能量本来要去惊醒可能引发痛楚的神经元，而“我”有本事将这些能量偏移，（大量投注）到无伤大雅的其他神经元上去。

但弗洛伊德有个实践精神。你们知道，你想要让某人出去，光是把人推出门是不足以了事的。光是把那些意象推出去，也不足以将它们就此压制下去。它们得同时被无意识吸引住才行。

在这时候，我们会发现今天我讲琼斯和“阳具”时说到的，有个思考这一切的由来、思考原始点的必要。弗洛伊德需要去想曾经有过一个“原始压抑”（*refoulement originaire*），就此，他没什么好说的，却在逻辑上需要它，好从一开始，就有个什么在吸引着那些意象，让它们最终能得以被压抑。

我很坚持这一点，那就是没有任何临床上的“原始压抑”。很多临床工作者认为原始压抑是存在的，既然弗洛伊德都称它为“原始”，它才是最深刻的。但我认为他们完全错了。

原始压抑只是弗洛伊德在理论和逻辑上不得不做的一个假定，只有这样，他的整个理论或逻辑体系才站得住脚。因此，在整个精神分析的知识体系中，弗洛伊德的也好、拉康或其他人的也好，留意区分有可能是临床的还是纯粹属

于逻辑需要而建构的，非常重要。

这是为什么“分离”（séparation）这个概念，在精神分析中如此经典，但一旦想去分离理论和实践，做纯粹的临床实践者或搞纯理论，我看都很荒唐。

好了，我讲完了，大家从现在开始讨论。（姚洁：先休息吧！）我们休息，然后讨论。OK（好）！

2013年11月2日上午

第6讲 拉康的“主体”

我怀疑，对你们来说，围绕着弗洛伊德的“我”这个概念，还有很多阴影，看得不甚分明，因而我打算通过解释它不同寻常的一个方面来说服你们。这个总被收入心理学范畴的“我”的概念，首先是弗洛伊德作为生理学家、神经科医生、科学家，在当时的某些领域中，这个概念是被酝酿而出的。它只是更为宽泛的一个结构中的元素。

正如我昨天对你们说的，元素间的关系比元素本身更为重要。比方说，在被称为弗洛伊德第一拓扑的无意识/前意识/意识，这个“我”并不占第一舞台。它同时是前意识与意识，却并不排斥它本身的一部分，也可能是无意识的。

你们看，这个“我”，亦即，这个感知-意识系统，名正言顺地是所有动作行为的施动者、语法上的主语、做出行动的那个。而现在，我将为你们展示拉康这个要做弗洛伊德派的，介绍的是怎样的一套完全不同的关于“我”的理论。

我觉得非常有意思的是这个立场。例如，某人说：“我在这一点上不同意您，但说到底，我想的跟您想的一样。”这句话很难翻译，因为很难说（现场笑）。

拉康认为他所瞄准的是弗洛伊德所讲的东西或事情（chose）本身，言下之意是他听到弗洛伊德说的。弗洛伊德当然是以他的方式说出的，我们也可以用来其他方式来讲同一件事。用我们昨天所进入的信号系统（所指、能指、参照）来说，就好比拉康认为他与弗洛伊德用的是同一个参照物，只是他用了另一套能指。

然而，在这个有关“我”的问题上，拉康是以一种完全不同的方式进入他要处理的材料的。在这个位置上，发生了一些精神分析史上独一无二的事情。

1 “镜像期”的历史

你们也许知道，数学家们大多出道很早、老得很快，三四十岁，就是个很老的数学家了。就像摩托赛的冠军，大多不到 20 岁。精神分析师则相反。他们得了解太多东西，是无法杜撰的。通常来说，人到了 40 岁，我们还是个非常年轻的分析师（现场笑）。我很遗憾，但事实如此。

好吧，想象一下 1936 年，拉康 35 岁，他开始进行精神分析，并应国际精神分析协会之邀，参加在捷克斯洛伐克马里昂巴德（Marienbad）举办的大会。

当时他做精神分析师只有一年，却已经在 1931 年写出一篇相当出色的精神病学论文，成为他那一代人里最出色的精神科医生，而且与当年的很多天知识分子关系甚密。我不跟你们提这些名字了，因为你们不熟，我目前也没有兴趣说这个，知道他与当时整个超现实主义运动相关就好。所以，他在知识领域有巨大的野心。这一点，从他整体上看不起当年的精神科医生、精神分析师，就可以略见一斑。他把他们当白痴，经常还是没有理由的。

好吧，1936 年在马里昂巴德，拉康宣读了他的讲稿，被他自始至终称为“镜像期”。我知道你们了解这说法。但实际上，在马里昂巴德发生的情况很糟。因为那时候，精神分析界没人知道拉康，他只有资格说 10 分钟的话。所以，没等他念完，当时主持会议的琼斯就打断了他，直截了当地说了再见。拉康整整 12 年没有再参加国际精神分析协会组织的任何会议。

他在马里昂巴德讲了什么？

从某种方式来说，他提前讲出了奥地利的一个叫康拉德·洛伦兹（Konrad

Lorenz)的学者后来的一个发现。这个发现在英语里有个名字,叫 imprinting (铭印)。我解释一下是怎么回事。

洛伦兹是动物学家,研究灰雁的专家。你们知道这事吧?(多少人知道?)洛伦兹意识到,当小灰雁在很小的时候见过他以后,即使长到成雁,它们都会跟着他,而不是它们的妈妈,OK(清楚吧)?英语中,“铭印”在时间框架中,出现在非常年幼的抚养期。在某个时间里,一个形象会固定下来,使得幼小的灰雁会跟随它在这个年龄看见的形象。如果是它妈妈,它会跟着妈妈,如果是洛伦兹,它就会跟着洛伦兹,一生一世。格式塔理论(Gestalt)的高奏凯旋,正是落在这个时候,它讲述了形态的重要性。

1920—1930年,最流行的就是各种形态的威力。超现实主义画家所取的,是这个方向;儿童心理学中一定数量的发现,也同样是这个方向。其中就有那时候很有名的一个法国心理学家,叫亨利·瓦伦(Henri Wallon),他在科学观察中发现,6~18个月的孩子,尽管方式不同,却都很肯定地对他们在镜中的形象颇有兴趣。但如果我们把一个同龄的小猩猩放到镜子前面,面对自己的形象,它会看看、绕到背后、拿鼻子闻闻,就走了。这镜中的形象并不能很特别地吸引它。相反,人类的孩子对自己在镜中的形象会非常感兴趣。他笑、做各种动作,而且很显然地,孩子能将自己身体与他在镜中看到的这个形象联系起来。

保留种种不同,我们有时会发现一些相似之处。如果你们在弗洛伊德的文献中好好找一下,会发现 Bewegungsbild 这个词:动作/运动的形象。也就是说,弗洛伊德对我们运动时所产生的—般机体觉感受(sensations cénesthésiques)相当敏感。孩子对镜中形象的兴趣,是由—系列的运动/动作、笑来支持的,他抛出所有动作来验证这个事实:他在镜中看到的形象,是他的。

瓦伦没想到，属于拉康自己的发明是这镜像，对孩子的“我”是具有建构性的。

我再从头来讲一遍：瓦伦观察到，而且非常出色地描写了孩子对镜中形象的兴趣。他得出结论说，这是孩子整合精神动力（psychomotrices）功能的关键时刻。孩子在这时候，第一次看到作为“整体”的自己。只有得益于这镜子，他才能察觉到自己是一个“全部”。

这形象的全部（tout）的理念，在“完全”（totalité）这个概念、在自我闭合为一中，是基本的。

你们应该记得，我在第5讲中带过一句：弗洛伊德的“我”，就是自成一体、自我闭合的一定量的神经元。在拉康那里，完全不涉及神经元，但始终有这个“自我闭合、自成一体”的形态，或者说这个形象。一种可以辨别得出、确定为此（repréable）的形态——在镜中，周围的摆设、装饰是不动的，而孩子的身体形象（会跟着他的动作和表情而）动。

是在这个时刻，拉康将“我”调整定位在（positionner）身体本身与它镜中形象的这个交流与兑换。多亏了镜中的形象，“我”这个概念将进驻到身体本身。当然，这里有个很直接的问题，那就是儿童精神病中所见的镜像紊乱。你们会遇到2~5岁、甚至更大一些的孩子，面对自己镜中的形象，表现出一种相当独有的行为举止。

通常，孩子能在镜中认出自己，正是在他开始学着说je（主语“我”）的时候。我当然不清楚中国孩子是怎么个情况，但一个法国孩子，通常当他开始说话，他很快就会说宾格的我（moi）；得等他再大一岁或两岁，可要会说主格的我（je）。

姚洁：中文没有主格“我”和宾格“我”的区别，而且，先是会说

“爸爸”“妈妈”吧？

GLG：啊，法国也是，“爸爸”“妈妈”先说，但很快，尤其要是那孩子有个小兄弟或小姐妹，“你”“我”马上就跟着说出来了。

好，我希望你们到现在都还跟得上我讲的这个问题，有关“我”这个概念的出世，所谓的“镜像我”，是来自镜像的自我。

但拉康不停地在给这个1936年的概念添加更多的力度和外延。我跟你们提到过的那篇基础性的文章，题目叫作《镜像期：作为“我”之功能的形成者；如精神分析经验所揭示^⑧》。我猜你们可以在中译版的《拉康文选》中找到。

拉康的一大雄心、他主要的中心思想之一是：这镜中的形象，是之后将到来的所有客体（l'objet，对象、物）最初的形态。所谓的“客体”，不能仅仅想到“物”，它同样也是种种意象。你们看这概念扩展到了什么地步！这意味着说，不管你们看什么是个“一”，一个整体，它就是“一”，因为它会再指向你身体被想象的整体。

我甚至要说，这几乎就是一篇形而上学的文章。因为自拉康之后或者自赫拉克利特（Héraclite）以及亚里士多德（Aristote）之后，有关“一”这个问题，就是人类思想史上的中心问题。而拉康随着他很晚才诞生的“整一”（unien，音“域尼昂”）理论，应该是会觉得自己进入到了有史以来所有哲学思想的核心。

“整一”与“素一”（unaire，音“域乃尔”）相对立，拉康的“素一”（unaire）指的是“一”个划痕、痕迹中不可再切的（insécable）最小单元，即弗洛伊德的 Zug。

^⑧ Jacques Lacan. Stade du miroir comme formateur de la fonction du je telle qu'elle nous est révélée dans l'expérience psychanalytique. Écrits, Le Seuil, 1966, 93-100. 译者注。

所以，拉康区分出这样两种意义上的“一”：一个是整体，“合而为一”的“一”；另一个是个体，“一个元素”的“一”。将这两种“一”对立，拉康找到了在所有逻辑思考中必需的术语，而且要理解它们也并不复杂。这里，我们是一定量的个体“一”，在一个更宽泛的整体“一”中。

每个人的运作都是该整体中的“素一”（*unaire*），而该整体，我们所组成的“一”个集体，它自己也是一个单元整体，堪称“整一”（*unien*）。

因此，拉康独创的“我”这个概念，相对弗洛伊德的“我”，已经发生了位移。替换“我”这个词，让他有可能以一种我们几乎无法在弗洛伊德那里找到的方式来思考“主体”。

2 无知的主体与“被假定—知—主体”

“主体”这个词，在德语中显然是存在的，*subject*，但弗洛伊德用得很少，而且没拿它当作属于自己的概念术语。相反，在法国的哲学传统中，“主体”这个术语无所不在。

那么这个词在拉康的体系中是怎样运作的呢？我现在将试着尽量快地给大家做个介绍，好在后面留出足够的时间来讨论。因为我不认为如此复杂的概念能用直接讲述的方式解释清楚。我需要大家的讨论，来确认你们究竟在哪些方面还不清楚。

我将从拉康称之为“主体的证据”（*preuve du sujet*）的这个点出发。

仅仅说话是不足以证明有个主体产生的。我们知道这里有主体的时候，是当说话的这个人撒谎了的时候。谎言，是主体的证明。

换言之，当一个人跟你说话时想骗倒你或从你面前混过去，这事实本身，

说明他正走在一个跟他以显性方式在说的相反方向（或意思）。就这一事实而言，你们要知道，孩子在某一特定的时刻开始撒谎，我们通常会很生气，我们是有道理的。但孩子开始骗人，也是有道理的。因为他要是不能撒谎，就将实实在在地被话语所监禁。

孩子的自由，在于学着撒谎和学着小心不要太经常撒谎。想象一下，如果我们完全不能撒谎，会是怎样的一种生活？简直就是不可能的生活（姚洁询问现场是否同意这种说法，现场一致同意）。Thank you（谢谢你们）。我不怀疑你们会同意。但这么说，就是骗你们了（现场笑）。现在，最难的来了。

到了某个时候，拉康在撒谎者的运作中，区分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撒谎者说：“我撒谎”。这显然是个矛盾，因为说“我撒谎”，如果他真的撒谎，那他其实正在讲真话，OK（对吧）？但拉康将区分出另一个阶段，是撒谎者说：“我说我撒谎。”他说，那是这人不但在骗你，而且试图很严重地骗到你。

这时候，拉康想象了第三个阶段，是撒谎者说：“我知道我撒谎。”这里，发生了非常“拉康”的一件事。拉康说：“你不能知道是撒谎还是在说出真相。”这是他第一次将他所谓的“主体”，与“知识”分离。

主体是令语言运作的某种东西，但不是一切知识之所在。这是为什么在创建主体这个概念的时候，拉康实际上同时创立了两种主体。他发明了并非知识之所在，而是与能指、与语言相连的主体。同时，又发明了一个被他叫作“被假定一知一主体”（Sujet-supposé-savoir），是储存所有知识之所在。

在哲学传统中，这“被假定一知一主体”已经存在，但是以其他形式存在。在莱布尼茨（Leibniz）这样的哲学家那里，存在着被他称为“普遍科学”（Mathesis universalis）的那种科学观。而很久以来，西方传统中的上帝就曾是

无所不知的。在所谓的“神明”（l'entendement divin）里，能找到人类的全部智慧，但远远不止于此。你们是否也有类似的东西？它不仅作为现实或作为知识，而且作为人所能想象、思考的一切而存在着？

在拉康“认同”（L'Identification）研讨会期间，“被假设一知一主体”的发明，就与无知的主体构成了一种对立。

拉康的主体，不是一个人，不是个体，不是一个人类的存在。我能给你们的最精确的定义，尽管拉康自己从未这样讲过，应该是：主体是两个能指之间的什么。“主体，在切里”（Le sujet, est dans la coupure），这是拉康说的。

由此，在研讨会“欲及其解析”（Le Désir et son interprétation）接近尾声的日子里，他引入了一个全新的“主体”概念，开始将重音落在“切”（coupure，水电的中断）上。既是弗洛伊德所谓的冲动生活之“切”，也是在意义运作中能指链的“切”上。

你们中的一位前天跟我讲到有关停止一场分析的问题。在跟一位女病人的工作中，他感觉到每次要停掉一场分析都有些难度。拉康的取向在于认为，主体在“切”里。那么，重要的就既不是您，也不是她，而是这个“切”本身。

这很难去想，但恰恰是拉康在这个位置上想要说的。他的“主体”概念指的是能指链的“切”。

可以说，我们这个工作的精要，就在于要切在一个好的位置上，而如果可能，就要和我们那些恰恰祈求着什么都可以永远不离、不弃、不失的病人尽可能干净利落地切。你们现在明白，为什么我昨天会跟你们说“阳具”真正的名字是“丢”？

我们在这里不是为了帮人看守东西，而是帮他们丢东西。理解吗？

我先暂停，好让大家有个真正讨论的时间。

3 问题 1: 什么是“切到一个好的位置”?

学员: 您讲到要“切到一个好的位置”, 什么叫“好的位置”?

GLG (笑): 我当然无法一概而论地来回答您这个问题。

一个泛泛的“好位置”是不存在的。因为就定义而言, 一个“好位置”从本质上就是局部的、定位的。但不管是什么情况, 一个好的时间, 是您有理由认为要将自己介入病人话语的那些时候。

不一定要跟他说点什么。一句话不说却表达出自己, 可以有很多方式。而停止一场分析在这里是最重要的一个例子, 每场分析内部, 也会有很多“切”。

但多亏您的问题, 明天或后天讲“分析师之间的关系”时, 我们可以看看, 在“分析时间”这件事上, 机构会加给每个分析师的一个分量。为什么几乎所有的精神分析学校、协会或学会, 都会在这个问题上如此严格? 因为确认它们对每个成员权力的一个方式, 就是成为“切”的所有者。你们可能会因此想到, “切”这个问题是极为政治的。

“主权”(la souveraineté, 君权)的经典定义之一, 是一个叫卡尔·斯密特(Carl Schmitt)的德国人给出的。他说: 君主是决定例外状况的那个, 在他负责执行法律时, 决定法律之延时的那个。

所以, 永远不要忘了, 在您严格遵守规定的分析时间时, 您正在屈从于规定。理由很简单: 作为一场分析结束的“切”, 只属于您个人、产生于您与该病人分析关系的独特性之中。

我猜, 病人对您遵守的时间规定, 也是了如指掌的, 他们也会要求您恪守时间。但这不是由他们决定的, 是您的工作会让他们明了, 您所尊重的是他的话语, 您最为专注的, 是他所说的, 而不是钟表上走的。

4 问题 2：“主体”这个词是不足的

学员：我想说一下我的体验，那个冲出来的感觉。当老师说到那个切口的时候，说到“切”这个地方的时候，然后这个过程就到这儿了，就让讨论了，我就在这个切的时候，感觉到一种聚集，就是有种能量聚集到自己的身体里。然后，就在那个瞬间，我感觉到那个“主体”所表达的，完全不是这个词。就是那个……曾经的那个……当下，是有一种非常特殊的，就是没有人的存在的这种感觉、这种状态。然后，再后面就是一种非常丰富的感觉，这种“切”让我能量聚集，让我体验到的是我存在于此。但是好像老师说的这个“切”，让我觉得主体这个词好像太小了，没有办法表达出来所有的这些感受。

GLG：非常感谢，因为您完全有理由说“主体”这个词是不足的。但我想，拉康是毫不犹豫地沿用了这个词，来保留它意义上的模棱两可。

拉康很有名的一句话，是这样说的：我们不能说清所有的真相。他讲这句话时，用的是一种无法翻译的文字游戏，说“我迷递它”（Je la midis），也就是说，我讲了（dis，音“递”）它的一半（mi-，音“迷”）。只是，在法语中，“迷递”这个发音，也是“正中午”（midi）的意思，太阳当头、光线最足的时候，光天化日之下。拉康却说它只有半个真相。

因为真相的全部，是会很盲目的——完全的真相让人失明，未见得就能让人看得更清楚。我昨天跟你们讲到极度的抑郁症病人，在我看来，他们就是极端明智、看穿一切的。你们也一定知道，当我们过度失眠时，脑子的状态是极度清晰的。可是我们不见得就真的处于真相之中。

但我感谢您所强调的主体是“切”，更多地属于事件而不是一个人。我甚至建议你们记住它，作为一种说法：主体是事件，而不是人。

这说法在你们看，是不是比较容易理解？（现场不肯定，学员们在尝试字对字地确认这个句子，最终要求老师再讲一遍。）再讲一遍这个提法？将拉康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建议的那个意义上的“主体”，作为事件这个秩序来考虑非常重要：它是会来、会消失，而不是始终在那里一成不变的存在。

学员：我重提一下刚才这个话题。我所理解的这个主体，就是老师讲的这个主体，是不是就是老师昨天说的第18只骆驼？或者是9个珠子之外的那两个珠子？也就是那个“阳具”？

GLG：显然有些联系，但不是一回事。

相同的是，它们都是负性的、阴性的（好像照相底片的空白或印章的凹处）。如果您想要给出它的意思、给出它很多的意思，确认给出它很多的存在，就会在此之中误导了自己。

弗洛伊德在他研究达·芬奇的那本书里，就画家与雕塑家的工作做过比较：画家添加颜料；雕塑家，却是从整块的石头上去掉一些什么。我讲了很多东西，为的是去掉些什么。我试着以雕塑家而不是画家的方式工作。所以，我对你们讲的，你们丢到垃圾箱里就好，只留下空缺就好。

当然，这是理想。

5 问题3：中国主体

学员：我想分享一下听老师讲课时的几个联想。老师说小孩子照镜子，说到拉康的“我”，发现“我”跟周围的东西是不一样

的，周围的东西不动，这个“我”是动的。我想说，在弗洛伊德以前，就是弗洛伊德以前说 ego，和拉康的“主体”之前，subject 在中国的文化中……

姚洁：等一下，是您接触到还是……什么叫“弗洛伊德以前”？

学员：没关系，就是在中国的文化中，就不太会有这种思考，关于“我”、关于主体的。因为好像我们中国文化喜欢把这个“我”放在一个更大的……比方说关系里面。因为这个“我”，当他是小孩子，很清晰的是“我”的时候，其实是很孤立的，很危险、很脆弱的。例如，我们除了跟母亲（保持）很紧（密）的关系，还有家庭中好多、好多的关系。所以，作为一个中国的小孩子，在很小的时候，他就会知道好多（亲戚）：姑姑、叔叔……好多很复杂的关系，各种各样的关系，这对我们好像非常重要。所以当老师说“切”的时候，我就会联想我们文化里面的“太极”，就是：我们好像喜欢“推”，而不喜欢“切”。就像昨天晚上做团体的时候讲到很有趣的事情：昨天老师上课前，我们中方有位领导有一段很长时间的讲话，其实我们那个时候听着，心里很焦急的，至少我很着急。我特别想看老师什么样，那时候也不知道老师在哪里，还担心老师在门口等。但是由于我们中国人真的不习惯“切”，于是我们就会等待。领导具有某种连带效应，需要给予遵从、尊重。于是当时的感觉特别纠结。在那个时间段里，感受到了某种西方的和中国的“切”点，我觉得我自己是在一个“切”点的交界处，很挣扎……

姚洁：在讲话的时间？

学员：对，20多分钟嘛，我就非常焦虑。关键就是关于“切”点、关于主体，要不要接下去的挣扎。然后，我主要想表达的是：

为什么中国的文化里，或者说中国文化为什么那么不愿意“切”，就像太极？

GLG：谢谢，可是不要相信法国文化就是特喜欢“切”的（现场笑）。

不管怎么说，官能症的运动倾向，不管他用什么语言，就是拒绝“切”，不是用这种方式，就是用那种方式。

如果有喜欢“切”的文化存在，就是我还没了解到的了。但相反，我了解弗洛伊德在他作品中用到“阉割焦虑”（angoisse de castration）这样的表达，分量有多重！不幸的是，法语和德语一样，“阉割”这个词太现实了。

所有人都知道，这里讲的，不是割掉男性器官。但将这一形象作为原理的合理性在于，阳具这东西是被假定为再宝贵不过、却会丢而且应该丢的。但怎么丢？同样地，我们认为对婴儿来说最宝贵不过的就是乳房。乳房也是该丢的。

有了今天下午我将介绍的拉康理念之后，你们也许能更容易明白一些。

我将明确这个位置所发生的分离，并不是简单地只在乳房与孩子之间，更在母亲与乳房之间。我相信大多数的母亲也很明白。因为断奶不仅对孩子，尤其对她，都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孩子丢失乳房的那一刻，母亲也失去了它。

这是自然界的一个“切”，我相信存在于一切文化。

这个“切”如此必须，看上去就好像不造成任何问题。但它却是所有其他“切”的根源。官能症行为的一大部分，就在于拒绝这个“切”。

“切”的视角使疤痕有了理由，疤痕成为我们可以不丢的乳房。这是有可能的，证据是：治疗师、精神分析师呼唤着它，支持着它。关于这一点，克莱因就精神分析的看法之精要说过：精神分析师，无论男女，与病人分享着同一个乳房。

给你们讲个有趣的小故事。

有个苏格兰分析师叫费尔贝恩 (Fairbairn)，几乎是“客体关系”(relation d'objet) 这个弗洛伊德派运动的创立者之一。他快 60 岁的时候，想要跟维尼科特 (Winnicott) 再做一轮精神分析。于是他们做了很多很多场，之后费尔贝恩发表了他与维尼科特做精神分析的故事。维尼科特那时已经 70 岁了，这俩家伙，一个 60 岁，另一个 70 岁，没完没了地讲着他们互相交流的乳房。这很好笑，或者意味深长？我说不上来。

你们也许看得出来，乳房这么个象征维度的东西，要到这个地步，唯一重要的，是确信、核实 (s'assurer) 它是如何没有丢，或丢了！

这是为什么“切”对于理解精神分析的解析、能指及主体，都是一个关键词。我停在这里。

6 问题 4：主体的两个维度

学员：很抱歉，大家都在讲“切”，但我想回到主体。

GLG：请，请！

学员：因为在老师讲到撒谎的三个层次的时候，出现了两个维度的主体。我的问题就是：这两个维度的主体同时存在吗？跟那个事件有什么关系？然后就是在治疗室里边，治疗师面对的是哪个主体？然后，治疗师自己，是不是一个主体？

GLG：不，不。

谢谢您的问题，因为它正好切到我走得过快的位置。我想今天下午不管用哪种方式，我都会回到这个问题上来。因为讲起来会非常长，涉及分辨拉康将“被能指所代表的主体”及“被假定—知—主体”设置到位的时间。

起初，当拉康创出“被假定—知—主体”这一提法时，他说：“这是给那些哲学家的，跟精神分析师无关。”两年后，他的观点完全改变了，说：“实际上，在一场分析里，“被假定—知—主体”就是移情中的精神分析师。”

拉康因此给移情做出了一个新的定义：病人的移情，是他对精神分析师所假定的一种知。不是关于精神分析或心理学的理论知识，而是对他或她，病人自己症状的一种知。这一定义的给出，使拉康对“分析之疗的终结”有了不同于弗洛伊德的描述方式，拉康将它命名为“被假定—知—主体”的坠落。

因此，如果我们想要区分这两个密切相关的实体：主体是随时随地会发生的，既然它是个事件。有时候它发生在病人身上，而有时候也发生在分析师身上，这得看情况。但“被假定—知—主体”必然是在分析师这边，维持在整个移情发生的阶段。

我要补充一点：在法语中，“被假定—知—主体”（sujet-supposé-savoir）这个表达是暧昧不清、模棱两可的。它可以是给某人假设一种知，给主体；也可以是为某种知假定一主体。

我下午会试着多讲一点。谢谢。

2013年11月2日上午

第7讲 幻想与对“空”的恐惧

昨天和今天上午都有些问题，实际上涉及的是“幻想”（*fantasme*）这个概念。所以我想先澄清一下对这个术语的误解。

（姚）浩告诉我说，在中文里，“幻想”这个精神分析的专业术语，与通常所说的“想象”（*imagination*）、精神问题中的“发作、发狂”（*délire*）、“幻想、幻听、幻视、幻觉”（*hallucination*），几乎都可以用同一个词。你们可能就会有直接的感觉，认为幻想是人们对一事或一物的不真实的想法，多少是个负面的东西。事实上，至少在法语里，当我们跟某人说“这纯粹是幻想”，就好比是说：“你错了！”这是为什么我要先从弗洛伊德开始，给你们讲讲 *fantasme* 这个词的历史（板书 *phantasien*）。

这是弗洛伊德所用的德语，动词，指的是产出幻想的活动。它的名词形态，*ein phantasie*，最终被翻译成法语 *fantasme* 这个词。

讲讲这个翻译的故事吧。

1 “幻想”在法国

弗洛伊德最早的法译者们，早上被我说过不少坏话，其实，也做过些很漂亮的事情。当他们在德语中遇到 *phantasie*，马上就察觉到这里有个很大的问题：这个词与法语 *fantaisie* 同属一个拉丁语词根，因此，*fantaisie* 是它的常规翻译。然而，弗洛伊德经常讲到的幻想之一，就是弑父的幻想，法语 *fantaisie*

指的却是很有趣、很好玩的东西，轻松搞笑的事情。两个放在一起，写出 *fantaisie du meurtre du père* 这样的表达，在法语里很无聊。谁都不会把父亲之死当作搞笑的事情。说到底，我不知道。所以用 *fantaisie* 来翻译德语的“幻想”，不适合。

于是弗洛伊德最早的法译者们就找出一个非常古老的法语单词：*fantasme*，这个词在他们那个年代，20世纪三四十年代，早就没人用了。

Fantasme 有个技术上非常具体的原意。当你非常用力地紧紧闭上眼睛，再睁开的时候会看到一些光亮，这些光亮就是 *fantasme*，中文有对应的吗？（现场：眼冒金星。）OK（好吧），就是这些“星星”了。看来，我们虽然语言不通，但视觉系统共享。

第一代的法译者们于是就拿这“星星”来翻译弗洛伊德所用的德语 *phantasie*，幻想。雅克·拉康实际上是将法语 *fantasme* 作为术语“幻想”使用的第一代人。直到20世纪50年代，还有不少人在撰文讨论，推敲它的首起字母，究竟是写成 ph-好还是 f-好。

精神分析在法国文化上相当成功的例子之一，就是今天用 *fantasme* 来说“幻想”已极为普遍。大多数的法国人要是听说这个意思是1930年诞生于精神生活的研究，一定会非常吃惊，所有人都以为这是个由来已久的词。如果去看看17—19世纪的法语词典，你一定找不到“幻想”这个意思，但是这个意思却被我孩子们那一代用得非常频繁。比方动词 *fantasmer*，随便哪个20岁出头、30岁左右的男孩，就算完全不知道精神分析，都会说：“这女孩真弄得我 *fantasmer*（想入非非）！”普遍到这个地步！

但作为术语，对精神分析师来说，它有自己的非常技术的成分。

用我昨天跟大家讲到的概念来说，幻想非真非假，它是在数学上称为

“公理”或“公设”的东西。也就是说，它是一种原则，指定在它之后而来的，即是真理。因此，它跟每个人对自己所持的观点相关，与他的“我”相关、与他的镜像相关。这是拉康建议把“幻想”写成 $S \langle \rangle a$ 的原因之一，我建议念：“被划掉的 S- 菱形 - 小 a”（S barré - poinçon - petit a）。

上午我讲到过“主体”，它在这里以“S”（被划掉的 S）这个字母出现。竖杠的功能是为了指示我早上所说的：主体是某种事件，而不是存在。之后我会讲述中间这个菱形是什么，但先要讲讲这个字母 a，小 a 的写法在拉康那里的历史。

2 “小他者”（克莱因的“类分裂—偏执位置”与“抑郁位置”）

很长一段时间里，它只是 autre（另外的、其他的，“他者”）的第一个字母。所谓“小他者”（le petit autre），是相似者、镜中的形象，而“大他者”（le grand Autre），是我们早上曾粗略提到的“被假设—知—主体”。

很长一段时间里，对拉康来说，随便什么客体的模式都是小他者，是镜中的形象。随便什么客体都会在小他者的模式中找到它的整体。他有篇非常重要的文章，叫《家庭情结》（《Les complexe familiaux》），我不知道有没有中文翻译，是他很早、大约在 1938 年的研究，就是从镜像期出发，在“客体的整体以小他者为参照”这个理念上建立起来的。

你们也许知道，在弗洛伊德那里，所谓的客体对象，首先就是“冲动对象”（l'objet de la pulsion），最早就是乳房、排泄物，可能的话，也是阳具。在弗洛伊德派的世界里，给予这一概念最大外延的，是梅兰妮·克莱因（Melanie Klein）和她的“局部客体”（part object）概念。

我猜你们对梅兰妮·克莱因的“局部客体”已经比较熟悉了。（现场认

同，并就以下这些概念给出中文的常规翻译。)她甚至还加上了一定数量的客体：联合父母、好客体、坏客体(现场给出的中译，甚至出现了好爸爸、好妈妈)……

你们有没有看过梅兰妮·克莱因自己写的文章?(看过)如果你们非常简略地进入到“类分裂—偏执位置”及“抑郁位置”的细节，这里涉及的是这些局部客体的不同分配(现场忽然沉默。姚洁：“是不是分配这个词不能明白?”)“分配”，在两个位置之间?(学员：只有一个位置)啊，不!两个位置。

看来我得给大家详细解释一下，因为它对应于……怎么讲，早上因为镜像期，跟你们讲到过。

在“类分裂—偏执位置”(la position schizo-paranoïde)，孩子看自己，就好像是充满着碎片，碎片与碎片之间处于冲突之中。但最好的情况是在某个时刻孩子意识到他不能同时是一切，或同时拥有一切。于是他进入到梅兰妮·克莱因所称的“抑郁位置”(la position dépressive)。“抑郁”，是因为它意味着一个“诀别”(deuil，常规译“哀悼”。现场解释“抑郁”dépression与“忧郁”mélancolie的翻译。用英语念过原文的学员，知道这里分别涉及两个不同的词。)你们知道，在我们现在讨论的层面上，我觉得抑郁或忧郁的区别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丢失、永诀、一去不回头的这个维度。所以，梅兰妮·克莱因有理由坚持说，为了要能建构一个“全部”，得先接受有所失的存在。

尽管这跟镜像期很不同，但雅克·拉康做的是同样一个动作。他认为镜像是被大量投注的，弗洛伊德意义上的“投注”，投注以力比多能量。但他也认为总有一点力比多的残余会继续投注于身体本身，否则，如果只有形象，主体自身就会一无所有。如果你们念过弗洛伊德的一篇文章，叫《爱情生活的种种化身》(《Les avatars de la vie amoureuse》)，会看到其中描述过这一类的爱：爱的

对象如此被投注，以致爱恋中的男女，将自己看得一钱不值，如同渣滓。所有的力比多都往对象那里去了，什么都没留给主体自己。但很肯定，有相反的例子，被爱的事实如此重要，被谁爱反而变得无足轻重。

好吧，我离自己的打算有点远了，我们回来讲讲冲动对象吧。

3 “客体 *a*” 与对空的恐惧

在某一时刻，拉康意识到他将客体定义为“小他者”、相似者，不适合描述弗洛伊德意义上主体与其冲动关系的经验。于是，在 20 世纪 50 年代末 60 年代初，就在他为“主体”这个词创建早上我力图为大家详细介绍的全新意义时，他也同时创立了一个新的“客体”概念。而且，用的是同一方式：就像他的“主体”绝对不像人们习惯上所称的“主体”一样，他称为“客体 *a*” (l'objet *a*) 的这个“客体”，也绝对不像任何其他的客体（对象 / 物）。

你们知道，不管是什么客体，如这支笔、话筒、手表，都是“一个”客体。这个完整性，是我们等着从一个客体那里看到的最起码的属性。然后呢，所有的客体都还另有一个属性：如果我将右手放在镜子面前，镜中的形象会是左手。平面的镜子有这么个颠倒对称的属性。与小他者仅仅是个镜像这个属性不同，“客体 *a*”不会有镜像。（现场很多声音。姚洁：能不能解释一下？）

既然拉康要定义一个与镜像完全不同的客体，他就从它那里去掉了所有作为镜像的基础质地，首当其冲地，就是最基础的两个：自成“一”体和成为与镜前物对称相反的那个形象。

这类客体会是什么呢？我现在来给你们举一个非精神分析的例子，请跟紧我的描述。这是一种非常广泛的小小恐惧，叫“对空的恐惧” (la phobie du vide, 现场：空间焦虑？) 随你们高兴怎么说。

请想象你们在一个悬崖，或是还在施工的一幢建筑物的边上。接近这个边缘非常危险。有些人不会头晕，能一直走到边上，但通常情况，你们还在很远的地方，就已经停下来了。有的能停在距离1米的地方，有的3米，还有的根本就不愿意过去。

我建议你们将你和这个悬崖之间的空间，考虑为一个客体。从你这里开始、到“空”开始的那条线结束，将这个空间请允许我叫作“客体”。你自己可以前进或后退，由此改变这空间的量；相反，你不能移动“空”所开始的这个边缘。我所说的这个客体就由你与这个“空”的边缘所构成。它不看你，它看着空。那是拉康很早所说的“*objet métonymique*”（换喻的客体、借代的客体）。

给这个换喻或借代一个提示吧。它是种修辞，一个词指代另一个。这里的重点，是你们要理解所谓“换喻或借代的客体”具有这种引向其他客体的属性，直接就是下一个。

我不相信这个例子能足够给你们一个“客体 a ”的概念，所以再加几个例子。那是我们在恐惧症、恋物癖和圣物中相继遭遇的客体对象。

4 圣物与“接触”的逻辑

精神医学将恋物与恐惧的客体对象相提并论，已是老传统了。但为了理解这种接近，我在很久以前将同一结构的第三种类客体引入研究，那就是圣物。

你们有祭奠祖先的风俗，一定知道圣物是什么。在外人看来毫无意义的那么点小东西，却很神圣，因为它是曾曾曾祖父的。我用“圣物”这个称谓，当然更多是指它在西方宗教的意义，而不是祖先的祭奠：圣物，是圣人的一部分，是为宗教捐躯的英烈所留下的碎片残余。

你们看过电影《印第安纳琼斯》吗？《印第安纳琼斯》中每一集的核心都

是一个圣物：这东西存在于地球上，我们可以去找它、接近它，但它是与上帝直接对应的。想象一下，一个电插头之类的玩意儿，却与神的某种核心直接相关！

我曾用 8 世纪拜占庭的“圣像”危机来讲解那些并非普通意象的形象。从公元五世纪、六世纪开始，人们开始发现一些非常特殊的形象，认为它们是耶稣面容的印记。那些布头于是就不但被视为耶稣面容的代表，而且被认为曾经接触过耶稣的面容，因此才留下的印迹。

“曾有接触”这一点，对圣物是尤其重要的。如果这个破杯子曾是我曾曾祖父的，他用它喝过什么，那它就是珍宝了。很简单地，只因为他曾触摸过它。所有这类客体对象的逻辑，都是“接触”的逻辑（logique des contacts）。

我用弗洛伊德所说的恋物来结束这一段讲解。

关于恋物（fétiche），有个简单且单一的说法：孩子在即将发现母性阳具缺失的中途，忽然停在某个东西那里，经过一系列的替代（在这个位置，有“借喻”“取代”），某一个客体，可以是作为曾接触过那玩意儿的对象而入选。在宗教的圣物里，当然有种痴狂，我不想还没指出这一点就结束。

在整个基督教，要建立一个祭坛，就得有一点圣物可以允许这祭坛被认为是神圣的。在这祭坛上，可以请到上帝之子耶稣的神圣之躯。而根据接触逻辑，很显然，与圣物有所接触的物，几乎也就是个圣物。

距离至今还没有 50 年吧，罗马梵蒂冈发掘古迹时，发现了几块最早的基督教徒的遗骨，一些骨片。他们就把这些骨片磨成粉，混上蜡做成圣物。骨粉足以制造圣物，因为是先烈遗骨所磨成的粉，而先烈们已经升天。

我们知道，恋物癖只要拿到一个鞋子、一条短裤，就已经很满足，足够找到他们的性快感。不是因为这些东西本身的价值，而是它接近更为重要的什么，接近母性阳具之缺失。

恐惧本身，其实要常见得多，甚至极为常见。我相信所有的孩子都必然要从一些恐惧经历中走过；而很多成人，很多很多的成人，私下里都始终维系着某些小小恐惧。我说的“恐惧”，指的非常具体。不是有什么东西让你不喜欢，那很正常；而是有某种东西，只要接近它就会让你焦虑，你却总能很好地混过去、逃过去，免得吓到你身边的人。

5 同属“事件”

我希望你们通过这几个不同的例子能理解到：正常来说，不管拿出什么样的客体来，我们都可能理论，但这一类却不行。我们无法拿它理论，它们却照样值得被称为“客体”。这是在作为主体的你跟它无法逃脱的关系中，它生成而为客体。其价值之独特，令它远远超越于尘世中的任何一个简单客体——但它同时也无非就是尘世之物。

如果主体属于“事件”这样的秩序，这类客体的出现，也就是一种事件。在恐惧中，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这个特性。在拉康所描述的主体与拉康所描述的客体之间的这个相当独特的关系，正是这样，他将它称为“幻想”， $\$ \diamond a$ ，这类主体与这类客体间的谋合（la collusion）与组装（le rassemblement）（现场开始有很多声音）。

姚洁：这个听不懂。

GLG：好吧，先从问题开始吧。因为不清楚你们理解到哪里，我就不可能继续讲下去。

好多学员同时：最后一句能不能再讲一遍？

GLG：哪一句？

姚洁：在这样的主体与这样的客体之间的这一独特关系，这种合谋，

是幻想。拉康说的。

GLG: 不是这样的。

你们是否记得，就“主体是事件”而言，我曾试着讲过什么？首先就是：一个事件，不是随便什么时候就会来的。我跟大家讲到的客体，不是始终都在那里的一个东西。

所以，这里的相遇，有“碰到、撞到”的意思在。在被其所言而决定的主体，与那种异乎寻常的客体之间。那些客体，主体在生命中一旦与之相遇，就会授予它只与该主体息息相关的状况或局势（situation）。

别忘了，这些想法，看上去非常现代，却早在弗洛伊德时代已经存在。

弗洛伊德在冲动理论中，首先定义了两种类型的客体对象：乳房和排泄物。它们决定了两种非常不同的主观态度或立场（postures subjectives）。被称为口欲型的，对嘴部活动很感兴趣；被称为肛门型的，感兴趣的是排泄的产出、礼物之类。弗洛伊德非常坚持这两个维度，但拉康补充说，事情并没有到此结束，不仅仅只有乳房和排泄物这两类典型。例如，最基本的客体对象之一，至少跟乳房与排泄物一样重要的，是注视。多少人在被人的注视中找到他们的快感？我是说，他们的性趣。不见得一定就是精神病学或警察部门所说的露阴癖。

作为精神分析师，有必要定位出对你的病人来说，是什么在运作着。是声音、注视、乳房，还是排泄物？可能还会是别的什么？

最后举一个例子，好让你们能多换几个不同的位置来看事情。

拉康曾将精神性厌食描写为这样的人：他不是没有吃，而是吃“没有”。他们是从“没有”里发现了性的吸引力的人（现场很多议论，包括给出中文翻

译)。我猜很难翻译，因为法语中的否定系统是非常诡辩式的。“什么都不吃”与吃的是“什么都没有”很不同，不是吗？

姚洁：重点在于“什么都没有”里，有他感兴趣的东西在。

GLG：是。

学员1：这两个是什么联系？

学员2：比方他吃一个苹果……他有没有吃这个动作？

GLG：忘了“精神性”这个词吧。“精神性厌食”是个固定表达，我无法改变，但厌食症病人不吃，就是不吃。

学员3：所有的厌食症都这样吗？

GLG：当然不是！我们永远都不能普遍性地来谈这类问题。

只是我正在传授一种知识，才不得不通过一些普遍性的陈述来表达。但任何时候，我都不会以为所有的厌食症，或所有的强迫症、歇斯底里症会是一样的，从来都不会！

这只是我们一起工作时，有办法讲述事情的理论工具。我希望你们之后能全部忘掉才好。如果在听病人说的时候，你们也在想着理论和术语，那就再也听不进病人在跟你们讲些什么了。

一场分析过后，我们可能会试着想要弄懂发生了些什么。分析的过程本身，并不是用理论工具来弄懂那些事情的最好时间，那只是听的时间，听病人正在用他的自然语言跟你说着的是什么。

你们得知道，我们在夜晚熟睡时，大脑能跟白天一样出色地工作。所以一旦你和病人建立起一种真实关系，这关系开始在分析中规律性地重复，就算你不去想病人，你在他身上所做的功，也会跟你们头碰头一起工作时一样多。

你们讲到的督导这类活动很好。但同时，它带有一定的风险。因为治疗中发生的时刻，并不都值得用这种方式来澄清。无休止地讲述一场分析治疗，将它作为每周一次受到重视的对象，我认为经常会抵抗治疗本身的运作。

对治疗有所反思是好的，但在静谧的氛围下，让治疗走自己的路，也很好（现场沉默）。

行吗？（各种声音开始起来）

好了，我们先停一下，但我会再从你们的问题开始。因为我不能不清楚你们对我讲过的内容究竟怎么理解，我不能这样继续讲下去。

2013年11月2日下午

第8讲 菱形的价值

答应过大家这一讲从提问开始，但我想要先补上忘记讲的一件事。为了要讲清楚这件事，得先给大家说一段我自己的童年回忆。

1 “幻想”公式中菱形的价值

当我还是个孩子时，6~9岁吧，很喜欢玩法语里说的 Jokari 这种游戏，不知道中国有没有。很容易讲清楚的：一块很重的木头或铁块，固定住皮筋的一头，皮筋的另一头拴着一个球，你拿一个网球拍去打球，球回来，你再打。就好像玩网球，但是你一个人在跟那根皮筋打。

就这样，每次球回来，我就再打过去。

但有些时候，皮筋断了，这就是个事件了。我相信，小时候我玩这个游戏，等的就是这个时刻。所以你们看，我是那种喜欢“切”的文化的。真正让我感兴趣的，不是球回来，而是它的一去不回。

我想这应该是孩提的我将自己跟母亲关系象征化的一种方式。母亲管得是有点多的。我很乐意她总是回到同一个位置，一如既往，但我肯定也渴望着她能一去不回。于是，每次玩这个 Jokari，我总是赢家。球回来也好，时不时不回来、被我彻底弄丢，也好。

两种情况都让我非常开心，非常不同的开心。

就这样了。现在可以略微给大家解释一下，拉康“幻想”公式中的那个菱

形究竟是什么。拉康赋予它两个价值，是我刚刚用 Jokari 这个游戏中的皮筋给出的：一边，它有个让与的价值（aliénation），是跟他人的联系；另一边却是分离（séparation），是“切”、是关系的断绝。

“幻想”是与客体接近与远离的游戏，你们可以在临床上看得很清楚。

你们可以经常观察到，恐惧症病人看上去像是永远都不想要碰到这个或那个客体，却总在想方设法地要去与它遭遇。一般来说，仅仅想象这一遭遇，已经足以让他焦虑。

所以你们看，这里的“切”永远都不是决定性的“切”，而只是个为了有机会再联系的“切”，就像结束一场分析。我们分手是为了能再次相见。再一次、再一次相见。

这是为什么每一场分析的“切”，都是在说着“下次再见”中结束的。这同一个动作，在“切”也在相联系。因为永远都是以同一种方式在恳求、同时祛除着（conjurer）人们想象中的一去不复返，换言之，死去。

我们玩着这个“切”的喜剧，来远离死亡。但对某些人来说，“切”的涵义，直接地，马上就是死。因为这个原因，他要拒绝这个“切”，把它推得越远越好，尽一切的可能让别人而不是自己去承担它。

作为阶段性的小结，“幻想”这个词的特殊价值，在临床实践中是非常重要的：它是一种非常独特的（精神活动的）产出，在这种产出里，同时有“切”也有相连，有让与也有分离。

我希望你们能理解，“幻想”具有当事人给他自己的一种基本价值。这种基本价值是在主体与某类特殊客体之间的分离与流通中给出的。这类客体，上一讲已经解释过，它们总是对我们背转身去。

我说“背转身去”的时候，是说这些客体总是望向他处。比方在“对空的

恐惧”这个例子里，如果你们可以接受将你和空之间的这个空间作为客体，那么你就是这个客体的后背，它自己是朝着空看去的，它不看你。

圣物也从来不看对它祈祷的人，它仰望烈士，属于这烈士，到最终审判的那一天，它将再次与这烈士合而为一。这里有个历史事件，也许能让你们更好地理解什么是“对我们背过身去”的这些客体。

在基督教的历史上有过一个很大的分裂，西方是罗马，东方是拜占庭（某学员：是不是天主教与东正教之间的分裂？）是，是！希腊人、俄罗斯人属东正教。有关“分离”这个问题，已经纠缠不清了上千年，首先就出在形象问题上，在“圣像”（icône）这个概念上。

西方教会，罗马天主教坚持认为耶稣、圣·皮埃尔或其他圣人的肖像，是représentations（同“意象”），是圣者的形象再现，那么肯定很珍贵。但它们本身不是“圣”，只是某人某物的“再-呈现”“再-表达”，所以重点在于被它“再-呈现”“再-表达”的这个物或这个人，而不是它本身。

相反，东正教呢，认为那些形象所复制的是“原型”（prototypes）本身，比方耶稣自己。这是为什么当你看一幅正常的肖像，会觉得是肖像在看你；但当东正教徒对着他们的圣像祈祷时，那圣像是不看他的，它仰望着它所属的“原型”。它像气味或光线一样，来自那里，它是“原型”所带着的影子，完完全全地属于它的“原型”。所以东正教的“圣像”，不仅珍贵，简直就是圣者本身。

依此而论，东正教“圣像”到了末日审判是要上天的；而罗马派天主教的“肖像”终究会留在尘世。你们看，目光注视的线路有多么重要！“圣像”这类东西不是寻常的物或客体，而“肖像”却是。

我举了这几个例子来从不同角度讲同一件事，讲这些不同于其他客体的客体。仔细听你们的病人说，你们会发现，每个人都各自以一种相当私密的方式

与一定形态的这类客体相关。让他有可能看到自己在精神活动中，与这类客体维系着怎样的关系，你们就有可能帮到他们，在生活中脱身。这远远要比给他们“做这个、不要做那个”的建议实在得多。

现在，回来看看大家的问题吧。

2 问题 1：坠落的恐惧（晕眩、移情的症状）讨论

学员：我的问题跟老师讲悬崖的这个边是有一定关系的。我听这个的时候会想到有些人到这个边还有一段距离，他会停住了，有的会掉下去，他会有恐惧。这两个有什么区别？

姚洁：哪两个？

学员：就是有的人到那个边还有一段距离，他就停住了，有的人就直接掉下去了，就会很恐惧……

姚洁：真的掉下去了？

学员：就真的掉下去了！

姚洁：真的掉下去了，那还怎么恐惧呢？

学员：他掉下去了，跟这个边，这两个之间应该有什么区别吧？因为我听到一些掉下去的梦嘛！

GLG：啊！很好呀。但只要做梦的那个人没有做出任何联想，我就无法告诉您这梦中坠落的涵义。任何情况下，我都需要病人就此做出的联想。

相反，我可以跟大家说的是：这个坠落的事实用晕眩来解释是不够的。晕眩是一种恐惧症，跟所有的恐惧症一样，不能用之后发生的害怕倒过来解释它的发生。不然，我们就很难理解为什么很多人即使在距离悬崖 20 米的地方，

就已经寸步不前。

只要你们略微去问一下，就会知道他们害怕的究竟是什么：他们怕的是无法抵御空的呼唤。

然而，空，我们知道，不呼唤任何人。这就让我们有可能来提问这种确信无疑：当事人认为空会呼唤他。请相信我，正是在这样的位置上，由幻想做出的一种精神活动组织。

假如你们询问他，如果你们能问得够灵巧，就会看到我前面所讲到的“小小的什么都不是”出现。害怕也好、被抛弃的恐惧也好，出生创伤、被活埋、掉进洞里，随便是什么念头，都围绕它在组织着。你们因此就有可能理解，为什么一定的主体会认为空在呼唤他。

但恋物癖和他那个短靴或鞋子的关系也毫不逊色。你们要是去问一只鞋子何以能产生那么大的兴奋，他在第一时间是答不出什么的。要到他加上一些女性的元素，某种特定类型的女性，尤其是妓女，与之多少相关，你们才会多少窥见短靴的幕后。我因此会跟你们说，这些客体在主观认识中如此重要，却总是对这些主体背转身去，它们面向他处。

所以，不要相信解释这些行为的理由，说什么“对空的恐惧”，就是因为曾经有过一个创伤。这些理由恰恰是太过理性了。请允许我给出一个侧向思考。

当你们在某人的讲述中定位出一个恐惧，永远不要让它太太平平地过去！可以肯定的是，如果你觉得这在社会上很普通、很平常，马马虎虎就把它听过去了，病人对治疗的整个阻抗从此都会固着在这个位置上。

我后面会给你们讲为什么我很反对“临床案例”这种工作方法，但我还是给你们讲一个。

很多年前，我见过一个精神分析师，她之前已经跟人做过一段个人分析。

见我的时候，是因为跟病人发生了很复杂的关系，所以整个分析她都在讲述这些困难。但很偶然地，她跟我提到她不会游泳。她曾试过，但到了要把头埋到水下时候，打死都做不到。

刚开始，对她自己的“问题”、她为什么来见我所讲的一切，我都没说过什么；一旦她讲到这游泳的事，我就非常感兴趣！这显然让她有点意外。她来见我不是为了这个，但只要她再说起，我就一直都表现得很有兴趣。于是，不等我建议什么，她就回到了游泳池。

该发生的就发生了。

她来见我，是因为她爱上了自己的病人。当她发现生活里的他与分析中的他很不相同时，整个故事就完结了。而当她开始学游泳，又坠入了爱河，喜欢上了游泳教练，这时候我就可以干预了。因为这是精神分析的真正产物。在试着理解跟游泳教练究竟发生了什么的时候，她可以理解跟那病人所发生的。

在这个过程中，她学会了游泳。但老实说，她游或不游，跟我实在毫不相干。谁都没必要被迫游泳，相反，很常见的，是有必要制造一个移情的症状。

有句玩笑话说，精神分析是它装模作样在治着的一种病。这恰恰是重述弗洛伊德的一种方式。弗洛伊德曾说，要将官能症转化为移情的官能症。

用拉康的话来说，精神分析师是症状的一半。这是很厉害的一种说法。它意味着精神分析师不同于精神科医生或心理师，不是治疗过程的旁观者。他涉及其中，以其性格、他自己的官能症，以及更多。

我停在这里。

3 问题 2：幻想是否是一种功能？（青少年及性问题）

李斌彬博士（后简称李博）：允许我跟大家分享一个感受，用一句话

来说，叫“学问之美，在于叫人一头雾水”。

GLG：“一头雾水”？

李博：这是中国的一位精神分析师说的，山东人，叫周立波。我也不知道是什么意思。还有第二句，叫“女人之美，在于丑得无怨无悔”。

GLG：啊，这……相当少见哦。

李博：我说这个，是一个思想，就是说的可能是不一样的语言，但可能说的是同一件事。我对分析是有幻想，或者说是有想象的……

姚洁：在听课的时候？

李博：对，对，所以，是一头雾水的感觉，到最后，差不多就是一个想法，是幻想的话，就是幻想，第一个，是不是一个功能？它的这个功能是不是针对丧失的客体？是不是为了维系一个若即若离的联系？这在我听来，好像是一个……“哀悼”？

GLG：我不知道怎么才能直接回答您，您能不能……

李博：就是说幻想啊，它是不是主体发展出来的某种功能？这个功能是在定义——就是带有普遍性的、每个人在生活中都会遇到的——对丧失的一个处理？如果是一个处理的话，刚才从你翻译的描述来讲，好像是对于一个……不管是圣物也罢，别的也罢，好像是一个注定要丧失的客体，来建立一个——通过想象，通过这个幻想——建立一种若即若离的联系。我想问的：第一，这是不是带有普遍性？换言之，这个幻想是有功能的，这个功能是用来处理丧失的；第二，它本身会不会是一个“哀悼”的部分？

GLG：好吧，我想我理解了您的问题，而且我相信您的问题是深刻建立在临床的基础上的。

事实上，幻想这个概念本身意味着对某种原始丧失的实现，（姚洁：“意味着？”）意味着主体考虑到了某种原始的丧失。

（对李博）既然您已经熟悉弗洛伊德的文章，您知道问题的答案——您这两个问题的一部分解答，能在弗洛伊德 1903 年关于俄狄浦斯情结之衰落的系列文章中找到。

大家知道，对弗洛伊德来说，俄狄浦斯是由这样一个矛盾的形象构成的：孩子意识到自己不能全部拥有，他必须得失去些什么。在弗洛伊德的用语中，对小男孩，他或者得失去母亲，或者得失去阳具，OK（同意吧）？通常来讲，他偏向放手母亲来保住阳具。但官能症的道路是想要什么都不丢。于是按弗洛伊德的说法，就是在这个时候，幻想被落实到位了。

“这时候”，完全不是一个确指，而是一段漫长的建构，随着时间线的延伸而再构。弗洛伊德最重要的论点之一，是说幼稚性幻想的第一典型发生在青少年阶段，在青春期到来之后，再造、再绘而生成。

正因如此，青少年阶段在所有的文化中都是个困难期。因为“青少年”是个正在重新建造自己幻想的人。这一点在性的问题上可以看得很清楚。曾是一个小男孩是不够的，现在的问题是得要“成为”男人或女人，因为这问题对女孩同样成立。

社会上很大成分因受到精神分析的影响而发生的颠覆，是将注意力转移到青少年的这个……我们就说是“再-性”性质的时期吧。青少年天生的性别并不能自动决定他生活中的性类型。当然，社会在演变，但同时有精神分析运动，各种形式的精神分析运动，才使得性别与性形态得以脱离一一对应的关系，使得同性恋者，不管男女，不再被视为罪人或精神病人、性变态。

请允许我用个小故事，来说说 20 世纪这一社会与政治运动的重大变化。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在英国有个年轻数学家非常出色，叫艾伦·图灵

(Alan Turing)。你们听说过图灵吗？是他令德军密码有可能被破译。正因为他，英国人才将德军潜水艇击沉于大西洋。

但图灵却是个同性恋者，很秘密，非常英国式地。在1952年的一天，他被警察抓了个正着，于是受审。当时的判决是要他接受雌激素疗法，服用一种完全阉割性功能的化学药物，不然就得进监狱。但图灵是个很棒的生化专家，他做了另一件事，把氰化物放进一个苹果。他吃了这个苹果，死了。

这事发生在1952年。2011年，大不列颠政府就此事公开道歉，追认图灵为民族英雄。英国政府为自己所做下的事情道歉，我在历史上还找不到第二个例子。

我在其他事情上都很喜欢英国人也很喜欢英国，但这个例子是为了告诉大家，曾作为一种罪要判刑的同性恋，现在真的再也不是了。如果连英国政府都可以为它曾经给一个同性恋者所造成的威胁而道歉，那同性恋就颇有前景可言。

离您的问题已经很远，但我不会停在“一头雾水”里。让我们试着回到失落与幻想建构的这个维度上，也许可以这样概括：不管是母性的大他者，还是泛泛而言的大他者，当主体与他面对面时，一个大问题是：“对你来说，我是什么？”来自大他者的任何回答都不能令人满足。因为如果他回答，那答案是从他自己的兴趣或利益出发，而且完全证实不了什么。他可以是在撒谎，“想要哄哄我”，诸如此类。怎么才能知道个究竟呢？

每个人就得自己创造出一个对大他者来说的“我是什么”：一个出类拔萃的男孩，一个坏蛋，一个贫穷的女孩子，等等。这一价值是幻想的根基。之后的，只要对得上这个方向，就成立；与之相反，就都很可疑。

在最为普通日常的临床中观察一下，总有些人认为自己只是好好人一个，最没用的，做什么都不成功。每次搞糟了什么，都成为这一说法的证据；而一旦到他不得不承认自己也做成了什么时，他会急着表白说，那是运气、是个意外、不太正常的……总之，那不算。

当你们有这类信息要处理的时候，如果我能说一句的话，就是你们活在当事人幻想的匣子里。换个说法，当你们遇到这类确认，你们正在幻想的领土上。

4 问题 3：大他者与小他者的区分

学员：老师讲到两个 A，一个是大 A，一个是小 a，这两个有什么区别吗？

GLG：大 A 和小 a 之间？这区别绝对是最基础的。

我跟大家说过，这个字母小 a 有两层意思。

一直维持着一词多义的可能，是拉康非常特征性的一面，这跟弗洛伊德很不相同。而对于尚未长期习惯阅读拉康的人来说，是很容易误入歧途的。拉康的译本，英语也好，西班牙语也好，我估计中文也不例外，一个很大的问题，是这类多种歧义词的大量丢失，包括对他的这两个“他者”的翻译。

因为在法语中，“他者”的第一个字母是大写还是小写（Autre 或 autre），发音完全相同。所以习惯上，会用“大他者”或“小他者”来区分。可是拉康在研讨会上，通常讲的只是“他者”，并不确指他说的是哪一个。想要将研讨会整理成书面文字的人，就得在大小他者之间取舍。当然，一取一舍之间，句子的意思就已经完全改变了。

小 a，类似者，是很容易理解的。但大他者，随着拉康整个教学的进展，被赋予的价值完全不同。

比方起初，它是“能指的宝藏”，我前面给大家讲到过“普遍性科学”（la mathesis universalis），是全部的象征符号，或者象征符号可以被想象的全部、全体。如果将它拟人化，就是大写的母亲、上帝，在某些时候，也是精神

分析师。但到了一定阶段，在他所有的这些说法中，大他者的重点落到了“相异性”（*altérité*）这个概念上。在这个位置上，你们触到了大小他者之间的区别。

小他者，是跟我一样的什么人，我可以跟他建立某种关系，他是我的另一个自我，*alter ego*；但拉康不得不将一个“相异性”落到位，“我”跟这个异己，是不发生任何关系的。

“圣”这个概念，因此很自然地就进驻到这个异己、这个大他者中。因为“圣”的定义本身，就是你无法建立关系的什么。这是为什么我们会常说“绝对神圣”。“绝对”这个词，*absolu*，在拉丁语里的意思是“分割开的”。从我们这里分割开，脱离我们这些神的造物。

大他者作为整体，必然有个空缺。梅兰妮·克莱因的故事中所讲述的正是这个。要想拥有一个完整客体，这客体就什么都不能缺，而在梅兰妮·克莱因的想法中，这个整体就得包含一个“无”。

这是个很古老的逻辑笑话：要让一个“全部”站得住脚，就得给它加上“无”。没有这个“无”，这“全部”就还是少了点什么。

但有了这个“无”在里面，这个“全部”就有点古怪了（现场沉默）。我最好再通过数学让事情清楚一些。

你们知道什么是“空集”吧？在逻辑学，尤其是数学上，我们用这样一个书写符号 \emptyset 来表达它。随便打开哪本逻辑书，到第二页，就得要你区分“一个元素”（*élément*）和同样的一个元素，却是只含这一个元素的“集”（*classe*，类）。于是我们说这个元素属于这个集。所以，为了它能够从属于这个集，就得同时要有这个元素和一个里面什么都有的空集，它们结合在一个所谓的“单元集”（*singleton*）中。单元集是只含单独一个元素的集。

如果你不能接受元素与只有这一个元素的集之间的这个区别，换言之，接

受空集的存在，那你就无法在数学最简单的学习与理解中前行一步了。

发明数字的古印度人用同样方式发明了零，是人类文明史上的一大发明：一个用来指示客体在此缺席的符号！罗马人尽管有非常大的智慧，但罗马数字中没有零。我猜在我国的数字中，是有这个零的。因为你们中国人是算盘的发明者，当什么都没有时，就没有算盘珠子要推。古印度人是创造了一个符号来说：那里，什么都没有。逻辑学家用他们的“空集”所做的，是同一件事：一个集里面什么都没有。

但要去想这一切很难，因为我们很难想象那是个什么东西。但那就得是个什么东西，否则就结束了，讲不下去了。所以，在一个“完全”里，总是有个空集。

关于这个逻辑点，最后再给大家一个概念：拿 a 、 b 、 c 三个元素的集，算上这个集的子集，就是： a 、 b 、 c 、 ab 、 ac 、 bc 和…… \emptyset ，空集。这三个元素的集包含的不是 6 个子集，而是 7 个。因为要算上空集。

这听上去好像只是个逻辑问题，但我向你们保证，它直接涉及精神分析的临床实践。因为我跟大家刚刚讲了几个小时的这个叫作“小 a ”的客体，与空集非常接近。当然了，它们不是同一件事。

我试着让你们对这类客体有一点概念：它们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客体，但是它们令我们有可能去思考普通的客体。

就这样了。

第9讲 进入倾听

阳光如此明媚的星期天，终究不是我们的休息日。

你们应该已经能猜到，我这五天的介绍不会顺着一条直线下来说。我的主题始终是同一个，但不得不转换角度来攻克它。第一天给大家讲的，是非常理论的东西，但它会在实践中产生重大后果——我讲的是符号、信号的本质问题。昨天是第二天，我试着在弗洛伊德与拉康之间，将“主体”与“客体”这两个词的意义抖动、拍打一下，去去成见。

我希望你们能意识到，这不是用拉康的理论去反弗洛伊德，或用弗洛伊德的说法反拉康的问题。事实是：想要估量自己的位置或立场，在实际操作中，从两个不同的点出发，远远要比死盯着一个点容易得多。

想从单独一个文献出发来建立自己个人的立场，实际上是非常困难的，尤其是当这个文献出自于弗洛伊德或拉康那样举足轻重、影响深远的人。这些文字中暗示的力量是无法估量的，以至于有些人会以为，单凭这些文字本身就足以回答一切可能提出的问题。我们会经常碰到一些弗洛伊德派、拉康派或克莱因派人士，讲的永远是一篇文章，他们的那一篇文章。

我并不支持折中派，但拿了不管是哪个作者的一点点东西就当是事情的全部，实在不能算明智之举。

你们得每次都尽力去感知、辨认、理解属于作者本身的“厚重”。我说的“厚重”（consistance）是指：你得尝试着好好去觉察、体会，抓出主宰着该作

者思想运行的原则究竟是什么，即使他自己从未如此表明。

没想过会跟大家讲这些，既然讲了，就举个例子吧。

1 什么是“冲突”？

你们知道，整个弗洛伊德的著作是围绕着“精神冲突”（*conflit psychique*）这个概念而构筑的。然而某一天，当我想要翻译朱迪斯·巴特勒（Judith Butler）的一本叫《安提戈涅的索求与声称》（《*Antigone's claim*》）的书时，作为译者，我最终理解到所有的文化对什么是“冲突”并没有一致的概念。

安提戈涅是俄狄浦斯的女儿，她想要安葬死于互相拼杀的兄弟，这是当时城市文明的法规所禁止的。安提戈涅因此违抗了克瑞恩（*Créon*），她的公公！她说过的这句话是最基本的：“是，我知道人文的法律禁止埋葬他们，但人性的法律迫使我让他们得以安息。”她于是成为一个非常具有代表性的形象，象征着所谓自然法与人文法之间不休的斗争。

但是，安提戈涅声称她有权安葬兄弟，同时却在索讨这么做的权力。她索求的，从城市文明的角度来看，是她所没有的权力；她却自认为面对她兄弟和普遍而言的人性，她有这个权力，可以超越人文制定的法规。她的话概括起来就是：我知道城市文明禁止我做这件事，但我也知道，人类的天性迫使我去做它。

在这里，同一个英语单词 *claim*，讲的是两件完全不同的事。一个是法语所说的 *réclamation*，祈求、恳求、要求或索要^⑨，另一个却在宣布开始时你所没有的什么东西。比方在美国的淘金热中，先锋者到达一小块领地，他立个写有自己名字的小牌子，说：“这是我的宣称（*It's my claim*）。”一个宣称，这是我

⑨ “因是应得的权利或财物”，李北达《牛津高阶英汉双解词典》，商务印书馆、牛津大学出版社，1997[1989]，第244页字条 *claim* 注1。译者注。

的领地。所以在英译法的词典里，在同一条 claim 名下，你们会看到两个性质上完全不同的解释。第一个解释说的是恳求我所没有的，第二个却是我自己宣布，这是我的所属，我所拥有的。

在这里，我发现了触及精神分析本身的东西。

开始的时候我不理解，这个英文单词在法语中为什么就没有可以对应的？之后我想到，我们终究是生活在法律背景完全不同的两个世界里。

英美两国，跟大部分旧制“英联邦”所属国（the Commonwealth）一样，生活在所谓的“公共法”（common law）体制下。这很深刻地意味着，两个团体或个人之间一旦有冲突发生，很自然的趋势就是双方寻求协议、达成共识。其基本思路是，冲突应该依靠自身解决，建立在平衡双方利益的基础上。

而所有的欧洲国家，如法国、德国、意大利、西班牙，曾经在拿破仑帝国的统治下生活过的，“冲突”这个概念本身已经完全不同。“冲突”的基础，是两者之一想要不致对方于死地而不会罢休的。其自然趋向就没有协议可言了，正好相反，一定要斗出个你死我活。所以，一旦有重大冲突发生，就得立马转向国家、转向法律。国家——也就是说警察、司法部门，会马上做出干预来解决矛盾。而在盎格鲁-撒克逊的世界里，国家势力当然也会出面调停，但只有在一种情况下，那就是双方自己无法达成协议，因而提出要求。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说过多米尼克·斯特劳斯-卡恩（Dominique Strauss-Kahn）这个案子？听说过？法国人当时真的被美国的司法运作给吓倒了。

他们通过这一事件才发现，美国的运作跟法国完全不同。但重点是，他们实际上对法国之外的运作完全没有概念！作为遵纪守法的法国公民，他们很自然地以为自己对司法的概念就是天下普遍的概念，以至于美国在司法上与法国如此大相径庭，居然无人知晓。

我再回到弗洛伊德。

早些年涉及将弗洛伊德译成英语时，“冲突”这个词并没有构成任何问题，冲突就是冲突，德语的 *streit* 是英语的 *conflict*。没被察觉的是，冲突的基本理念在两种语言中是不同的。美式或英式弗洛伊德派的某种特定风格，正是在这一事实的基础上，悄然分流而成。

由此可见，对精神分析的接纳，相当依赖当地已有的文化。在一种像中国这样古老而根深蒂固的文化中，得等着看到一些非常深刻的思想动荡。不仅仅是在你们翻译弗洛伊德或拉康著作的时候，更在你们想要弄懂深藏在语言与文化之中的基础这一过程中。这是我在准备这几天讲座时，为什么选择只给大家介绍几个基本点而不做长篇大论的原因之一。也是为什么当涉及“临床”这个主题时，我完全无意给你们介绍所谓的“临床个案”。

我不怀疑我们这两个国家之间，或多或少地享用着同样的病理结构——我讲的不是精神医学中所谓的 DSM，“精神疾病与诊断手册”。我可以预言，它已经走在即将消失的路上。你们可以持相反的观点，认为它正在到处大获成功，但在它 40 年前的诞生地美国，这种成功已经失落了它最初的速度，因为它已经变得越来越复杂。精神病学的研究者们将它放弃，至少有 5~8 年了。

我讲的“病理结构”，是很简单的“恐惧”“歇斯底里”“躁狂-抑郁精神病”之类，是精神病学上最关键的几个决定性维度。但我很清楚，很多精神分析师做讲座，是用精神病学的模式在讲精神分析的临床。是不是法国人不是关键，关键是这样的讲解弄得精神分析治疗就好比是与精神科住院病人的面谈，略微特殊一点而已。

然而，即使我们能在两种情况中找到很多相同的特征，用介绍一个病人是为什么和怎样被收治的方式，来介绍精神分析治疗中发生的某些时刻，始终会倒退到同一件事：忽略了移情的存在。不然就是简单地将它看成是病人那边发

生的客观事实，是个物，分析师可以事不关己地对这整个现象指点江山。

有关移情这回事，今天下午涉及“基础规则”的时候，我会详细讲。目前这个阶段，我只想从结构上给大家点一下：精神分析治疗与精神科面谈之间，有个绕不过去的不同。

2 “职业秘密”与“私人秘密”

我们刚见面的时候，我跟大家略微讲过两句什么是我所谓的“精神科面谈”：即使只有两个人，医生总是被视为持有“职业秘密”的人。我猜在你们中国也一样，应该存在着所谓“职业秘密”这回事吧？（大多数人回答“没有”。某学员说：“有，但我总怀疑是不是真的。”）

总之，在法国，医学上的“职业秘密”是说，这秘密可以在医生、护士以及医护这个职业圈子里，公开共享的。（某学员：实际上，我们已经没有专家权利了。）好吧，反正不管怎么说，“职业秘密”是不可能不存在的。但这就意味着任何时候，我们都知道谁是这圈子里的一分子，知道跟谁我们有权分享关于某病人的一切资料，秘密地或圈子内公开的。

所以，在精神科面谈中，即使只有两个人，都好像潜在地有第三者在。这第三者，是晚些时候我们会去把这里讲过的事情都告诉他的。

但是，精神分析中完全没有这么回事。我非常清楚无数的精神分析师都很喜欢讲述他们的病人，在他的朋友圈里、夫妻间、同事间……碰上研讨会之类，就完全是公开场合了。一旦涉及在公开场合讲病人，通常都名正言顺地认为从案例出发是传授精神分析实际操作的需要，而且都以为，弗洛伊德自己从一开始就这样在做。弗洛伊德讲述的大案，在传统中早已成为经典文章。

我晚一点会回到这个点上：精神分析的传授，是精神分析生存的最大危

险。这是个值得探索的矛盾。我认为，在精神分析治疗中，精神分析师是服从于我要称为“私人秘密”这回事的。这秘密跟任何人都不能分享。

我把督导放在一边，因为这种情况下，存在着分析师自己指向督导的移情。这至少应该是被期待的。因为如果没有这点移情，督导就无非例行公事，早已与它真正的目的背道而驰。

我坚持“私人秘密”这一点，不是要讲伦理道德这些冠冕堂皇的理由，而是出于技术上的原因。我给大家解释一下。

如果你跟另一个人讲述治疗中的某个时刻，比方一个朋友，这人多少会以某种方式来反馈你些什么，即使他一句话都不说。所以，你对自己的病人、对之前你对病人已有的想法，就会有改变位置与立场的危险。从这个时候开始，到下一场分析，你会在你们两个人的运作中引入一个新的数据或条件，是你们两个人的关系中所没有的，并非发生于移情。

这就是为什么虽然跟他人讲述自己的病人从来不是被严令禁止的事，却终究是有点儿风险。最坏的是，你越是跟人去讲病人，这病人就会越来越变成一个“案例”。我用“案例”这个词想说的是：你对他或她的看法是完全固定的。然而对于一个精神分析师来说，如果说有个必须要做的工作应该算是已经做到了位，这工作恰恰就是要持续扫清他在跟病人接触中可能不断生成的成见。

显然，这是个相当矛盾的情况，因为一方面，的确你对他或她会有越来越具体的想法；但另一方面，如果你不能越来越远离这些固存的想法，就再也听不进去他正在跟你说什么了。就像我昨天解释的，所有听起来像是在证实你那些想法的，会被当作是你有道理的证据，而与此相反的话听到耳里，会被当作偶然、怪异，或是没有太大意思的东西。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你已经不再给他任何机会了。

如果精神分析治疗能允许我们从它那里期待些什么，恰恰就是某人不被他所谓的人格或个性同化。我们多多少少都会肯定自己的某种人格或个性，但主体的

运作没有被迫要跟这所谓的人格或个性走。一个人所能感受到的最强烈的自由感，恰恰是在我们能略微逃脱一点这种人格与个性的时候。余下的时间里，不如说是感觉在完成一种订购服务。（姚洁：“订购服务”？）是。“做好我应该做的”。

爱情的魅力之一，就是能让人忘掉一点点他自己的所谓人格或个性。如果移情之爱也能达到同样的效果，就很好了。

好。我现在要开始的问题——始终与临床相关，是理论与所谓的“精神分析实践”之间的关系。这问题比较复杂，为了有可能用最简洁的方式讲清楚，我得从逻辑学方面讲一下。

逻辑学中，这是“普遍陈述”（*proposition universelle*）与“特殊陈述”（*proposition particulière*）之间的关系。

3 普遍陈述与特殊陈述（从理论到精神分析实践的关系）

普遍陈述在一个特定的“场”中确认一定数量的元素。例如，有个物理原则说：重物坠落。它就是对所有重物都成立的，我们不必列出一张清单来。如果某物体有一定质量，在地球上，它就会落地，结束。

教授这一原则的时候，我们会举出一个例子。比方，我们拿个东西出来，给大家看，它会坠落。于是我们说：所有的物体都会坠落，就像这个一样。你们是不是也这样？

在我小时候，物理老师还会做另外一个实验。我们抽空一根管子里的空气，制造出一个真空，在这里面，让一个铁珠子和一片羽毛同时坠落。两样东西落得一样快。于是得出结论：如果没有空气阻力，所有物体将同时落地。

这是科学原理的普遍运作：如果“所有 x 都有属性 a ”，那么它们中的任何一个就具有属性 a 。我要指出的一点是，当弗洛伊德宣称“所有的梦都是欲

的实现”，他用的是同样一个逻辑运作。这里的重点不在于涉及的究竟是“欲”还是“愿望”，而是这类肯定中的普遍性。因为，如果他说：“某些梦，是欲的实现。”其他人马上就可以追问：“哪些梦？”而他呢，应该是觉得自己发现了放之诸梦而皆准的一个属性。

你们也许知道《梦的解析》出版后发生的一件事？他的一个女病人给他讲了个梦，听上去完全不像是在实现某个欲望。弗洛伊德回答她：“可是，您想要反对我的说法，您的梦因此是这个欲望的实现。”你们从这里可以看到，弗洛伊德时不时地会像一个真正的科学家那样去理论一件事：所有的梦是欲的实现，随便哪一个梦就都是欲的实现。可这，很不幸地，变成了通过案例传授精神分析的特定方式。你们去看，被讲述或发表的临床案例（字对字译：临床标签）中，80%都是以这种方式运作的。

我曾在我的一本书里，用一篇十来页的文章做例子。这篇文章想要阐述维尼科特所说的“崩溃恐慌”（la crainte de l'effondrement）是什么。作者讲述了一个年轻女子，在她身上发生了这事那事，在他眼中就是“崩溃恐慌”的证明。

很显然，那些事什么都不能证明！我们可以说，它们在演示着什么，但它们证明不了什么。这让我可以指出这类练习中所存在的逻辑困难。对于这个困难，我引入“几个”这个词，通过它在所有语言中的暧昧不清，来为你们理一下思路。我希望它的中文也存在着同样的模棱两可。

在普遍性原则中，对所有的一切都是成立的，对这“所有”中的“几个”，也同样成立。但如果一架飞机失事，我听到新闻说有“几个”幸存者，我不会有一分钟去想：这是在说所有人都幸存，因此这“几个”也幸存了。

在这个例子里，这“几个”就局限于“这”几个，恰恰因为那几个幸存者不是“所有”的人。而在科学原理中的那“几个”，却因为它们属于“所有”。

如果你们能清楚觉察到“几个”这个词在运作上的这一区别，就有可能对什么可以被称为“精神分析临床”有个新的认识：我们可以下决心很长很详尽地报告一个病人的案例，但它不会有什么意义，除非它能表明“不是所有情况都会这样”。我要指出的是，弗洛伊德所做的重大案例，正是如此。

4 精神分析的“案例”

弗洛伊德曾以斗士的姿态描述过一些东西，来论证他自己的某些论点。但他从未断言说，所有的歇斯底里都像朵拉，或所有强迫症都像鼠人，这些案例却常常被人当作那类病例的原型在读。也就是说，认为弗洛伊德的案例是在定义这些疾病种类本身：歇斯底里是这样，强迫症是那样，诸如此类。

历史上弗洛伊德定义的几个重要病理实体在精神病学领域大获成功，在他之后，美国是在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法国是20世纪70年代，精神科医生几乎全都成为了精神分析师，成为这些误读的历史背景之一。在20世纪50年代的美国，人们不能想象一个精神科医生营业，可以不在他门上挂个牌子表明他属于哪个精神分析群体。时代很不同了，我不肯定精神分析在精神病学界就已经失去了一席之地，但在美国，就像之后在法国，这个系统培养出很大一批精神科医师，自称是做过分析的，却痛恨着精神分析。经常地，是他们成了精神分析最糟糕的敌对分子，因为是他们在说：“我已经做过这个了，多谢！我再也不要了。”

我阶段性地小结一下，好让大家可以就此展开讨论。

我坚持这个事实：主体，我们昨天所讲到的这个主体，不是个案例。

“案例”这个词的拉丁语词根 *casus*，是“坠落的”意思。你们应该不会忘记，同样的这个词 *cas*（英：*case*），有语法案例、语言学案例、司法案例之说。因此，说是也有“精神分析案例”的时候，你们要能听到其中的口误。原因是

我一再坚持的：案例不是主体。

这是为什么我认为对于精神分析治疗本身，当它正在发生时，其实完全不可能发表。只有在治疗结束了相当一段时间之后，你们可能可以评估说，这个故事已经“坠落”，因而你们现在想要用它来“做一个案例”。

但这案例从来都不是关于一个病人的，而是你和这病人之间所建立的关系。从某种方式来看，这里面你自己的故事会跟他的一样多。

我们开始讨论？

学员：这几天听课，最大的感受就是在和病人工作的时候，最好是把自己的东西（放）空掉，同时去理解病人空掉的东西，主体带来的那一刹那、一瞬间。实际上我们跟病人工作的时候，只是这病人的一部分。这对我们过去的理念是颠覆性的。老师给我的感觉，就好像是我学到了其他很多课程。最大的启发就是我们跟病人工作的时候，其实这只是他的——你的病人的一个“部分”，不可能不是你病人的全部，不代表所有的病人就都是一致的了。这颠覆了我过去的理念，给了我很多思考。现在我每周有两个督导，一个是个人的，另一个是团体的。我在想我和督导老师所呈现的一些东西，的确它是不可能涵盖病人的所有。这就是我的理解。

5 问题 1：“我”的“最低痛感原则”与“快乐原则”

学员：昨天老师讲到神经系统，它有一个重要原则，就是要保持一定的痛感。讲到这里，我脑子里有个念头，就是弗洛伊德也说过“本我”的“快乐原则”。能不能请老师讲一下，它们之间是个什么样的关系？

GLG: 是同一件事。

快乐原则肯定说：精神器官的整体总在想方设法地寻求着将力比多数量维持在最低水平，而痛楚总是被理解为一种过量投注。

所以开始的时候，弗洛伊德很自然地以为这些量，这些能量的激增，是通过感知觉而来的，来自外部世界。但他是个出色的临床工作者，尤其还是个神经学家，他就撞到了一个非常有趣的问题上。他问自己说：怎么就会有一些记忆，当它们被想起的时候，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痛楚呢？我们可以躺倒、闭上眼睛，没有来自外面世界的任何兴奋。一旦某个记忆被勾起，却可以是极度地痛苦。如何用神经学观点来解释这一事实呢？

于是他说：我看我不得不做出这一假设：存在着一种相当特殊的神经元（弗洛伊德对“我”的最初定义）。这些神经元如同腺体一样地运作：当它们被一定的量激活，就会吐出一些新的量。（姚洁：“吐出”是？）它们制造、抛出这些量。这样一来，弗洛伊德有关痛楚的普遍认识就得到了验证：痛楚是种发生在精神器官内部的能量过度，并非来自外部。

这段历史中最有趣的是，该假设诞生于1897年，在《雏形》一章中。那年头，人们对这种神经元的存在毫无概念。但即使弗洛伊德所说的这种“内分泌神经元”（neurones sécréteurs）不曾被发现，今天的人们也非常清楚，人脑能激发出并非产生于外界的痛楚。明白吗？

6 问题 2：主体与主观的探讨

学员：因为谈到主体和“案例是我们与病人的关系”，过几年以后再回去反思它，就能区别开来。另外一个就是“主观”，我在想它们之间有没有什么共同的地方，或者是它们有什么区别？

GLG (对姚洁): 请他把问题具体明确一下。

学员: 为什么我们能够把这个“主体”给……就是说,如果是主观的话,怎么能把它给呈现出来?就是“主观”,怎么可以把它给“观察”出来呢?还是通过哪些条件,可以把它呈现出来?我想问这个,因为那个时候我们好像跟这个主体之间是有一定的关系的。

姚洁: “那个时候”?

学员: “过几年以后”,因为是过几年以后这个主体才可以呈现出来。

姚洁: 啊!我好像大概明白了你的意思。你是说老师讲“主体不是一个案例”,为什么过几年以后,我们就可以讲这个案例,是这个意思吗?

学员: 老师说这个案例可以讲……自己跟这个案例的……

姚洁: 老师在这时候加了一个词,说:这时候我们也许可以“做”一个案例。不是“讲这个案例”……

学员: 他也用了“反思”这个词。我想问的是为什么我们能够看到这个主体?

GLG: 好,我明白了。(沉思片刻。)

主体永远都不会成为案例。

正是因为这个道理,我们昨天讲到主体时,说它是“事件”。一个事件,会来也会去,会发生也会停止。要是能长久存在,就不是事件了。一个案例,相反,通常是篇文字,口述或成文,可以一成不变地流传。

正如你们中的一位所指出的那样,案例是个“很局部”的什么,但它有一定的扩展,涵盖着一定数量的线条特征。线条,是你试图想要拿来组配一个形象的痕迹。而这一切,都是主体所没有的。在书面案例中,比方狼人,没有任何主体。没有任何我想要给主体的那个意义。

但在狼人治疗中，你们会看到一些提示，知道至少是应该有过一些“事件”质地的东西发生。你们会在弗洛伊德某个句子的角落读到这样的提示：这是个已经做了四年的分析，每场 55 分钟，每周 6 场。

弗洛伊德从未做过如此长的分析，而且他看得很清楚，事情还会这样继续下去好几年，因为“狼人”在这个系统里舒服得很。

狼人——其真名是 Sergueï Pankejeff——后面会讲到他与弗洛伊德的分析。他当时满脑袋纠结、说个不停的就只有一件事：他与黛拉斯的关系。黛拉斯先是他的护士，之后将成为他的妻子。弗洛伊德毫不掩饰自己对此——对他和黛拉斯的关系毫无兴趣。相反，他对那个关于狼的梦非常关心，因为他认为这是阐明他“事后”理论的一个很好的例子。好到如此地步，当 1914 年 3 月的某一天，他对 Sergueï Pankejeff 说：“假期前的最后一天，将是分析的最后一场。”接下来四个月的分析，就只有那个梦。历史在这里也开了个玩笑。狼人最后一场分析结束的两天之后，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

你们看，弗洛伊德最为知名的大案之一，是在特别锁定的视角中建构的，涉及的不是主体的故事，而是通过将分析约减到一个很小的区域，来为一个理论观点做出辩护。

精神分析的所有知名大案，比方梅兰妮·克莱因的“迪克”——她把那孩子叫作“迪克”，但实际上是她的亲生儿子，都是为了举例说明某一论点而建构的。是你想要展示的论点，让你有可能裁剪得出做一个案例的材料。而主体间的关系，你与主体所建立的关系，它本身从来就不是案例。因为唯一重要的，是之后会成为什么。

我并不想这会儿就拿拉康对主体的定义来闷倒你们，但这定义是多年来始终不变的，叫“一个能指将主体代表为另一个能指”（Un signifiant représente le sujet pour un autre signifiant）。这意味着你不会停在任何一个能指上，因为每个

第一个都只有在第二个产出时，才有意义。

所以，你们唯一能做的那个“切”，呼唤着一个继续。这是为什么分析的结束是非常独一无二的事情，它不是心理治疗。病人好转的事实，不足以决定工作就此终止。他或她好起来了，再好不过，这是继续做功的最好理由。因为通常而言，分析这工作在非危机阶段，进展会好得多。

有时候，也会有些多产的危机时刻。但焦虑一旦太过强烈，终究是个阻碍工作的东西。你们看，我得怎样地根据具体情况，调色、转调，晕出一件事情的不同层次？

昨天，当我说到恐惧症的时候，说到恐惧症病人会有那种为逃避焦虑而躲着不要遭遇焦虑对象的方式。我那时告诉你们说，这经常会把分析带到死路一条的状况。既然已经讲到这里，我就顺便把这一点再强调一下。

7 抑制的问题

因为抑制对精神分析来说，是个很大的问题。

你们也许知道，弗洛伊德写过一本叫《抑制·症状·焦虑》(《Inhibition, symptôme, angoisse》)的书，在一定条件下，症状是个可以解析的什么东西，但解析抑制，通常是不管用的。当有人跟你说，他的问题是开不了车、写不了东西、结不成婚……他其实是在告诉你，他无法在自己的活动中前行一步，因为他已经提前知道他做不了。为他解析为什么他做不了就没有意义。你跟他还能花上个好几年来一起目睹，得让他略微向他所焦虑的那个“什么”靠近一步，好让它重新成为可以解析的东西。事实上，要非常小心弗洛伊德所谓的“纯抑制”(德: reine Hemmung, 法: l'inhibition pure), 因为它不是症状, 不能当症状来解析。

各种积极的心理治疗，都是在这个位置上大获成功的，但只是一时。人们以为它们会明显地要比精神分析快得多，但这只是因为它们用直接暗示在操

作。当前绝大多数认知疗法、行为疗法都是这种情况。在面对纯抑制时，它们都表现得很成功。

有一种情况不要忘了，那就是反复冲动也是抑制的一种。当有人无法不做某一件事时，这就是一种抑制。所谓的“冲动型强迫紊乱”(les troubles obsessionnels compulsifs)，经常是些抑制。所以，得要病人试着停下它，好让他可以焦虑一点儿，分析才有可能进入症状到位的情况里。(现场议论“冲动型强迫紊乱”是不是强迫症。)

我讲的是在 DSM IV 或 V 里所指的，不是我们从结构上讲的强迫官能症。比方说，一个人睡前得要检查 15 次煤气有没有关上这类属于强迫官能症。

学员：对我们来说，这就已经是强迫症了。

GLG：是，这是强迫症，但所有的强迫症不会都去做这件事。这是强迫紊乱中的某种模式。

学员：您是说，这只是行为问题？在我们的强迫症里，还包括强迫思维，算不算？

GLG：强迫症是非常复杂、非常多样化的一件事。拉康甚至要说，强迫症是如此多样，足以解释和论证宗教战争。

所以，在强迫的框架中，无数行为可以名正言顺地被定性为强迫性的，且经常反复的。美国现代的精神病学摧毁了歇斯底里—强迫—恐惧之类的结构，发明出“冲动型强迫紊乱”这类属性，既非强迫症独有，也非强迫症特有，即不是所有强迫症都有的。

但你如果像解析症状那样，去解析这些冲动、反复的行为，就弗洛伊德给予“解析”这个术语的涵义而言，我敢保证，你只会给予这些行为越来越多的

意义，令这些行为更加理所当然，更加肆无忌惮。

真正的战争在他处，是在你们想要找到这个恰好的“他处”的路上，你们也许会对这个所谓的“冲动紊乱”发生真正的效应。

因为这“他处”，从根本上就是移情性质的。病人反复发作的行为，是因为他对你没信心，就像他对自己没有信心一样。即使他跟你说他很喜欢你、你是很了不起的治疗师，他对你还是没有信心。而且他是对任何人都没有信心，尤其对他自己。

如果你能在他的历史中，找到一个他有道理对任何人都没有信心的严重时刻，那时候，也许，你会有个效应。

学员：抱歉，我还是想再提个问题。在具体的治疗中，是不是应该做点什么？就是说，具体地在治疗过程中，是不是应该停止这种重复？

GLG：你要是显示出想要他停止，那就已经提前输了。

因为这冲动行为的目的，就是防御“停”的可能。

不管怎样，通常而言，分析的第一时间就是接纳症状的，真正地接纳、完全地接纳，毫不拒绝。但关系到抑制，我刚刚讲的意思是说你们不能用接纳症状的方式去接纳它。

弗洛伊德很清楚，在症状中有不同的抑制。但既然他会写出“抑制·症状与焦虑”这样的标题，是因为他懂得在抑制与症状之间划出不同。

所以在一定的时候，你们可能会被带到要求某个病人缩减一下这个运作的境况里，不是为了他能好转，而是因为如果他继续反复这些相同的事，分析就不再继续往前了。

第 10 讲 什么是精神分析的临床案例

为了证实我的方法论，我要再给你们讲个故事。我们在一起已经有两天半，你们应该已经清楚我是如何运作的了。

一方面，我对逻辑理论、数学理论、精神分析理论都很感兴趣，也就是说，对普遍性的东西很感兴趣；但同时，我喜欢故事（或“历史”histoire；英：histroy），包括分析者的、病人的、团体的，等等。任何形式的故事我都喜欢。这应该归功于我所接受的历史学教育。一般来说，历史学家是很喜欢细节的一类人。

经常在哲学家那里碰到的，只有理论，我很快就会觉得很闷；但如果只有故事，我也会觉得郁闷。要是两者调和一下，我就一点都不闷了。我希望你们也是这样。

既然上午打算讲“精神分析的临床（研究）”，就给你们讲这一段吧。它跟精神分析临床（研究）毫不相关，但当我在一位历史学家的书中看到这个故事的时候，我的内心有一个声音告诉我说：“就是它了！精神分析的临床（研究）正应该是这样的东西。”

当然，这是个比喻，这只是个形象，不能一字一句地拿来对应。故事是这样的……

1 无名氏的历史故事

在法国有个历史学家叫阿兰·高尔班（Alain Corbin），曾是索邦大学的教

授、法国 19 世纪研究历史的专家。你们想象得出，他对法国与欧洲的 19 世纪情况了如指掌。但同时，他针对 19 世纪所写的很多书都很怪异。比方说，关于 19 世纪的一段“气味”史、19 世纪“想要旅行”的历史……当然，他写这些书都是从研究历史文献、研究当时的新闻报纸、私人日记入手，从大量的史实资料出发。历史学就是研究史料的。

到了事业晚期的某一天，他对自己说：“这终究有点悲哀，我从未成功写过 19 世纪一个无名辈的历史。”他很清楚作为历史学家，这念头很荒唐。因为历史学家只能从他所能遭遇的历史痕迹出发来阐述，而一个无名之辈，就其定义本身，就是没有留下任何历史痕迹的人。但这想法让他觉得很有趣，时不时地再现脑海。

他很熟悉史料馆，多少知道怎么去做。于是他对自己说：我要去查阅 18 世纪末的出生记录，在里面随便找个人，如果他活得够长久，足以跨越 19 世纪的一部分，我就来研究这个人的生平。

于是他就去了。面对户籍出生的民事记录，闭上眼睛选了一个名字。

很不幸，第一个没选准，因为那人 20 岁就死了，只活到 1815 年。再来第二个：路易 - 弗朗索瓦·必纳戈（Louis-François Pinagot，姚洁建议：“就当是王老五好了。”现场笑），生于 1796 年，卒于 1870 年。完美！就是他了。

于是，阿兰·高尔班着手研究这个路易 - 弗朗索瓦·必纳戈的生平。

他是个出色的历史学家，很快就发现必纳戈曾是个做木鞋的工匠，生活在离巴黎西部 200 公里的拜莱姆森林（Bellême）。除此之外，没有任何资料专门讲到这个路易 - 弗朗索瓦·必纳戈。他能知道的全部，就是这个人很穷，因为做木鞋是个穷人的行当；他不识字，既不会写，也不会读。

那么，在这些条件下，如何来写一本关于此人的书呢？如何建构“路易 - 弗朗索瓦·必纳戈”这个案例？

阿兰·高尔班知道很多法国这个地区在 19 世纪的情况。比方说，拿破仑战争之后，普鲁士军队占领此地长达 5 年之久。高尔班了解占领时期的很多细节，不停地在书中讲道：路易 - 弗朗索瓦·必纳戈那年快 20 岁，应该知道这个。

简单来讲，高尔班同样了解木鞋工匠、民谣等，很具体地知道那个时期人们如何生活。所以，在一系列的章节中，我们都经常会看到这类句子出现：“必纳戈应该经历过这个”“必纳戈应该是很懂那个的”，但我们不知道……事实是否如此？

然而，当这场调查接近尾声时，他都快写完这本书了，忽然发生了一个不曾预料的事件。

他在研究过程中了解到，在 1860 年，当地有过一次关于森林道路的请愿，有过投诉。因为那条路没有被好好保养，秋冬时节，天一下雨，就走不了人，也过不了车辆。早上讲“冲突”这个词的时候，我跟你们解释过，在法国一旦有这类问题，人们会立即转向政府，写请愿书、众人签名。为了结束对必纳戈的这一研究，阿兰·高尔班就特意去当地大区政府（等于省政府）的档案馆，查阅这封请愿书。

毫无意外地，他读到了请愿书。

请愿书本身并没有什么，但在结尾处，就像所有的请愿书一样，有个参与请愿的人员名单。就这样，忽然地，他看到了什么——“路易 - 弗朗索瓦·必纳戈”！跟在这名字后面，有个画押的十字叉，这个他太清楚了。他写道：这个叉，“粗大而笨拙”。

在西方传统中，十字叉是不会写字的人所签的名。

记得自己当时还很年轻，正在做历史研究，曾整理过 17 世纪的婚契。我可以跟大家保证，一个人会不会写字，从他画的十字叉上，是一眼就看得出来

来的。所以，面对这个叉，高尔班知道那是路易-弗朗索瓦·必纳戈画的：是他握着那支不知如何拿来写字的笔，划下了自己故事（历史）中这唯一的记号——唯一能让文盲在文书上标志自己在场的记号。

高尔班极为激动，落下了眼泪。

好几个月了，他一直研究这个人的生平，此时却是第一次遭遇。遭遇到的也许是此人留在地球上的唯一信号，因为连他的坟墓都消失已久了。

当我念到这里，我自己……我没有哭，但非常感动。因为我感觉这几乎就是我所愿意在一个临床案例中所得到的效果。

就像阿兰·高尔班知道那么多的历史，我们自己，我们也知道那么多关于精神分析、官能症等很多的事情，我们也能写上成堆的书、做无数讲座，却不触及任何一个人。而想要有一个“案例”，就得像艺术家们所擅长的那样，要能制造得出一个事件。最后，还要像高尔班那样有点儿运气。肯定得有很多的知识，但仅有知识不足为是。

有了这个故事之后，我终于可以重新来尝试回答你们的问题，关于主体与案例的。

2 再述主体与案例

试着构建一个案例的时候，我们有可能给不在场的主体留出一点位置。但我知道它不会发生，除非建构案例的这个男人或女人能让读者或听者自己意识到：这案例会有所不同。

我在这里就通常而言的“历史”做个点评。

我们总是有个倾向，会把过去的人，尤其是过去已久的人，约减为一些形象。自然而然地，我们不再能想到他们也会睡不着觉、肠胃不舒服，尤其无法想象他们的“不知明天会怎样”。（姚洁：您是指他们也有很具体的日子？）不单单是很具体的日子，而且有他们很不确定的事。只因为他们死了，我们就觉得好像是对他们来说，不“再”有任何的不确定。很难想象他们也曾焦虑。

然而，历史学家思考历史，恰恰是为了在人已死了无数世纪的那些故事（历史）里，重新找到人性之所在，为了在那些人身上，重新找到一直驻在我们身上的这种互相感染的体验。

当高尔班遭遇到十字架，遇到必纳戈活着时留下的这唯一信号时，就如同目睹老人画着这个叉，在他去世前10年的场景。不是这信号本身有什么特别的东西让人感动，是它所蕴含的在场、“在现”（*présence*）……

必纳戈的这个故事，我就此打住。但我想借此给大家一个我对精神分析“理想案例”的概念。

3 精神分析的理想案例

没必要泼墨如水，写掉无数纸张，但很希望在某个时刻，这些案例能在读者心中生出一定形态的情感。

当然，它要能让人弄懂一定的事情，在精神分析的知识上、临床上前进一步，这很重要。但如果没有任何这一情感质地的时刻，我们就是被法语所谓的“普遍性论调”（*discours universitaire*）所囚禁的。在这种知识传授中，只有知识的积累才算，而全然不顾个体与这些知识的关系。

可是你们看，精神分析这东西本身的传授中，需要有多少种完全不同的话语来参与！其中一部分完全像是普遍性论调，因为涉及的是理论、术语的教与学，涉及的是知识的存储。但有些东西，是完全无法集体传授的，而且不管怎

样，只有在对已有知识的某种特定的批评工作完成时，才有可能真正获得。

我说的“批评工作”，是指对已有观点中的某一些提出质疑的方式，不是因为没弄懂它（这很常见），不管我们有没有道理、是对是错，而恰恰是因为我们感觉到自己不愿意、不能接受它。所以，我们在理性上很清楚地知道：应该学进去的东西和我们可能体验到的感觉之间，有个“冲突”。

这是非常有趣的事情。用这种方式，你们正在像精神分析师一样地工作。

这不是个应用问题，不是拿弗洛伊德的理论、拉康的理论、维尼科特或梅兰妮·克莱因的理论来帮你做些什么。正好相反，能够这样去工作有赖于你对这些理论的阻抗。不是在人们教给你的东西中去偏爱某些理论，而是要真心实意地去理解。这里，发生了你对该理论的难以理解、难以接受（的情形）。

好吧，留给讨论的时间不多，我却再次落在没有提问就已经不可能再进展下去的境地。我需要你们的提问来了解你们怎么理解我已经讲的这些、我应该如何继续。

4 问题：评判性的吸收

学员：老师是不是说要“批判地吸收”弗洛伊德或拉康的东西？这是我们中国人的词汇。

姚洁（对 GLG）：“评判地吸收”是毛泽东的方法论。但很微妙，常常还没真的接触到什么，就已经改了所有的东西。

GLG：啊……那“我们中国人”怎么说呢？

学员：意思是说，带着自己的一些反思啊，批判的精神啊，合理地接受要学习的理论知识。

GLG: 我不了解毛主席的思想……

姚洁(对现场): 因为我跟老师解释了这是毛泽东提出来的……

学员: 怎么会是毛泽东提出来的呢?

姚洁: 那是谁提出来的?

学员: 这是……中国人习惯的一种想法。

姚洁: 什么时候开始的……“习惯”? (现场笑、议论) 无所谓, 是我翻译时多了一句, 所以老师开始回答的时候, 先说他不了解毛泽东的理论, 仅此而已。

学员: 我们中国人对一篇文章, 或者一个案例, 会思辨地吸收。(现场很多的笑声和讨论。) 开个玩笑, 我也“切”在这里吧。

GLG: 好吧, 我来回答您的问题。我试着来回答您的问题。

当然, 不管是不是毛泽东的方法论, 我们可以想象在所有的文化中, 都会有这个大的概念, 是“以批判的方式接受”。这是所有人都尊重的理想。我想要说的, 略微有所不同。

当我们研习一套像弗洛伊德或拉康那样复杂庞大的理论时, 恰巧的是我们对两个理论都感兴趣, 就先得要用一种非批判的方式全部吞下。如果你们从一开始就跟自己说“我喜欢这个”“我不喜欢那个”, 你们会永远停留在什么都没弄懂的阶段。因为这些文字尽管很复杂, 整体上却相对统一, 而且言之有物, 理论体系极其厚重。所以, 你要是东弄一头、西弄一头地懂了点皮毛, 实际上就是什么都没弄懂。

因此我个人非常反对在精神分析中玩弄所谓的“折中主义”。如果你拿这一点拉康、那一点弗洛伊德, 一会儿梅兰妮·克莱因, 一会儿美国派理论, 等等, 我们很快就会被你带到愚蠢的平庸里。

在这一点上，精神病学是相反的。

因为精神病学从根本上来说它就是一门医学。它有一个抱负或野心，是治病救人。所以，所有能帮到它治人的，都受欢迎。药物、音乐、体育运动、心理面谈，所有你们想得出的，只要能帮得到，都很好。精神分析师完全是另外一回事，因为他不知道他要到哪里去。我从今天下午开始，会很坚持在这个位置上。

正因为分析师不知道跟着他的病人会往哪里去，他就不能老是改变他的参照。一旦做出决定——在我，是拉康，也是弗洛伊德，或者说，拉康加弗洛伊德，我也还是会去念很多其他的作者、很多其他精神分析师写的东西，但我不需要他们的理论工作。

因为我的评价是，在这一点上，混合理论将是彻底地言而无物。

我给大家明确一下我所说的“批判”指的是什么，用这个来结束这一讲吧。

那不是一起步就开始批判，而要等到有朝一日你已经吸收了很多很多东西、理解了很多很多的术语和理论，你会看得很清楚：这里面有一部分对你很适合，你完全理解、跟你的工作是一个方向的；但另一些元素呢，你却总是会忘，或者对你一点儿用处都没有。

在这个时候，你可以开始考量你与你所“收养”（adopté，常规译“采纳”“选用”）的这知识之间是个什么关系了。在这以后，很晚的一段时间之后，这个叫作“批判”的智力活动就开始了，起步时并没有的。

学员：老师说到“阻抗”，就是我们依赖阻抗……

姚洁：不是依赖，是依靠。

学员：“依靠”在这个阻抗上，然后才可以进去。是不是有这样一个句子？我一方面非常认同这个观点，就是，我会认为阻抗会给

我们提供了解我们自己精神世界里面的一次机会。但同时我也感觉到一个困惑，之所以我们会有这个阻抗，是因为有些地方我们去不了……但这样一个阻抗，怎么样能把它变成一个机会呢？

GLG (考虑之后): 有阻抗也有阻抗 (有人笑, GLG 也笑)。——这是毛泽东思想 (现场笑)。

有这样的阻抗，你提前就知道它已经赢了。因为你私下里跟它步调一致，它让你适得其所。但也有另外的阻抗，它干扰到你，因为它是……怎么说呢，在内心深处阻碍着你寸步不前的东西。是在这个位置上，我明天要讲的你们自己和其他精神分析师的关系，有它所有的重要性。

我们跟病人在一起，就与跟自己在一起一样，是孤立的 (seul, 同“孤独”“单独”“独立”)。没有其他的精神分析师，我们就不是精神分析师。所以，精神分析师这个社会团体的存在，很有必要。不一定对应所谓的精神分析学派、协会、机构或学校。

明天早上，我会跟大家讲讲拉康曾经建议他学校的成员所尝试的一种社会关系模式，叫“卡尔代尔” (le Cartel)。你们会看到，在 Cartel 这个概念的框架中，我们将再次遇到阻抗问题。

2013年11月3日上午

第 11 讲 精神分析中的基本规则

我们现在开始第三天的第二单元，我感谢各位的耐心。这是个很好的信号：也许，我能一直走到底，到周二的傍晚时分。

不过，一开始就已经知会大家，我们将把更多的时间留给讨论。我热切地盼望到周二上午，不仅跟我，而且在你们互相之间，能有充分的探讨。因为大家一致赞同我说过的话，是没道理的。

现在我将试着讲述精神分析中的“基本规则”（*la règle fondamentale*）。我想你们知道什么是基本规则的，这并不妨碍我多花一点时间来详细讲讲。我想原因正是所有人都认为已经知道。

大多数操作着这一规则的人实际上并未从中汲取后果，尽管这后果在我看来是明摆着的。

我先要坚持的一个事实是，弗洛伊德对其工作方法的酝酿与其理论建筑是分开形成的，今天仍在用这套方法的人，所持的论点又截然不同，甚至全然相反。我因此建议你们要非常清楚地区分弗洛伊德式的实际操作的方法和弗洛伊德的理论。

弗洛伊德式的操作法 1904 年就已经发表在一篇短小的文章里，标题很令人好奇，叫《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术》（《*La méthode psychanalytique de Freud*》）。某先生自己说，他将介绍某先生的某某术，我想你们也会听得出，这里有点蹊跷。弗洛伊德很清楚，他不是第一个实践话语艺术的人。整个人类所有的文化传统，都有所谓的实践“治疗性质话语”的这条路。

那么，弗洛伊德怎么会走到属于他自己的某某术呢？

1 从催眠术到精神分析术

我想你们知道，他开始是用催眠术的。1886—1887 年，弗洛伊德在巴黎看沙可（Charcot）工作。巴黎沙勒贝特里艾尔医院（Salpêtrière）的沙可，以其催眠手法而盛名远扬。催眠在当时是治疗精神类疾病的大法。

当弗洛伊德回到维也纳开始行医，1888 年或 1889 年起，完全不是以精神科医生的身份出诊，而是以神经官能症专家的名义，做的也是催眠，给男病人、女病人做。但很快他就意识到催眠疗效甚微。刚去除一个症状，几天或几周后，又重新出现。他是个倔头倔脑的人，就说：我要去见催眠大师。当时的大师是个叫伯恩海姆的法国人（Bernheim）。

伯恩海姆是精神科医生，住在离巴黎东部 250 公里的南希。弗洛伊德不是一个人去南希的，他带了自己病人中最难治疗的一个同去，请伯恩海姆催眠她。

伯恩海姆没有成功。

他跟弗洛伊德解释说，他有无数的成功病例，但做的是住院病人，私人诊所很少。弗洛伊德回到维也纳继续他的催眠实操，但实在是不太相信了，只当用来绕过病人阻抗的工具。

你们应该记得，他最初的想法是，在所有的神经官能症中，都有个病因性的记忆。他当年有个因果理论，够简单的：你要是能找到那个被压抑的病因性记忆，就能终止症状。在这个背景下，发生了一个很有名的案例，你们能在《癔症研究》（《Études sur l'hystérie》，1899）一书中找到。

有个病人叫艾米·冯-N（Emmy von N.），行为方式相当古怪。一接近她记忆的某个特定区域，她就说她什么也想不起来了，而且情绪变得相当恶劣。弗

洛伊德就试了一种他从催眠术中提取出来的技术，换言之，一种“非”催眠术。他把手掌放在病人额上，说：“现在，告诉我你在想什么，不管它跟我们刚才讲的有没有关系。”而这个原本相当顽固的病人呢，这时候却变得很顺从。她讲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回忆。

从那时候开始，弗洛伊德暗暗下了决心，他有理由要求病人讲述接下来产生的念头，完全不依循已经启动的思路，而是跟着这些想法在头脑中出现的无序本身。

在这个时候，他认为自己发现了一个规则，是联想在根底里启动着与催眠相同的工作，而它却与催眠有个相当重要的区别：在联想过程中，病人完全清醒；而在催眠的情况下，病人完全可以说：“我不记得被催眠的时候想到过什么了。”

弗洛伊德因此发现了话语的另一种实践操作，但当时的目标非常明确，是要找他坚信的所谓“病因性内核”（le noyau pathogène）。他的理论很快就复杂起来，以致“病因性内核”这个概念本身，虽然始终活跃，也变得很复杂。而他的操作方法本身，却很快就显示出它彻底的独创性，超越了当时所有的其他操作。他索性就把它称为“基本规则”（la règle fondamentale）。

就我而言，我在精神分析中只认这一个规则。每场分析的长短、分析师干预的方式、躺下还是面对面……所有这些，是病人与分析师之间的约定；相反，基本规则是精神分析工作的标尺和绝对条件。

我当然不了解中国的情况，但在法国，所有人都以为自己知道什么是精神分析：精神分析就是对着一个叫精神分析师的人说话。这是真的，却又完全不是。因为它关系到一种特殊的话语体制（régime de parole），在日常生活中绝对是不同寻常的。

日常生活中，当我们跟一个人或几个人说话时，我们会留意对方，因而选择我们所用的词汇、信息，留意组织我们说话的意思。而在精神分析的基本规

则中，宣布方式当然有很多，其中之一恰恰可以是：“说吧，就当我不在。”

宣布精神分析的方式、在分析中宣布这一规则的方式，在我看来，是决定性的。

2 决定性的宣布

一个人来见你们，很少是来要求跟你们做精神分析的。

通常，他们来是为了生活中碰到的各种问题。所以在第一时间，他跟你们说话，为的是讲这些问题。你们会回问他一些问题，来了解他给这些问题哪些意义。有时候人们把这叫作“预备性面谈”（entretiens préliminaires）。但这样“预备”下去，这种面谈变成精神分析的机会很小。

它也许会成为一场出色的心理治疗或很有趣的精神科面谈，但很少有机会变成精神分析。因为你没有进入所谓“涌现性思维”（la pensée jaillissante）的入口。弗洛伊德用德语叫它 Einfall，从侧面涌现的念头。

会有这样的一个时候到来，是你们得要决定接还是不接这个人跟你做分析。你有说“是”还是“不”的自由，这个很重要。要选好时机，包括跟那些为了成为精神分析师，直接找你们要求做精神分析的人。

跟任何一个人，都只有在你有能力说“不”的时候，你才真的能说“是”。（现场困惑。）啊！这根本都不是精神分析专有的，是普遍规则：如果你觉得被迫说“是”，你说的就不是“是”。只有在你有能力说“不”的时候，你说的“是”才是“是”。婚姻如此，精神分析也是如此。

所以，到某一特定时刻，应该具体明确我们将要改变话语游戏的规则。表面上，我们还会继续说话，但游戏规则对两个搭档的每一方，都不再同以往。

我自己有时候介绍事情的方式——不是始终，是有时候——会这样，不管

前面说的是什么，优先权都将交给从边上冒出来的念头。但我也完全可以说：“试着大声地说。但万一您想到别的什么，先说这个别的什么。如果您没说完的事情很重要，它会再来到您的头脑中的。”

通常来讲，我会明确说，我们两个人开始的调查——像侦探片那种：谁做过了什么？罪犯在哪里？哪里能找到线人？等等不再是我们的运作了。我们在这里停止。因为通常而言，在好一点的侦探片中，罪犯恰恰就是侦探本人或他的搭档。我们要是跟病人同谋去找病因，最终很可能也是这样的结局。你们像美国警匪片那样串党结伙，这可是不给精神分析机会的。

因此，要做得两个搭档之间联盟关系脱钩，却留住话语运作上的同心协力。这是精神分析师多少比较沉默的原因之一，通常比病人要沉默。

插入一句，我并没有忘记技术上的一个大问题，那就是遇上不说话的病人。我想你们也会碰到这种情况，很难走出僵局，因为你不能指望某一天他们就会说起话来。但肯定的是，你不能取代他们，帮他们说话。在这种情况下，要能承受沉默并陪伴好沉默。这是非常特殊的一件事。

我们晚些时候可以讨论，我不打算把这个话题当作演讲的中心，因为它并不是最常见的。但就精神分析师而言，维持好他在话语中的位置是很有难度的，面对一个字都不产出的人，是个很好的例子。

允许我在此就“话语”和“语言”做个区别。在语言学上，这个区别很大：话语（la parole），是语言的付诸行动；语言（le langage）存在于我们之外，而当我们说话时，主体将语言付诸它的行为。

我讲这个只是为了简单地明确一件事：有些病人不说话，但他表达着很多东西，他没有说出任何语言，但他是有话语的。你几乎得用身体去猜他们在沉默中讲述的究竟是什么。那可能是种责怪、是种爱慕或痛恨……无数种不同的可能。而从他们所说的或身体姿态所表达的那么少量的信息出发，你得试着

去理解他们没有跟你说的究竟是什么。

我绕了这一圈，只是为了尝试让基本原则的复杂性得以表现，为了说明基本规则的重要性。

3 基本规则的复杂性

乍一看，这好像是个强加给病人的听写原则，或者说某种条件。它讲明病人应该怎么做。当然，通常来讲，他们是不会这么做的。他们有很好的理由不这么做，这理由我们叫它“阻抗”。他回答你说：“是，好吧。”但他心里觉得这完全就是不明确的——没文化的人做的事、跑题、太具有攻击性、有点寻开心……这是他的事。不管是谁接受一个规则，通常而言，从来都不会完全遵循到底的。

但人们没看清楚的是，基本规则一旦宣布，在精神分析师这一方会发生更为严重的后果。

既然他说了“跟我说吧，随便你脑子里出现的是是什么”，那么，不管病人说的是什么，就都应该是受欢迎的！病人永远都可以说：“我这么说，因为这是刚刚出现在我脑子里的。”严谨地讲，分析师都不能回他一句：“跟我讲点别的。”既然这已经是他在做的。他在说着他说的那些时，他就是在做你要他做的：说他正在想什么。没别的。

在弗洛伊德最早的学生里，有一个叫费伦奇（Ferenczi）的，曾讲到一个故事，也许会帮你们更好地理解我刚才说的这一点。

费伦奇是个很有创造性的人，非常积极主动。他简略地讲到过一个强迫症患者，总是跟他讲同一件事。当费伦奇跟他指出说，大部分的分析都在讲着这同一件事情，那个病人，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是个匈牙利的大知识分子，回答

他说：“没错。但我不停地想到它！您告诉过我要讲我脑子这时候有什么，我脑子里经过的一直是这个。”

费伦奇于是就出了个很符合他风格的点子：“听我说，每次您再想到这同一件事的时候，举一下手，我就有数了。”（现场笑）显然，病人只好去讲别的了。

姚洁：我怀疑大家的理解正好相反。

GLG：什么意思？

姚洁：以为您介绍了一个好办法。

GLG：不，这不是个好办法。这只是让大家看到操作基本规则没那么容易，要动点脑筋。

你们并不受它庇护；别人也可能很滑头。

就像一场按规则进行的足球赛，你们跟病人一样受这场话语契约的制约。所以，如果对方想要糊弄你——不管怎样，他总要糊弄你，因为这属于话语游戏的赌注，你得懂得跟着他玩到底，让他能听到你听懂了这点小把戏。

费伦奇的这个故事，好就好在它很搞笑。病人笑，是因为他认识到自己的论证貌似很诚恳地在执行着基本规则，实际上是糊弄他的分析师的一种方式。

你们因此可以理解，在我看来，现在是着手“移情”这个问题的时候了。

我非常坚持这个事实：移情不能被约缩为病人对分析师的感情。为此，允许我先用一点点时间，来给大家讲讲弗洛伊德用的 *Übertragung*，“移情”。

4 单复数的移情

弗洛伊德先用的是复数，指一个意象到另一个意象的过渡，其中就有在梦

或症状的形成中所发生的这种“移转^⑩”。我想是星期五，我跟你们讲到过艾玛的故事。她不能单独去买衣服，因为曾有个店里的小伙计“笑了”，这笑唤醒了年迈的杂货铺老板的笑。小伙计的笑和杂货铺老板的笑之间的这个联系，弗洛伊德叫它“移情”。

所以，当不久以后，一个女病人在分析结束时扑进他怀里，弗洛伊德并没有因此断定说对方爱上了自己，而是看到了某种移情的表达，病人的情感从被压抑的意象转移到他本人。

他很久以前就讲到过这种情况，从布洛伊尔（Breuer）和安娜·O 的故事就已经讲到过。

我们得再插一句。

1882 年，安娜·O 在接受弗洛伊德的朋友布洛伊尔的治疗，这是个很严重的歇斯底里症病人。那年头相当流行这个——要知道，精神疾病中也是有“时尚”或“流行”一说的。治疗过程中，她宣称自己爱上了布洛伊尔，而且怀上了他的孩子。布洛伊尔实在是怕了，他终止治疗，逃了。

弗洛伊德好像并不太喜欢布洛伊尔，他欠过布洛伊尔不少钱。布洛伊尔赚很多钱，在维也纳是个很有钱的犹太医生，而弗洛伊德那时候是个很穷的犹太医生。所以，当他自己处于类似布洛伊尔的境地，面对一个想要拥抱他的女病人，就不想做第二个布洛伊尔。他不愿意停止治疗，也不相信对方真的爱上了自己。

但他确信有什么事的确是发生了。是这“什么事”，弗洛伊德重新将它命名为“移情”，这次用的是单数，病人将情感移转到他称作“医生本人”的这个意象上。

那年是 1897 年，也许更早。1899 年，当弗洛伊德撰写《梦的解析》时，他在基本规则和移情之间，打造了一个关联。

^⑩ 很独到的翻译，出自张东荪先生之手。颠倒两个字的位置、转动词为专用名词时，带出位移与转化这两个核心机制。参见张东荪《论将神分析》，1921 年商务出版社《民铎》杂志。译者注。

5 目标—意象

他那时候有个概念，后来一直沿用下来，叫 *Zielvorstellung*，“目标—意象”（法：la représentation-but）。一个人说的话是朝向这意象驱动着的。就好像通常当你们想要说什么，你们会组织句子，好达到说出这“什么”的目的。这是弗洛伊德所谓的“目标—意象”。他对基础原则的描述在于告诉病人“请悬置起所有的目标—意象”。你们猜得出，这等于是说“请随便说什么”（乱说好了）。说到这里，你们同意吧？（同意）

而这时候，弗洛伊德说：当我们告诉病人悬置起所有的“目标—意象”，他至少还是会抱住其中的两个不放。

第一个，弗洛伊德假设说，病人其实不会忘记，所有这一切只是个游戏、一场治疗。我晚一点会以批判的方式回到弗洛伊德的这个想法上。第二个呢，弗洛伊德最终说，病人永远都不会放弃的第二个“目标—意象”，是用德语说，叫 *die meine Person*，是作为意象的“我本人”（法：ma personne）。

因此，在弗洛伊德的概念中，移情完全不是所有人类关系之间都可能自然发生的什么东西。他所称为“移情”的，是基本规则实操所产生的结果：某人一旦脑子里来什么就说什么，他把这些话交付给某个特定的人时，必将对他交付的这个人发生情绪或感受。他会将原先负载在其他意象上的情感与记忆都转移到这个人身上。

现在，请允许我用一点点时间，回到弗洛伊德所宣称的第一个“目标—意象”上。他认为病人永远都会记得，这只是一时的游戏，是分析治疗，不是“真实的生活”。为了让你们比较容易理解我所想说的，我先给大家讲讲美国某些催眠师所做的试验。

他们选了些特别容易接受暗示的人，在他们身上做了很多的催眠。到某个

时候，当他们处于被深度催眠的状态，催眠师要求他们把一瓶硫酸泼到催眠师的脸上。这些人虽然沉浸在深度催眠之中，却拒绝了。对另一些试验者，也在深度催眠状态，催眠师要求他们把手伸进一个装着毒蛇的短颈大口瓶。没有一个人这么做。这很清楚地说明，即使是被最为深度催眠的人，仍然保留着某种防御反射。

同样地，弗洛伊德认为第一个“目标-意象”始终有效，也就是说，这只是个游戏，我却认为这很值得怀疑。这恰恰是“移情之爱”（l'amour du transfert）的问题。

要是是一个女病人深深爱上了她的分析师，或者略微改变一下情况，一个男病人爱上了他的女分析师，也是会碰到的，他要跟分析师讲的第一件事就是：“这完全不是移情，是真爱！”要是这时候分析师说：“不不，这只是个游戏。”那么，相信我，整件事会结束得很难看。

这里，就像费伦奇那个故事所表达的，分析师多少得比直接提醒病人“这是个游戏”要聪明一点。因为，不管怎么讲我们都已经在游戏的非常边缘了，而玩到这个地步，是分析师自己邀请对方的结果，是他“促销”了基本规则，将基本规则付诸行动的后果。

正因如此，我坚持认为，分析师实施基本规则的事实本身，会将他带到“不知要去哪里”的境地。你们操作着这一方法，就再不可能知道往哪个方向“驾驶”你们和这个人的分析。

我要是敢说，最经常的情况不会很糟，结果往往还会“不坏”，两个人分手时，双方都能很高兴。但没必要太把表面的分析失败看作失败。并非所有人投入分析都是为了做一个幸福的人，那是好莱坞电影的形象。总会有些人投入分析，是为了某些怎么都说不上是好玩的目的，有时候，有些期待甚至对当事人自己是相当有害的。处在这个位置上，你们真的要好好询问对自己、对工作方法的尊重。

我们已经就自杀问题讲过很多，没必要再重复。但你们知道，某些时候，你们要是牺牲自己的工作原则去救人性命，真的会是竹篮打水一场空。

因此，我用两句话来做个结论：基本规则听上去没什么特别的，表面上似乎跟话语的常规运作没什么不同，实际上，它的运作相当特殊。就好像我们不会把外科医生当作店里切肉的伙计，精神分析实践与心理治疗再怎么相像，都没有理由混为一谈。

结束前，我特别想要去除一个歧义，和大家一起辨别一下：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究竟有什么特殊？

不要太快得出结论，说我看不起心理治疗活动。在日常工作中，我从来都不太清楚自己究竟是在做精神分析还是心理治疗，是个外科医生还是肉铺伙计。因为很大程度上，要看所有这一切是怎么结束的。

有些治疗看上去绝对像是在做精神分析，却最终结束得像是心理治疗，也就是说，病人的状况好多了，决定结束，我也就同意了。而另一些治疗呢，病人来见我做心理治疗，也像心理治疗一样地运作了不短的时间，某一天，在我的建议之下开始了分析运作，有些还能作为一个真正的分析告终。所以永远要记得，允许我们清楚区分的，不见得就总能简单分割。这是个事实。

我先说到这里，不然就要把你们彻底催眠了。

6 问题 1：“分析结束”的探讨

学员：我想问一下，什么叫“像分析那样开始”和“作为分析结束”？（姚洁直接落到“分析结束”这个问题）

GLG：啊！您问了我一个最难的问题。真正的答案是“我不知道”。但这答案要加很多注解。

因为，如果我不知道每一次的分析会怎样结束，我却知道不少分析结束的故事。给大家讲讲分析结束的三个不同理论吧。

第一个理论是弗洛伊德的。他写过一篇文章叫《终止的分析·无止境的分析》（《Analyse terminée, analyse interminable》）。这是他晚期的著作，我记得是1936年发表的。弗洛伊德在文章中解释说，分析过程本身是没有终结的。就这个意义而言，他忠实于自己的实践方法：没有一个人能停止思考，总有事情可以说，总有新的问题可以讲，所以，以为精神分析可以汲透无意识，是非常荒唐的念头。弗洛伊德认为我们会在一段时间过后停止分析，感觉“就是这样了”，但我记得他是说，“每过4~5年”再起一段。

所以他的答案，运作得就像个犹太人的笑话：我们停、我们不停……然后，我们就死了。我这个介绍相当粗糙，事实上弗洛伊德的理论要微妙得多，我只做个简单快速的处理而已。

我也简单扼要地讲一下梅兰妮·克莱因，因为她也有一套分析结束的理论。她对“正常人格”的概念（这是她的术语）是一个人面对“诀别”时，有能力去完成它，她就认为分析结束是分析者能够与他的分析师诀别的时候。所以听说在克莱因式的分析中，经常会看到某个时刻，分析师和分析者对分析停止的日期寻求共识，认为这是在酝酿着这个“诀别”。我自己从未做过这种分析，但我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有位走得很近的朋友，做过一段长程的克莱因式分析。

现在，我转到拉康。

拉康在他1964年脱离国际精神分析协会的时候，创建了他自己的精神分析学校，就尝试着酝酿一套与国际精神分析协会不同的运作，其中包括分析的终结。他的基本想法很简单：既然分析从移情开始，自然也应该随移情的结束而结束。有机会我也许会做较为详尽的评论，但他对移情的概念是说，分析师被爱，是因为病人假借给他的知。病人认为分析师什么都知道，但这种假设在某个时候会像尘埃落地。我可以作证。如果这假设落定，分析师也就从知的位置上坠落了。

但你们看，三种分析结束的理论让我所震惊的，是它们相当依赖于这三位分析大师通常对精神分析的概念。不要逼我明说，其实这些分析结束理论每个都对应着分析师自己的幻想，但你们至少可以理解，为什么我对您所提出的问题抱有比较相对主义的态度。

我认为自己是拉康派的，但不见得我就得要接受拉康建议的所有解决方案。我认为那三种解决方案都存在，其他解决方案也存在。

无数分析看上去像是随着移情的结束而结束，实际上却一直在继续着。另有一些结束在一个可以很容易清楚定位的诀别上，还有些结束在分析师突如其来地失去了以往在病人眼里支持着他的魅力与威信。这正是我自己个人分析结束的方式。

跟着同一位分析师做了7年之后，我至今清晰地记得在7月的一天，初夏，我在沙发床上发现自己在问自己：我在这里做什么？我感觉到如此难以置信，因为7年来从未掠过一丝这样的想法，就说：“过了假期再说吧。”但假期过了，我回到分析，完全一样。于是我说：“我停在这里了。”我再没有重新开始做一段（分析），我再也不是分析者了。但我并不能因此而下结论说，所有的分析都得是这样结束的。所以你们看，要我回答您的问题有多尴尬！

我能为分析结束所坚持的唯一标准是：通常来讲，它会很让人震惊。

我们可以讲上好几年想要结束，一旦这日子来临，所有人还是会为此震惊，为这行动发生之暴烈和粗野。这跟你有多少知识是没什么关系的。

7 问题 2：关于“维持好分析师在话语中的位置”的探讨

学员：刚才老师提到有关话语和沉默，老师讲到说，那个沉默……打破沉默不是最重要的，而最重要的是在那个当下，去维持作为精神分析师的“位置”？

GLG: 是。

学员: 我认为, 老师说的不是维持权威的位置, 而是维持其他的什么东西。对于这个能否再多讲一些? 在这个意义上, 什么叫“精神分析师的位置”?

GLG: 嗯……(沉思)。

这是个事实。

病人的沉默在技术上是个严重的问题, 它凸显什么是“分析师的在场”。我不肯定中文的“在场”跟法文有同样价值, 但在法语里, *la présence* 是个很有价值的词。

有不同性质的“在场”。

有些“在场”立马就是带侵犯性的——不说话的“在场”, 是个身体性质的问题, 身体性的、几乎是磁场的, 真的就像是人类之间回到了动物间的关系。有时候你会接到一些病人, 远远比你更有“在场”的感觉。这会导致一些很难超越的私密关系。当然, 也有相反的, 病人比你害羞, 完全被你的“在场”压垮。所以当我讲到“分析师在一个沉默境况中的‘在场’”, 是以某种方式告诉你们: 病人在沉默中会感知到, 我们是和他在一起的。

我没有任何食谱类的东西帮助你们很现成地发生这个效果, 任何泛泛而言的操作方式。我所知道的是: 是你在沉默中“在场”的方式, 令话语不再时, 沟通并不中止。

2013年11月3日下午

第 12 讲 现场提问互动——精神分析不同于心理治疗的是什么？

答应过大家，我们继续讨论。

1 问题 1：精神分析与心理治疗

学员：我的问题——因为在我们的观念里面，精神分析过去总是心理治疗的一种技术，老师呢，把精神分析和心理治疗区别开来。那么，这个是法国这样做的，还是拉康？只是法国这么做，还是拉康这一派这么做？

GLG：不是法国也不是拉康（现场笑）……

要详述历史有点难，因为时代和文化不同，情况也不同。比方在美国，20 世纪 30~50 年代，与弗洛伊德的初衷相悖，人们认为精神分析师首先就得是医生。究其原因，是完全出乎欧洲人预料的。

美国的自由主义导致了很多人江湖郎中的存在。例如第一代的美国分析师布依尔（Brill）等，自己既是医生也是精神分析师，但曾经接纳非医生资格的精神分析师，恰恰是这一点，在美国人看来，给江湖骗子打开了大门。所以，美国好几代的分析师习惯于认为，精神分析师首先就得是医生或精神科医生。

但我说这是违背弗洛伊德的初衷的，是因为在第一代分析师中有一个知名的例子。狄奥多·芮克（Theodor Reik）是心理师，他问弗洛伊德：“我想成为精神分析师，是不是就得开始去学医学课程？”他那时非常年轻。

弗洛伊德回答说：“不必，没用的。”芮克就在柏林跟亚伯拉罕（Abraham）做了分析，最终在柏林作为精神分析师开业。

但他却被柏林的医生们告上法庭，说他非法行医。弗洛伊德以书面形式为芮克辩护，说他没有非法行医，因为他不需要医生资格来做精神分析。这件事令弗洛伊德派的运动发生了很多分歧，因为盎格鲁-撒克逊这边，美国人和琼斯为首的英国人，他们真的想要只许医生有资格成为分析师。

在法国，20世纪50年代进入大致相同的状况。但拉康自己是精神科医生，却做了很多工作，力图让精神分析不为医生或精神科医生所独有。1964年拉康创办的巴黎弗洛伊德学校成立时，他在学校章程中明文注出：精神分析不是医生、精神科医生、心理师之专有。我那一代人都把精神分析师既不是医生也不是心理师看成是自然而然的事。跟我差不多年纪的很多同事投入到精神分析中，却同时是哲学家、记者、文学家，等等。

20世纪60年代起，心理师出现，心理师中的很多人也成了精神分析师。于是有了被人称作“既非……也非……”的分析师，特别说明既非精神科医生也非心理师。

但在法国，心理师的大量涌现带来了一个新的问题，叫“心理治疗师”。这问题很快就成为政治问题。

因为心理治疗师中的大部分人在官方的医疗中心工作，拿国家的固定收入。而我说过，法国至今没有任何“精神分析师”这个官方头衔。所以在很多机构中，心理师以心理治疗师的身份领取国家薪水，却同时自称精神分析师。因此就有过且至今仍有心理治疗师与精神分析师之间的混淆。

还是再用个真实的小故事来让你们感觉一下我实际上想说的是什么。

我去过几次南美洲一个叫乌拉圭（Uruguay）的国家，400万人口的小国，有精神科医生、心理师，也有精神分析师。像法国或任何其他地方一样，他们也发现，在精神分析师这个问题上，存在着法制上的“漏洞”：活动本身被普遍认可，却没有任何法律上的说法。

这是个多多少少谁都认识谁的小国家，精神科医生、心理师和心理治疗师就聚在一起，他们中的一些人同时是精神分析师。互相进行了充分的讨论之后，他们最终拟出一份作为共识的文书，来填补这个著名的法律漏洞。但“精神分析师究竟是不是心理治疗师”却成为其中非常难以解决的一个问题。要想知道是或不是，他们以“为病人好”来作为目标，“目标一意象”的目标。“是！不过……”如此纠缠。

最后的时刻到了，一小组人马面见部长，面见全民代表的领导，说：“我们达成共识，不讨论心理治疗的问题。”精神分析师们却说：“不……不对，不能不谈。我们不能把精神分析的行为约缩为心理治疗。”结果，他们只好对部长承认说：“就治疗这个问题，我们还有一个难点。”部长回答：“既然你们无法统一，我就不签什么字了。”

这是当地延续至今的局势。

你们应该明白我的回答了吧？

在实际操作中，我无法对自己是在进行心理治疗还是精神分析做出区分，我坦白告诉过你们，但要维护我的精神分析实践，我就不会把它约缩为心理治疗。

这不是个行为问题，而是“目标”问题，是你的实践过程所“瞄准的”那个东西。（现场还在困惑）

姚洁 (对GLG): 我想可能有个小问题出在: 通常我们认为, 心理治疗是个大的范围, 精神分析只是其中的一种技术。您却几次说到不要或不愿把精神分析“约缩”为心理治疗。

学员 1: 不是, 我认为心理治疗和精神分析是两种性质的工作。

姚洁: 再好不过。但我也怀疑, 不少人认为精神分析只是心理治疗中的一种。我遇到过我很敬重的一些师长和领导, 都在鼓励我们要把“眼光放开一点”, 不要“停留在一种治疗方式上”。当然, 如果在座各位认为这个问题已经很清楚, 我们就跳过好了。

学员 2: 我们现在实际上通常的理解, 就是刚才这位同学说的, 即心理治疗里边包括了精神分析。它是其中的一种工具和方法……

姚洁: 所以我想, 这还是很流行的想法。

GLG: 所以?

学员 3: 非常普遍。

GLG: 我很清楚, 在法国、美国, 到处都存在着这种思路, 认为精神分析是所有心理治疗里面的一部分。

无所谓有没有人这样想, 但条件是要尊重精神分析区别于任何其他治疗这一点。不幸的是, 当人们认为它只是众多心理治疗中的一部分时, 就以为这只是个词汇上的问题了。所有的治疗都有同样价值, 每个人可以有他自己兴趣上的取舍。这样说的人, 没有看到“治疗”这个词本身有个很具体的意思, 它恰恰是弗洛伊德所说的“目标—意象”。

治疗师是想要病人“好起来”的人, 不管用什么方式, 他针对这一既定目标在操作。而精神分析最大的丑闻, 不是性, 是它最终目标的缺席。天下有的

是性取向的治疗师，在性的问题上远远要比精神分析师更大胆有为。精神分析师在性的问题上，实际上还是相当腼腆的。

允许我快速地重述一下弗洛伊德 1927 年就“外行分析师”所著的文章，来结束这个问题吧。

弗洛伊德在文中为自己假想了一个谈话对象，被他称为“不偏不倚的对话者”，这个人不打算妄加判断，只想弄懂精神分析究竟有什么特别。这是一位政府要员，一位部长，很用心的人，想弄清楚精神分析是怎么运作的。

弗洛伊德于是就给他解释什么是阻抗、压抑、移情……而每一轮，对话者都说：“啊，这很好！但您想拿这些做什么呢？”弗洛伊德大概的回答是：“国家不能理解这些是拿来做什么的。”这里，允许我点评一下：因为我们不认为“人民的利益”可以简单拿来作为工作的目标。然后弗洛伊德补充说：“正因如此，我们不问国家要任何东西。”

在整场论辩中弗洛伊德所寻求的，不但区别于医生，而且区别于所有的心理治疗。所以，把精神分析归入心理治疗，我无所谓，但有个条件要弄清楚，它不是一种治疗。

2 问题 2：占星问题

学员：老师刚才提到“巫术”（江湖郎中）这个概念，我知道占星在法国、英国很热，就是占星分析啊，在法国 1/6 的人都拜访过占星家。

姚洁（很惊讶）：你是哪里知道的这个数据啊？

学员：资料上有啊！

姚洁：什么资料？

学员：网络资料，老师能不能做个分析，就是在精神治疗师、心理治疗师、精神分析治疗师，跟这些占星家，有没有可能做一个排序，就是说，他们在法国的社会地位？（现场议论纷纷）

GLG：我先要告诉您的是，美国“心理师和泛科学”最近一次相当严肃的调查表明，所有的治疗中，有65%都行得通。所有的治疗，包括最折磨人的、最为纯想象的，包括占星术，包括感应术，全部行得通。

我必须说，65%是个很客观的统计数字。就连最魔术性质的——反正在科学家看来是玩魔术，比方印第安人的萨满操作，也能令印第安人中的大部分人口得以治愈。

所以，就严谨的治疗意义来说，我不能小看任何治疗。有些我可能多少有些偏向，因为它们看上去没有其他的那么愚昧或没那么暴力，但我不怀疑它们的效应。我相信，如果以治疗结果的观点来看问题，精神分析不见得就比其他手段高明，我不肯定它就一定有65%的治愈能力。当然，我没有任何严肃的统计数据，显然我连怎么算叫“成功”都不知道。

拉康的一个学生赛基·勒克莱尔（Serge Leclaire）某天写了段治疗故事，有人就问他：“那么，治疗结束的时候病人有没有感觉好一点？”勒克莱尔回答说：“嗯，他略微焦虑了些。”（现场爆笑）

他说这个可是不带幽默的！

这是说，略微焦虑一些，对某些个体来说肯定是更为合适的。有些焦虑缺失的状态会带人进入严重的躯体疾病。例如，我们可以完全不焦虑，却在胃里生成严重的溃疡。所以有时候有点焦虑可能还好一些。

3 问题 3: 传播精神分析的危险

学员: 先回馈一下老师。我觉得这几天听老师的语言, 精神分析的语言, 就像是喝白酒喝到三成时那个醉了的感觉: 没有醉, 却有点儿醉意。老师早上说道, 精神分析的传授, 常常是精神分析最大的危险。

GLG: 是! 是, 是。

学员: 是不是说这三天里, 我正在做一件非常危险的事情?

GLG: 可能的。

学员: 但是我有一种……被勾引的感觉。老师好像敞开了什么, 但又没说清楚, 是这样困惑着想……再往里面去一点。

GLG: 您再不能给我比这更漂亮的恭维了! 我很乐意透彻, 但只在时不时的情况下。因为我要是始终透彻, 那你们就真的完全暴露在危险之中了。

学员: 那我问一个问题, 主要是关于自恋型人格的。因为自恋嘛, 他爱上的是自己, 所以弗洛伊德认为他是“不可分析”, 因为他不产生移情。后来科胡特 (Kohut) 虽然说“神入”, 但是……(姚洁: 什么叫“神入”?) 它是形容治疗师像一个“神”, 精神的神, 他要入到来访者的里面去, 识别他的那个……然后抽出来。我想问的, 假如说精神分析像是一个双人舞, 科胡特所说的“神入”, 其实也是个双人舞, 神入是不是也像来访者跟他一起来跳舞? 我想问的是, 拉康是怎么看这个问题的, 既然弗洛伊德说是不可能?

姚洁: 科胡特所指的神入因此主要针对所谓的“自恋型人格”。

学员: 是。我也想知道, 老师是怎么看这个问题的?

GLG: 您让我有机会来讲一下弗洛伊德与拉康就“移情”概念上的不同。

起初,开始的10—15年,精神分析起步的岁月,弗洛伊德认为移情只从病人那里发出,分析师对此是无所作为的。但自从1910年费伦奇的分析以后,他开始考虑“反移情”(contre-transfert)。这个概念指的是分析师对病人的情感过分在意或抵触病人的情感。比方说费伦奇曾与他做过一段时间的分析,当他抱怨弗洛伊德没能分析到自己对弗洛伊德的负性移情,弗洛伊德写信回答说:“我对您的反移情实在太过强烈,我把您当作自己的儿子。我无法说自己孩子的坏话。”但很长时间以来,精神分析师们对这个反移情的问题总是有很大的分歧。

那些自以为非常正宗、很严格地在执行弗洛伊德的分析师,说反移情是不应该存在的。曾有个弗洛伊德派的法国分析师,多少有点名气,甚至提出过“反移情的盥洗”,认为每天早晨分析师都得检点自己不要对病人发生感情。这真是绝对的荒诞不经。

但与此形成对比的是,很早就有其他的分析师说:相反,重要的就是反移情!持这一观点的主要是梅兰妮·克莱因一派,之后还有整个美国传统取向,叫“客体关系”(法:relation d'objet;英:object relation)。某一天我讲到过欧文·雷尼克(Owen Renik),至今仍是洛杉矶的精神分析师,在加利福尼亚。他曾建构起自己一整套的弗洛伊德派理论,就完全是建立在反移情的基础上的,移情的不断出现,只是华尔兹的一个个步子,如您所言。拉康就这一问题的立场,依然是相当彻底地以另一种方式来介绍事情本身。他说:“没有反移情这回事,因为移情是个双向运动。”

记得是今天早上,当我跟大家说,精神分析师是病人症状的一半,这是个很重的说法,指明了精神分析师主观进入到移情官能症的运作,要到什么地

步！如果想要理清移情中哪一部分来自病人、哪一部分出于自己，你就提前输了全局。再者说，在分析运作中最奇特、最为魔术一般的事情，是有时候我们对病人的想法略微变动了那么一点点，还没做一丝一毫的解析，病人的话语就已经有些什么发生了改变。

对我这个自认为相当理性的人来说，这是很让人困惑的，因为我完全不相信所谓精神之间有通灵感应的存在。但在那样的时候，我不得不承认有些事情正在发生，完全逃脱于我的知性之外。这并不改变我通常的思维方式，但就其真实性而言，让我多少要谦虚一点。

所以，作为结束语，我认为连着听我讲五天，肯定会有些风险。但星期二这一切就结束了，你们将重获自由。

唯一重要的是我离开后，留下的是什么。

4 问题 4：禅宗之切

学员：您好，老师！我的问题是您提到您的母亲，您提到“切”的时候，您说到小时候玩一个网球的游戏，当老师讲完这个游戏的时候，有我们这里的同伴向您提问这个“切”。当时老师说，没有任何一种文化里面，会很鼓励或是……怎么说，切是舒服的。我忘了，好像是反过来，先提问，然后老师讲了那个游戏去了解拉康的这个……

姚洁：没问题，讲下去。

学员：我想说的是，事实上有一种文化，就比如我本人成长的中国禅宗的文化，是充满了这个……“切”的。

姚洁：说说你为什么这么说？

学员：事实上在禅师培养禅师的过程中，上一辈的禅师经常会在话语

的对白当中使用这个“切”。也许会让听着的禅师感到非常不舒服，但是……

姚洁：打个比方……

学员：比如一位参禅者，他向韶宗和尚提问“狗有没有活性”的时候。因为按照佛教的理论，众生都有。可是韶宗和尚回答他说：“无。”（她停下来，现场也沉默着）

姚洁：……你认为这是个“切”。

学员：是。嗯……还有其他类似的。

姚洁：你自己碰到过吗？类似的？（现场有笑，姚洁也笑）我是认真的。

学员：我自己碰到过很多次。前两天我还在阅读我一个禅宗的老师写的心得，他有个句子，是个诗，讲了他这个参禅的过程。当时我心里还在回味那种“切”的感受，这个时候老师正好就讲到了这个“切”。

姚洁：啊哈，为什么老师讲的那种，跟当时你念的……

学员：当时我念的开始是叫：“早岁参禅悦……”早岁，就是他早年的时候，参禅的过程中感觉到……喜悦的“悦”。“禅悦”是一个人学禅过程中那种身心的感受。第二句，“截流识本心”。截是截断的截，流是流水的流，识是识别的识，本是根本的本，心是内心的心……我觉得，我现在没有办法跟老师讨论这不是同一个“切”。

姚洁：OK（好），你的问题是？

学员：我是想说，因为当时我认为我是有问题的。但是当时没有抢到话筒，所以问题就丢了一半。（现场笑）

姚洁（也笑）：丢了一半？

学员（也笑）：但是我觉得有必要在这里告诉老师说，在我成长的历

程中……其实是有过这种感觉……也让我觉得这是一种非常亲近的……让我觉得这历程不是很遥远。而且老师的讲授，也让我觉得提供给我自己了解我的那个方面，老师（给了）一种新的理解角度，让我觉得跟那个方面的老师更接近。

姚洁：跟禅的方面更接近

学员：是的。所以我觉得有必要在这里把这一点告诉老师。我觉得培训的时间还很长，可以留在这里。以后如果这里面我有问题，一定还会再提问。

姚洁：这句话就是老师说的：有什么要紧的，它还会再来。

GLG：谢谢！我多少明白了一点儿您所说的。您让我有可能纠正我说过的一句傻话。

你们可以肯定，这样讲课，持续即兴地说话，我一定说过一定数量的傻话。您让我可以至少先纠正其中的一个。

我的确记得曾经说到很多文化都不喜欢“切”。看起来在座没有一位是做人种研究的，否则当下就会对我说“不”。事实上，绝大部分的文化都操作着“切”，以入教、入会、启蒙、成人仪式的方式（l'initiation）。入教、入会、启蒙、成人仪式，是社会性地在安排、组织着一种“切”。

这在传统文化中看得很清楚，非常戏剧化，现代社会就没那么视觉化了。但在我看来，现代社会的切，更暴烈而且突然。所以我相信，没有任何文化不在实际操作着“切”。

但我说出那么个天大的傻话，也不是没有理由的。我当时是想说，神经官能症的个体——也就是说，很多人绝望地企图做得像是“切”完全不存在一样。当然，如果您沉浸在像禅宗那样强大的文化之中，人们要教会你的第一件事，显然就是“切”的艺术。

精神分析以它自己的方式，也是一种“切”的艺术，但禅文化要比它严格得多。因为禅所赋予最高价值的理想，正是要活生生地、狠狠地下手去“切”；而神经官能症的理想，是永远不要有“切”发生。

这是为什么我要不偏不倚地停在这里。

（全场笑，掌声）

2013年11月3日下午

第 13 讲 关于“怎样成为精神分析师 (第二基本规则)”的现场互动

好，我几乎不停地讲了三天，有点重复会很正常，我们将从昨天讲课和提问中已经有所进展的一些东西开始。

我曾答应大家，今天会讲精神分析师的社会性，讲他们一起工作、沟通、互相支持精神分析发展的方式。从我已经讲到的，你们可以想象，精神分析师之间有个非常特别的困难，跟我们在各类群体中所遇到的个人恩怨无关——我讲的不是做精神分析的那些人之间所发生的种种友情、敌意或矛盾冲突。

这根本的困难，从费伦奇开始，被称作“第二基本规则”。它回应弗洛伊德就精神分析培训所说的：只有自己做一轮分析，才是唯一的分析师培训。

你们理解为什么初始问题会如此令人操心？因为弗洛伊德自己没跟任何人做过分析。所以 1912 年发表的《禁忌与图腾》(《Totem et Tabou》)，几乎就是在讲他自己的故事。至少，我们要是乐意把分析师与分析者的关系看作父母对孩子——尽管这很值得怀疑，那么，只有弗洛伊德不是任何人的儿子。

有个小轶闻可以说明他真是这么想的，在精神分析运动之初，他活得就像是所有人的父亲。就在《禁忌与图腾》出版不久，国际精神分析协会有个维也纳大会。会议期间，老成员与即将成为新成员的人有一场饭局，好像是大约二三十人的样子。应该要弗洛伊德发言的时候，他晕倒在荣格的怀里——起初，在最早的精神分析师之间，有种我们几乎可以称作家庭式的组织运作。

但弗洛伊德不是唯一没有被人分析的。梅兰妮·克莱因的分析师亚伯拉罕（Abraham）也没跟任何人（包括弗洛伊德）做过分析。但除了这极罕见的两个例子之外，从精神分析运动之初就很自然地，精神分析师是跟人做过分析的人。

在我昨天跟你们讲到的1927年那本书里——假想与一位国家要员对话、讨论精神分析时，弗洛伊德定义说，唯一能对精神分析师培训负责的，是精神分析师自己，是培训分析师的分析师。所以，大专院校不是必需的。在弗洛伊德看来，分析师的培训并不依赖大专院校。

诚然，最好是在大学里多学一点东西，医学、文学、哲学、艺术，都好。但弗洛伊德在书中再次而且长篇大论地坚持，只有分析才能让一个人成为精神分析师。

在精神分析开始出现的最初10年、20年，这么做显得很简单、很自然。但自从1922年柏林学院成立，事情就变得非常复杂起来（板书：1922）。

1 柏林模式

柏林精神分析学院的历史是很重要的，因为它是国际精神分析协会创立的第一所学院，此后五十年来几乎所有的学院都以它为模式。该学院的核心人物之一，恰恰是亚伯拉罕，他当时住在柏林。但他去世很早，于1924年。在他之后，学院的管理运作就比较官僚了。

这个学院区分开两种性质的精神分析师：一种被称作“教员”，跟他们做分析能成为分析师；其他的人，就没资格去带想要成为精神分析师的人。这种等级制度，在表面上看很自然，所有军事化的技艺传授也都有这类等级之分，但等级制度对精神分析却是灾难。

因为它重新回到一种听上去很自然，却是错误的、骗倒人的想法，那就是

存在着某些精神分析师，是高人一等的。我不知道这么说，会不会在你们中间引起极大阻抗。因为虽然你们在这里处于学生的位置，但是很多人自己就是老师或被尊为前辈的人，这其中包括我自己。

我能马上和你们达成一致的，是存在着很多的“识做”（savoir-faire），知道怎么做。但如果你们接受精神分析分析之疗的基本点——其关键是移情进入到话语活动，因而你们不太清楚病人会把你们带到哪里——如果这是事实，那么最普遍的情况，应该是病人就这样地将我们从普通人转化为精神分析师。

我希望你们至少能接受：不管“识做”有多少、到怎样的质地，精神分析中除了这些技术性的“怎么做”，还有其他东西。有一种接受你们位置的方式会在移情中被生成，是这些将你们转化为精神分析师。

有关分析终止的问题，正好是个小证据，能间接证明我的整个展开。

在柏林学院和所有以它为模式的学院里，人们认为一位教员级的精神分析师首先是已经终止了自己分析的人。然而，从来就没有任何机构或个人，知道怎么定义什么是分析的终结，即使大概而言。

道理其实很简单：如果我们知道该做什么，我们就能很简单地做得像是真的一样。这是最常发生的事，也部分解释了为什么在精神分析的群体中，会有那么多遵循惯例、不愿打破习俗的人。但遵守惯例挡不住被批判。

这又得按我的习惯，给你们讲个具有代表性的小故事。

那是个纽约的分析师发表在《*Psychoanalytic quarterly*》杂志上的一篇文章，已经有30多年了。故事是这样的：有位老兄被接纳为纽约精神分析院成员，要参加向其他成员介绍新成员的会议，那些老成员实际上还是他已经认识的。这位老兄就跟自己说，这么一个重要的场合，要穿得像样一点儿。他于是就决定给自己买件新的西装外套。他去了一家很考究的店，选了一款略微有点运动

型的西装，很有现代感，他很喜欢。

结果，到了会场，他看到所有人都穿着同款的西装！

从某种角度来说，这很正常。我自己也有同样的故事可以讲。用它来当作最后一个闲闻趣事吧。

在我的第一个诊所，是我自己铺的机织地毯，用了一种浅绿的颜色，是我选了很长时间才定下来的。我觉得它很漂亮。工程完毕，我去拉康那里接受督导，才发觉他用的完全是同一种颜色！（现场笑）真是这样的！所以我也逃不出如来佛掌心的人。但精神分析的传授，不是这个。

这无非是身份定位的一部分，在整个人类文化中是共通的。军人是唯一不需要这类东西的，因为他们已经统一军服了（现场大笑）。所有其他的人，根据类型或理想，都至少会生养出一个这类的痕迹。

但我严肃一点，回到你们中有一位提到过的这个实在很难回答的问题上：什么是精神分析的终止？

2 分析终止的问题

事情中相当私人和隐秘的部分，会真实地在精神分析的结束中表现出来。分析的结束，是互相非常了解的两人之间所发生的一个隐私事件。显然，如果有第三者存在，例如有个机构或学校在边上问着：“怎么样？行不行？你们好了没有？”就全都不一样了。

既然移情经常是被当作一种爱情来介绍的，你们可以想象在爱情故事中，如果有另外一个人来问“怎么样？行不行？你们好了没有？”（现场笑）唯一的回答就是：“我们好的时候告诉您。”（现场笑）精神分析也是一样的。

所以，一个机构要求把做完个人分析作为成为精神分析师的审查标准，表面上听起来再合情合理，实际上也是个闹剧。正因如此，本着世上最为美好的

意愿，机构本身正在成为反精神分析的趋势。

我以这种方式介绍是希望你们能感觉到分析运作中，在移情与分析终止这个理念之间，有个尖锐的矛盾。

弗洛伊德在他 1927 年关于外行分析的文章里，第一页就说：“分析受不了第三者。”不允许第三者、无法授权第三者。这是定义移情的某种方式。

两个搭档之一，精神分析师，接受了被对方抓来当作其他人。比方，要是你们的病人发现你是个虐待狂，你没必要急着去跟他说“不是，根本不是！”，没必要跟他说，生活中你更多是个和善的人，全世界可以作证。我希望你们不会去尝试纠正他对你的看法。

我说“我希望”，是因为弗洛伊德派的整个传统，尤其是美国派，恰恰都是往“纠正”这个方向去的。他们有自己的理由，认为当病人对分析师产生了一些错误的想法时，这些错误投射来自他本身的神经官能症。因此，就有必要去教会病人做出区分，在分析师实际上怎么样和病人把他看成什么样之间。

但问题是，我们怎么就能想象说，精神分析师真的就知道他自己什么样呢？最常见的，即使经历了相当长程的分析，每个人还是会算错自己的账，更不必说接受他人对自己的负面判断本身，也是非常困难的事。

所以，以为用这种方法能在现实和我们对现实所做出的形象之间作出对比，这想法本身是不现实的。

我希望你们开始感觉到，我讲的所有这些困难都有个倾向，就是认为精神分析师好像是能掌握自己的人，能对自己看得很透彻，知道什么是真、什么是假，好像真相大师。当这样的事情发生——因为这经常在精神分析界发生，精神分析就是比任何一个精神或心灵操作都要无聊的活动。

在所有那一类的活动中，就我大概所知，大师从来都不是自以为超强的

人。大师是懂得做“去无痕”艺术的那个人（在无形中完成“抹去”的操作）。我乐于相信，精神分析也是往这个方向走的，相信精神分析师能尊重病人对他做出的判断，多过他给予自己判断的价值。

我很年轻时就相信现在跟你们所说的这一切。雅克·拉康的学校之所以会吸引我，正因为它旗帜鲜明地不依循陈规运作。

3 拉康学校的经历

跟我所认识的所有法国、英国或美国的精神分析群体相反，这个学校里没有任何教员分析师的名单，公开的没有，私下里的也没有。

我要选自己的分析师的时候，就找了个不太有名的人，也是学校的成员，比我略大一点点。分析马上就进展得很好。因为在生活中，我不曾跟父亲有过太多纠葛，但有个哥哥，跟他却有不少话题。因此当我去见这样一位素未谋面的分析师时，情况再理想不过了，因为我们的年龄差距跟我和哥哥相差的岁数很接近。

整整七年，我跟他每周三场分析——这是为了跟大家说，所有的拉康派并不都是以同样方式运作的。他是每周三场、每场45分钟。所以，我以几乎正统弗洛伊德派的标准，做了拉康派的分析，而且早在分析结束之前，就已经以精神分析师的身份开业了。没人说过什么，我也没问过任何人意见。

确定一下日子的话，我是1971年开始分析，1975年开始执业，我的个人分析是1978年结束的。我跟拉康做的督导，每周一次，1974—1979年。现在你们知道我的一切了。

始终没有过教员的问题。

但你们看运作的相对性：我的个人分析每场是45分钟，我和拉康的督导，被我朋友们看作是时间很长的，最长不过10分钟。（现场笑）比分析贵10倍

都不止！（某些“哇！哦！”）我无所谓。我认为每个人有他自己做事的方式，就像没有精神分析教员这回事，每场分析的官方价格也是不存在的。

好，放下闲话，为大家具体讲讲从1967年开始，在拉康的这个学校里，究竟发生了什么。

我已经告诉过大家，1963年，拉康基本上被国际精神分析协会完全排斥。但这时候，他已经有个跟了他十多年研讨会的听众群，实际拥有全法国最大的精神分析师群体。你们要想想，那年头精神分析师并不多。1950年，巴黎精神分析协会（la Société psychanalytique de Paris）囊括了全法国的分析师，只有12人。这数字即使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直线上升，实际上也没多少人。1963年拉康被开除的时候，已经拥有最大的听众群，追随者占了法国最大数量的精神分析师。于是他就创建了自己的学校，巴黎弗洛伊德学校（École Freudienne de Paris），当然，他就得着手组织运作这个学校了。

刚开始的三年，他想按照通常模式执行，也就是说，指定教员来培养精神分析师。但在那之后他说，他那么辛苦、经历那么多困难，不是为了再来做一遍跟那些人相同的事。在这个时候，他发明了被他称为“帕斯”（或意译“过”：la passe）的特殊流程。

姚洁：帕斯，算不算一种通行证？

GLG：啊！你们对这个词应该需要有个解释。

4 帕斯或“过”这个流程（La passe）

“过”（passe，念“帕斯”）真的是法语里一个很丰富、很复杂的词。它被用作名词的第一个意思，是说某人可以跟一个妓女度过的时间。对妓女来说，

“做一个 passe”就是接一个客。（姚洁：“是她申请执照吗？” GLG：“没有执照问题，她的一次行为，就叫一个 passe”）有个常用动词 passer，是“通过、经过、传递”；这里用的是名词，“做一个 passe”。

但这个词最通用的意思，是“迈过一步”“跨越”（franchissement）的概念。很常见地，在山区，当你到达一个峡谷，这也叫“一个 passe”。一个峡谷，是两座山之间的口子（板书图示），我们上山、“迈过”“穿越边界”，翻越到另一山。所以从 passe 这个词里，应该听到的是“过渡”或“过道”（passage），经过的路，而不是通行证、“护照”（passeport）。

现在要请大家好好跟紧我的讲解了，因为我要试着给大家介绍这个叫“帕斯 passe”的流程。流程从来就不是个很复杂的东西，但要弄清楚一个流程，脑子里得同时有好些术语。

拉康是从这么个理念出发的：某人可能会想要跟另一个人解释，他终止自己的分析了。显然，跟自己的分析师去解释是没有意义的，因为想要离之而去的，正是跟他的这个关系。所以，问题就是：跟谁可以诉说自己分析的细节，来表明得益于分析，自己已经改换了立场和位置？

拉康的回答是这样的：这个可以被叫作“passant”的人……（现场议论纷纷，给出“通关者”这个说法）。

GLG: 是在找 passant 的翻译吗？太好了！

姚洁: 倒过来翻译，是要经过一个关卡或边界的人。

GLG: OK（好吧）！那么现在，我需要另一个词，是“帮人通关的人”“让人可以过边界的人”，le passeur。在被密切监察着的边关，总有些 passeurs，他们认识路。用什么词来说这个呢？

姚洁: 是不是“向导”？当地人？

GLG: 但, 又不是向导¹¹。

学员: 我忽然在想, 如果有野兽的脚印, 我们也能跟着它过关的。

GLG: 的确。现在, 我们有了一些词汇, 我应该可以给大家做这个解释了。

所以拉康的新发现是说, 通关者可以跟与他处于相同境况的人去讲。也就是说, 同样是在做分析并正在成为分析师的人。但谁是正在成为分析师的人呢? 怎么去找这个稀有品种?

拉康这时候就建议在他学校工作的精神分析师们, 留意看看他们的病人中有没有在评估来看, 是在很积极地成为分析师。于是, 想象一下, 接下来的情况就是这样的: 一位同意拉康这个建议的分析师, 认为自己病人中的某一个正在成为分析师, 他通常什么都不会对病人说, 但会把病人的名字提供给负责流程的秘书。秘书于是有了一个名单, 很多个这样的名字。

一旦有个通关者要求做一个 *passee*, 秘书就叫他来, 给他一个翻过来的帽子, 里面装着一堆折好的纸片, 每张纸片上有一个名字。通关者从里面随机抽出两个名字, 之后, 就得他自己看着办了。他可以打电话、见其中一个、再见另一个, 很多很多次, 或很少几次。没人知道也没人想知道, 学校完全没有兴趣知道。

每个通关者要见两位路人, 但分开见, 这很重要。他对每个路人讲述他想干嘛, 但没必要一定跟两个人讲同样的话, 这是他自己的事情。

一段时间过后, 可以是 15 天, 也可以是 6 个月、一年, 他跟两个路人都说“够了”, 跟他们分头结束。起初是他决定的见面, 也要他来决定这结束的

¹¹ *Passeur* 本意: (渡船的) 艄公、帮人偷越国境或禁区者。本书中, 我们权且译为“路人”, 取事实上同路相遇却很盲目的特点。译者注。

一步。这时候，他就可以回到那个给他名单的秘书那里，跟秘书说：“结束了。”秘书就召集一个小组，5个人的评审团，是秘书自己从提供“路人”名字的精神分析治疗师名单中随机抽取的。

所以，这里有两个名单：一个是路人的名单，被自己的分析师认为是正要成为精神分析师的人；另一个名单，是提供这些名字的分析师。秘书抽出5个分析师的名字，整件事没有一个环节是公开执行的。在某个指定的日子，评审团就聚在一起，先听第一个路人讲，接着再听第二个路人讲。他们听到的是这两位路人的间接见证，但也是分开的，一个听完之后再听第二个。

我曾被抽去作这样的评委，我向你们保证，这是个很搞笑的经历。最常见的情况会让你有个印象，就好像那两人讲的不是同一个人。但真正有意思的，在于这里涉及的“间接见证”，每个路人都有他自己的方式来讲述通关者跟他说过什么。

简单来说，评审团这时候得要尽快给出一个“是”或“否”的答复，这是学校唯一想知道的。如果评审团回答“是”，通关者会有个头衔，叫“学校的分析师”（A.E）。这头衔本身没有任何价值，没权利、没义务，只是说此人已经通过了这一流程。没通过流程的，未见得就不是精神分析师。这只是允许我们有个方式来尊重分析结束的多样性。

我参加过几次评审团会议，可以说，从未听到过同样的故事。某些时候，实在是听不懂，坦白讲，一无是处；但有一些，很靠谱，也极为感人。

我想指出一个问题，来阶段性地小结前面这一部分。

某些拉康派的学校能坚持得住，尊重这种流程内在的偶然性；其他的相反，大家用同样的流程，最终却建立起一个漂亮的等级制度。那些持有“A.E”头衔的，虽然始终叫“学校的分析师”，却成为跟柏林学院如出一辙的教员。

就这样了。我很乐意我们现在就此略作讨论，尤其想知道你们是否能略微

听出这流程所包含的意义。对某些当年追随拉康的人来说，它一上来就完全像是个脑子出毛病的念头。他们连一秒钟都不能允许自己去想象，精神分析师的质地考量可以依赖于某个尚未成为精神分析师的人！

拉康并没有强迫任何人接受这一价值观，他只是用一篇文章来建议，标题就叫《1967年的建议》（《La proposition en 1967》）。之后有过表决，谁赞成谁反对，绝大多数都投了赞成票。但拒绝接受的人最终分道扬镳，另外成立了他们自己的学校。

到拉康自己解散学校为止，那是学校内部发生的唯一一次分裂。

好，该你们的啦！

5 问题 1：为什么要这个靠“偶然”运作的流程？

学员：从我们的理解，精神分析师要有一定的培训，要有一定的能力，我想说，需要什么样的能力可以成为这样一个精神分析师的？第二个问题就是，刚才老师讲到，这是一个偶然的过程，为什么要是这个偶然的过程？（现场很多议论、互相解说）

姚洁（对 GLG）：对我来说，这里涉及一个细节，可能不那么容易理解。您在自己的介绍中告诉大家，您在结束分析之前，就已经作为精神分析师开业了，而您所讲述的 *passee* 整个流程，那些通关者，您却将他们这个时间点的关键，落在“分析的结束”上……

GLG：我来回答？

不是因为我从 1974 年作为精神分析师开业、开始接收病人，我才开始是

精神分析师。如果我“已经成为”精神分析师，这事情的发生远远比开始接收病人要晚，我都说不上是什么时候了，多亏了与一位女病人的分析，让我很震惊。

我已经跟大家指出过，很经常地，我们会遇到那些自我介绍为精神分析师的人，当我们在普通生活中看到他们，我们会说：“他做了什么就变成一个精神分析师了呢？”分析师之间的争斗，互相的敌对与竞争，根本就跟任何其他人类群体之间的斗争一样野蛮。

生活中也许可以一眼认出一位大禅师，可我看不出任何可能来辨认出一位大分析师。原因很简单，我们所说的精神分析师，只因移情而存在。走出移情，他就跟任何人都一样。

但就 *passee* 这个流程，允许我再为大家明确一个位置。

乍一看，它显然很啰嗦，但它实际上是为了安置一个非常具体的运作，我们在法语里叫“间接见证”（*témoignage indirect*）。通关者始终都不会见到评审团的人，理论上他完全不清楚谁会是评审团成员。这在拉康的巴黎弗洛伊德学校有可能做到，因为学校有 300~400 个成员，不是谁都认识谁的。要是只有一个只有 20 人的群体，那基本上就没有操作这个流程的可能，因为流程所需要的最起码的隐私都保不住。

让我们来好好看看这“间接见证”中有意思的是什么。

这流程之所以会被命名为“过”（*passee*），是因为通关者得要成功地让某事从他那里，通过一个人，再传递到另外的一个人。动词 *Passer*，是人家递给我什么，我再转手把它递给另一个人。很显然，这流程的每个环节都有可能出差错。

通关者可以想象说，他正在结束自己的分析，而实际上完全不是这么回事；路人可以被他的分析师指定，但他可能还完全没有到位，没有任何心理准备；再者，通关者自说自话，不管他讲过什么，路人完全无力传达——我做评审的时候，就曾目睹过这种情况。一个路人对我们说：“我一点都听不懂他跟

我说的是什麼，我问自己到这里来做什么？”

最后，评审团本身可能是聋的……或无能；它也可能很简单地无法做出统一的决定。因为没有投票表决这一说。三个“是”两个“否”，就是没有结果——得要所有评委都同意“是”才成。然而评审团，任何评审团，都是被冲突激荡着的，所以整个流程也有可能纯粹因为评审团的原因而落水。

这要是个资格考试，就是彻底地不公平，完全靠碰运气。但这正好不是个资格考试，而是个考验。

当某人想要尝试给出“分析结束”这个信号（或记号），你们仔细想想，我们不能跟自己的朋友做这个，同事也不可能，我们实在不可能找得出谁来做这个。这是为什么这个流程所寻求的是一种偶然和匿名的形式，以此来抵达我所说的“间接见证”，唯一有能力对分析结束所能给出的见证方式。

一段分析不见得就要结束在“活得更好”（mieux-être）上，如同心理治疗的自然结果，在形式上它会是某种“事故”。而就“事故”来说，实在很难在“事先”说上什麼。

6 问题 2：探讨“自己的标准”

学员：老师部分地回答了我的问题，我的问题是：什么样的人能够成为一个分析师？根据我的理解，就是一个人，自己被别人分析，然后自己也再分析别人，然后在这个过程中……

姚洁：如果你在说这个流程，那么通关者不一定要分析别人。

学员：不一定，反正在操作吧！

姚洁：不一定。

学员：这是我理解的。然后在这个过程中，直到某一天自己意识到了

自己能跟这个来访者两个人之间能够产生……

姚洁：跟来访者没有关系，是跟你自己的关系：你是不是觉得自己的分析已经到了可以结束的程度了？（GLG 确认）这个人想做通关者，是说我已经被分析够了，准备好成为精神分析师了。跟他这时候有没有病人是没有关系的。

学员：所以还是有个标准在自己心里吧！然后呢，这个评委总会有他自己的标准吧？（现场议论纷纷）

GLG：没有。

当然，很正常，我们无比期待着评审团是没有任何标准的。如果评审团有个预设的标准，就没必要劳神安置起如此复杂的一个流程了。我们按标准汇合起评审团，把候选人叫来，然后说同意或者不同意就是了。

在今天，几乎所有的精神分析机构都是这样在运作的。通常的情况，不是会合起一个评审团，而是候选人自己很微妙地去见两三个精神分析师，这些分析师会问他一些有关他分析的事情：怎么开始、经过怎样、有没有很好地分析过他跟自己母亲的关系、他跟自己分析师的关系怎样，等等。之后，这两三个分析师会碰个头，两种答案：不行，您得继续见您的分析师；行，您可以开始接病人了。

这个是传统的运作模式，你们在精神分析圈的任何地方都可以看到。而拉克所发明的这个 *passe* 流程，则与其相反。

一个 *passe* 流程，它加给评委一个压力，为的就是要忘掉标准。当然，他终归会有点标准在脑袋里，谁都有个标准，但你得要很经常地用积极斗争来推翻它。

我可以向你们保证，那些评审团内部的争执、分歧常常就针对着这些标

准。所以有时候评委中的一个，会跟另一个或其他评委说，他或他们有“成见”，妨碍对方听到路人刚刚在讲的这个或那个。

所以，当路人在设法见证通关者跟他们说过些什么时，评审团的关键就是要有能力从他的话语中去理解事情的来源。

还是“间接见证”这个核心问题。如果重新把“标准”这个概念弄回到 *passe* 流程里，你们就把它给湮灭了。

2013年11月4日上午

第 14 讲 精神分析的临床与实践

请允许我从一个小小的坦白开始。

当我真正意识到我将真的过来讲五天的课，正是暑假，我忽然非常焦虑。我准备了又准备，写了又写，每一场都有这样的 10~15 页纸（拿 A4 纸示意）。当焦虑略缓，我很清楚你们是绝对受不了的。于是，这时候，15 页纸简化到了这样子的一页；一到这里，连这一页都丢掉了（全场笑）。因为我明白了，想要你们听我的唯一方式，是我得跟你们说话，而不是原本照读那些我想到要来、但还没有来的时候所写的东西。

请相信，这对我自己有了个很搞笑的效应。

你们当然不知道我在论证时多少是个精确严谨的人。当我用法语、英语或西班牙语提出一个论据时，总会引用不少文章，连同对弗洛伊德、拉康在术语上的翻译与理解，来点明缘由或进一步探讨。而在这里，四天快要过去，我还没真正引用过一段文字。我的法国同事如果在这里，一定会说：“好琐碎！”换句话说，我没有在这里精确地碰过临床术语。

因为我不太相信有个全球通用的临床（经验），国际性的临床（经验）。

我们能尝试着去做的，是比较互相的经历与体验。所以，今天下午和明天早上，我等候着你们的问题。尤其是今天下午或从现在，从我们所剩下的半个小时开始。请跟我详细讲讲你们的临床经历、你们所遇到的问题。

这里，在“实践”与“临床”之间，我得引入一个微妙的区分。

就定义而言，既然是“实践”（实操），就很私人，“临床”则是共享的。而在精神分析，不可能二缺一。因为我们始终不断地涉及移情，不讲实操就没有站得住脚的临床（经验），而缺乏某些临床知识，也无法讲实操。

但你们要理解，如果因为你们将会讲到自己的个人实操，就说我们是在做某种督导，我是不支持的。我很了解这类事，来来往往做讲座的人常常在做；我自己很久以前也做过，尤其在阿根廷。但我很快就清楚地意识到，我不愿意。当我们处于做讲座的位置，像我现在这样，在我看，我们不可能取代督导的位置。我完全不支持对这两件事的混淆。

我已经准备就绪，很好奇，等待着来自你们的临床问题。我期待着整个早上的时间，我们有可能讨论所有已经触及的问题，从最开始到现在我所讲到的。

该你们了。

1 问题 1：“通关可有通过率”？

学员（立刻）：我完全认同拉康评选分析师的这个程序、这个过程，但是，我的问题是，这个通过率有多高？拉康在不在意这个通过率？因为通过率低了，他的收入就少了，别人还来不来读这个书了？（现场笑）

GLG（也笑）：问题在于，这不是个筛选。

雅克·拉康那个学校的大多数学员都没有做过 *passee* 流程，但都作为精神分析师注册。这一点很重要，能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有关“标准”这个难题。

当您有些标准的时候，通常情况下，就会有一些头衔是要去尊重的。这是个很简单的细节：当您属于一个经典的精神分析协会，法国也好，美国也好，

如果您是个年轻成员，young member，您每年付 x 作为年费，如果您是资深成员，full member，您付……比方说两倍的 x；如果您有资格作为教员，就要付三倍的 x 了。这是个等级。谁是谁一目了然，而且也很正常：想要作为教员带年轻分析师，付费最高，因为学院会给他们送去客户；想做分析师的人也会愿意付大价钱给他自己的分析。所以，教员赚比较多的钱。这跟任何一个社会等级一样，一般没什么好说的。

但我所从属的那个学校（拉康的巴黎弗洛伊德学校），以及我和朋友们建立起来的学校（拉康精神分析学校），不是这样运作的。

我们 1985 年创立的拉康学校只有一个会费，所有人一视同仁。赚再多或是完全不赚，都付一个价，因为学校只有“成员”这一个资格，连精神分析师这个头衔都没有。

我们认为精神分析是件有关声望的事情：每个人得自己去获取他作为精神分析师的声望。

我得说，这在很多人看来，是很可怕或很丢脸的。法国跟任何地方一样，大家都喜欢真正的头衔，希望能有真正的评审团，带着他们真正的标准来建议说，他们能保证真正的质量。

但是，全世界都知道，一旦我们接近这些了不得的标准，它们都站不住脚。这是通常的情况。所以，如果我跟你们讲到你们叫它“通关”（passe）的这件事，如果你们感兴趣，请试着去想这个过程，而不要带着选拔头衔之类的念头去看它。

谁都不必非去通关不可，从来都不必。

2 问题 2：收费问题的探讨

学员：我想说一下付费的问题。因为精神分析它是个比较长，而且每

周频率比较高的……（姚洁：“不一定。”）不管怎么样，它都是长期而且要付费的。比方说，你的来访者分析到一定程度了，他说经济上有一定的困难，他提出来要减去每周的场次或者想要延长每次的时间间隙，想问一下老师怎么处理？我认为比较棘手。有没有是治病的来跟您做分析？他并没有想来做精神分析的。是个病人，他去了，然后呢，他也没打算再收其他的病人来赚钱，那他怎么办？——他现在说生活有困难了。

GLG: OK (好)。

鉴于我不可能泛泛地来回答您的问题，那么请允许我给你们三个我自己的例子。

第一个例子，有一个搞艺术的，画家。他付费一直都很正常，但某一天，没钱了。我就建议他欠账，以后再付。但我跟他说：“是您开了这个账户，就由您来记这笔账。”这样过了一年，他始终很规律地来，每周两次，都没付给我费用，我也没要他付。

一年过去了，当他跟我说“好，现在，我可以付给你费用了”，就已经是笔有点大的数目了。那场分析结束时，他说：“我相信是 2850 欧元。”我说：“好了，就 3000 欧元了。”（现场笑）他付了我 3000 欧元。这是第一个故事。

第二个例子很不同。很久以前，我接到一个人，已经在有一个有点名气的分析师那里做过 17 年的分析，见我是为了恋爱问题。但几场分析下来，我了解到这位先生很具体的一点——他肯定是强迫症，但属于很特别的一种：只要他欠了谁的债，他就是攻而不破的，好像某种精神上的被保护。听上去很奇怪，但就这么回事。

怎么办？怎么让这位先生永远不要欠我的债？

你们肯定知道在精神分析里有个规矩，病人在该做分析的时候没来，是要支付那场分析的费用。这个人已经做过17年的分析，何况他自己还是个心理咨询师，所以应该很清楚这个规矩。于是，建议他做分析的时候，我跟他说了两件事：“第一，在分析开始前付费。”这跟通常的操作是完全相反的。我还加上了一条：“如果碰巧应该有分析的时候您没来，那一场就算是我送的。”他很意外，回答说：“是嘛？！”我们就这样开始了。

当然，要出的事情终究是会出的。

那时候，他每场分析付我200法郎，某一天，他一进来口袋里只有180法郎。我就客客气气地对他说：“啊！那么，今天就没有分析了。”（现场笑）

这时候，他才开始对自己以亏欠别人来谋求保护的方式提出疑问。

第三个例子跟很多与钱相关的事一样，很搞笑——跟排泄物相关的事情，通常都很搞笑。

我很规律地接收的一个人，是个年轻医生。那时候他每场付我150法郎。有一天，他身上只有140法郎。我对待每个人的方式都不一样，当然不可能就跟他说没有分析了。他跟所有人一样，是在做完分析的时候清账的，我也从不怀疑这人的可信程度。接下来的那场分析结束时，他给了我160法郎。

但是从此之后，这变成了一个很复杂的游戏，有时候他自己都会笑出来。因为他弄不懂怎么回事，有时候身上会总共只找得出145法郎，下一场算起账来，就有点复杂。

我始终让他自己在弄，一句话都没说，没做任何解析。即使很明显地他已经有点算不清了，我仍然对他抱着充分的信心。直到某一场分析关系到他的梦。

梦本身我已经忘记，但在他对这个梦的分析中，我了解到这位病人每星期六会去给他同样是做医生的父亲顶班。法国的传统是当一位医生顶替另一位医生上班时，收入是两人分成的，但父亲把顶班所收的钱全部给了他。这人讨厌去银行，平时在医院工作，也没太多必要去。可他通常现金支付给我的分析，如果没有星期六顶班收进来的钱，就得专门去银行把数目凑齐。结果是，在他付给我每场分析的费用时，实际上是他父亲在出一半的钱。

这是每次付费时算进算出这个动作所发出的警报。

这样发生的事，值得被称作一个“出位”（un acting-out）。这是为什么在了解到与这个动作紧密相扣在一起的是什么、它怎样被一连串的事情扣住之前，任何解析都是毫无意义的。

令这一“出位”再现的那一连串事情，显然溢出“出位”这个动作原本注册的移情关系这一框架。

所有这些是为了告诉你们，在有些分析中，钱只是钱，没什么好说的；但有一些分析则相反，所有的移情都从钱上经过。更何况您跟我提了一个双重的问題。

有时候我们会被要求降价，有些时候则被要求涨价。不是因为货币膨胀，是因为移情的演变。即使两种情况都在拿分析的未来作赌注，相比而言，处理降价也许比涨价要难得多。

维系住关系当然很重要，就此而言，我们当然可以降价。我遇到过这类情况，也还会继续发生这类情况。在我看来，以减价维系住分析的频率，要比减少每周分析次数更为可取。

我很乐意借此做个总结：很重要是病人要能感觉到，我们这么做不是为了显示自己的好心和宽厚。这只是为了维持住继续治疗的可能。

这也让我有机会跟你们说，分析师拥有一定数量的病人很重要。

当我们只有一两个病人的时候，在经济上会很依赖他，这会让工作变得很复杂。你们很清楚，当一个人跟你说“我要停掉”，你就开始担心柴米油盐，这很担风险，（现场笑）用不着隐瞒，特别是精神分析，就这么回事。

所以，最好是有一定数量的病人，你工作的时候面对他们、面对钱，才有一定的自由。

3 问题3：中学心理教师的自杀危机干预

学员：有两个问题想说一下，一个是昨天那个“王老五”的故事，使我知道今后在给的高一学生讲课，告诉他们心理咨询师什么时候，该怎么和他们讲什么是心理工作。尽管之前，我能把它讲得……我认为是很清楚，但孩子们明显茫然。昨天我听那个故事，我知道该怎么样才能说……

姚洁：什么是心理工作呢？

学员：我一直和他们一起，在等待感动的这一时刻的到来……

GLG：很好，很好。谢谢！

学员：然后第二个就是，我有一个问题，我自己也已经有解，但我还是想听老师说。我是晚上十点的车，大约晚上七点的时候，我还在学校，有一个班主任，他在我上课的课堂外徘徊了大约有多半节课的时间，直到我下课出来，他给我讲了一个他认为非常重要的事。

姚洁：是很具体的某一天？

学员：就是晚上要坐车来这边参加这次……然后，他讲他们班有一个

学生，是一个高三实验班的学生——我在的这个高中升学率达到 80%，然后又是个实验班，排名靠前的，要他们冲击——这个学生已经回家休养了大约十天了。这次回家休养的原因，是因为他感觉到在他身上……一年前，他邻居的弟弟，是他的好朋友，在学校里跳楼自杀了。

姚洁：同一个学校吗？

学员：不是，不是……

姚洁：嗯，没关系，我们过。

学员：然后呢，那一年、近两年的时间，这件事一直困惑他。实际上他自己学习压力也很大——嗯，这个是另外，这是我的判断……

姚洁：没关系，很好。

学员：这次终于逼得他不得不回家休息了。然后他感觉到，一想到这事，他总想从楼上跳下来。那么给予我的一个压力是，这个学校真的发生过这样的事儿，所以我有感觉到……

姚洁：您自己在做的学校？——所以您也有压力。

学员：对对对！嗯……我感觉……我当时，我就推嘛！“我、我、我今天晚上要坐车。”其实我是有时间跟他谈一谈，但是我真的是逃……逃……

姚洁：嗯。

学员：然后他那个班主任之所以那么紧张，也有自己的原因。因为我们共同谈到过安全问题：事情到了极限。然后我现在对于做这个个案，我自己有很多的想法，有很多……

姚洁：您说的“这个个案”，做谁？

学员：就是说，我得回去以后接这个学生呀！

姚洁：您要接这个学生？

学员：我肯定要接的，无论我能不能做，我肯定都要去接的。

姚洁：嗯。

学员：然后我觉得这本身对他会是个支持。我尽管有好多的……一些想法，我还是想听听老师的。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他是怎么想的，能给我什么建议？

GLG：这是我们这类讨论中，可能发生无数误会的一个典型例子。很明显，通过（姚）洁出色的翻译，我能理解您的问题，但同时我所能懂的，比起您给大家讲述的临床实情，已经很贫乏，不再那么有血有肉。

就我的理解而言，这里关系到两个人：有个学生，他兄弟或同学自杀了，但这里还有个班主任……（现场很多“嗯”。）他也是，显然他很担心。这允许我们提出一个临床上很重要的问题，要知道我们首先做谁的工作。尤其在跟孩子相关的临床工作中，这是个很真实的问题。

学员：学生。

GLG：啊！学生？肯定？（学员犹豫）

姚洁（笑）：但，是班主任来找您。

学员：是班主任来找我。但是如果说我们学校的工作方式是我一回去就告诉他，我回来了，他马上会去告诉学生说王老师找你。

GLG：是这样！那为什么您要提到……班主任？

学员：是……他给了我压力。

GLG：这样！那么您会拿他给您的压力怎么办呢？

学员（笑）：我逃呗！

GLG：喔？当您回到学校，您跟班主任总要做些什么，而且在我看，您还会跟孩子讲。不是吗？

学员：打电话。

GLG：啊，您得跟他讲电话。

学员：我直接发个短信告诉他：“我回来了。让学生来吧！”

GLG：这就可以了？

学员：然后，我跟学生在咨询室……

GLG：好吧。学生跟这位班主任之间，会不会有很多事相关？很多关系、很多接触？（沉默）不会？

学员（忽然以一种秘密的口吻）：从目前的信息是这样，他是班里前几名的学生。如果说利益关系的话，就是他如果能考上清华北大，学校能奖励给他两三万元——一个（学生）考上清华北大，学校就能给他两三万元。（现场很多议论）

GLG：哇——！情况就非常有趣了。（现场笑）要是在您的位置上，我会对那位班主任非常感兴趣。（现场笑）

因为学生有他可以焦虑的道理，也许还有自杀倾向。但是，当你已经忧心忡忡，还有人在为你不安，就够你受的了！这样看，也许一个短信足够让班主任安静下来，但也许不够。（学员自己也笑起来）如果您想要跟学生有效工作，我建议您多少也要照顾一下班主任（好几个学员笑）。

很简单地，很简单、很快地，不是给他做心理治疗（学员：我知道，我……）。要让他理解学生那里不再是他的事，而是您的事，好让他可以大大减少自己的不安。

学员：我知道、我知道，现在我跟自己说，应该去找班主任，和他谈……

GLG (对学员)：No longer worry, now it's my business (不要再担心了，现在这是我的事儿了。)

学员：好、好！我明白了。

GLG：OK，我们在这里结束？（掌声爆发）下午见。

2013年11月4日上午

第 15 讲 不同群体的精神分析师

展开现场提问与讨论之前，我想就今天“分析师之间的工作”这个主题，再最后做一个细节上的明确。

这几天里，我一直都在给大家讲一个难题。拉康在创建他的学校时，曾就这个难题提出过一个建议，我也重复又重复：“精神分析师”这个头衔不存在，生活中我们很难知道谁是分析师、谁不是。当我说到精神分析师是个事关声望的问题时，指的正是这个。

被认作精神分析师的，是一旦有人跟其他人提起他，会说：“你可以去跟他讲讲看的！”你们看，提到一位精神分析师，人们用的常常是第三人称。我们跟另一个人，男人或女人，说：“我把他看作是精神分析师。”我把这称作“声望”。

中文有没有相对应的词？（姚洁：“声”好比响声，望……）我们做出来的一个响声……

1 Passe 流程中的声望问题

老实说，“声望”（réputation）在法语里，更多是个贬义词。说一个人以其声望获得他的质地，几乎就是在说他很值得怀疑。而且在 réputation 里，很容易听到 pute（妓）。但我偏向它，是因为它的运作恰恰好比是早上讲到的 la passe 这个流程。

我跟大家提到过，在 la passe 中，到了某个时间，两位路人得要分头跟评审团讲述另一个人（通关者）对他说过什么。因此，la passe 在构思中，被当作是个制造声望的小机器。通关者的工作是要让他人以某种特定的方式来讲他。这方式要足以使人信服，才能让从未与他直接对话过的评审团认可说：“啊！他说过这个！”你们能估量得出，这事情要脆弱和不确定到什么地步！

拥有评审标准和评审团的机构正好相反，氛围中充满了严肃。评审团通常都是年事已高、又被视为值得尊重的人，尽管经常只是因为年事已高而被尊重。在这些人身上押着整个机构的分量。

就我而言，我宁肯接受一个不确定的传授所固有的脆弱，胜过机构化的谎言。尽管这些日子听我讲下来，你们应该已经可以想象，我对谎言本身并没有太大的恶感。这话表面上听起来很矛盾，但我希望你们是理解的。

现在，回到我们的问题：精神分析师之间，究竟是怎样工作的呢？

2 Le Cartel: 卡而代尔工作小组

拉康提出的建议，是建立一个工作小组，叫“卡而代尔”（le Cartel）。这个词在法语里有两个非常不同的意思：一个是像这样的小卡片，但另一个是某种工业组织。你们中间如果有谁学过工程管理，应该知道“卡而代尔”和“托拉斯”（Trust）。

托拉斯是英语：you trust someone（你信任某人）中的“信任”。但它特指美洲汽车制造业中，福特公司下属的那些工厂。福特公司曾是汽车制造所涉及的一切之业主：森林、矿藏，从生产橡胶的树到橡胶生产的轮胎之类——很抱歉，我又在跟你们讲这些看上去无关精神分析的事情，但我得跟你们解释我用的词汇。

所以，托拉斯是个垂直结构的组织，或者用英语的说法，“我们靠自己。”

卡而代尔相反：这种组织方式首先存在于德国，同水平的不同企业互相联营，来制造一些共同的产品。

所以，一个是垂直的；另一个相反，是一种水平方向的组织。用 Cartel(卡而代尔)这个专用名词来指称工作小组，是建议一种水平工作的组织模式：所有人都被视作是程度相同的。

于是，接下来的问题是：多少人呢？

3 小组人数

很有诗意的讲法里有一种是说：“多过美惠女，少过缪斯神”。美惠三女神卡里忒斯，是三个；主司艺术与科学的缪斯女神，是九个。比三多比九少，卡而代尔一般是4~8个人。这不是个定数，只是概念上有个关键，是要保证话语的最大流通，同时要尽可能地避免七个人以上肯定就会出现团体效应。所以，那时候的建议是：4、5、6个人相互选择而定。

不是机构或学校指定说：“你跟某先生做一个小组。”而是成员之间的互相选择，视友情、工作热情、意气相投而论。更常见的，是对某一主题的选择，决定了他们将要共同投入的工作。通常第一目标是从对一篇文字的研究开始的，但因为这不是学院式研究，很快地，就会有临床问题、精神分析的实操问题出来。

这类被称作卡而代尔的小组所存在的风险，就是它很容易转化为没有督导的团体督导。有些卡而代尔形成之后，做不下去。因为有争执、意见不合，我们通常会遇到的一切人际关系的问题。

关系到我自己，我可以这样说，作为精神分析师培训的精要，都在不同的卡而代尔小组里发生。我做过很多小组，但只有两三个对我最终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小组里的人意气相投，无论是在工作中，还是在对事物的好奇、参照、对精

神分析的兴趣中。

并没有什么大师在场，只有弗洛伊德、拉康或其他人的文字，但在小组内部，没人会拿出权威来说：应该这样想、应该那样考虑事情。

这是个很难找到的平衡。我也不知道跟你们讲这些，会不会是一种带着怂恿的建议。但我热切地鼓励你们尝试用这种方式去工作。因为它会帮助你们免去一个很大的不便，那就是单独面对机构组织。我认识很多人宁肯一个人关起来单独跟病人工作，也不与他人合作。这样的人一眼就认得出来，通常都是忧郁而严肃的。他们有太多的事要做，知识、实践，太多的事情要一个人去扛。他们“压弯了自己的腰”。

相反地，当我们有4、5、6个人一起工作时，又能比较默契，经常就会冒出一些材料可以一起笑笑（现场很多的“嗯”或“嗯”）。我向你们保证，如果没有笑，一定没有什么精神分析的传授。弗洛伊德出得最好的书之一，写的是关于俏皮话，不是没有道理的。不同文化对笑的习惯会非常不同，但一个人如果从来没让你笑过，最好提防着点儿（零星的偷笑）；相反，我看你们对刘华清先生颇有信心，因为他有本事让你们很容易笑得出来（现场大笑）。

好，现在轮到你们的问题了。

4 问题 1：频率设置

学员：我从昨天开始就有两个问题想问。不谈刚才的话题，可以吗？

GLG：当然，当然！

学员：第一个是关于治疗频率，两三次或者四次，或者……在国内大多数是一次或两次。然后，老师呢，我相信他那边会……频率高一点。我想问的问题是，老师是通过哪些评估，来确定这个

病人的频次？

姚洁（笑）：所以，回到有关标准问题？

学员：也许吧。但是，老师的病人里肯定有两次、有三次，他总是有点……

姚洁：依据？（笑）不要怕，进攻我。

学员：总是要有一定的评估吧？

姚洁：这里，国内有吗？

学员：这里没有，但比方国际精神分析协会的那些，一般是说前3次或者12次，比方说前3次都是在做评估。

姚洁：……哦！

学员：有这样的说法，不是说确定必须要做这个。

姚洁：嗯。然后，12次是什么意思？

学员：收集资料。

姚洁：收集资料！你的病人知道你这一段不干活要付你钱？

学员：也没有，其实在干，主要是关注点。我就想知道老师的看法，就是他怎么确定他病人的频次。

GLG：我先回答您这个问题的结束部分，关于国际精神分析协会的分析频率。

今天的情况我不太清楚，但这个协会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所存在的场次标准，是每周4次，每次至少45分钟，可能会是50分钟。要知道，对弗洛伊德来说，做精神分析，就是每周6次，每次55分钟。所以每周4次45~50分钟的标准，是国际精神分析协会在50年代初的发明。

从来都没有任何技术上的理由来支持这一频率，只有机构本身的分量在说：必须如此，否则就什么都不是。

但国际精神分析协会的精神分析师们并不比局外人傻。

20 世纪 80 年代有过一个调查，刊登在《Psychoanalytic Quarterly》这本季刊上。这个调查询问被国际精神分析协会认可的那些精神分析师，有多少个做分析的病人。平均人数最多的是芝加哥，有 6.7 个（姚洁：“每天还是每周？” GLG：“全部！”）；整个美国平均拥有病人的人数，都不到 3 个。我希望这个数字足以让你们理解这一标准的荒谬。

我记得曾有一位在美国的分析师朋友，在跟我讨论时说到，他每周 3 次接待一位女病人。我就回应他说：“为什么不是每周 4 次呢？”他说：“不可以的，那就变成是精神分析了！我还没权操作呢！”（现场笑）

这就是太拘泥标准之后出现的情况。我向你们保证，这话一说出口，他自己都笑了。

他应该是意识到，也许应该另外来面对这些事，跟每周几次分析的眼光有所不同。他每周两三次跟病人所做的，也许已经值得被称作精神分析，也许不值，事实上没有任何重要性。重要的是，每周几次的节奏是否能体现他做临床的精准、每一次是否都能在移情的背景上发生些什么？

这是我对您有关频率问题所能尝试的回答。

在法国，很敏感的是这 20 年来，有种减少每周场次的整体趋势。这是非常复杂的一种现象。部分原因是因为精神分析不再拥有昔日的声望，也因为它接触的社会人群非常不同于从前，而且非常多样化。但尤其是做儿童工作的心理师与心理治疗师发展出一个理念，认为人们可以每周一次去看看“心理医生”。

然而，每周一次，就大多数的所谓官能症病人而言，会是个很大的问题。病人会每周一次来跟你讲这个星期发生了些什么。而这是一种虽然来做分析，却希望分析永远不要发生的方式。我现在可以开始回答您那个问题的中间部

分：有关所谓预热的面谈。

我给大家简单讲个小案子，是很久以前在我自己的实践中发生的。

我那时候接到一个显然非常歇斯底里的人，我们做的是面对面。我不太清楚为的是什么原因，这么面对面，一做就是好几年。然后，某一天，他开始说想要停止。就在这个时候，他做了个梦，是我不会跟你们讲的。时光流逝，我已经忘了这个梦。但在这场面谈结束时，因为有这个梦，我指着沙发床对他说：“下一场，躺下做了。”病人说：“可我打算结束分析了！”我说：“正是如此。”

就这样，他是在躺下几个月之后结束治疗的。我能不能因为他在沙发床上只有6个月的时间，就认为是跟他做了四五年的预热和6个月的分析呢？

你们中的一位，早上跟我讲到沙发床这件事。我要跟你们说的，还是早上用英语跟他说过的那句话：在中国，跟在法国一样，沙发床被当成精神分析的一个强烈信号。于是，所有喜欢不动脑筋、快速了断事物的人，就认为只要有沙发床就有精神分析，一旦是面对面，就是心理治疗。

通常，这种情况是事实。但请不要忘了那些相反的例子：有的分析以面对面的方式进行并终结，有的在沙发床上，却自始至终在进行着心理治疗。

信号，就其定义而言，就是其意含混，因此可以是骗人的。作为信号，沙发床可以跟随便什么其他信号一样地自欺欺人。相反，当一个做精神分析的关系将要开始时，预热的面谈将要过渡为精神分析治疗，这是非常值得好好做个记号的。

有关这一点我在昨天和前天的讲课中跟你们有所提及。我说过，当我们选择向病人建议精神分析时，我们首先建议的并不是沙发床，而是邀请对方以另一种方式来进入话语的游戏或活动。

开始分析的时候，我们当然需要知道很多事，在我们完全不能预先设计的时间段里，我们需要提问、需要了解。就我自己的实践而言，这说法完全成立，因为就算是比较通常的情况，我也会在3~4场之后结束预热的面谈。

当我第一次见一个人，通常而言，在第一场结束时，我会跟他说，我们将继续这样地见几次。我无法知道要多少次，但到时候我会告诉他我打算做什么。这样，可能是3次，也可能是15次或更多。这些见面之后，我做出干预，会比通常讲话的时间要长。我解释说，我们将改变游戏规则，您如果就此有所疑问，现在是问的时候。因此，这个时间是我区别基本规则与通常话语在社会上运作的时间。

从这个表面现象来讲，国际精神分析协会的3~12次，可以显得非常有理。但就像一周四场才是分析一样，这个规矩也缺少根据。

这是一种事情发生的平均量。谁愿意不惜一切代价，把一个数字当作规则或规律去遵守，无论怎样，这都很荒唐。

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是……

5 问题2：拉康“性关系不存在”之解

学员：第二个问题是拉康的一句话，我在不同的场合听到，拉康说，“性关系是不存在的”。

姚洁：什么关系？性关系？是、是、是，老师还出了一本书，在巴黎讲了三天……半（现场大笑）。

学员（也笑）：所以，我想知道这是拉康说的吗？第二，是在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说的？第三就是，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GLG（笑）：我让自己跟你们东拉西扯地说了好几天，倒是一个字

都没提到过我最后那本书。书名是《Hiatus sexualis^⑫》。问我这样的问题是要担风险的，因为我可以跟你们再讲五天（姚洁：“警告过了。”全场笑）。

我要预先告诉你们会很难，因为绝大部分要用到数学和逻辑学。我给你们解释为什么。（板书“性关系不存在”的原文：Il n'y a pas de rapport sexuel.）这句话，即使用英文都没法翻译，因为如果说“*There is no sexual relation.*”显然很荒唐，违背事实。

法语中，这句话却有一种模棱两可的感觉，变得很有趣。

“性关系”的第一个意思，是说性问题上的 *intercourse*^⑬，所以极端挑衅，听上去甚至匪夷所思：一个弗洛伊德派的精神分析师，居然说性关系不存在？！

但，一惊之后，第二个念头会出来，是问：“但他这么说，是什么意思？”这时候，会想到法语里另有一个相当挑衅却又很常见的表达：“这根本就没有任何关系！”（学员：“风马牛不相及。”）明白了。那很简单，就是：“男人女人不相及。”（现场有人笑，大多数困惑）只要生理上毫无问题，我们知道他们是会“相及”的。

拉康在他这句话里用的，是数学中的“关系”。我们不停地在讲两个数字之间的关系。比方， $6 \div 3 = 2$ ，有吧？2就是6与3之间的相除关系。拉康想说的是，男女之间，没有这个意义上的关系，数学关系。（“噤——！”“OK！”）

你们如果念过一些弗洛伊德文献，一定知道弗洛伊德自己绝对说不出什么是男人，什么是女人。他非常清楚什么是主动性、被动性，但也非常清楚，他

⑫ 《性之元音重复》或《性之间隙》。Guy Le Gaufey, *Hiatus sexualis : Du Non-rapport sexuel selon Lacan*, Paris, EPEL, 2013.

⑬ Intercourse: 两国船舶在对方某些港口停泊的互惠权利。

不可能将男性与主动性、女性与被动性混为一谈。尽管世界上到处都是机械式文化，中国跟其他地方应该也一样，但作为分析师，我们不能把男人与主动、女人与被动视为等同。站不住的。

1937年在《终结的分析，无止境的分析》（《Analyse terminée, analyse interminable》）这篇文章结尾处，弗洛伊德最终建议给他所说的“男人”与“女人”划个区分。他解释说，女人感觉到……他称之为 pénisneid，“阴茎羡慕”，男人呢，阉割焦虑。当你要试着想去理解这些概念的重要性时，会发现它们非常含糊不清，尤其是女人那一方。

因为，要是有人用这些字面的意思，去说女人们想要阴茎或阳具，就我所知，大多数的女人会觉得荒唐又愚蠢。她们也许想要，但你要她们留一个在身体上，估计会很尴尬的。所以，这说法另有所指，但我们不太清楚指的是什么。

拉康重提这个“不太清楚”究竟在讲什么，用的是他惯常的煽动方式。

他其实是说，没有一种关系能相对于女人来定性并区分男人，或者相对于男人来定性并区分出女人。就这一意义而言，他将自己与绝大多数的宗教及人文传统区分了开来。因为文化与宗教大多都认为男上女下，是天经地义的男女关系，之后，就给出了“孩子”这个关系结果。（现场困惑。GLG 板书）这个，是男女关系的经典答案：

$$\frac{\text{男人}}{\text{女人}} = \text{孩子}$$

（很多“嗯”和“哦！”）大多数的学者——遗传学、生理学，思路都只有这一个方向：配子发生、精子、卵细胞……所有这些，都是一个和另一个的“关系”。在这些解释里，你们都能看到“男上女下等于孩子”这个算式。那么，要是没有孩子，出什么事了呢？什么事都没出！

可人们偏偏会有个印象，好像那一男一女一定是出了什么事，才弄得这算式结果不对，没有“孩子”。

有性行为却没有给出孩子，发生的是什么？弗洛伊德倾向于叫它“快乐原则之外”，依我看，在所有的语言里都能找到被拉康称之为“快感”的这个词。

但怎么才能知道男女快感是同一，而且是唯一的呢？无从知晓。希腊故事中，有个叫迪雷兹亚斯（Tirésias）的神话，尝试要解决这个问题。你们知道这个故事吗？不知道？这是进入希腊圣贤祠的一部分。

迪雷兹亚斯起先是个男人。希腊诸神某一天互相嘀咕说：在性行为中，究竟是谁快感更多呢？男人还是女人？诸神没有性，无从得知，就做了个决定，把迪雷兹亚斯抓来变成了女的。事后，他们问：“好了，你感觉谁的快感更多呢？”迪雷兹亚斯说：“我想是女人。”话一出口，他就变成了瞎子。他知道太多了（现场笑）。请原谅我把好好的一个内容丰富的希腊神话约缩成这么搞笑的小故事。

“性关系不存在”以一种鲜明的方式描述了性的异质性。这说法也表明：貌似到男人、女人，都被一种不可约缩的互异性分得清清楚楚。

这问题注册在妇女运动的浪潮中。

妇女运动开始于19世纪，依我看，至少还会再持续一两个世纪。但这些运动在男女关系的问题上，是有很大的自我冲突的。

一方面，妇女们想要完全与男人平等——社会层面上，这越来越成为事实，我很为此而欢欣。昨天电视上，还看到沙特阿拉伯的妇女们开始有了驾驶权。就开车这种事所被附着上去的色情投注而言，这无疑是个重大的胜利。

所以，一方面，有种多少合情合理的请愿或追讨，要求男女绝对平等；但另一方面，不可约缩的男女区别，却又是明摆着的。

通常，男人们不说什么，因为不知道该说什么才好（现场笑）。至少，除了小男孩可以抗议被人说他是受不了阴茎失落之外，也没什么值得一说的。所

以，就事实而言，男人不知道有什么好说的。有时候，他们拍拍手，给自己撑个排场（现场笑）。

所有这些是为了让你们能看到，拉康在他教学的最后十来年所讲的“性关系不存在”，在我看，实际上提出了一个重大的原则，甚至是超越于精神分析之外的——这事实所有人都早已知道，拉康却是自亚里士多德以来，第一个将它清清楚楚说出来的人。

就这样吧？简单一点。

6 问题 3：小组人数

学员：我只是想搞清楚一个小问题。刚才讲那个水平相当的组成一个小组，忘了叫什么，老师开始说是 5~7 人，后来我还听到一句，好像为了要有团体效应还是怎么样，最好是 7 人以上。我不太理解这两句话。

GLG：团体效应从 7、8 个人开始，必然发生，这肯定不是拉康的发明。我们停留在 5、6 个人一个小组，正是为了避免团体效应。我不记得是谁在 20 世纪 50 年代开始做有关团体的心理学研究……（学员：福克斯，美国人。）Fox, yes, but...（福克斯，是，但……）抱歉，但也有比昂。沃尔弗莱德·比昂（Wilfred Bion），do you know Bion?（“知道比昂吗？”“知道。”纷纷给出中文）这个小小的插入也许很重要。

比昂创建出“基础团体”（groupe de base）这个概念。但要理解它，你们先得知道：英国人与美国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所遇到的问题，是截然不同的。

珍珠港事件之后，美国人与日本人开战。他们招募了大量的年轻人，打算送到一线战场。很多年轻人。所以，得筛选精神病与非精神病，因为不能把冲锋枪放到有风险的人手里。我有点夸张，为的是讲得快一点，反正实际上，是在这个背景下，美国人创造出了心理测试这回事，来快速决定谁上前线，谁留守后营。

英国人碰到的问题正好相反，他们需要的是将脑子不清楚的人整合到平民防御阵线中。比昂，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跟瑞克曼（Rickmann）做过分析，就有了这个念头，组织小团体来整合那些人格困难的人。

在这个工作中，他观察到，为了要生成一个积极的团体效应，这个团体至少要有7、8个人；一旦超过一个可变的数字，15~20人，就达到了他所谓的“大团体”，运作又完全不同。超过大团体之后，就是“人群”了，人群中的个体，他们之间互不相识，却被捆绑在相同的运动中。

其实，不必走那么远，想想你们自己的个人经历就可以了。

（姚）洁告诉我说，你们在学校里一个班会有30~40个，甚至50个学生。你们就应该很清楚一个“大团体”是怎么回事。但你们知道，当我们要结成一个友谊小组，跟一对朋友有所不同，能有五六个人，已经很不错了。

五六个人，我叫它“团伙”，这跟一个卡而代尔（Cartel）还是非常不同。

我所参与的第一个卡而代尔，实际上就运作得像个团伙：始终是这五六个人，每周一起工作，我们在友情上互相锁得很紧。这使我们在所属的巴黎弗洛伊德学院中，拥有一股强大的力量；但同时，当我们不得不分手时，我可以这么说，那是极痛苦的。

就是这么回事，有得必有失（现场沉默）。

姚洁（对GLG）：依我看，大家不一定明白您说“分手时极痛苦”的意思。

GLG: 啊?

姚洁: 我猜您想说的不是“依依不舍”吧? 按中国的思维, 真有了感情, 就是一辈子的事。

GLG: 是嘛! (笑) 你们真运气! 有位法国剧作家说过一句很有名的话: “友情是头怪兽, 它死的时候咬人。” (没人笑)

姚洁: 下一个问题?

7 问题4: Passe 中路人的选定

学员: 我想问, 早上老师说的做一个 *passe*, 提到帽子里抽来的那两个人, 是被分析过, 而且被他的分析师认为以后有可能做精神分析师的。我就很好奇, 为什么会制定这个标准, 这两个人?

GLG: 艰难到几乎不可能的, 是“以什么做标准”这个问题。只是说说的话, 是分析师认为他的某个病人正在成为精神分析师, 但请跟紧我的整个论证。

如果指定路人的分析师可以将他选择的理由讲得清清楚楚, 整个程序就没有必要了, 直接看看一个人是否吻合这些标准就好了。正是因为这个原因, 指定自己病人为路人、自己又可能会被抽中进入评审团运作的这一个人, 在整个流程里就会自问: “我指定这个路人, 有没有道理?” 对评审的参与, 使他在行动中提问自己。

所以, 这个流程其实够复杂的, 因为一环扣一环。法语说, 是条咬住自己尾巴的蛇 (姚洁笑: 小狗也会追自己的尾巴)。好吧, 但有个区别是, 蛇会真咬, 小狗只是追着玩 (很多的“嗯!”)。

这里有一套很真实的程序循环。不是缺陷, 是尊重问题本身难度的一种方

式。要知道，没有一个人握有这个关键问题的答案：分析的终结，究竟是什么？（“嗯！”）

8 问题 5：网络可以做分析吗？

学员：我问一个问题：网络上能不能做分析？网络对移情有没有什么影响？

GLG：啊！一个很大的现实问题。政治上炙手可热（现场笑）。

纯粹主义者会对您说：“不能！”实际上是不知道实际操作中会发生什么。但我还是可以给你们一个最公开的例子。那是个英国的大分析师，叫克里斯多夫·波拉斯（Christopher Bolas）。你们不知道他？

克里斯多夫·波拉斯曾在伦敦做了 30 年的分析师，写过很多书，在盎格鲁-撒克逊（人中）很有声望。你们知道，那是个很大的圈子。

我没弄错的话，他到了人生的某个时刻，就开始在美国北达科他州安顿下来。那是个非常漂亮的地方，在伦敦待过那么多年之后，我很理解为什么有人会想要留在那样的地方。但他待在那里，就整天脑袋上套个耳机，因为他的病人遍布全世界：英国、南非、亚洲……我相信他要是在这里，会跟你们解释说网络对移情再好不过。

我的经验就非常有限了。但因为我用英语、西班牙语和法语工作，常常有人赶来巴黎找我，一段时间的分析之后，为生活或生存回到他们自己的国家。有时候，分析就结束了；有时候却没有。所以，尽管极有分寸，我还是会有要用到 Skype 或传统电话做分析的时候。但跟波拉斯当然不可比。

我倒是还可以很具体地跟你们讲个跟拉康有关的事。那是 20 世纪 70 年代末，还没网络这回事，我接到一个多年前在拉康那里做过分析的病人，从她那里知道

她跟拉康做过几场用电话的分析。那是位女科学家，要到美国东岸工作一年，拉康就要求她每周一次给他打长途电话。——那年头，很复杂的！信号不好，还非常、非常贵！幸好，拉康的一场分析时间很短（现场大笑）。就这样吧。

让我很实际地来回答您这个很实际的问题（现场笑）：我从不担风险去给一个未曾谋面的人做分析。

我时不时会去纽约跟那里的分析师们一起工作，回到巴黎后，会接到不少要求我做督导的请求。有些听过我讲座，有些根本就没碰到过。我一般都会回答：“好的，但您得先来巴黎，让我们有个时间互相认识一下。”但谁知道这得花上多少时间（现场笑）？

9 问题 6：俄狄浦斯情结的效应

学员：能不能请老师讲讲他对俄狄浦斯情结的理解？

姚洁：老师对俄狄浦斯情结的理解？

学员：他提到过，我感觉跟我们以前学到的不一样。

GLG：啊！

姚洁：怎么个不一样？

学员：我也没听明白，是第一天的课他有提到过，可我不知道……

GLG（对姚洁）：能不能请她把问题讲得再具体一点？

学员：没办法了……当时想问的，没时间了，记在本子上了……

GLG：您是不是想知道弗洛伊德所说的俄狄浦斯是什么意思（现场很多声音）？

学员：就是那个神话啊，有什么关系？

姚洁（笑）：那天我们讲到俄狄浦斯的女儿？不是俄狄浦斯情结，但

这可以讲。

GLG: Antigone! 《安提戈涅的索求与声称》……(思索之后)我可以就弗洛伊德意义上的一种俄狄浦斯效应, 略微点评两句。

全场: 好!

法国弗洛伊德主义最为脆弱和可怜的版本之一, 是将所有的官能症都约缩为一个俄狄浦斯问题。一切都拿俄狄浦斯来解释。我们可以把这叫作“直接的俄狄浦斯”: 小男孩爱他的母亲, 畏惧他的父亲。在此之上, 加了个“反向的俄狄浦斯”: 小男孩爱他的父亲, 也想为父亲所爱, 而对母亲心生畏惧、将母亲视为竞争对手。拿这么个机器, 你可以解释一切, 包括“一切”所剩下的。

但适用于“一切”的机器, 哪里都用不上。一直到1972年, 出了一本书, 在法国非常轰动, 叫《反俄狄浦斯》(《Anti-Œdipe》)。两位作者: 德勒兹(Deleuze)、伽塔利(Guattari)。伽塔利是位精神分析师; 德勒兹, 我要着重介绍一下, 是位真正大名的哲学家, 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的一位朋友。他出的书在哲学文献中举足轻重。

他们的这本书造成了一种炸弹效应, 因为它就法国人的智商而言, 取笑了经典的精神分析师。引发这一事件的极点, 是大致在同一年, 离我们所谓的“1968年事件”不远, 出过一本书, 叫《抗争的世界》(《L'univers contestationnaire》)。我不打算进入细节, 但要知道, 这本书将整个1968年的运动解释为一场俄狄浦斯危机, 对父亲的不满与反抗。这真是荒诞不经, 将整个极端复杂的社会运动与政治运动, 约缩到那么可怜的一点精神分析的解释上。

我从你们的脸上看得出来, 是稍事休息、呼吸一点新鲜空气的时候了(立刻有很多声音, 有些学员上来个别提问)。

2013年11月4日下午

第 16 讲 能说“不”，才算能会说“是”

我们来吧，问题呢？

1 问题 1：关于 GLG 老师的两个私人问题

学员：我想问一下私人问题，老师到底是不是犹太人（现场笑，学员压过笑声）？还有：老师的宗教信仰对精神分析有没有什么影响？

GLG：第一个，我不是犹太人，“人无完人”（nul n'est parfait）——是一句古老的犹太笑话。第二个，孩提时，我多少是在天主教环境下长大的，但我对上帝的信仰从来都没能成功。我不知道要怎么做才能相信上帝的存在。

在天主教传统中，12 岁会有个仪式叫“坚振圣事”（la confirmation，本意“确认”，这里专指“坚信礼”“接手礼”。某学员：“是不是洗礼？”）不是，但正好是对洗礼的确认——洗礼，我才 5 天大就已经洗过了（现场笑）。谁都没问过我的主意，就洗了；到 12 岁，却要我来确认这件事。

罗马天主教的传统上，做这仪式得先退避三日。整整三天里，整个社区跟我同龄的人都被关在一起反思和祈祷。我觉得非常、非常受罪，因为我那些同学看上去都有了“信仰”，我却不敢说，我不知道“信仰”是什么意思。

跟你们所能想象的相反，我是个很怕羞的男孩，更麻烦的，还是那种精神医学上叫作 *hérothopobie* 的那种，爱脸红。所以我就更不敢说出，我不懂怎么才能“有”这个信仰，生怕被人耻笑。

但日子在逼近。

那是很隆重的圣事，有音乐、很多服饰，有主教到场，宣读特定的说法，在你额头上用油画个十字。从这时起，你就是跟其他人一样的基督教徒了。我向你们保证，这是我一生中最不愉快的记忆之一。因为我不想做这个，却没有勇气说“不”……所以，真的很恐怖。

道德上的怯弱，是我们一生都无法原谅自己的。

回到家里，我对我父母说：“我再也不去弥撒了！”他们说：“是嘛？！为什么？”我说：“不去就是不去！”（现场笑）我再没去做过弥撒。但为了让你们能好好地笑一笑，我也要给大家讲讲此事过去大约 20 年后在我身上发生的事。

30 岁那年，我决定开始健身，就去找了健身房的教练。他让我平躺在地上，再起来。我就问：“可是，怎么做呢？”我不知道应该要哪块肌肉去做这事儿，事实上，我从来都没有过腹肌。

教练就拉住我的胳膊，再松掉，让我感觉到那个位置上那些肌肉的存在。之后，我做健身，也有了腹肌，但离开那儿出来的时候，我突然想到了我那场“坚振圣事”——12 岁的我不知道应该命令哪块肌肉，才会有“信仰”。

那是同样绝望的境地，我无从知道该做什么。如果那时候我能有个所谓的“意识教练”，我应该不会那么蠢。可我没这运气，所以生在天主教传统里，却彻底不是天主教徒。

当然，我属于一种笼统来说的天主教文化。拉康也是。他的二弟一生都是

天主教僧人，moine Dominique 是个级别。我不清楚拉康因为什么缘故放弃天主教，直到 20 岁、25 岁的样子，他还是信教的，是个天主教徒。在法国，天主教徒中很传统地会出一些大知识分子。但从 20 世纪 30 年代开始，当拉康开始精神医生和精神分析师的工作后，很显然地，他已经不再信教，而且终生保持非教徒。

但出于政治原因，他与教会的人始终有些周旋。他还是很小心的。

也曾有些拉康派的精神分析师，公开表明他们是教会的身份。没有很多，但还是有那么几个的。

这样是否回答了您的问题（是）？

2 问题 2：假期里病人怎么处理？

学员：想知道老师如果休假，或像您这样来中国，他怎样安置他的病人？他的咨询？

GLG：呃……

我规律性地休假。在我看，只怕是休得不够。我可以告诉你们我期待着在近期内实现的休假理想是怎么样的：既然我已经没有看上去这么年轻，我希望每六周能有 15 天的假期（现场立刻议论纷纷）。

40 年来，我没休过普通法国人那么多的假。只是 8 月份停一个月，圣诞节和复活节各休 8 天。这在家里造成很大问题，因为孩子们的假期多得多，我妻子就经常要求我能跟孩子们同时休假。但通常我都做不到。

现在我应该是可以做到，但孩子们都已经不跟我们在一起了。所以，假期这个问题反正是已经砸了。

姚洁（笑）：那学员的问题呢？您如何安置病人？

GLG: 没什么好安置的。我不在（现场笑）。我不认为我是他们必不可缺的（很多的“毋——！”）。我也不是他们可以随时联络到的：我从不给人手机号码。

我承诺下一场我会在，40年里我也的确“下一场”的时候几乎就是始终在（毋——！）。比方说，下周二早上8点，我会准时在；但在那个时间之前，我是不在的。就这么回事。

这是我跟医院的区别。

医院有一个医护的义务，我没有这个义务。不是我对病人没有医院那么善良的问题，而是出于我对跟他们一起所做的这种工作的尊重。我希望你们是懂我的。

学员: 没有，我是觉得我一些……可能还需要有一些解释。我的意思是说，其实现在在中国，医生也是很难得休假的，我很想休假。然后我就是想说，在你规律的这些……病人、来访者也好，你不在，应该怎么安置（现场很多议论）？

GLG（对姚洁）: 我听不懂（现场大笑）。我怎么？

学员（很着急，提高嗓门）: 就是你平常是一周两三次见一个病人，比方说（姚洁也对GLG说上了中文“比方说……”全场大笑）。

GLG（笑）: 是、是、是，继续。

学员: 这次你要来中国5天，再包括旅行的时间，就是6、7天，那这些人怎么办？

GLG: 可他也一样，要度假的呀？

学员: 就是你要告诉……你要预先告诉这个人是不是？

GLG：……多多少少吧。最经常……不，要看的。呃……

最经常的情况，我会跟他说：“下个星期我不在，所以我们的下一次约是11月12日周二，8点30。”很肯定的是，我永远都会给出下一个约的日子和时间，即使没有假期这种情况。如果我们在周二分析，我会说“周五见”，从来不会简单说句“再见”了事。即使分析已经进行了好几年，我也始终会说周二或周五见。

你们应该理解，既然我支持我们称为“能指”的理论，我就不会犹豫去重复这个能指信号。如果我们这时候是周二，下次分析应该在周五见面，我不会简单地说“再见”，我说：“周五见。”这是一个承诺。

但就此意义而言，从周二说再见的这个时候起，到周五我们再见，我对这个病人来说，就是不在的。就像我现在来中国做讲座，回去之后还要去乡下，这近乎两周的时间，对我所有的病人来说，我也就是不在的。但上周二我做到晚上19点，23点上飞机。就这么回事。

3 问题3：精神分析师的离婚率的讨论

学员：我的问题是，我发现在中国，著名的一些精神分析师这个群体……离婚率比较高（现场笑，议论）。

GLG：啊！

学员：他们的弟子，这些著名精神分析师的一些重要弟子，大多数也是处理不好这种关系的（现场很多议论，学员开始提高嗓门）。我觉得这可能跟精神分析有关的。那么，拉康流派的一些专家们，他们的婚姻关系有没有这种现象——因为拉康自己也是结过两次婚的？

GLG: 好吧。到今天这个日子为止, 我只结了一次婚(现场爆笑), 而且始终跟我所娶的那个女人生活在一起(笑声未落又起)。——我算是个好的还是糟糕的精神分析师呢(又笑)?

我无法在两者之间划出直接关系, 但您指出, 精神分析师经常地发生离婚问题。我也毫不犹豫地要为您指出: 这是社会分类。同样地, 警察被归为自杀率最高的群体(现场沉默)。

这很蹊跷, 自杀这个我们所能想象的最为私密的行为, 实际上却成为极端社会学的问题。法国第一位大社会学家叫爱米尔·涂尔干(Émile Durkheim), 他的第一本书就是研究自杀的。他是从一个非常简单的点评开篇的: 战争时代, 几乎就没有自杀这回事。除了把士兵冲向敌军直接联系为自杀举动, 但这尚有争议。我们把日本人操作自杀式袭击的特别攻击队(Kamikazes)放在一边, 那是另外一回事。

讲到婚姻状况, 我还可以给您另一个数据, 那是我自己的孩子还在学校读书的时候告诉我的, 说今天在巴黎, 学校里 50% 以上的孩子都有父母离异的情况。按这个步子走下去, 就像我跟(姚)洁说过的, 几年后我就是个变态和精神病人了(现场笑)。我们的婚姻已经快 40 年, 这太让人担心了。是不是得赶快离婚, 好略有常态?

至于拉康, 他结过两次婚, 但他性生活之泛滥是众所周知的。但我不认为我到这里来, 是为了给你们讲这些故事。

弗洛伊德自己, 外表看倒是很乖, 但那些范围颇广的调查令某些人开始认为他跟自己的小姨子可能有染。究其原因, 还跟维也纳家居的建筑结构有着非常紧密的关联。

我对维也纳没有特别的了解, 但有人告诉我说, 维也纳的房子内部很少有

过道，从一个房间到另一个房间，得穿过一个房间。所以，弗洛伊德的小姨子想睡觉的时候，就得穿过弗洛伊德和他太太的房间。于是乎，某些坏脑筋就开始转起来，想象出很多事。

但我很怀疑这些跟精神分析有什么关联。就算是真的，就算弗洛伊德私下里跟他小姨子睡过，我也想不到我可以用什么身份去谴责他。

通常来说，爱的选择是非常官能症的选择，经常地，分析会将选择中所包含的官能症特征显示出来。所以，分析使得种种“离去”成为可能，其中包括离婚，的确会经常发生。但我完全不认为这会是分析的命运或必然。分析带来的结果是极为多样化的，我绝对没有这个能力为你们提供任何具有说服力的数据。而且我要求你们在座的各位，不要太相信这类以“经常”“很经常地”开始的说理。说话者其实不清楚所涉及的数量究竟是个什么概念。当我跟你们讲到在巴黎的学校中，父母离婚率有50%，那是某位社会学家做过所有应该有的调查之后，所给出的数字。

我最后说一句，就在这里打住了：大多数的成见，都是以“一般都认为……”这类形式开场的，所以，当有人开口就这样跟你们讲话时，第一个问题就是“是谁跟你这样讲过？”或者，“你自己是否支持这个说法？”只有在这个问题得到回答之后，你们才有机会与对方开始谈真正的问题。

4 问题 4：分离焦虑

学员：我听提问的时候，有好几个问题是提问老师的……跟老师个人有关的问题。这让我感觉到4天下来之后，和老师的接触是在……我似乎感觉到……我不知道有没有分离焦虑，反正对我来说，多多少少是有的。

GLG：啊！

学员：然后，老师说来中国上五天课是一件疯狂的事情，我不知道老师的内心疯狂是什么样子的？

GLG (困惑，对姚洁)：是真的……是我做过的疯狂事？

姚洁 (对 GLG，笑)：您说到过连续讲五天这个想法是够疯狂的；但在我看来，她理解成了来中国是个疯狂的事。

GLG：是嘛？（略想一下）问问她能不能多给我一点信息？我需要（对学员）。我略微有点明白，但不够（现场笑）。

学员：会不会是翻译的问题（全场大笑）？

GLG：好，OK，OK（好吧，好吧）！（对姚洁）这就是说，她认为自己已经讲得够清楚了。

学员：但是我更想知道老师……中文这个意思没有传过去嘛！

GLG：OK，OK（没事，没事），我明白了（现场大笑）。

学员：但我非常怀疑老师是不是清楚。老师说，这五天对你来说是一个疯狂的决定，那我很想问问这个疯狂到第四天了……

姚洁 (笑)：我想我的翻译比你的话还要……精准。开始我只翻译没评论，老先生说他听不懂的时候，我解释说，您讲过到这里来“讲五天”是个疯狂的事，但我想这位……老师理解成了“到中国来”是一件疯狂的事。你讲的这个过程让我觉得我的确是理解对，也解释对了。

GLG：OK（好了吗）？我该回答她了（现场与学员还没有结束讨论）。

姚洁：没问题，你另外表述一下，他会回答你的。

学员：……

姚洁 (对学员)：我换另外一个方式来翻译，你告诉我有没有道理吧。你其实从一开始跟老师说，已经有四天了，我似乎感觉到有一个分离的焦虑，然后你想知道老师有没有。我再翻译得深

一点，你说：老师你爱不爱我？（现场笑，掌声之后又是笑声）

GLG（问姚洁）：怎么样了？

姚洁（对学员）：如果我错了，就纠正我。他们拍手不等于我翻译对了，对吧？

学员：翻译对了，老师。

GLG：那现在，我可以试着回答您了（现场笑）。

第一，我从个人分析所学到的，是私人生活与公众生活之间的区别，对我已不再有太大的重要性。要是你们认为我正在成为暴露狂，那可能是唯一能阻止我继续（分析的理由）。可要我跟你们讲些非常私密的事，我自己真的无所谓。我不会特地想要往那个方向去，用私密来诱惑你们或恶心你们，而是继续不断地邀请你们进入这个“乱说”的话语活动（现场笑）。我学会了喜欢话语的这种运作，它全然不同于习惯上的社会运作。

这不等于说，我就是没有抑制的。但我希望，当有人邀请我说话——像你们现在做的，不会是抑制跳出来，指令我的话语。你们一定已经碰到过、还会碰到很多的精神分析师，应该会比我要懂得有所保留。

在我刚刚接受这个邀请时，即使只是在第一时间，我的计划曾是想要用我40年所有的文章和书，制造出一个知识的大机器。我在来这里的飞机上意识到，这行不通。不是简单地因为我对你们的语言一无所知，而恰恰是因为这个“五天”。

人在魂不在地跟你们整整讲五天，是不可能的。如果我单纯只讲五天的知识，你们会闷死，我会惭愧死（现场笑）。

这就是为什么，我有这个野心，任由移情的效应率性而来。

如果……如果分离焦虑是存在的、对所有人都有效，我理所当然地应该很乐于赶紧回到我家里才对。可你们要知道，这四天以来的经历，在我整个的生涯中，已经是没有什么可比的了。

但我们明天一早还要继续（现场笑）。好吧，（有没有）别的问题？

5 问题 5：丢钥匙的故事

学员：我自己在课程进行过程中，发生了一些事情。我把钥匙给丢了。我就在家门口，进不去。第二天早上我在同一辆出租车上找到了钥匙。同一辆出租车！这件事我在心里有两天，然后今天下午忽然出来一句话，可能可以……我对这个精神分析的课，就是老师传授的是是什么，可能有我自己的理解。我先把这句话说出来，好吗？

姚洁：好。

学员：呃……我感觉，在我对这件事情的理解里面，好像说，我们的生活其实就是精神分析，我们就生活在精神分析里边。然后再回到这个找钥匙的过程中，我经历了丢失的第一个反应，我有过焦虑、有过慌张，然后……我有一些祈祷，比方说我说“阿弥陀佛，不要丢了！”我有这个“阿弥陀佛”就想到老师讲的这个“圣”……然后，在我找到钥匙之后，我还谢了阿弥陀佛，虽然他并没有真的帮到我什么……

姚洁：是嘛？

学员：对。然后在我找到钥匙的那一刻，第一反应是很高兴的，因为失而复得嘛，我就不去砸门啊，我要去换钥匙啊……但是在

那一刻，我就感觉到我好像把那个“丢失”给丢失了。就是在此之前，这个钥匙是丢掉了，对我来说，这个钥匙是丢掉了，但是其实这个钥匙是在的，我不知道丢失在哪里了……然后当这个钥匙回来的时候，我有一个感觉是我要回去的那个家，是不是真正我要回去的地方？

姚洁：哇——！

学员：……就是这样的一个过程。然后今天下午，我在想老师的精神分析我一直没有搞清楚过……就是这个感觉啊。

姚洁：我可以翻译了吗？

学员：可以了。

GLG：好，我也许听懂了点什么。

在您所讲述的故事中，如果找回钥匙时，您至少知道您丢了丢失是真的，说明找回钥匙显然是种解脱。如果可以，我会说，这正是弗洛伊德所说的快乐原则：这里有个紧张、张力的下降。有个非常奇怪的表达与之紧密相连，叫“有物可失的快感”——有种快感从这丢失中来。

这想法不太容易理解，因为首先要能接受“快感”（*jouissance*）这个词几乎与“快乐”（*plaisir*）相反。我相信中文中也有这类东西，但在法语中，有“极致之痛”（*douleur exquise*，医学上指局限点的剧痛）一说。那是非常强烈的一种痛，但 *exquise*（精致、美妙、雅致），非常、非常舒服。感觉之强，直至难以区分究竟是一种痛还是一种快乐。这种经历，我想跟性关系中的感受，多少是相通的。有时候，我们知道很是心旷神怡，有时候我们很清楚这是痛，但有些时候，我们是不太清楚的。丢失的快感大致如此，它非常、非常强烈，但我不太清楚究竟是好还是坏。在分离、分离焦虑之中，正是这一秩序的什么东西。

所以，在您丢了钥匙，又幸运地找回它时，应该很对应我刚才所讲的，因为故事结束得很好。要是您最终不得不砸门，那很简单地，就是个伤心的故事。

而现在呢，我们可以说是发生了一件平常而又古怪的事，您刚刚从某个东西的边缘擦身而过。那东西我们叫作“绝望”（*détresse*）。

那是我们都想着要躲过去的一个东西，但时不时地，我们也很乐意撞上它，只要它不留太长时间。这是一种祛除坏运气的方式（现场沉默）。

明天早上见（好）？好，说定了（掌声）！

2013年11月4日下午

第 17 讲 意思与涵义、适用问题

我们开始跟我有关的最后半天，下午预定是给刘主任和回龙观主管院长的闭幕式。跟我相关的，已经是英语里说的“the final line stretch”，最后冲刺了。

培训开始时我就说过，这一讲不会从讲课开始。我们会像昨天那样，但比昨天更彻底，我要等你们的问题，看你们会把我引到哪个方向来回答你们。这是我唯一的方式，好知道这次授课究竟能成功地传给你们些什么、考验一下（姚）洁的翻译究竟好还是不好（大家笑）。

好，我等待你们的问题（立刻有人举手）。哎！

1 问题 1：弦外之音与庖丁解牛

学员：今天来的路上，我想了两个问题：一个是有点困惑，另一个还有些兴奋。一个是关于语言的问题。我记得老师第一天说过一句话，是我非常认可的。有人问到精神分析，然后老师说的是：“精神分析是语言的艺术。”

姚洁：“话语的艺术。”

学员：那我也完全同意。我的困惑是说，有时候我也会觉得，像老师说的，被困在语言……呃，话语里。中文里有两个成语，一个叫作“弦外之音”，一个叫作“庖丁解牛”。不论在临床工作，还是我个人体会，在某个地方，我认为是觉得有“弦外之音”，

但就是……我捉不到它。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就是，我有的时候会困顿于我的语言功能的强大。这个会让我……（现场有笑声起）觉得……（笑声干扰到学员继续）。

姚洁（很慢）：她说的第一个，大家有感觉到吗？“我感觉到有弦外之音，但是我捉不到它”？没有办法用语言说出来。第二个说，“我困顿在……”（对学员）自己语言的强大？还是……

学员：是的，主要是。因为最近我有个个人体验，呃……

姚洁：说下去，勇敢点。

学员：我太依赖于这个……语言的表达了。

姚洁：什么意思？

学员：我在尝试把每件事都说清楚。

GLG：请继续。

学员：有时候，我试着写下来，但我意识到自己又犯病了。

GLG（对姚洁）：她写什么？

学员：只要我想要写什么，总是有很多感觉会出来。没有办法。

姚洁：就是被……被……

学员：被我自己。

姚洁：为什么你觉得这是“有病”呢？

学员：因为有依赖，而且还有过瘾的地方。然后我就想切断，就像老师说的。但是在某一段时间没有个人分析，空挡的时候，我如何去自我切断？最后一点，我提的问题就完了：就是“庖丁解牛”那个缝隙吧，我有时候觉得有东西从那个缝隙里出来，但是我没有办法回到那个缝隙里，把我分离开，所以我就用语言把它们粘结上，是这个感觉。

GLG：那是身体的关节（articulation，链接、环节）。

姚洁 (对 GLG): 她没有提到身体, 听着更像是“漏洞”。她说是“裂缝”。

GLG: OK (好)。

非常感谢! 我特别欣赏这一类的问题。因为对于我来说, 问题有两大类: 一类是针对知识点的, 也要用知识上的术语来回答; 另一类是来自一种个人的内在体验, 单用知识术语来回答, 就完全行不通。

但我还是先解释一下第一天我用英语讲到的“the art of speaking”, “话·语”的艺术 (l'art de la parole, GLG 强调“话·语”作为行为, 对应于英语中动名词的 speaking 而不是名词的 word)。

所有的文化中, 都有这种说的艺术, 法语叫 l'art “oratoire”, “演说的艺术”或“辩术”, 比方我在这里用来跟你们大家讲课的艺术。但说到精神分析和分析中的“话语艺术”, 我讲的完全不是这回事。我指的是弗洛伊德先以他的实践, 之后又撰文介绍的《弗洛伊德医师的精神分析术》所打开的话语空间, 在弗洛伊德之前, 完全不存在。

从这一点来说, 我至少希望已经说服了你们: 要知道, 基本规则不是一个浅表的细节, 而是精神分析式倾听的基础。

但现在, 回到您那个真正的问题。如果我没有理解错, 它是针对您自己和我们每个人都有一种经历: 发现我们被语言居住的方式。

对“我们被语言居住”的方式, 最普遍的理解趋势, 是想象人们对我们说话, 就是为了沟通。在沟通成为全球最大商务之一的今天, 状况比以前更糟。

人们赋予沟通的这种重要性, 试图要我们忘却一个简单的事实, 那就是“说”本身可以是充满快感的。对牙牙学语的孩子, 这很显然; 但对于成人,

有时候得对诗歌有了兴趣，才会意识到：自己对语言本身所可能发生的兴趣，远远超越于它的沟通力之外。这时候，我相信，您的问题就开始了。

出于我不知道的原因，某个时刻，您被带入到一个境地，把字与字的链接所拥有的快乐看得很重，赋予它极高的价值。如果这正好是您的情况，这时候涵义继续存在，但已经是次要的了。这情况足以触动一个机制，我想把它称作“前逸”（*fuite en avant*）。

允许我在这里插一句，我没想到过会跟你们讲这个，但要让你们明白我在说什么，先得明确涵义（*signification*）和意思（*sens*）的区别。

不要担心，在法语里，这两个词也几乎是对等的。我们经常可以用这个替换那个，或相反。但它们指示着话语运作中的两个不同时间。作为话语工作的实践者，学会区分这两个时间，对你们是很有意义的。

涵义（*Signification*）能自己形成一个环，结尾能回过来扣上开头。您扔出去一个词，有动词有宾语，就构成了一个句子。当一个句子结束的时候，您会得到一个涵义的效应。而要想理解一个句子，需要构成句子的所有这些词同时出现在脑子里。证据是，当一个句子过长，忘了开头，您就“不得要领”，得不出它的涵义。所以，结尾要回头来扣住开头。

意思、意义（*Sens*）相反，对了，*sens*这个词本身，在法语里也是“方向”的意思。所以，它正好相反，跟几何中所谓“有方向的半条直线”同一性质，是个矢量。

当然，问题是意思和涵义以这种方式混淆着：当您依次炮制出一定数量的涵义，它们是以一定的意思（方向）走的。您如果想做文艺批评，要整体评论一本书，您得把这本书的意思转化为一系列的涵义。一本书的意思，不是显现的，并未在书中明确写出，它从来都只是一个方向。您要想弄懂一本书，就得试着把它明朗化，也就是说，要用一定数量的涵义来锁定它。所以你们看，在

意思和涵义之间，有个辩证的关系……

我正在做的，就是想要辨认出您问题的意思，好依据它做出一个或几个涵义。所以，如果在某个时刻，当您把心里想的写出来……

GLG (对姚洁): 然后我忘了，她说到对这些思想的“切”，当只有什么，偏的时候？

姚洁: 不是，比“偏”要复杂多了：她感觉到有东西从那些缝隙里出来，却不知道怎么回去。

GLG: 啊！她的缝隙完全不对应我所说的？

姚洁: 我觉得连那个故事本身都……

GLG: 我要再问她几个问题。(对提问学员)要回答您的问题，我需要您明确一下。某个时候您讲到庄子的故事，之后，您讲到了“缝隙”。庖丁解牛的故事，我经常用来解释应该要尊重语言中的链接。拉康从他的角度，把这称作“好好说的伦理”(l'éthique du bien dire)。但我的理解是，在您说到“缝隙”的时候，您的感觉，是这些“切”没切在正好的地方。是不是这样？

学员: 是，感觉是这样……实际上的感觉是，我试图寻找这个缝隙，好像有个感觉我有可能接近它，可是每次接近，我都没有办法真的能到那儿去……

姚洁: 你讲到你会重新去找那些东西出来的缝隙，但找不到。然后你觉得在写的时候，把这些东西给……粘上了？就更找不到……

学员: 所以我有种恐惧，坦白地讲。

GLG: OK (好)……

你们对所谓“诗的工作”(travail poétique)有没有一个概念？因为有时候

人们会描写它。其中的一种方式就是说，诗这工作，是语言链接与语言内部缝隙之间的持续斗争。前者，那些链接，全世界都在使用着它们却浑然不觉；后者，这些缝隙，只有诗人知道，因为他被语言居住着。有了他自身的这些缝隙，他就想要告诉别人什么是语言的链接。

但所有这些会存在，都只是因为语言本身是个乐趣。而这语言的乐趣，当它变得过于强烈时，是一种触发焦虑的东西。

我给你们讲一个叫西尔维娅·布拉特（Sylvia Plath）的英美女诗人，来结束这个插入。

她在1963年自杀，应该是过得够不幸吧？但她在世的最后三个月，每天要写一首诗。这听上去好像不多，但我可以向你们保证，就这个动作本身，已经足够自杀倾向的（提问学员：“我知道。”众人笑）。你们可以去念诗人们的传记，没人会每天写一首诗的。这太可怕了！

所以你们看，语言是有极大快感的，但当这快感被用得过了，来得太快、太强，我认为会造成象征维度的危害，一种无法面对的晕眩。相反，如果试着跟别人去沟通，这种快感被社会化，就绝对没什么可让人担心的了。

我希望这样已经是部分地回答了您的问题，除了一件事：我不认为在那种时刻，精神分析能帮到您。

“切”的模式，在它最好的操作中，碰不到您所描述的那种您与语言关系中的私密。从这个观点来看，每场分析都是我们法语所说的“罪恶的萌芽”（les pousses au crime），因为它们会刺激您走向另一种乐趣，叫“思想的快乐”。

看着自己在意料不到的地方涌出思维，看着15年都没想起过的记忆，忽然历历在目地冒出来……因为是乐趣，我们就想要在分析后继续。这样一来，我们就很容易落入您所描述的时刻，那是令人不快的。

就这样了？（学员：谢谢！）

2 问题 2：“有语言”和“有话语”

学员：我听老师回答问题的时候，会被某些句子抓住。老师说到孩子，在做“说”的这件事情。是吧？可是我想到我以前学过的别的理论吧，会说到孩子一出生，他可能就会哭，会用他的语言来交换，至少要回应他、满足他的需要。我觉得这里有一个矛盾，孩子他只是在这里做这个“说”的，还是他用这个哭来呼唤一些东西，来满足他的意愿什么？

姚洁：出生的这个哭，通常讲的是他还没有语言的时候。

学员：没有语言，这个哭是不是也可以当它是哭的一种语言？我是这么想的。我有两个孩子，所以我知道孩子，我经常观察孩子，我看到孩子他不只是在做……就算他咿咿呀呀，他也像是在呼唤着什么。所以老师的话，它一下子就把我抓住了：孩子他只是在做“说”？还是应该去回应他？

GLG：在这个层面上要回答您的问题很容易。

既然我在描述雅克·拉康的教学，我就跟你们讲个他经常在说的例子。他说：“我的狗没有语言，但她有话语。她不但知道我是谁，而且知道得很清楚跟我要什么：出去溜个弯儿、吃啊喝啊、要摸摸抱抱啊……”所以你们看，法语里“有话”和“有语言”是有区别的。

很显然，孩子从出世的第一时刻，就在呼唤和要求着什么。哭、喊，很快还有笑，是父母们能拿到的唯一坐标，来定位究竟该做什么。顺便带一句，这正好可以帮我解释意思和涵义的区别：你们想弄清楚宝宝的种种表现有什么意

思，但宝宝自己，完全没有任何能力来闭合上哪怕一点点的涵义。他哭，也许是饿了，也许是倦了，也许完全是别的原因。

有时候得赶快，好让他不要再哭下去；可有的时候，最好是让他哭着。因为，你要老是去妨碍他哭，之后发生的事情不会太妙。跟别的需要一样，婴儿也需要哭。有个几乎生理上的原因是，哭能帮他减轻一天来身体上的紧张。

所以，回到沟通这个事上，你们可以看到，没有语言，进行沟通仍然是可能的。但反过来也很重要，或者说每个人实际上都知道：语言并不只是为了沟通。

再带一句，我曾跟你们讲到语言的丢失这个维度，大家想想，在孩子进入语言的时候，他身上所发生的这个不可思议的约缩，音的约缩：在6个月到1岁期间，婴儿能发出大量的音，区别之大，不可思议。我们不太注意，但语音学家所做的非常科学的研究，认为孩子能发出上百种不同的声音。

开始说话以后，会丢失80%~90%的这些音。你们看，要到什么地步，我们可以说，为了能有语言，要先穷再富。这几乎是生活中的一个基本规律。

难的是要穷对方法。做到的，被人认为是大智大慧的男女。我不知道你们认识几个大智大慧的富人？我没见过。有人说在美国有，不要相信。

3 问题 3：作为客体的空

学员：我曾提过一个问题，关于悬崖，山上的。就是那个1~3米，就是关于那个客体。

姚洁：有关空的焦虑。

学员：对对，是的，我那时候少问了一句，就是那个直接坠落的人，他的客体在哪里？他没有那个1~3米，他直接就……跳下那个悬崖？我想问这个。

姚洁（对 GLG）：她在讲病人的一个梦。

GLG（笑）：好吧，直接跳下去的那个……

在我的故事里，没人跳下去。如果有人跳下去，就没故事了。因为我讲的就是关于人到空之间的这个客体。这个人如果接近悬崖，一个头晕掉下去了，他就再没有客体，也没有主体，什么都没了。我也就没什么故事好讲了。这是行不通的。

对我来说，重要的是给你们一个概念，知道这世上有些客体恰恰不是物。一个对我们“背过身去”的客体是最好的例子，它遥望他方：空（在我这个故事里）、耶稣（及偶像）、发现阉割的恐怖（及恋物），是我能找到的最好的例子。

事实上，我们已经很难把一定量的空间当作物，我们习惯于不考虑空气的存在，除非空气开始缺少或像在中国发生的——其他地方也一样在发生，空气污染已经成了问题。但作为常态思维，空气就什么都不是。这是为什么我要用空这个例子。

我在这个小小的个人体验中所描述的客体，它的这一头，你是有份的，你的身体是该物的外缘边界——这样定义本身，就说明这客体是个可变的量，因为你能进能退；另一头呢，悬崖或屋顶的边缘，它是不动的。它在那里只是为了指出这个客体的方向（意思）和延伸。是这，令人晕眩，我曾带到过一句的。

晕眩，在于无法抵抗意思的召唤，我用西尔维娅·布拉特的故事，想告诉你们的是这个。就物理而言，你们可以怀疑晕眩时，有个“空”召唤过人或物。但相反，对这边缘作为边界的拒绝、对构成这边缘的一切的拒绝，这是对意思的一种召唤（经投射而被主体认为是空对他的召唤）。

所以，在精神分析的日常实践中，重点不是简单知道病人“想说”什么，

而是作为他说的材料，他所用到的词，留下些“什么”。这种非常模糊的、无法清楚地以语音发出的“什么”，我叫它 *sens*，意思或意义。

如果我能允许自己给你们做个四天来不曾允许自己做比较——因为这得涉及所有这些画面的展开——我相信可以说，移情中的精神分析师就是在“空”这个边缘位置上。至少是这样，我才能略微理解，为什么涉及病人与分析师之间的性关系，会有那么多的禁忌。

这类事当然也是会发生的，但移情的某些性质使得这样的事即使发生，也让人不知如何去想它才好。我冒险说了这些永远都不想被发表的话，因为事实远远比我现在能说的要复杂。如果说精神分析师这个所谓的小他者、类似者，在移情中也处于大他者的位置，是相异性本身，那么，跟他或她发生直接的身体接触，其危险无异于在宗教系统中，与圣体的直接接触。

“圣”（*sacré*）既然是“绝对”，就牵连到或者说包含着“区分”“分离”（*séparer*）。即使最为大胆的人文，都不敢太拿这类区分与分离当儿戏，不应该将这种分离弄到消失。

我停在这里，不再继续冒险于如此棘手（*scabreux*，同“淫秽”“危险”）的领地——除非你们的问题将我推向更深处。

4 问题 4：意思和涵义发生在所指层面

学员：关于老师刚才讲的意思和涵义，我能不能说一下我的理解，不知道对不对？涵义是在语言内部的……

GLG：呃，嗯……

学员：意思呢，是指向客体的。

GLG：啊，不是。

客体当然在语言运作的问题中有所作为，但它既不是意思也不是涵义。意

思与涵义之间的这个区分，只活跃在所指这一层面。

当你说话的时候，你在排列信号，能指在时间链上依次排列。事实上，它们是瓦片或鱼鳞那样叠放的。有叠放的时候，它们就不只是逐个排列。

但这样一来，就有其他的事会发生。不同的所指汇聚、凝结到一个涵义上。涵义的依次出现，生成涵义。从它们互相不同的表象中，悄然而成为一个整体的涵义。这些涵义的依次出现，给出意思（方向）。

5 问题 5：话语的音乐

学员：昨天，老师讲到主体面对客体的真正问题是“我对你来说，到底是什么？”老师说主体所能得到的回答永远都不会是他要的，“因为他者有他自己的回答”。

姚洁：他者的回答是从他自己的兴趣或利益出发的。

学员：对。然后，这个得到的回答，实际上是主体自己想象的？

姚洁：这里有另外一个时间：因为得不到能让我满足的答案，想象就出来填补。

学员：这有点像我这几天听课的感受，包括很多其他同学提问的时候。因为有些问题也是我想问的。老师回答的时候，有些跟我想象的接近，有些跟我想的不一样。

姚洁：所以……您现在的问题是……

学员：所以……让我想一想，刚才还……

姚洁：我先翻译？慢慢来（翻译结束时，学员还没能组织出问题。姚洁笑）。那么，就解决了？

学员：没有解决。这也是我有时候在分析里遇到的情况。

姚洁：您自己的分析还是您接病人做的分析？

学员：和病人做的分析。有时候我听懂了病人正在说的是什么，但有时候，我又很怀疑，不知道我听懂的，到底是不是他想说的。

姚洁：那怎么办呢，这种时候？

学员：这正是我想问的。就像听课，有时候我感觉自己听明白了，像刚才那个问题，但同时我又怀疑自己的理解对不对。所以这种情况，我想知道怎么做比较好？

GLG：如果我能允许自己给您一个建议的话，那就是：听懂病人想说什么显然很重要，但更重要的是要抓准（*capter*，“截取电话、电报”“接收电波”）要点，要捕捉，不是听懂，而是捕捉他用来讲那些我们懂得那么少、懂得那么不对路的，是什么字。

这是为什么，与其时不时地陷入怀疑之中，不如试着不要去听懂他，而只是简单地去听话语的音乐。

如果您一味地只是在听意思和涵义，您永远不会对音乐敏感，而很多涵义是通过音乐来表达的。抱怨，当然首当其冲。抱怨，首先就是某种语调、某种我们说话的声音，不管我们说的是什么。但怒气也是指责。

在说辞这个意识层面被压抑下去的涵义，只会从音乐中出来。所以，有时候应该像法语说的，“一脚踩到饭盆里”（等于“来吧，直奔主题！”），为病人点出他话语中的音乐。

您肯定很担风险，可能说错话，但他至少会明白，您很留意在他想尽办法说着的那些东西之外的东西。因为他终究会以某种方式知道，他在说着的，恰恰是想要蒙过您也蒙过他自己的某种东西。

所以，在他意识到您也在找其他什么的时候，也许会对自己说：“好吧，跟着他/她做，我也许有机会能走得出来。因为他不让自己被我讲的

故事困住。”

6 问题6：适应性问题的

学员：现在在中国有种说法，关于哪些人比较适合做精神分析。就是说精神分析比较适合那些“四有”的人：有钱、有头脑、有时间，还要有意愿。其中有头脑还有个解释，分三种能力：要有能力承受焦虑，有能力做自由联想，最后要有自我分析的能力。这位学者还经常在说，中国的现状，自我分析的能力这部分，大多数的人都不具备，所以……

姚洁：好吧。说说您为什么要支持他的这些观点？

学员：我没有支持，只是想把这些说法带过来，想知道老师是怎么想的。因为我们经常受这些信息的影响，有些跟这里听到的很不一样。

GLG：我很高兴回答您的这个问题。

我想，有关精神分析适用问题的种种说法，历来存在且任何国家都有，是彻底没用的东西。它们只有一个功能，就是抑制实际操作的人，好让年轻的分析师懂得尊重大师的智慧和他所属机构的权力。我希望你们理解，我与这种思维方式抗争，已经有快40年了。

当然，它们听上去很……怎么说？很理性。

精神分析不是用来处理全人类的。我甚至倾向于认为，至少就法国来说，它在文化上的成功是被夸大的，而这夸大已经令精神分析的实践变得很复杂。但这是另外一回事，我不打算在这里跟你们讲今天的法国。

回过来想象一下，您刚才所讲的这一整套有关适用人群的指导会怎么运作？我说它们只有一个目的，就是吓倒实际操作的人，跟他们说：“当心！你正要落入一桩很花时间的东西，跟那个人你会很难脱身的！”而这腔调，恰恰是那些不会做父母的，看到女儿想嫁的不是他们想要她嫁的人所说的话！一位多少比较得体的长辈，我们指望从他那里听到的忠告，却是：“我的儿子，我的女儿，你选了这个人，就跟她/他好好过，你是幸福的。”

所以，我知道唯一可以解说“适用”问题的，是当您收下一个不管来找您做什么的人，经过一段时间后，您觉得精神分析会适合他，或至少，因为 x 或 y 的原因，您很有意愿想跟他做一轮精神分析，那就去做吧！（现场沉默）你们会看到最终的结果如何。

这个位置上，即使官能症与精神病的区分，在我看来，也没多大意义。

我接过危机状态下的精神病人，不多，但特别记得有个年轻女子精神病发作时来找我，已经处于不吃不睡的状态了。我在一个星期里每天见她一次，因为实在弄不懂她究竟出了什么事。一个星期之后，我让她去了圣·安娜医院，那是巴黎最大的精神病院，我有个朋友在那里负责急诊部。在那种时候建议她做精神分析或是一周见两次，会是完全的荒唐。

相反，有过我认为结构上是精神病的，最终建议了他沙发床，或没建议他，那是另一回事。多少年过去，我还在见他们。因为精神分析的结束，在官能症和精神病结构之间，有颇为敏感的不同。同样地，移情问题也颇为敏感地有所不同。

有位同事，我的一位老朋友，叫让·阿鲁什（Jean Allouch），他写过一篇很精彩的文章，有关精神病的移情问题。他在文章里指出了一个大事实。

你们一定知道弗洛伊德应该说过，精神分析是针对官能症的，它对自恋型官能症，也就是说精神病，做不了什么。我不能苟同这个意见，阿鲁什也不同

意，但他所指出的这个事实非常简单：在官能症，移情首先是由病人指向分析师的；而在精神病那里，移情首先从分析师指向精神病病人。

我要是说错了，你们尽管纠正，但我认为，只有我们自己对精神病非常感兴趣，才会做精神科医生。在更宽泛的层面上，甚至可以说，对疯狂有兴趣。因为不是非得精神病才是疯子，有些官能症，以他们自己的方式，会比精神病还要疯狂。

但是，如果我们不是每个人自己对疯狂抱有极大兴趣，甚至是维系生命的兴趣，我们不会在这里。跟这种极具情感的实情相比，那些所谓的精神分析适用症或适用人群，实在是愚蠢而不足理论的。

所以我建议你们听到这种话，忘掉算了。

2013 年 11 月 5 日上午

第 18 讲 诗的韵律、移情之爱

关于分析的适用性，您刚才提到的第三个问题，我得做两个小小的补充。第一个与我相关，是过去很久的小趣事。

还是拉康做我督导那会儿，我接了个四十来岁的男子做分析，因为某些我不打算在此展开的原因，这人让我很没有好感。

当然，我认为我可以完全不对他表露任何情绪，把分析好好地做下去。但几星期、几个月过去，我发现分析进行得很不顺畅。某一天督导时，就跟拉康解释说，我收了个人，一点儿都不喜欢。拉康说：“当然，您不是接他来做分析的！”

我说：“没有！我就是接他做分析的呀！”

拉康说：“可这简单得就跟打个招呼一样！您要不想接一个人，就不该接的。”

关于分析适用性的第二个补充，不知你们有没有听说过，美国在 20 世纪 60 年代有个“YAVIS 症候群”的说法？YAVIS 是这几个字英文第一个字母的缩写：“young 年轻、attractive 具有吸引力、verbally fluent 能说、intelligent 聪明、sophisticated 善辩”，似乎大致吻合您刚才给我们的分类，只是更像漫画、更夸张而已。所以，值得看看事情的荒诞性。

因为，即使某一天您遇到一个所谓的“YAVIS 症候群”，您要是没这个想接他的欲望，不接就是了。

我就这样点到为止了，但很愿意你们知道这个“YAVIS 症候群”的存在。这类东西都在假设理想的病人，但理想的病人是不存在的（提问学员：非常感谢老师的回答！）。

1 问题 1：诗的节奏算不算能指？

学员：关于诗歌。中国有唐诗和宋词，宋词是长短句，读的时候，放松，感觉到一种韵律。

GLG：是。

学员：这种节奏能不能算一种能指？

GLG：绝对是！没有一点点可以怀疑的乌云。

乐感，作为这类诗词的第一目标，理所当然地属于能指的材料，有它的可书写性和音质。

韵律的乐趣、声母叠出而带来的乐趣，以及其他美学上的乐趣，都建筑在能指的不同属性上。

这几乎就是拉康理论的说明：所指只是跟着而来。有时候，所指本身会很古怪，但能指所带出的音乐上的快感，超越一切。比方在英语里，有一种叫 limericks 的五行小诗，意思几乎荒诞，整首诗只停留在声音上。

我肯定，音律之趣存在于所有的语言中，否则，人类几千年前就终止说话了。开个玩笑。

2 问题 2：关于“缝隙”

学员：还有个问题，关于庖丁解牛中的“缝隙”，是不是链接？

GLG（犹豫）：这问题总是相当复杂。

庄子的故事，按法国流传的说法，容易让人推测说，在语言的链接与真实世界的链接之间，有个直接的关系。你们可以了解我想说一种“相符”“相当”的对应关系吗？因为故事导致这样一个很平常、又一次普遍到全人类的历史中都有的念头：谁完全掌握语言，谁就完全掌握世界。我猜很多人对这位中国经典文人的理解是往这个方向去的，就是说，对大量信号的了解，意味着能比旁人更好地在真实世界中区分出这些链接。

你们看，这意味着第一天我讲到索绪尔所提出的“目录品名表”这个问题出现了。如果一词对一物是真的，那么是的，这种想法就成立：语言之刃可以击入真实链接本身的空处，丝毫无损。完全掌握语言的那个人，完全掌握世界。但整个现代语言学都是反方向的：它为我们提供的任何一个链接系统，开始时都绝对不对应真实世界本身的链接¹⁴。

正因如此，每个人都会感觉到即使他说得很好，即使他把一种语言掌握得相当精到，在真实世界中他肯定会比旁人定位明确，但他了解的，并不真的是这个世界本身。语言和世界之间，还是留有一重浓雾。

这是为什么我觉得“缝隙”这个词用得合情合理。因为“缝隙”在法语里要比“链接”偶然得多、意外得多，更多是由事故引起的。

我的肘、肩，是我的关节（articulation，同“链接”）。要是我的手臂折了，就像我曾经遇到过的，那就是骨折（fracture，同“缝隙”），而不是一个正确的链接。

要经历过极为大量的精神缝隙或骨折，我们才有可能多少知道一点什么是

¹⁴ 虽然立足于“生有涯”而“知无涯”，不足以理清楚知识并非真实世界本身，庖丁的案例描述所邀请我们“知止”的位置，恰恰在这个不对应上：“虽然【尽管如此】，每至于族，吾见其难为，怵然为戒，视为止，行为迟；动刀甚微，謦然已解，如土委地。提刀而立，为之四顾，为之踌躇满志，善刀而藏之。”换言之，庄子这一篇本身的论点与论据之间，已经有相当微妙而根本的不对应。译者注。

真正的关节，或者说链接。

3 问题3：事物与规律

学员：在事物背后都有一个规律，这个规律是什么？

GLG：事物背后？

学员：这是不是属于涵义的范畴？这些算不算“链接”？

GLG：……我不知道怎么回答您的问题，因为您说“事物背后有些规律”，我无法领会“背后”这个词是什么意思。

学员：一些现象里面有些不同的元素，可以总结出一定的规律。

GLG：是啊，当然。

学员：比方说，中国有句谚语说，“燕子低飞要下雨”，这是一个现象。在它后面，会有些规律。那个算涵义吗？

GLG：啊，是，这是的。

姚洁：老师是就这句话说，是的，它有个涵义。

GLG：总之，我们不知道燕子懂不懂要来的是什么天气，但我们很久以来就在做着这类关联。

这句民谚所描述的现象链，是一连串自然界的道理，一旦展开，实际上要复杂得多。燕子吃蚊子，天要下雨的时候，蚊子飞得比较低，因为气压低又有水汽在翅膀上什么的。所以，燕子要低飞去吃飞低的蚊子。什么都不能保证它们在直接跟我们说：“呜呼——明天要下雨了！”（全场笑）反过来，它们知道哪里有蚊子，是肯定的。因为对它们来说，这是生存问题。

你们看，我们完全进入到第一天、第一课，我给大家讲解的荣格与琼斯就“信号”的区别：以荣格的方式，我们可以说，燕子低飞指示着“明天，下

雨！”而琼斯说，对不对，有那么多中介在，不要忘记蚊子！

谚语忘记了蚊子。人们用了很多的时间，才弄明白燕子吃蚊子的这一环。这是科学的进步，或许也是乡野常识。——乡下人很知道有蚊子，他们是编织谚语的高手，只是常常爱省略。他走捷径，造成能指短路的后果。

你们看，知识与知识的链接，是随时间而演变的。

4 问题 4：回到“切”

学员：精神分析师与病人的相遇，或者说，分析师的那个“切”，是分析师给出的答案吗？还是两个人的？

姚洁：答案？什么问题的答案？

学员：就是说，我给一个病人做分析，那么这个答案是什么呢？答案就在我跟这个病人的相遇里，就是我在分析中的“切”。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在这个相遇或“切”里所产生的，我能不能叫它“所指”？

GLG：呃……您看，我不知道怎么回答您的这些问题。不是我不明白，但这些问题让我措手不及。我不知道……

您的问题让我真的了解到我们之间的链接或循环，要不同到什么地步！我觉得不可思议、几乎是魔术般地，我们以这种方式达到了相互的意见统一。

我之前的准备比这要糟。你们能从我这里听懂多少？我又能听懂你们多少？都很成问题。在我有所实践的其他语言，英语或西班牙语，都有过这类经验。我因此会试图在一篇短文里，以“冲突”这样一个极普通的词为例，来解释发生在英语与法语之间的差异。

但对我来说绝对是最基本的能指与所指的区分，你们却完全没有概念……

这让我想起20来岁时我学语言学与符号学的年代。

我那时开始做关于历史学语境中的信号运作的论文。这篇论文我一直都没完成，因为在这个过程中，我成为精神分析师。但能指、所指、涵义与运用，就知识层面来讲，我就像是生在其中的。拉康教学立刻就吸引住我的原因之一，不仅是他非常清楚地抓住弗洛伊德所说的精要来做重新阐述——这本身当然让我很感兴趣，但更重要的，是他酝酿出一整套思路，当年被我们称作“能指理论”（*théorie du signifiant*）。

我那时还同时在研究不同的语言学家及符号学家有关能指的理论，就以为可以将两者结合起来。我用了四年时间才弄清楚，这是不可能的。但我得告诉你们为什么。

先要说明，意识到我无法结合这两种能指理论，当时对我是个很大的打击。我很爱当时作为我符号学导师的阿尔吉尔达斯·朱利安·格雷马（*Algirdas Julien Greimas*）。某一天，我去跟他说：“先生，我想做精神分析师，所以，我得中止我的符号学研究了。”

他对我叫起来，说：“这是什么话！您都快做完了！”

我说：“您不明白我没法做完？因为我想要结合拉康与您的理论。”

于是，他说：“啊！要这么说来……”（现场笑）

这件事对我是很残酷的，因为我一样地爱着他们两个。所以在刚开始时，就梦想把两个都留住，在他们之间实现某种流通链接，产出一套漂亮的大理论。但我做不到。因为他们各自所支持的“主体”这个概念，是完全相悖的。

我希望你们能猜到，主体在拉康那里，从来就不是一个施动者：一句话、一个动作的主语不是它，行为的起因不是它，对行为动作发号施令的不是它，是行为动作所留下的。而符号学这边呢，考虑主语（*sujet*，同“主体”）的经

典方式，就是视其为动作的起因，比方动词变位就是跟着主语走的。

相反，对拉康式的精神分析来说，主体只是能指产品的后果。

我完全不打算再一次就此展开长篇大论，只是想告诉你们，当我发现两者之间互不相容、没有任何希望同时落在两个立足点上时，我得选择我的阵线。结果是，我放弃成为符号学教授的可能，成为拉康派的精神分析师。旧的不去，新的不来。

5 问题 5：督导与分析

学员：老师您为什么没有要拉康做您的分析，而只是请他做您的督导？

GLG（笑）：啊！

首先有个官能症上的原因。在童年、青少年时期，我跟父亲没有发生过很多问题；相反，跟大我八岁的一个哥哥，我们的关系非常复杂，有爱或恨，甚至嫉妒，很强烈。强烈到要跟一个人做分析时，我找的完全不是一个父亲形象，比方当时的拉康，而是一个年轻得多的分析师，笼统来讲，大致就是我哥哥的年龄。开始完全没有意识到，但一段分析做下来，这是明摆着的。

其次，当我想要开始的时候，有个好朋友正在跟拉康做分析，每场付拉康 100 法郎。我付不起这个价，也想象不出为什么我的价格就得比我朋友低。所以，我就去见了一个不太有名的分析师，他要的价钱便宜得多。我那时有个念头（而且始终有这个念头）：一个精神分析师就是一个精神分析师，没什么“更好的”精神分析师。

当然，说到底，这是个错误的念头。因为糟糕的精神分析师还是存在的，但在名声之外，没有任何办法知道谁好谁糟。我尤其偏向认为，虽然年轻的精神分析师做一大堆我们可以认为是错误的事情，但他们至少可以跟年长的分析

师一样出色；倒是年长的分析师，通常知道太多，有缺少好奇的风险。而好奇实在是让马达运作的汽油。走长程是要很多汽油的。

所以，不要小看年轻的精神分析师，说他们没有经验。他们是没有，但正是这些没有，才是构成好奇的基础。如果他们执着于这事儿本身，执着于这个以接纳移情而生的实践，就能允许移情自由发展，不对它妄作指点。

我是之后才去找拉康做督导的。那时已经有了几个病人，有一点点钱了，我也没有忽略声望这个维度。法语里有句谚语说：“宁肯跟神也不要跟那些圣人打交道。”但我可以告诉你们，我每周一次，跟拉康做了整整五年督导，他从没有一次、一句话，讲到过所谓的“拉康理论”。

有一次，我从他的一个研讨会里讲到的图表出发，在巴黎弗洛伊德学院的大会演讲。拉康本人在场，所以也听了。之后的督导中，他问我：“您是从哪里找来那图表的？”

我回答：“是从您的一个研讨会上呀，先生！”

他回答：“是嘛！”

所以，他从没有想要将自己的决定直接强加给我。督导中他唯一关心的，是我跟这个或那个病人所维持的关系。在这一实践中，他明确认为，用法语就足够了。

这并不是说在个人或多人的督导中，我们用来互相交流的技术用语毫无价值。在我看来，术语一旦达到一定数量，我们就不再真正的交流了。

6 问题6：移情之爱

学员：我想触动一下老师的禁忌。我设想一定有一位女病人，是向老师表达她是真心地爱上老师的（现场笑）。两个人之间产生的

是真正的爱情。那么，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下，老师是怎么把分析做下去的？

姚洁：你怎么知道得这么多！（现场笑）

GLG（也笑）：好吧，……啊！首先，不是这么回事（全场笑）。但我还是会回答您的问题。

因为说到底，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那么“不是这么回事”。当然，我得再给你们讲个小故事，多少年过去了，我都没再想起过它。

那时我做精神分析师有个五六年了，接到一个年轻女子，从第一场我就注意到她的嘴、面部下方，很像一个人，像几年前我曾热恋过的一位年轻女子。我注意到这个，但并不认为这对我有什么重要性。分析开始了，几个月过去，没什么特别的。

但某一天，正是我做 *passe* 那时候，这可不是个小细节。我在接待她的时候注意到，不知何时也不知道是怎么开始的，我发觉我在爱着她。我立时感觉很窘。这是我第一次碰到这种事。我当然什么都没对她说，但也不知道该怎么办。这样过了大约有几个星期，我跟谁都没有提起，但也不知道怎么走出这个困境。

但，故事结束得还不错。

记得是个星期六的早晨，在她的分析过程中的某个时刻，我做了个很长的干预。一定是有我的理由的，只是我已经想不起来了。在以往的分析中通常我很安静，只用非常短小的句子做出干预。但那时候，我忽然冲进一个没完没了的解释里，解释得笨手笨脚。我大致记得涉及的是 Cronos 神（时间之神，在母亲指使下阉割了他的父亲），是她先提起的。

到这场分析结束，告别时，我忽然发现自己已经完全不在对她的爱恋之中了。分析就这样又继续了四五年。

不要太追问我这一天究竟出了什么事。一定要说的话，像这样演讲，我的

活动完全在爱恋的框架之外，在那种将我维持在抑制之中的沉默之外。

在这个故事里，是抑制将旧爱复燃。

在法国，炽爱的经典形象，是当你把手伸向另一只手，这简单的一个动作，足以令另一只手向你伸过来。所以，您真正的问题，如果我没有理解错，并不直接针对移情之爱，而针对着分析师对移情之爱所给出的回应。

关于这个问题的解答，我只能带你们去看弗洛伊德的文献，看他在这一点上是如何暧昧不清或模棱两可。

我希望你们有机会读一下弗洛伊德的一篇文章，叫《对移情之爱的观察》（《Observation sur l'amour de transfert》）。在这篇文章里，弗洛伊德解释移情之爱的种种根源。他说：一个年轻貌美的女子，怎么就会爱上个丑老头呢？他就罗列了好几个理由，首先他认为是个错误。

你们记得，弗洛伊德的 Übertragung（移情），是从一个意象到另一个意象的过渡。所以，对弗洛伊德来说，移情之爱一上来就是童年的、幼稚的爱的重复，它尤其是阻抗分析展开的一种自我防御，一种拒绝进入分析工作的方式。

好吧，我忘了一定数量的其他线索，都绝对是否定的。最后弗洛伊德说：然而，所有这些，在常态的爱恋里，是一模一样的！

所以，这篇短文的结论是说，事实上，移情之爱，是……我给你们德语的说法，因为它让无数人泼洒过很多很多的墨水（板书）：Eine echte Liebe, a true love（一个真爱）。

你们对弗洛伊德的暧昧大致有个概念了吧？我概括一下他的推理：首先，移情之爱是个错误；但所有的爱都是错误；所以，移情之爱是真爱。你们自己拿这看着办吧！（现场笑）这不是我说的，是弗洛伊德。

这答案是否能让您满意？对我来说，这是最重要的。

学员 1: 非常满意!

学员 2: 这让我想到一句话: 爱是重要的, 但爱的对象可以随便是谁。

GLG: 啊, 这是拉康相当有名的一个说法。对爱的一个定义, 是说: 爱, 是给出我们所没有的 (L'amour, c'est donner ce que l'on n'a pas)。

当我们给出我们有的, 是庆典与欢乐。在众多的庆典与欢乐中, 可以是性的庆典与欢乐。但, 这话说得够真实: 爱, 更多的是给出我们所没有的。

(现场沉默了很久)

某学员: 如果没有, 怎么给?

GLG: 这恰恰是爱的问题。

我跟你们讲了很多的零、空的位置、无、空, 等等, 你们应该奉献给爱人的, 正是这些。为了能给出这些, 通常来讲, 也得要给出很多很多其他的东西。但你们知道, 如果只是馈赠, 爱是不会跟过来的。爱, 得是馈赠之外的什么东西。

7 问题 7: 两场分析之间, 分析师怎样调整自己的状态

(课间递上来的书面提问之一。)

GLG: 啊! 这很简单。呃……(很久的沉默)

有时候, 没这么简单。提问的同学, 您讲的可是英语里说的 over crossing? 我不知道法语用什么词来讲这个。意思是说, 当您接待下一个病人的时候, 您还在想着前面已经离去的那个病人。

这是您自己的“切”没有成功的证明。

当然，这是会发生的，而且我也不知道有什么规则能让这样的情况永远不要发生。我的常态，是病人一个接着一个，两个之间几乎没有什么时间。但我始终都有个运作系统上的设置。

进来的门始终是开的，病人可以直接进门到候诊室。他自己进来、安顿下。约会的时间到了，我打开另一扇门，将他迎进另一个房间，里面有沙发床和椅子，没有一本书。然后还有第三间，分析结束时病人从这里出去。这一间相反，有很多的书、我的电脑和其他东西。

出去的门，通常来说，能让出去的人看不到在候诊室等待的人。有时候我弄错时间或病人弄错时间，还是会发生两个病人相互碰上的情况，但非常罕见。所以，通常我跟一个说“再见”，打开另一扇门，跟另一个说“您好”。

我可以向你们保证，大多数的情况，我不会去想刚刚走掉的那一个。直到下一场开始，我根本不会去想他，除非是梦到，或在写什么的时候想到。我当然是会想到病人的，但不是强迫的，恰恰是因为我希望重现刚刚分手的那一个时刻，我还能在老地方，找到自己在她离去时的状态。

我给你们解释过，为什么我很不看好分析师跟人谈论自己的分析者，不管跟谁，当然，督导的情况除外。因为您跟别人，朋友也好、同事也好，谈起一个病人，再面对这病人时，会有看法改变的风险，远离他的在场、远离他正在向您传递的语言。

不是说这样的事不会发生，也不是说永远不该这么做。但在我看，很简单，越少发生越好。

8 问题 8：每场分析是否要做笔记

（书面问题：是不是每场分析都要做笔记，有没有什么规律？）

也是同样的回答。这问题我没有任何建议可以给什么人。因为我是个不会做笔记的人，即使是听讲座。记忆里能留住多少就多少。就算我做笔记，事后常常不知如何念它。但我认识些记笔记的强手，尤其现在有人到哪里都带着手提……呃，不是在说你们，但现在真的有人是带着手提电脑去听讲座的！我真羡慕他们（现场笑）。

不过我记得有个朋友，总带着个录音机。他很喜欢思考，想到什么他就对着他的录音机说。当我跟他讨论事情的时候，他会说：“等一下，我考虑过这个！”于是就开始找磁带，找了好几分钟，然后又好几分钟过去。我说：“忘了你的磁带吧！记得什么就跟我说什么好了！”

他说：“不、不、不，我那时候说得很好的！”（现场大笑）

就这么回事。病人在说着的时候，如果做笔记能帮到你，就记呗。但如果记笔记影响你好好听他说话，那就别记了！给你自己的记忆一点点信心吧。

我有过一时间想不起病人叫什么的时候，这很烦，但并不是个很严重的问题。这就像口误，是个“行为之误”（acte manqué），我会把这当作我梦到这病人一样来考虑。

当然，有时候会比较复杂，因为有些人的家庭组成很复杂。当你弄不清不是他爷爷的堂兄做了这个或那个，不如好好问他。因为，就算你曾记下，不是这笔记不在手边，就是你寻找记录的翻纸声干扰到他。

所以，给自己的记忆一点点信心吧（极为热烈的掌声）。

2013年11月5日上午

第 19 讲 出位、算命、撒谎

现在开始，在法国就叫“额外工作时间”了（现场笑），要贵得多！（笑声）但我免费加这个班，因为跟你们一起工作是个乐趣（现场笑）。

好吧，第一个问题是什么？

1 问题 1：有关“出位”（acting-out）

学员：我有两个问题，第一个就是关于 acting-out 付诸行动。因为荣格和他的来访者也发生关系……我的问题是这样，就是昨天晚上看《拉康精神分析词典》，台湾版的¹⁵。在“acting-out”这个词条下面，它认为克瑞斯，就是那个自我分析学家，有一个分析没有做到位，因为他那个来访者在克瑞斯的分析做完之后，就去吃了新鲜猪脑，（这个案子）叫作“fresh brain”。

姚洁：这是在我们第一期培训中，特里斯坦·加尔齐亚-峰思（Tristan Garcia-Fons）院长讲过的一个例子。

学员：对，对。那么拉康认为分析之后他（来访者）会去吃新鲜

¹⁵ 出处不明，提问学员在现场也没有坚持。拉康从未出过词典，法语出版物中，至今没有关于拉康的词典。台湾版有行人出版社沈志中、王文基所译、尚·拉普朗虚（Jean Laplanche）与尚·柏腾·彭大历斯（J.-B. Pontalis）合著的《精神分析词汇》[*Vocabulaire de la psychanalyse*]，但其中没有给拉康很多位置；acting-out 词条中，也未提及克瑞斯一案。原作者及译者注。

猪脑，是因为他（克瑞斯）诠释不到位，所以他做了这个 acting-out，我的问题在这里：是不是诠释到位了，就不会有付诸行动了？

姚洁：故事不是这样的。我可以翻译，但你对事情不清楚的时候，就很难进入讨论。

GLG（对姚洁）：我来回答他。

首先，得找到 acting-out 这个词在弗洛伊德那里的出处，是德语的动词 Agieren 被译成英语 to act out——你们应该知道，out 在英语中不单是指“外面”。如果我跟一个人说“speak out!”，不是“出去说!”，而是“说出来!”“你讲呀!”——Speak out! 说出来! 讲清楚!

To act out 就是这样一种情况，请想象：一出戏将要上演，演员们应该要在舞台上做些什么，但导演一遍遍解释，他们还是不明白。这时候，导演就爬到台上去指手画脚起来。Then, he's acting out.（那么一来，他就正在出位。）

To act out 是实施，用话已经说不清，就“用行为来表现”。

然而，如果我们重提特里斯坦已经为你们讲过的“新鲜猪脑”（cervelles fraîches）故事，关键要弄懂，拉康责怪克瑞斯（Kriss）的，是他没听到病人在讲些什么。

是什么呢？

病人对他的分析师说自己是个抄袭者，说他写的东西，是抄别人的。克瑞斯没有听进去，他没有邀请病人对这句话再说些什么，而是要他把他写的和他认为被抄袭的文章带来。对比之后，克瑞斯对病人说：“我两个都念过了，您没有抄，两篇文章是不同的。”所以，他引入一个外部的事实因素和自己对事实的判断，取代了病人跟他说的话。

我向你们保证，这是永远都不要去做的事。你们得对病人说的话抱有信心；即使，他跟你们撒谎。你们要是去找出些事实因素来锁住他，像警察抓小偷那样，要他知道所谓的客观事实，就是把他的话踩在脚下在走。因此，你是向他显示，对他正讲的什么，你充耳不闻。

是在克里斯对他病人说了“不，您没有抄袭，我亲眼看过”之后，病人某一天说：“啊，对了！分析完出去，我去一家餐馆吃了新鲜猪脑。”这是以某种方式在对他的分析师说：“您看，我继续是个抄袭者，我吃别的脑子。”但你们要知道，尽管拉康对克瑞斯的指责很严厉，但是既然克瑞斯讲了这个案例，说明他已经明白自己做了傻事。

就这个故事的点评，我不打算走得太远，但有件事想跟你们提一下。实际上，是我们这代人制造了“新鲜猪脑男子”这个案例。

拉康的评论在他的几个研讨会中一带而过，原本很简约。但20世纪70年代中期，我的几个朋友就此出发，从研究克瑞斯的文章，一直到想去了解20世纪60年代的纽约，看究竟有没有卖新鲜猪脑的餐馆，诸如此类，做了一系列的工作，来建构“新鲜猪脑男子”这个案例。

讲这个细节是为了告诉你们，一个案例并不总是由它的当事人建构的，通常不是这样。比方精神医学界的某些知名大案，都是依据精神医学的不同学说，经过再演绎才最终产生。

一个案例最终能成为案例，是当某个故事找到了一定解释的时候。但acting-out这个问题始终是精神分析师之间发生分歧的一个因素。

当弗洛伊德讲到Agieren时，又一次，是在同一篇文章里用了三个不同的动词：Errinnern，“想起、记起”；Wiederholen，“重复、反复”；Durcharbeiten，

“酝酿”，to work through，实施一定的精神活动，经历一定的思想工作。弗洛伊德在这篇文章里说，在精神分析治疗中，有三种重要的表达模式：我们可以想起、记忆起，这是第一。第二，我们可以尝试精神活动、思想工作。但是，当既想不起又不能以精神活动替代时，就只有第三个可能：付之以动作或行为了。

我不会就此再给你们讲上几个小时，但如果我再讲一遍克瑞斯的故事，是为了强调这个点上的价值：病人一个冲动进入到某个 acting-out，是因为有些什么，分析师没听进耳朵里。所以，对 acting-out 做任何解释都是没有意义的。于事无补，还会让病人对自己刚刚做出的事情心生负疚。而负疚感，通常而言，已经太多，没必要再添新的了。

相反，作为分析师的你，在这样的时候有太多要去理解消化的东西：你的病人正在给你信号，想让你知道你听不出来他曾试图想要告诉你什么。

学员： 嗯……那我就比较怀疑，如果我们把那个 acting-out 解释得很清楚之后，是不是它就没有这个行为冲动造成……

姚洁： 没有办法解释。字的解释很容易，但字以外，有发生的事情……

学员： 我给他解释清楚，比如他不停地吃东西，他背后的需要，他的更深层的东西，他自己都没有意识到的，包括回忆这些东西。把这些都告诉他了，他就不都明白了？

姚洁： ……如果他都不知道，你怎么能知道？我们知道的都不算。

学员： 我把它言语化，把身体的……

GLG： 我通过其他问题、用其他方式，来回答您这个关于 Agieren 的问题。

如果我对您想要问的没有理解错的话，我们得换个角度，先解决病人那方

面何谓“动”的问题。

病人做出的行动，不一定是 acting-out，它也可能是个症状，是某种抑制的结果，或者某种生活习惯，其缘由您还一无所知。但它也可能是个 acting-out。弄错行动的性质，是很棘手的。

如果您对 acting-out 做出解析，将它当症状处理了，这时候想要停下来就机会渺茫。因为，跟克瑞斯一样，您以为是在为病人做出解析，实际上却只是一再向他显示，您听不懂他在试图告诉您什么。

这样一来，他只能不断地在 acting-out 里重复给您看。

2 问题 2：关于给来访者“留作业”

学员：有这样的现象，（第二个问题）就是治疗师给来访者留作业的问题，想知道老师怎么看。

GLG：我不明白。您是说，病人和分析师在两场分析之间，是否还要一起工作？

学员：No, homework.（不是，回家作业）

GLG：Ah, if they do some homework between the sessions?（啊！他们在两场分析之间是不是要做回家作业？）

学员：Yes, between the two sessions.（是，两场分析之间。）

GLG：But I answered this morning.（但我早上已经回答过你们了。）

I do prefer that no one, neither the patient nor the analyst, in my opinion, have to think a lot about what has been said during the session. Of course, it occurs from time to time, but there is no necessity in that.

My opinion is that it is worthless.

（我真的偏向认为分析师也好、病人也好，谁都没必要想太多分析说过些什么。当然，时不时地，说过的话自己会再次想起，但没有任何必要刻意去想它们）。

（我的意见是，想它也没用。）

3 问题 3：沉默的分析师如何能“承载”话语？

学员：我有些好奇，我自己从来没有做过分析，但是我可以想。就是在咨询的过程里面，如果这个分析师，他一直不说话，或者说，很少说话，而且来访者也不看他，这样的一种过程。我们原来在心理治疗里，把治疗师叫作一种容器，承载话语的容器，那么在这样的一种治疗里面，分析师他起的作用是什么？他是怎么发挥他的作用的？就是……他是以一种什么样的方式存在在这种过程里面的？

GLG：多谢！非常精彩的问题！嗯，承载话语……

你们有没有意识到，已经五天了，你们一直在承载着我的话？

整体来说，你们很安静，但，是你们的承托让我的话可以说得下去。精神分析师的一大功能，恰恰是这个。正因如此，他很安静。跟我在这里的情况相反，他不会讲述自己的生活，他接待来自病人的一切。

这功能意味着分析师“在场”的一定质地。封闭的、不怀好意的沉默显然不在我们这里所讨论的范围。换言之，分析师也在说话，根据学派及每个人的性格，会很不同，但尊重这一事实很关键：话语中有优先权的，是病人。

我想，每次当一位病人要求您更多地在场、更主动、说得更多一点，等

等，都是一个直接的记号，表明他对您邀请他/她做功的阻抗。

所以，在越少让他不高兴越好的基础上——没必要弄得人不高兴，您得设法让自己看上去不至于太过缄默，但让他/她多说一点。

拉康有个很漂亮的法语表达，我不知道能不能用中文翻译出来，他说，作为精神分析师，“我沉默在说的位置上”（je me tais au lieu de parler）。Au lieu de... 既是“在……的位置上”“取代……”也是“另外的”“不同的”。这句话的意思因此是：“作为另一种说，我沉默着”，而不是“我退出说的领地，保持沉默”。

学员：那我想问一下，要是这时候，分析师体会到这里面有种不愉快呢？

姚洁：分析师？

学员：对，就是刚才讲的那个，分析师感觉到一种不愉快的时候，那我不能让那种不愉快在那里……在那里待着，在那种不愉快里待着……

姚洁：您想要消除掉这种不愉快。

学员：对呀，那应该怎么办？

GLG：哈！

姚洁（对GLG笑）：她没做过分析，我……

GLG：（对姚洁）嗯，没关系。（对现场）呃……会碰到感觉不快的……但……唔……（姚洁笑）

学员（试图帮助回答）：比方说，我们在一般的治疗里面，可能会把它归为反移情，然后会和他谈这个问题。

GLG：当一个人跟您解释，他绝对需要您跟他多说些什么的时候，是您的工作，要让他明白到这恰恰是他官能症所导致的方向。

有些人不能接受，会走人，会说“我受不了精神分析了”。他们绝对有道

理，他们的确受不了，我们没什么可说的。

我们永远不能强迫什么人做精神分析。

4 问题 4：“镜像是所有对象的原型”

学员：镜像是拉康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我们自体心理学有一个叫“镜映”（镜印？l’empreinte du miroir），但我觉得这两个特别不一样。拉康有句话，就是“镜子里的形象是所有对象的原型”，这句话，我想通过它来了解镜像这个概念。

GLG：我理解。

我想拉康所讲述的镜像期会让你们吃惊。

因为我们总是自然而然地认为自我是人的内心。然而，肯定自我是建立在镜像的基础之上，来自外部世界，等于是说，正好相反，“我”，恰恰是主体在此丧失自己的地方，它自我丧失。它成为这个他者，而这个他者，将成为它的我。

要理解这个，得接受所谓“主体”与“我”之间一个性质上的区别。

我跟你们说过，“我”在弗洛伊德那里，就已经是那种舞台上很特殊的小丑，自认为发生的一切都是它的错，或多亏了它。将主体与“我”加以区分的这种思路，是与英美派系的精神分析截然相反的。英美派系强调 self（自我），正是有赖于杜撰出一个“假我”——显然是假设会有个“真我”存在。

如果你们这样考虑问题，将会发现自己不可避免地要重新落入有关好坏、真假的思维方式中去。而对拉康来说，假不在自我这边，真也未见得主体就有保障，完全不是。

真相只赖有谎言的可能才存在，这是话语正常的体制。

回到克瑞斯的故事，你们看，在他做着两篇文章对比的时候，他用的完全

是另一个概念的真相，建立在判断与感知之间的相互对应上。话语的真相与之不同：谎言与真相之间、欺骗与真爱之间，诸如此类，都只是交流与兑换。要经过所有这些，你们才能进入到病人的精神活动中，进入到他与自己话语的关系里。在那里，细密编织着他所有困顿的精要。

你们不必自己说很多的话，但你们得追紧分析者话语中的这个线索。如果你们跟得好，我想，你们不必将他淹死在建议里。他不会跟你们要那么多建议或忠告的（现场沉默）。我希望，我希望（沉默继续）。

5 问题 5：借用易经做精神分析

学员：要是没有人，我问一个问题？（现场如恍然而醒，笑声起）
我希望老师能给我一个忠告（先是一两个人偷笑，最终全场笑）。

GLG（也笑）：Sometimes I can...（有时候我可以给的……）

学员：我是这样工作的——因为我像荣格一样热爱中国的易经，那么，我跟来访者工作的时候，我实际上在这个过程中，一边在给他算命，一边通过算命的诱惑，让他跟我说了很多东西。然后在这个过程中，给他做精神分析的。我不知道这么一个操作模式，老师能不能给到我一个忠告。

GLG：好吧。很好呀！呃……这完全不是我做事的方式（现场大笑），我也一点都不喜欢“命”这个念头（突然沉默）。

想要知道我的命如何，先要等这一辈子过完再说。等着的时候，我不想知道。即使显然，我的命与您的一样，有其归宿。我感兴趣的，是玩偶然性的游戏，去做不曾真正预料的事。

如果有个星象家之前告诉我，我会来中国做五天讲座，我一定会很吃惊。就我对自己的了解，只要他这么跟我说，我肯定不会来。您看，我跟您的操作有多么不同！

反过来，我倒是很肯定一件事：您的操作大体上与我的一样有效，很大程度是因为您对这个操作很有信心。您接的病人应该能马上感受到，他们会对您很有信心。所以，整体来说，我可以想象这是行得通的。

但我还是希望，这五天里我尝试着跟你们讲述的，能略微分散一点您已经习以为常的思路。

学员：好，我回应您一下。因为我在问这个问题之前，实际上我已经跟学员们有一定的交流。第一天我向老师提问，到我问的最后一个问题，我就发现我跟老师之间，有一些阻抗。我就把我跟老师之间的这种阻抗，与部分学员交流。我说，我跟老师之间肯定有些什么不对。老师最后回答这个问题，我找到了一定的答案，就是：老师是个不相信命运的人！所以我就找到了这个答案（现场笑，提问学员压过笑声大声表达）。我想借这个机会跟老师……就是说，我觉得我跟老师潜意识的交流更精彩！
谢谢！（现场默契友好的笑声）

GLG（也笑）：好！

6 问题 6：我的学生撒谎了吗？

学员：我有一个问题，就是（与）小商小贩（发生的一件事）。我是小学老师，小商小贩说我有学生偷了他们 10 块钱。老师讲了说谎的三个层次，这三个层次让我迷惑了。我当时是相信我

的学生没有问题的，那时做了那样的处理。但是讲到的这三个层次，我是很迷惑的。我不知道哪个……是不是应该……判断那件事的一个真假呢？还是说……

姚洁：您是学校的老师，是做心理还是教心理，还是……

学员：做心理。因为带孩子们去做体验嘛，有小商贩卖东西，有两个商贩就说我学生偷东西，拿了他们10块钱。我就联想到这五天的课，说到说谎的三个层次。这三个层次我是没有搞明白的……

姚洁：这很不一样，我给您翻译过去。您的问题是……

学员：我的问题是我很疑惑，这说谎的三个层次，它是怎么来的？然后具体生活当中，就是我处理问题，我怎么能够感觉到……更真实一些吧，就是跟孩子这个互动，我可能……我特别害怕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会不会纵容了孩子？就是有这个东西，有这个角度。

姚洁：……您跟这个孩子不会发生这三句话，他只会跟您说“我偷了”或者“没偷”。

学员：他就是跟我说“我没偷”。

GLG：Yeah, yeah（是啊、是啊）！呃……

当我讲到谎言的几个不同时间，实际上，我并不是在描述一种个人或主观的生活经验。我没有直接指明，我是在跟你们介绍拉康的一个论证，其结果的重点在于解开那种将主体与知识抱成团的思路。

这与我们的习惯截然相反。我们习惯上甚至认为，我们主体最重要的功能之一，就是知、识。比方在您的例子里，要知道孩子究竟偷了没有。

但在“谎言三阶段”这件事情里，唯一有意义的，是指出当有人说“我

知道我撒谎”时，真正的回答之一，是对他说：“你相信你在撒谎，但实际上你无从得知你究竟是在撒谎还是讲出真相。因为我这个听你说话的对象，听到在你说的话之外还有别的东西。你想着你在骗我，也许却说着最真实的东西。”

您看，要到什么地步，我讲的不是您的实际问题。因此，您提出的这个问题，需要您来决定：您的信任更多在您学生这边，还是小商小贩那边？

学员：我学生。

GLG：您信任的是您的学生？您必定有自己的道理。为什么？

学员：是个感觉，我说不清。

GLG：但这，甚至不是感觉问题。

因为跟您的学生，您还要继续，而跟小商小贩，我想象，您是可以走过而置之脑后的。换言之，如果孩子骗了您，他的谎言会继续——他对您的谎言。

而这，比知道他究竟有没有偷 10 块钱这类侦探所感兴趣的真相，要有趣得多！所以在我看，在您向他给出信任的时候，您赢得了全局。

借您这个问题我们可以看到，常规下我们所听到的真相，其实带有很大的偶然性，我叫它侦探类或司法类真相。在社会生活中，建立事实真相一样也很重要。我曾顺带跟你们讲过涉及恋童癖的官司，正是出于同一个原因。

这是现今社会所提出的各种很残酷的问题之一。因为在那些事件中，涉及的就不再是 10 块钱，有人要为这类“真相”去坐好几年、十几年的大牢。

眼睁睁地看着所谓客观真相与话语的真相对峙，是够可怕的。

（现场沉默良久。姚洁：“……还有别的问题吗？”）

7 问题7：底线

学员：我感觉这已经不能算是个问题了，但还是想分享一下。本来想问这个问题，但听着听着就有点模糊了。我非常被那个“缝隙”吸引，心里有很多的联想。我就想着，这几天可能我们在不停地交流、不停地沟通，但是实际上，无法产生真正的链接。整个课给我的感觉就是这样的。我觉得一直继续处在“好像”的状态，好像明白，可好像还是很糊涂。一直到今天上午，好像这个缝隙在逐渐缩小。这时候我感觉好像明白了什么。我也在想，这个缝隙这么吸引我，实际上它带有某种神秘的感觉吧，而那种神秘的感觉，实际上有种恐惧（越说，声音越低）。实际上，这种恐惧，是我们……实际上要面对的……（忽然自己笑）我不知道我在说什么！（现场笑，有学员表达宽慰：“自由联想！自由联想！”很多人同时说话……）

GLG：听我说……

学员：我还是想试着……还是想找到我的这个问题。可能我是想问，所谓那个人际关系交往的障碍，是不是因为，当我们处于那样一个缝隙当中的时候，产生的那样一种恐惧感？然后这恐惧感，就让我们不能够……交流，或者是说……反正是这个吧？

GLG（沉默良久）：您的问题让我想到，非常肯定地，我们已经到达了交流的底线。不单单是钟表上的时间问题。

我做出不同寻常的努力，让自己可以被你们理解；你们也是，尽了最大的

努力，想要弄懂这几天我可能跟你们说过什么。通过你们中的一些问题，我很惊讶，看到我们达到了如此出色的沟通。但同时，通过大多数的问题——几乎所有问题都让我衡量出，我们在一个怎样大而又大的误会里。

我却真心感谢你们，刘先生、（姚）洁和参与这一培训操作的所有人。你们承担起这么大的风险，邀请我一个人来讲这整整五天的时间。

你们很清楚，一个人来讲一个上午或一整天，他能带给你们一个或一些知识点，你们在此之后可以整合或拒绝它们，尤其当你们处于同一个文化背景时。一旦改变文化与语言，事情就已经要棘手得多。而在此之上，还要加上连着讲五天，另一个风险开始出现。会有很多情感，而且会往各个方向去。

情感让我们有个印象，好像我们之间是完全理解的了。而实际上，什么都不能保证我们这一点。所有这些，还要加上一切都进展得那么令人愉悦——我希望这是我们双方的同感。

但我们永远不可能知道，你们不能，我也不能，这里的真相究竟是什么。

也许，我在这里讲的，几天后就化作烟云散去，只留下多少是种愉悦的几天来共处的感觉。或者，一个奇怪的念头会忽然冒出来扰乱你，让你几天、几星期都焦躁不安起来。又或者，它会打开其他的地平线？

我一无所知。但正因如此，我要就此打住了。

我看不出有什么理由，要为遵守时间而制造出问题来。我对你们抱有无限的感激，我要跟你们说再见了（长时间热烈的掌声）

2013年11月5日下午终场，闭幕式前

附录 1 偏执者所未成^⑥

纪·勒·构菲 (Guy Le Gaufey)

“有经验的分析师都能记起一连串他与病人告了长假的例子，在某一成功之后” (rebus bene gestis^⑦)。弗洛伊德就这样以此句作结，紧跟着“如果个人分析经由确定的任务到达无止境的任务”，他“无意就此肯定，说分析会是个没有结论的工作” (ohne Abschluss^⑧)。

这才是问题所在。在涉入一场是非的种种必然与是非过程的种种偶然之间，最大限度地划开了区别。接下来的问题显然是：终止治疗 (Beendigung) 纯属偶然吗？那就是很奇怪的偶然了。因为很清楚的是，它不能……不来。弗洛伊德自己也出过“实际操作事故” (eine Angelegenheit der Praxis)，肯定的。但这样一说，就什么都教不到我们了。经验是我们背上的一盏灯，永远只照亮来时的路程。

行动，实际上突发于某个无知无识的位置，才称其为决定性事件。但以

^⑥ 原文参阅《海滨地带》杂志 1982 年 2 月第 3/4 期，19 页；或 legaufey.fr，文章部分第 22 篇。译者注。本文未作标记处，均为作者原注。

^⑦ 我在这里依据凯撒《高卢战记》所能念到的 male re gesta (“某一失败之后”，见 1、40、12) 和 occasio rei bene gerendae (“赢得某一成功的时机”，见 5、57、1)，把 rebus bene gestis 译为“在某一成功之后”。但别忘了 res gestae (在 historia res gestae 中) 是“已确凿发生的事情”，与 rerum gestarum (据说是已经发生的事情) 大不相同。就这个意义来说，rebus bene gestis (“在某一成功之后”)，也是“已确凿发生的事情”，且“已确凿过去的事情”，法语在这一点上是模棱两可的。

^⑧ 本文所用引文，均取自德文 Studienausgabe 版《Die Endliche und die unendliche Analyse》，Fischer Verlag, Frankfurt, 1975，第 357 页及后续。

为或让人以为，这一行动是所知（或“知-识”）的某一答案，根本就是错误，是个“假性关联”——如果能允许我重申弗洛伊德给予“移情”的这个名词解释之一。这种似是而非的答案混淆了“知识”（savoir）与“识做”（savoir-faire）：识做提前就搞砸了本可颠覆知识的一切。

芝诺（Zénon）就这样质问他那个年代的知识：如果承认（按那时的观点）每个长度与空间都由不可分割的元素组成（空间点和时刻），那斗士所射出的飞矢就应该有必要、始终且到处是静止的（“飞矢不动”论）。针对这一点，第欧根尼（Diogène）二话不说，起身大步走遍房间，把嘲笑他的人都抛在一边：他动。

传统就将此举代代相传（这下就是 *res gestae* 了），没提防芝诺悖论并没少跟被此举动摇而失去信用的世界沾边。第欧根尼再怎么移身而为飞矢，击败唇枪舌剑，都不足为奇；奇的是人们可以相信他是在反驳矛盾，而他实际上却在无意中亲身运动，强化了矛盾，一举击中亚里士多德物理学说的软肋，由此而击溃了矛盾本身。

依赖知识而给出的答案被延时，因为它正好是对实际存在的另一想象。

那是个现代科学如曙光初生的时代，运动不再就其属性或本质被提问，人们试图描述它。我们应该看到，矛盾其实并不针对运动本身，而针对着空间这个隐含其中的概念。我们面对的已完全不是物理问题，而是数学问题。

决定性的大转折！借由微积分及与之相关的莱布尼茨有关“力”的概念，运动将结束它的矛盾状态，成为新理性的中心。

1 弗洛伊德，1938年

这有力的一课让我们想到，弗洛伊德做过什么，只有根据他传递给我们的

所知（而不是我们想象的他这个人）去解读，才有其意义。就分析的终止这一问题而言，他语中的锋芒落在《终止的分析·无止境的分析》一文中最后几段。让我们退后几步来念。

最后一章第一行，其实有这样一个小句子，推敲之下颇为神秘。

提到男人“拒绝女性化”和女人“阴茎羡慕”的力度，弗洛伊德写道：“我们也就此看到，阻抗出现的形态并不重要，移情也好，非移情也罢。”如果我们没有忘记，弗洛伊德所指的移情，从开始，早在它成为分析关系的联结物之前，就是一种元素的、点式的、被确切定义的操作。那么，没有移情的阻抗能是什么？

从《梦的解析》开始，弗洛伊德就把“移情”叫作一种挂钩模式。根据该模式，一个被压抑的无意识意象在遇到监察者阻挡时，就把它的冲动强度“移转”给一个冲动强度投入不多的前意识意象。这个前意识的意象从此载有代表无意识冲动动势的负荷。

“这才是‘移情’的真相。”移情二字是弗洛伊德强调的，“它包含着对神经官能症病人精神生活中种种独特事件的说明……别人可以因为我拿日常生活作比方，就把我的想法听过并不算数，但我还是忍不住想说，被压抑的意象所建立的这种关联，与美国牙医在我们国家所建立的一种关联是同类的。要想在德国行医，他们就得用一个合法获得文凭的医学博士作招牌，来面对法规¹⁹。”

“移情”这个词因此毫不含糊地被界定了范围。按这个意思，没有移情的阻抗，表现为不用移情机制来代表自己的阻抗，应该接近于弗洛伊德在《抑制、症状、焦虑》一书中所重点提出的那个神秘的“无意识阻抗”：“要承认在

¹⁹ 弗洛伊德《抑制、症状、焦虑》（S. Freud,《Inhibition, symptôme, angoisse》, PUF, Paris, 1971）第88页。

自我阻抗取消之后，余下所要克服的是强迫重复的支配，无意识原型施加给被压抑冲动过程的引力。如果把这一要素定性为无意识的，看来无可厚非。”就此，这一类型的阻抗把分析中遇到的阻抗种类提到了五种：三种归于自我，压抑的阻抗、移情阻抗、因疾病而得的利益；一种归于超我，负疚感和惩罚的需要；最后一种是无意识的阻抗。

如果说“阻抗出现的形态并不重要”，是因为弗洛伊德就此谈到他关于终止分析的论证，提出：如果“针对阉割情结的态度”在两性之间有一个共同的根源（stamm），两性所能找到的表达模式却大相径庭。“就男人而言，追求阳刚之气从一开始就与自我（ichgerecht）相一致。这一姿态意味着去势的假设被有力地压抑着，没有极端的过度补偿就很难看到它存在的真面目。男人以这种顽抗的过度补偿，从移情阻抗中分出最为强劲的支系之一^②。”这里，弗洛伊德的确可以作出一类自我阻抗的结论。

而女人的情况却大不相同，追求阳刚之气只有在阳具阶段才与自我相协调，此后应屈服于压抑，“这一压抑的完成，如通常所见，牵系着女人的不同命运。”

然而，如果分析能给男人以重新演绎出自我对阉割假设阻抗的机会，弗洛伊德注意到“从女人阴茎羡慕（Peniswunsch）出发，不能生成类似移情。”在男人产生移情阻抗的位置上，女人滋生出“严重的抑郁”，从心底里确信（innere Sicherheit）精神分析毫无用处，而她是无可救药的。“我们不能说她不对，”弗洛伊德接着写道，“如果希望重新找到痛苦失踪的男性器官，是当初推动她进入分析的最强动机。”

表现模式不同，但两性面对阉割情结的阻抗所共同的，究竟是什么

^② 弗洛伊德《终止的分析·无止境的分析》，Studienausgabe 版第 390-391 页与第 392 页。

么？弗洛伊德到了想要清楚说明这个点的位置上，前进一步，提到 *gewachsenen Fels*^②：这个词组从此被分析界传统地滥译为“阉割情结的坚岩”并到处传扬。“涉及阴茎欲求和男人的抗议，经常有的感觉，是已经层层穿透精神世界，开辟出一条直通 *gewachsenen Fels* 的路，由此也到达了 我们职能的尽头。”

弗洛伊德总是用词精准，很明确“到达（分析师）职能尽头”对他来说是个“感觉”（*Eindruck*）：不肯定。紧接着几个相对矛盾的句子更说明了这一点。刚刚确认这坚岩不为移情所动的特点，“否决女性化可以完全是一个生理事实，性之巨大神秘中的一块”，为的却是立刻非常奇怪地缓和他的语气：“很难讲在一个具体的分析治疗中，我们是不是已经成功到达了这个要素、什么时候才会终于到达。”

弗洛伊德不是内向的作者。如果他犹豫，在不该肯定的位置取保留态度，那么学术上的正直不是唯一的理由。不如说整个《终止的分析·无止境的分析》最后的这个第八章，在同跳一曲犹豫华尔兹，给终止治疗这个问题中他所不能正面肯定的一切，划出一个双重拒绝的框架。这双重否定，是极其明确的。

究竟是谁出现在这篇 1938 年的文章结尾？——不是旁人，正是弗里兹（*Fliess*）和费伦奇（*Ferenczi*）为理论所需，被邀来具体体现弗洛伊德所要否定的极端立场。随着他的思路一直下来，指出两种情况中“落入压抑之下的，都与主体性别相反”（*das Gegengeschlechtliche*）之后，他接着写

② 微妙的表达难以译传。*Fels*，是岩石，确凿无疑，但 *gewachsenen* 是动词 *wachsen* 的过去分词，原义是“增长”、“生长”……有时候甚至是“测量、衡量、估计所依靠的”……我们不在这里做任何斗胆的翻译，只拿另一动词 *wachsen* 的著名使用来反映，那是尼采写在癫狂之前的最后几个字：“荒漠在生长……”（*Die wüste wächst*）

道：“我在别处^②已经说过，这观点是威廉·弗里兹在他那些年头给我的，他在两性对立中看到了压抑的实际理由和原始动机。我在此重申当年的拒绝（Widerspruch），拒绝以任何方式把压抑两性化建立在生理基础，而不是心理基础上。”

因此，如果 *gewachsenen Fels* 的确曾是“生理性”的坚岩，根据事实本身应该承认，精神分析遇到这一障碍而越出自己的领域，撞击到——不是一个极限，而是一个边界。

这一点是决定性的，如果我们接受“极限”与“边界”较为精确的定义。

极限以一个序列（或疆域）为限，没什么可以推到极限之外的。一旦我们说得出超越极限的是什么，我们已经置身于该序列之外，这才看得见序列、它的极限，及继极限之后或许会来的什么。因此，是个外在的位置或立场，从这个立场出发，给一个序列划以极限，看到眼里可能只是区分彼此的——边界。极限与边界因此是语义学上非常相近的两个术语，它们都表达一个分界现象，但其陈述或说明截然不同：极限在它所决定的一个序列中被内在地确定；而边界，根据一种观点被外在地划定，通常并非它本身（很常见的天狼星现象！）。

术语明确之后，我们才能说，弗洛伊德引出弗里兹是为了拒绝给予生理相对于心理而言的边界价值。观察到这一拒绝与40年前他给同一个弗里兹的书信如何完全一致，这是很触动人的——1898年9月22日函：“而且，我的看法跟你没有任何不同，根本没想过心理上的东西可以在没有生理器官为基础的空中飘荡。我确信如此，但从理论到治疗我所能知道的，也仅限于此。所以，我得按照呈现在我面前的只有心理状态这种情况来工作。为什么要认为这一切

^② 涉及《有人打孩子》（《On bat un enfant》）中的一个具体注解。参见《官能症、精神病与倒错》（《Névrose, psychose, perversion》, P.U.F., Paris, 1973），一书第240页，或 *Studienausgabe* 第七卷第250页。

不是相互协调的呢？我还一点都没有这种预感。”

与弗里兹截然不同，弗洛伊德应该是相当忠实于自己的立场。这立场不允许他以所知的眼光来支配和标识生理与心理之间可能的关联。他始终誓不接受的生理基础，终究只是地平线，从未真实遭遇。

1938年《终止的分析·无止境的分析》没有就他的再拒绝多说什么，接下来的一段马上转回到费伦奇：“女人羡慕阴茎、男人抗拒被动姿态，这两个主题值得注意的重要性，并没有逃过费伦奇的洞察力。他在1927年的一个报告会上宣布说，凡冠之以成功的分析都应该终结这两种情结。我个人的经历容我加一句，这个位置上，我发现费伦奇格外地苛求。分析的任何时候都没有如此之沉重，要翻来覆去毫无成效地努力排除空对荒漠布道（Fischpredigten）的嫌疑，除非是我们要逼一个女人放弃她对阴茎的渴望，或力图要男人心服口服，说他们对一个人的被动姿态不见得总有被阉割的意思，而且是所有人间关系所不能避免的。”

那么，费伦奇究竟说了什么？弗洛伊德留意到了并摘录在注解里：“所有男性病人面对医生都应该达到一种权利平等的感受，（这感受值得作为）他战胜严格焦虑的标记：所有女病人，为了她们的神经官能症得到完全释解，都应该与她们的阳刚情结宣告了断，并毫无怨言地（ohne Ranküne）献身于一切能想象她们女性角色的可能中。”总而言之，分析没什么可碰撞的，换一种说法就是：所有的碰撞都是阻抗，分析只有视一切阻抗为芥草才算得上大功告成。

既不肯定边界（没有生理或任何对分析可能是“自然”障碍的暗示）也不肯定极限（没有对“分界”这样一个术语的任何正面解读），这种就治疗终止（目的性明确）的看法会很轻易翻转到替人治病的立场，即 *restitutio ad integrum*^② 的医学

② 这概念首先是生物组织学的：回复到病前状态，没有后遗症。

模式。曾经有神经官能症，从此再也没有了（就算事实不过是下次发作之前）。

如果只是停在这里，弗洛伊德就分析终止这个问题所阐明的独特立场，就只是负性的双重信标：很宝贵，但不足。然而，具有决定意义的总会穿越时间重打标记：这篇 1938 年的文章中由三人组搬上舞台的，28 年前就已经全部到位。

那是 1910 年夏天。

2 闪回

1910 年暑假，弗洛伊德经巴黎去西西里，带上了费伦奇：后者 37 岁，弗洛伊德 54 岁。有关这次旅行，我们只知道琼斯（Jones^{②4}）看过两人书信来往之后所描述的一点关系。“涉及友情，”琼斯写道，“（费伦奇的）需求是有限度的，他与弗洛伊德之间不得对外泄露秘密也不能互相隐瞒什么。自然，他没能这么坦率地表达，但或多或少怀有希望，等着弗洛伊德走出第一步。”换句话说，作为旅伴，费伦奇是够碍手碍脚的。他十月初给弗洛伊德的一封信，似乎也这样自责过。琼斯把这封信定性为费伦奇“冗长的自我分析报告之一”。

弗洛伊德这个大写信迷，回答得出人意料：这封信，以其带给“弗里兹故事”^{②5}总结模式的精确说明，比很多其他信件更足以成为弗洛伊德整体文献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

^{②4} 琼斯《西格蒙·弗洛伊德的生平及作品》（《E. Jones, *La vie et l'œuvre de Sigmund Freud*》，PUF, Paris, 1961），第一卷，第 85 页及后续。

^{②5} 琼斯书中的这封信已由德文译到英语，法语读者至今还只有英译法的这本书中的版本。两度转译让人作最坏的担心（鉴于弗洛伊德原著在翻译中经常被误译）。极为庆幸的是，琼斯一书德文版的译者没有让步到简单地再从英文翻译，而是找到了德文原信。通过这个渠道，承蒙让·皮埃尔·德瑞福斯和诺贝尔·阿斯与我就此达成的沟通，这里是新译的版本与德文原信【本书略，有意者可参阅 [legaufey.fr](#) 原文】，为读者参考之用（参见：E. Jones, *Das Leben und Werk von Sigmund Freud*, Verlag Hans Huber, Bern und Stuttgart, 1962），第二卷，第 106 页。

亲爱的朋友：

很独特的是，您写信比说话更能清楚地表达自己。当然，我已知道一大部分——绝大部分您信中的内容，现在要做的，只是为您澄清几点。为什么我没有训您一顿，就此为理解打开道路？很有道理，此处曾是我的软肋，我也不是人们想要塑造的精神分析超人，更没有超越反移情。我做不到，就像我跟自己的三个儿子都无法做到一样，因为我爱他们，而且如果我那么做，他们会让我的日子很难过。

您指明，同样地，您很了解，我不再感觉有任何这种完全开放个人的需要了，您就此精准地追溯到它的创伤根源……您看到我最近在全力攻克弗里兹案例，这种需要自那一事件之后，对我就已过期无效了。一部分同性恋式的投注被收回，用于自我本身的成长。我成功了偏执者所未成。——请再算上我那时候大部分时间情况并不好，肠胃的折磨远远超过我想承认的，我常常怪自己说：做不了自己 Konras²⁶ 最佳主宰的人，仅就这一事实，就已经不必上路远行了。真诚应该从这里开始，而您在我看来，还不够坚实到可以不陷入过度的焦虑情绪中。

至于您给我造成的不快与气恼——包括一定的被动阻抗，归根结底，都会与旅途的记忆一样：经由这个私人过程，横生枝节的小事终会滤去，唯美好独存，为精神与知识之用。

看得出来，您疑心我有些重大的秘密并对此颇有好奇，但承认这很幼稚并不难。我授予您的学术观点有多么多，对您隐瞒的私人事实就有多么少。那段时间的梦，您已听我说过，做的完全是重回弗里兹的故事。就事情本身的性质而言，我很难拉您进来与我共受煎熬。

细查之下，您会发现你我之间的争执不必如您起初可能以为的那么大。

²⁶ 弗洛伊德对自己肠胃之称，但大小肠所用的“肠”（intestin）作形容词时，在古法语指的是体内，而在现代书面用的法语，指“团体内部的、内心的”。参阅本文原作者注第16条。译者注。

我更愿意您回到当下……

弗洛伊德

1910年10月6日

不要太快跳到信中那句名言上，还是让我们从神秘莫测的那一头开始。“完全回到弗里兹故事”的那些梦，究竟是什么？这正是弗洛伊德原著的魅力之一，总是给这类调查研究留下一个机会。

西西里之行过去一年后，1911年再版《梦的解析》时，弗洛伊德加了些注解，其中一条安插了他对著名的“俄狄浦斯假惺惺之梦”一例的补充：“I. 朋友R是我叔叔。我对他怀有一种极大的柔情；II. 我在眼前看到他的脸，多少有点变化。它好像拉长了，一把黄胡子框着，特别清楚地跳入眼帘。”^①

这个梦（1897年2~3月），弗洛伊德坦言曾断定它“无聊”，因此应该是要征服一个活生生强有力的阻抗才有可能分析得到它。这时候来的（被承认的）联想是他的叔叔约瑟夫，被家里（尤其是被弗洛伊德之父）称作“头脑不清”^②。另一个联想落到“朋友R”这个位置上，眼科医生朋友科尼格斯坦，联想把弗洛伊德又送到自己对成为“非凡教授”的真实渴望，我就不再重述中间那些思路转折了。这梦被称作“假惺惺”，意思是指显性的柔情正好遮掩着一种隐性的恨，它牵系着梦的主人与科尼格斯坦种种情感的一部分，正是弗洛伊德深感苦

① 弗洛伊德《梦的解析》（S. Freud, *L'interprétation des rêves*, PUF, Paris, 1967）第126页，Studienausgabe版第154页。

② 有关约瑟夫叔叔的“头脑不清”，请参阅阿兰·德·米肖拉（A. de Mijolla）在1979年《弗洛伊德研究》第15-16期所发表的文章及资料（《Mein Onkel Joseph à la une !》*Etudes freudiennes*, 15-16, Denoël, Paris），第183页及后续。我们从中了解到“约瑟夫叔叔”这个全家的羞辱，曾因假币买卖受庭审，被判10年徒刑。

恼而无法面对的。

但就在这个梦的情节之后，弗洛伊德写道：“跟着来了（梦的）另外两个部分，又一个想法和一个画面，我跳过。”他跳过什么我们不再知道，但就在这个位置上，1911年他加了这个注解：“这类伪君子之梦，对我和他人均非罕事。在我一心想要将某个学术难题^②定格的时候，发现自己连着好几个晚上都做到（同一个）略微模糊的梦，在梦中与一个分手已久的朋友重修旧好。梦到第四五次，我终于捕捉到了它的涵义，是在鼓励着我与心中对那人所残留的最后一点左思右想做出诀别（aufgeben），将自己完全从中解脱；这涵义被伪装成了与它相反的意思。”而英语版中，斯崔琦（Strachey）的一个注解指明那个“分手已久的朋友”不是别人，正是威廉·弗里兹，与致费伦奇函之所言不谋而合^③。

② 此处提及的这个“学术问题”，非常可能是达尼艾尔·保罗·薛伯《一个神经病患者的回忆》所留下的线索，并非无足轻重。弗洛伊德在1909年对该文有所接触，并曾是他与费伦奇……恰恰是在西西里，长时间讨论的对象。有关“薛伯庭长”（Rainier Lanselle 提出的中译名）的案例分析（*Psychoanalytische Bemerkungen über einen autobiographisch beschriebenen Fall von Paranoia*）著于1910年12月。作者注。——该文法文标题：《Remarques psychanalytiques sur un cas de paranoïa (Dementia paranoides) décrit sous forme autobiographique》（《关于以自传形式描写的某偏执狂病例的几个精神分析之评注》）；1932年波拿巴公主所译版本的标题为：

《Remarques psychanalytiques sur l'autographie d'un cas de paranoïa (Dementia paranoides)》（《关于某偏执狂自传的几个精神分析之评注》），中文读者可能已接触到的中译名是《有关一个偏执狂病例的自传性说明的精神分析札记（“施莱博尔”）》。译者注。

③ 应该想到，并非两者伪装这唯一特征让弗洛伊德在1911年把叔叔之梦靠到西西里之梦上（叔叔之梦是《梦的解析》中很重要的一个梦，因为就内部引用的数量来排位，其重要性仅次于给伊尔玛注射之梦）。弗里兹并未在有关叔叔之梦的内容中直接点出，但当我们了解到下面这段插曲时，两者的关联却极为惊人：1895年因弗里兹的疏忽，经他治疗后由弗洛伊德接手的一个年轻女子（匿名为伊尔玛，真名为艾玛）险些断送了性命。弗里兹在女病人的鼻孔里留下了大致50厘米左右的碘纺纱布，导致系列性出血。弗洛伊德当时还对弗里兹抱有无限爱慕，直到眼睁睁看着一位维也纳耳鼻喉科医生找出原因，惊得目瞪口呆。Max Schur 刊出了弗洛伊德有关这一事件的未发表信件（参阅《弗洛伊德学说研究》的译文，*Etudes freudiennes*, 15-16, Denoël, Paris, 1979, 第151页及后续），把重点放在弗洛伊德想把弗里兹这一因疏忽而产生的差错大事化小的反复努力。“当然，”1895年3月8日弗洛伊德写道，“谁都没怪你，我也看不出旁人有什么理由好怪你的。我只愿……你放心，我没有要去重新赢回对你的信赖的需要。”但在1897年1月17日（所以是两年之后，与1897年1—2月——据昂兹奥（Anzieu）的考证，为叔叔之梦发生的时间同期），他又写道：“艾玛（当时在跟他做治疗）提到一个场景，魔鬼把针插入她指甲，还在每一滴血上放了一小块糖。你跟血是完全没有关系的！”从这里想到弗洛伊德对约瑟夫叔叔的联想会很快（太快！）把他带到亲爱而代价昂贵的弗里兹之“头脑不清”，只有一步之遥，我们留给读者去决定这可能的一步。

看来，当费伦奇很有压力地要提供给弗洛伊德那种他已在弗里兹那里尝过味道的热烈关系，而弗洛伊德对斯沃伯达事件^①还历历在目，就开始反复地做起与柏林故友重修旧好的梦来。

从这个位置上再来念那个有名的比喻句，我们可以想象，费伦奇的种种需求在功能上像是这些梦的承包者，但真正持有价证券的，却是弗洛伊德自己内心对弗里兹的种种求^②，因两人关系的悬而未决而被悬置、被放逐。1909年3月9日，当容格（Jung）在他的书信任务中弱下去的时候，弗洛伊德还曾在信中写道：“我还是明显对信件减少有种创伤性的感觉过敏，我对它的起因（弗里兹）记忆犹新，也不想纯天真地在这样的经历中再生活一次”^③。如果到第四次或第五次，他最终能把自己的这些西西里之梦分析为决裂之欲的满足，说明那时候他已经可以如蜕膜一般看待自己的求。

只有在至少理解了这层意思之后，我们才能来念致费伦奇函中几个关键句中的一句：“……我不再感觉有任何这种完全开放个人的需要，您就此精准地追溯到它的创伤根源。”

① 1904年，在弗洛伊德与弗里兹书信关系断绝的两年之后，弗里兹从奥斯卡·瑞（Oscar Rie，弗里兹的妹夫、医生，维也纳人，也是弗洛伊德星期六塔罗纸牌游戏惯常的拍档）那里得知，一个23岁的年轻哲学家威宁格（O. Weininger）刚刚发表作品（《Geschlecht und Charakter》），确认人类共有具有性的双重性基础。这是弗里兹几大概念中的一个，曾在他与弗洛伊德的“会议”中长期互相沟通。而弗洛伊德正好有个病人和学生叫赫尔曼·斯沃伯达（Hermann Swoboda），是威宁格的密友。弗洛伊德因此被指责为掩盖甚至帮助了剽窃。整个事件，参见贝尔纳·维莱《1904：弗洛伊德与弗里兹最后的书信往来》（Bernard Vichyn：《1904：dernier échange épistolaire entre Freud et Fliess》，in *Psychanalyse à l'Université*, n° 24, Editions Répliques, Paris, 1981）第705页。但事情并未就此结束：1906年，某个Pfenning，之后是弗里兹自己，在柏林署名发表诽谤性文章，指名弗洛伊德为剽窃者，远远超过一个威宁格故事。弗洛伊德部分地通过媒体渠道回答了这一指责……可见“精神分析师”并没等到1980年才开始在公共广场上演他们最为……内部的论战（débat intestin，“内心冲突”“内心斗争”）。

② 对精神分析中，尤其是拉康意义上“欲”与“求”的推敲，可参阅中文版：纪·勒·构菲《求与欲：一个回顾》，本教程I第137-140页；法语原文：legqufey.fr 文章部分第12篇（Demande et désir：un rappel）。译者注。

③ 弗洛伊德与容格《书信集》（S. Freud et C.G. Jung,《Correspondance》, Gallimard, Paris, 1975）第一卷第285页。

倾向于“什么都说”，曾将弗洛伊德与弗里兹联系到相互关系最为强烈的位置（信函、“会议”，等等），现在，在这个位置上，弗洛伊德见证对他自己来说，存在着……一个边界还是一个极限？“一部分同性恋式的投注被收回，用于自我本身的成长。”我们在引入自恋概念的四年之前，这个“同性恋式的投注”因此应该被解读为自恋性投注的典型本身。就其力度而言，所用的还是个非常弗洛伊德式的单词 *Verliebtheit*：爱恨交加之热恋^④。

这反复梦到两人关系的断绝并没有被实际弃置一边，因此是股强大的情绪波动，弗洛伊德在此之中遇到了一个新的事实，给他就“弗里兹事件”一个启发，在此之前还是空缺。

他在这个梦之前的位置或立场，就像我们面对这整个故事，如果只看到致费伦奇函，所可能采取的位置或立场一样：总归是为关系决裂援引因由；朋友间互相疏远、逐渐不再投入；人与人之间的不同，导致合二为一演变成一分为二的自然游戏；弗里兹性格多疑，等等。但有了这些梦和决裂之欲借由梦而实现，在这些事实之上，弗洛伊德才可以说他是“攻克了”这一“事件”。这事件不再只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是精神内部冲突所完成的工作、精神内部之间的关系。是这些内心关系本身允许他写下：“我成功了偏执者所未成。”

这成功是学术上百般研磨酝酿的结果，否则就只是打猎吹的号、侃山吹的牛而已。脱离了语境——像通常人们介绍它的情况，这句名言就被叠入随便什么解说而不见。它的精确，却只有与弗洛伊德当年对偏执所形成的概念重新联

④ 热恋 *énamoration*，拉康谐音自创 *Hainamoration*，拼写译出“爱（*amour*）恨（*haine*）交加”之意。译者继作者注。

系起来，才能重见天日。还是要到《致弗里兹函》（手稿 H：偏执^⑤）中，去寻找他那时就偏执给出的“关键性精神特征”。

弗洛伊德在这封信中提到的案例，涉及布洛伊尔（Breuer）转给他的一个女病人：经历一场没有下文的意欲诱引事件之后，病人表现出偏执性“推力”（poussées；德：Drang），认为邻居们说她被人始乱终弃，云云。弗洛伊德催眠式地试图唤醒她诱引那一幕：完全失败。女病人绝然离去，让他知道所有这些她已经厌烦透了。“防御！”弗洛伊德写道，“一眼就能看穿的！她不愿意让那回忆被唤起。”“这些事实的内容，”他接着写道，“因此被原样保存，完全改变的是东西（la chose；德：Ding）的位置。之前是内在的抱怨，现在变成外来的一句“不要脸”。评判和怨言就这样被自我排斥在外……所以，是出于防御目的，对投射机制的误用。”

经由这段文字的启示，我们可以来衡量一下西西里之梦的解析所引发的调整：决裂之欲不再是“出于防御目的而对投射机制的误用”，一味推卸给某个弗里兹（弗洛伊德先前的位置，之后因斯沃伯达事件而加固），弗洛伊德现在把它归于自身。这个点才是他前进进一步的“成功”点；偏执者的失败，正好相反，在于对自己“内部变化”的浑然无知。

“如果我们忘记（这变化）”弗洛伊德继续道，“就只有以外因为结论的三段论（演绎推理）那一部分在继续。偏执者的表现正是如此，对‘人家知道我们什么’和‘人家对我们做了什么’抱有过高评估……人家知道我们什么？——我们所不知、我们所不能容的。”根据这一有关偏执的理论，应该是

⑤ 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的诞生》（S. Freud, 《La naissance de la psychanalyse》第98页，Aus den Anfängen der Psychoanalyse 第97页）。我在这里用的是 A. Albert, S. Faladé 及 E. Laurent 在巴黎弗洛伊德学院内部发表的译文。作者注。——以作者所引用的“人家知道我们什么？——我们所不知、我们所不能容的。”（Que sait-on de nous : ce que nous ne savons pas, ce que nous ne pouvons admettre.）作比较，在法国通用的 PUF 版本里被译为：“我们以任何方式都既不能知道也不能接纳的，人家知道我们什么？”（Que sait-on de nous que nous ne puissions en aucune façon ni savoir ni admettre ?），一念之差，前者邀请，后者关闭。译者注。

弗洛伊德很久所不能容许自己的，作为结果，被归因于弗里兹。西西里之梦让他得以把这笔账算回到自己头上，从而得到“自我本身的成长”。

就分析领域的广延性这个问题的思考上，弗洛伊德双重否定了跟进弗里兹或费伦奇的可能，一路下来，我们获得了有关这双重否定的几个定位点，现在可以用这些概念来重申：这领域不认边界，但认为它没有极限是错误的。

这正是弗洛伊德在他结清弗里兹故事时所能动动手指头的地方：结束这段情感关系的，不单纯是如此熟悉而又陌生（*unheimlich*）的这一个叫“弗里兹”的他者的存在，这关系本身所固有的决裂之欲丝毫不亚于前者。运动着的物体必须要遇到一个障碍，才能停止。与这个惯性（惰性）定律相反，弗洛伊德从他的西西里之梦看见自己站在“死之冲动”与“快乐原则之外”的轨迹上：种子在瓜果里，与果肉在瓜果里一样地肯定。

在那样的一个点上，显然，我们又遇到了联结于重复冲动的神秘的“无意识阻抗”，弗洛伊德因此在他这一作品几近终止的时候再次将它搬上舞台，给分析师的职能划出一个极限，并未就此授予分析师什么突出观点，可以直达这一职能或超越其外。这样一个外在的和居高临下的观点的不可能性，正是移情这个精确概念的结果：这是现在我们要来建构的。

3 从移情到爱情

随便什么移情，在弗洛伊德看来，都是特别两面性的因子或施动者：它制造着阻抗与自我的游戏（有助于维持住压抑），但同时参与着无意识意象的活动（从中使意象得以“变身”）。正因为移情履行着这样的功能，弗洛伊德才有可能用它来解释：为什么“白日梦残余”能在梦中存在，却恰恰在白昼里，很少得到精神投注？

让这些平衡动摇的点，是当治疗程式把弗洛伊德所谓的“医生这个人”^⑧冠冕堂皇^⑨地放在与“白日梦残余”恒等的位置上。即：全部的前意识意象在开始接触时很少被投注，却（通过移情“挂钩”和“变形”这两种渠道）允许被压抑意象借此得以表达。于是，弗洛伊德式解析的艺术，就在于承认这种凝缩（condensation）与移置（déplacement）的复杂游戏，通过“变形，到达曾被变形”（Von den Entstellungen zum Entstellten^⑩），如同对梦的分析。

如果将“医生这个人”引入“白日梦残余”的这个位置，是个转折^⑪，那是因为这么一来，移情是在自恋维度上操作的：这些被很少投注的意象现在被定位在一个“相似者”身上；爱恨交加的热恋之门就此一扇扇地打开，冲动动机将通过它们，多少激烈地投注到构成“医生这个人”的某些独特痕迹上。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正如弗洛伊德很快所指出的，移情之爱与另一种爱是无法分辨的。我们可以更进一步说，是对弗洛伊德观点上“爱的精神力学究竟是什么”的举例说明。正是这一点，拉康一语中的：“移情，是爱的真谛。”意思是说，爱，不管形式会如何多样，至少都有这一点：意象因无意识所玩的那种字对字的的游戏，被用别针固定一样地捉住，使被压抑的冲动动势可以就此被投注（最常见是俄狄浦斯式的）。这样一个概念，就事而言，联结着（但并不等于就此混淆着）移情和爱。更确切地说，没有爱的移情（参阅“白日梦残余”）也许存在，没有移情的爱是不存在的。

⑧ 在《移情的动力》（《精神分析技术》（《La technique psychanalytique》），P.U.F., Paris. 1970, 第50页）一文中，弗洛伊德所用的表达有微妙区别：有时候是单独的“医生”（Arzt, 被 A. Berman 译为“分析师”），有时是“医生这个人”（der Person des Arztes）。就德文原本，参见 Studienausgabe 版第十一卷 159 页及后续。

⑨ Formellement：“明确而毫无暧昧地、肯定地”，但也是“外表地、形式上地”。译者注。

⑩ 弗洛伊德《精神分析技术》（《Die Freudsche psychoanalytische Methode》），Studienausgabe 版第十一卷 104 页。

⑪ Virage：车辆或思想的“转弯”“改变方向”；化学中“滴定点的变色”、医学中的“皮试阳转”，因而可诊断病情的存在。译者注。

这与分析师们——弗洛伊德首当其冲，总是在“移情”官能症的案例中所强调的一致：移情之爱表现为俄狄浦斯种种特殊成形^⑩的再现，更确切一点，按弗洛伊德在《性学三论^⑪》中所述，是对“原初幼稚性对象选择”（choix d'objet infantile primaire）的再现。

然而，应该强调的是，在这个位置上，他这几个概念在1905年（《性学三论》）到1923年（《幼稚性设置》（《L'organisation génitale infantile》）、《俄狄浦斯情结之消失》（《La disparition du complexe d'Œdipe》）^⑫）期间，被弄得很乱。

刚开始弗洛伊德把俄狄浦斯情结介绍为这样一种（精神）组织：通过它，孤立的、为“柔情”之流（zärtliche Strömung）所滋养的冲动动机朝着父母双亲中性别相反的那位汇聚（convergent^⑬），直到（至少对男孩来说）阉割情结到来，将这一主观立场彻底粉碎。再以后，经过青春期，肉欲之流（sinnliche Strömung）会来重新投注到已被柔情之流开辟的道路上，就此自然而然地指定性对象。

1923年，弗洛伊德对这些观点做出了一个决定性的纠正：“儿童期生殖组织的首要特性在于，两种性别都以为只有一种生殖器官存在，男性器官。所以不存在生殖器至上的问题，而是阳具至上^⑭。”

在这里，很重要的是要辨别出“生殖的”或“阳具的”，在性质上迥然相异。

所谓“生殖的”，是尘世间的物或对象（这里是性别相对的父或母）。如果

⑩ 弗洛伊德《移情之爱的观察》，参见前注《精神分析技术》，第116页。

⑪ 弗洛伊德《性学三论》（《Trois essais sur la théorie du sexuel》），Gallimard, Paris, 1962）第99页，及《性生活》一书中《爱情生活的心理学》一文（《Psychologie de la vie amoureuse》，in *La vie sexuelle*, PUF, Paris, 1969）第57页。Studienausgabe版第五卷第200页。

⑫ 弗洛伊德《性生活》，第113页和第117页。

⑬ “整体的性欲倾向朝着独一无二的那个人汇聚，以求在他那里达到目的。”《性生活》（《La vie sexuelle》）第113-114页，及Studienausgabe版，第五卷237页（[...] das sämtliche Sexualstreben die Richtung auf eine einzige Person nehmen, an der sie ihre Ziele erreichen wollen）。

⑭ 弗洛伊德《幼稚的生殖设置》，参见前注《性生活》，第114页。

他/她是某种“汇聚”的对象，那只在动词“汇聚”的一个特殊意义中。实际上，这个动词有物理或几何上的意义，但也有算术上的意义。说“光线向透镜焦点汇聚”（Littré 词典），是假定在每条光线上存在着一个特定点，在这个点上，众多被收敛到焦点这个点状单元上。但说“ U_i 序列各项收敛、趋向（法语与“汇聚”相同）于一个 a 极限”，是说（性质几乎相反）：如果也有这么一个众多被缩减为单元的点存在，这个点（数字 a ）却不是该序列的任何一项（而焦点却是每条光线上的特殊一点）。算术的收敛（法语与“汇聚”相同）概念（完全明确，要等到 1819 年才由柯西提出）指明的是，我们尽可以把某系列各项列举到远之又远，却始终不会碰到收敛点。这个点肯定是被指明的（在某些条件下也可计算），但它对“各项组成的序列”来说，却是异质的。

这一术语上的区分，让我们有可能明确“阳具至上”的论题所带给力比多理论的修正：弗洛伊德就此将一个几何的汇聚概念转变到了算术上的收敛概念。

从这一观点出发，两性就此有了不属任何一方的决定性因素：阳具在此并非男性固有的特权。它应该被看作（算术）极限，向着这一极限，两个系列以不同方式收敛（无限接近）。支持这一论点的，是“阳具”严谨的象征属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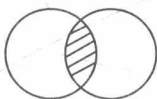
它的“在”只有在它“不在”的底子上才读到，它的“不在”要在“在”的底子上读。两边都不会在路上撞到它。

这正是我们就极限所能讲述的（让我们再来看拉康就“阳具”而做的官能症表述）：一个（收敛）序列并非没有指出一个极限，但这极限要能成形、能用形象表示，只能以补充运算为代价，通过补充运算，用序列中可呈现的项另外来“结”（lie）（或“解”（lit））。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阳具”这个术语的引入就不再给全凭个人经验的寻求留下什么位置了：它打断了各项间毫无科学依据的简单连续，将这一象征意义的项放到位，它以其他方式整理现实碎片，却

与这些碎片绝非同属。

琼斯（他有他的方式，但像“委员会”其他成员一样）发现自己得被迫放弃“阳具至上”这一正题，正是因为没能接纳这一方法论。他找了个（且以 aphanisis “欲望消失”这一取自拉丁语的自创概念）不单是两性共有，且分属各方的东西来替代。

我们在这里正好能看到上文已述的两个相对概念之精准：边界对极限。要么是两性间存在着一个共同的边界，能想到的就是一种两集相交（即使交集有可能缩到只有一条线）：



要么，两性视共同极限而各自定位：



弗洛伊德 1923 年的立场，在我看来，毫不暧昧地选定了第二种解决方案。如果说，这一抉择因此而彻底改动了他的力比多理论，它却并没有对治疗中的移情概念触动一分。

4 单数移情的阳具价值

弗洛伊德曾坚持（这一来，就是继他之后整个弗洛伊德传统了）精神分析技术的特点最终就落在这个点上：在治疗中得到发挥的移情有它可待分析。缺

了这一点，就会陷入无力，将分析之疗减价操作为暗示性治疗。

但是不是说就得要解析移情？——解析，在弗洛伊德，是建议病人“潜伏性意象”（Erwartungsvorstellung），其精准度要由它们支持种种移情的能力来评估。当弗洛伊德抛给病人，说他把 Gauner（弯曲）说成了 Jauner，病人却回答：“Das schein mir doch zu jewart”（最后一个词应该是 gewagt（冒险）），弗洛伊德是在这堪称典范的字对字、实打实的移情中，得到了对“潜伏性意象”^⑤的确认。

治疗的特点从此看来，就是错开一步的：单数“移情”的这个术语可标志的“事事”相继（coup，“一下”或“一击”，呼应 après-coup “事后”概念），在治疗中定居、入账，串成序列：用这种方式——关键在这里，我们不但可以用复数讲治疗中具体发生的移情，更有“那”移情（单数）。它是可定位的，与某些精神分析式的叽里呱啦相反，那些叽里呱啦无非是把整个“移情”事件缩减到捆绑两个拍档的万种“爱恨交错的热恋”之中，不亚于根本忘掉无意识。这真的就是重新演绎了弗洛伊德在他力比多理论中的第一个错误，相信每个移情是按几何意义（如同光束）聚焦于“医生这个人”，是这个人本身构成了对象。不奇怪在某一“生殖性”支持者的笔下会念到这样的句子：“……在分析中尤为重要的，不是分析师说了什么或做了什么，而是他是什么。”^⑥就一种以语言为本质的实践来说，这真是句“了不得”（hénaurme）的话；但在这句话里吐露了它包含着的那一部分的真谛。还是要去解读，因为真谛并非一目了然。

移情中，什么才是“医生这个人”？我们讲了又讲：那是个意象集，其中

^⑤ 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建构》（S. Freud,《Konstruktionen in der Analyse》, Studienausgabe 版），第十一卷，第402页。

^⑥ 沙夏·纳什《精神分析的治疗》，参阅《今日精神分析》（S. Nacht,《La thérapie psychanalytique》, in La psychanalyse aujourd'hui, PUF, Paris, 1967），第135页。

的每个意象都为—个移情所用。这样一来，就是“集”这个词（或随便其他能将众多归入一个单元的什么）要求注解了。能为“—”（浑然—体）的，在此在彼无所不同，都是自恋；更确切地说，是对象投注的根本性自恋特征，正如弗洛伊德在《为引介自恋》所提出的。移情就此成为主体能指性的决定（每—移情）与自恋客体（所以是对象选择）的联结。

然而，唯一能明确威胁到自恋的，弗洛伊德用语，就是阉割情结，即：就此出发能调度整理，从此能称得上“—性”与“另—性”的那个点。“要评估阉割情结所具有的确切价值，”弗洛伊德写道，“只能在一个条件上：要考虑到它在‘阳具至上’这一阶段的突如其来。”^④能指性的决定与自恋的这—联结，是赋予治疗中移情以其阳具价值的，它使移情注册到阉割这—秩序中。在支持着—个个移情的过程中，分析师将它们注册到自恋投注的—个序列中，只有这样来看，阉割才以—种可被确定的方式在运作。

也正是这样来看，才能解读到分析师“是”—什么的真谛：远在他所支持的—个个的意象之外，他的“是”—什么（存在）不外乎那躲避虎视眈眈的封杀。他是什么无疑是决定性的，却没有正性称谓，因此有待具体确定这些特征：“是”—这个词在这里只是—个纯粹的借代指示，是能命名所有逃逸于自恋投注的名字中的—个，是恋之热情的出血（痛爱？）之所。

这个空（弗洛伊德确认它来反对费伦奇）没有任何外在性（反弗里兹）。把它看作已实现的移情序列之极限（算术的），作为逃逸于自恋投注的（却从两种意义上调度着它），才是弗洛伊德的操作。它把“阳具至上”置为性决定之“理”（ratio），因此是主观的，是种种移情的决定。

“委员会”诸成员中，亚伯拉罕（Abraham）曾是最为努力跟从弗洛伊德有

^④ 弗洛伊德《幼稚性生殖组织》，出自《性生活》（S. Freud, 《L'organisation génitale infantile》, in *La vie sexuelle, op. cit.*），第115页。

关幼稚性生殖组织思考的人。在他对力比多发展的分析中，出现了“局部爱”（*partialliebe*）这个概念——“局部客体”的概念也由此而来。在他诸多的临床报告中，有一个讲到女病人梦到没有生殖器官的他，说：“就此证实了弗洛伊德有关阳具阶段的发现”，因为观察到在这样一个客体爱的阶段，客体本身不容忽视的一个部分却被排斥在外。

“因其生殖区之故，”亚伯拉罕总结说，“神经官能症病人无法爱恋整个的客体。对官能症的分析驱使我们将这些对力比多的抑制看作是阉割情结的效应。”^⑤接下来就搭的不是同一个脉了，因为断定整件事是个恼人的状况，亚伯拉罕认为，“只有在严格意义上的生殖器期”，客体的一切就有可能全部被爱。

拉康没有再提最后这一点，给前面的这些观察一个后续，补充道：那正是“爱减去局部客体”（*l'amour moins l'objet partiel*^⑥）。亚伯拉罕所提出的客体“局部之爱”（*amour partiel*）正好说明了“阳具期”，实际上有个条件，要能察觉它不具有任何一种完备性：正是阉割情结的突如其来，致使完全投注无计可施。

如果我们以“阳具至上”（算数收敛），而不是“生殖器至上”（几何收敛）的观点来思考移情，移情之爱不可约的局部特征就会在“医生这个人”中注册上这一空缺，任何一个“是”都不能填补。

证明这些概念精准性的首要原因，不是就治疗活动全凭经验的这个事实而言，它显得理由更为充分而恰当，而在于它能与每一“移情”初起的定义相协调。在每一移情中被无意识的冲动动机所投注的，既非前意识，更说不上是自我：它就是个意象（当然，能被拓扑性地定位），没别的。就此而言，且就自恋观点来看，每一移情开始启动与它彻底异类的能指机器时，均已失手。

^⑤ 亚伯拉罕《力比多发展》，出自全集第二卷（K. Abraham,《Développement de la libido》, Œuvres complètes, tome II, Payot, Paris, 1966），第308页。

^⑥ 拉康《移情》，未出版研讨会（J. Lacan,《Le transfert, séminaire inédit》），第141页。

大家也可以因为是比方，就把我的话听过而已、不必算数：我们在各种器具上投注技术效力，来保证我们对世界一定的控制力。然而，一旦要这些器具去应对多少属于不期而遇的位置（成败的关键在此），其效应是可确定的：焦虑！就看着它如同癌症一样扩散，在我们这些人的浑然无知中；这浑然无知还恰恰是我们如此习以为常地依赖着的，却从此根本不问一声我们的看法，直奔它自己的路而去。自恋，系在种种能指性决定的牵引索上。

移情是重复，但也要听到（s'entendre 谈得来）才行：它不单是童年事件（对象选择）的再演，也是事事无限的延续，每一事（coup，一下、一击）总不能完全落在自恋的观点上，就还需且总是要重来，使每一事中已在的，得以在序列程度上显出庐山真面目，即：脱离能指机器本身而独立。

在我看来，在给分析师职能及重复冲动设置下极限、给出调度主体“性”决定的这个 *gewachsenen Fels* 时，弗洛伊德已完全预感到了这一点。他说在这里存在着一个没有移情的阻抗，一个无法让自己通过移情操作来得以呈现的阻抗，是点明移情转化所依赖的材料具有不可约的特征；将是非争议的材料性缘由形象表明。

拉康讲学的一大部分就依靠在这点上。在考虑如何定位分析的独特性时，他写道：“在象征维度，我们有俄狄浦斯神话……去掉俄狄浦斯，我可以说，整个精神分析就只可裁定为薛伯庭长式的癫狂”^⑨。那是他标识“偏执者所未成”的方式：解析之链发展出一个结构，是移情在治疗中同样要显露出来的。

要读懂这一点，还要再做一轮功，在处于自恋动态的种种移情之运作中，汲取其后果：在此，“弗里兹故事”的西西里结局可以升值为一个典范。

^⑨ 拉康《1967年10月9日就学校精神分析师之建议》，出自《巴黎弗洛伊德学校》1977年年刊（J. Lacan,《Proposition du 9 octobre 1967 sur le psychanalyste de l'école》, *Annuaire de l'EFPP*, 1977），第15页。

这一形象的表示（让我们冒险用一下 *Darstellung* 这个词）是弗洛伊德真正能推论出不同于偏执的成功点。实际上，如果我们支持他的 *Deutungskunst*，将从移情出发的无意识形成视为他解析的艺术，那么这算得上够聪明的艺术，足以说明精神分析师与偏执者的区别。弗洛伊德自己对两者的近似看得相当清楚，向薛伯打了个真正同行之间的招呼。

进一步说，这种移情是由引入俄狄浦斯神话及与之内在（且明确）相连的阉割情结来实现的。我在上文中试图证实，“阳具至上”这一论题——很晚才酝酿而出，使我们不能再将俄狄浦斯单纯看作神话，而是精神组织的结构性原则。图腾之父的建构是同样的性质，通过它，弗洛伊德得以将之前只停留在拉伯达斯德家族（俄狄浦斯）的痕迹交予整个人类家族来担当。

但这一俄狄浦斯的普遍化还是被本质上是个神话的观点俘虏着。“阳具至上”这一论题允许弗洛伊德清楚解析出在主体构建中象征（符号）决定的优先性。

（姚洁 2014 年译于巴黎）

附录2 闭幕式

刘华清主任：我们有个短暂的闭幕式。我想有这样几个情况，希望大家可以交流。我们想请学员，谈谈想法、体会和感受。如果最后院长赶到了，就请院长讲话。没有指定的学员，你们愿意怎么表达就怎么表达。讲这五天的感受。

我最重要的感受就是很累、很辛苦。我们的老师67岁了，五天的课程讲下来很累，倒时差、饮食习惯，就像他自己所说的：对他来说是一个疯狂的举动，到中国讲课，是第一次尝试。包括听课的都很累。

所以我在想，今后的课程怎么来安排比较好？晚上团体的课程怎么和白天的课程结合起来？我想再和培训老师、姚洁博士商量看看，培训内容怎么贴近在座的每一位同学，临床和实际结合起来。我们弄得晚上活动太多，会不会太辛苦太累？

我先讲这些，现在邀请学员，讲讲对课程的期望，以及对五天课程的印象和感受。请来自天津大港的申青荣老师先讲。

申青荣老师：我作为老学员，三期的学员，谈谈个人的感受。每个学员都是千差万别，都是特别好的。

我从一开始的时候就很喜欢这个课，真的觉得来对了。

因为在之前有中美班、中挪班，虽然想去但是都没去。突然有这个中法班的时候，就真的来了。冥冥之中有这个缘分，从一开始就很喜欢，没有太多不舒服的感觉，都是很舒服的感觉，也很喜欢姚洁博士的翻译。

这个是挺奇怪的。语言是有很大的差别。之前没有太多的感觉。我觉得这个应该也是一个收获。

私下跟同学聊，我提不出问题。提不出问题是我最大的问题。我感觉有很多临床经验的，也有没有太多临床经验的。

还有一个分享，就是老师讲那个阳具，未知的不存在的意向，恰恰是——如果用四画把这九个点都连上的话，只看这个部分的话没办法解答，如果有那两个点的话，就会解答了。

任何理论都有个假设的原点，这个假设是这个人创立的，就像是弗洛伊德创立了“原始的压抑”，有了这个基点，在这个基点前，这个基点又来自于什么。好像所有的科学理论都有一个基点，在这个基点基础上后面的都符合逻辑，能够被验证和证明。佛教不讲这些东西，他讲的是轮回。如果你今天遇到什么问题，可能是你前世是怎么样。基点是每个人对事物的不同看法得出来的一些东西。

理论的基点就像是每个人创造的不存在的东西，这个方面给我很大的信息。因为有时候我学习时发觉好像是理解了，但是我的知识不能产生一个新的知识。实际上是我学习的一个最大的困惑。

当然还有很多了，咱们的会务，刘华清老师，他们的团队，为这个项目所做的一切，等等，我觉得都特别好。

到第三期的时候，还有个分享的（机会）。一开始我住的是如家快捷酒

店，有几个同学住的是七天快捷酒店。这次呢，我就把旅店定在了七天快捷酒店，跟那两个同学交流的时候，发现他们把旅店订到了如家快捷酒店。然后我就说真有意思，我们都改在如家快捷酒店去吧，在晚上的时候可以交流交流。

我们这几个同学都是参加了三期的。到今天就自然而然了。我就觉得好多事情就自然而然地发生了，这是我的分享，谢谢！

刘华清主任：谢谢申青荣老师的分享，学习真是一辈子的事情。不断地学习，慢慢三期学员变得熟悉了，积累了很多的知识、交流、体会，对大家的提高是非常有用的。第二位，请两期参加者江佩英。

江佩英：那我就说两句。前面刘老师鼓励我说点什么，我是不太会计划的人，临时做什么事情的话，我会紧张的，不会像荣荣老师那样。

刘华清主任：其实你能愉快地答应我是非常好的，你没有推脱让我觉得非常非常的顺畅。

江佩英：主要是这次又跟刘老师有这样的接触，我跟刘老师都在一个小组，我觉得那个小组在我和刘老师之间还是挺有意义的。我跟刘老师的距离更近了，更真实了，促成了我不知道说什么样的情况下可以坐下来感受一把。

我的五天课程，上次就上了四天课，到现在仍然无法语言化，有一个直觉的东西是我来对了这个地方。

因为这个课很有意思，在其他课程选择的时候会有很多的摇摆、考量，时

间、费用啊，等等。我知道我要来上这个课，究竟为什么我说不出来，但是我上这个课是对的。

我有些提议，一个是一、二、三期来的老师是不同的，至少上一次老师是不同的。他们在不同的框架和领域里分享他们的东西。我这次听老师讲课，有个强烈的感觉是，如果这位老先生能多来中国几次，陪我们成长就太好了。

但是我在想也许这个梦做一做是可以的。老师已经干了一次疯狂的事情，也不在乎第二次、第三次，是吧。所以，有首歌，李宇春的“再不疯狂就老了”。所以就趁热打铁。

如果每一次课程是一个大餐的话，那个东西太大了，太好吃了，吃下去没吃下去都在里面，好像还缺点什么，如果后面再继续加工一下的话，对我们成长是更重要的。

我们同学交流的时候，谈到咨询师的个人成长，因为我们需要成长，迫切需要好的工作机会带我们出去。在国外更容易找到合适的分析师，在国内很难找到合适的，不敢贸然把自己交出去。

三年一届，如果一个老师，一波老师持续过来，完成整个系统的话，在这个里面能够学到东西。

另外，在课程期间老师连续讲了五天的课，一个人讲五天很累的，那个感觉好像在飘。我在想有没有现场示范的东西，把老师讲的东西现场示范出来，如果需要病人我第一个报名。

晚上的小组是一个很好的安排，因为我们白天学了理论，自我体验对于白天的课是个补充。如果老师轮流地在每个组待一待，可能感觉会非常深刻和了解中国人是怎么玩的，对第二天的授课应该会有很大的帮助，如果法国老师带

我们的小组玩的话更好了。

我一直提不出问题，我非常佩服会提问题的同学。我会在这个课程里带出来一些体验和感受。

我有个小小的问题，研讨会在法国是怎么进行的？以什么方式来讨论？是有主题的吗？还是思想的碰撞？这是我想要了解的。

好了。对会务的感觉太好了，吃得好，喝得好，照顾得很好。

刘老师，很多人爱你，谢谢！谢谢主办方刘华清为代表的会务组成员给我们的服务。从来没有这样的感谢。

刘华清主任：江佩英是我们医院危机干预中心的志愿者，是非常好的志愿者。现在请新来的辽宁锦州马文斌院长给我们讲几句。欢迎他！

马文斌院长：没啥准备，很高兴能参加这个学习班。简单地说一下我的感受。

我参加这个班非常偶然。我对心理学感兴趣，但一直没有机会学习。

精神分析我认为是心理学里边最基础的，最起步的点。如果精神分析没有学的话，学其他任何一个心理治疗的方式，都是我个人无法接受的，也是无法做到的，这是我个人的理解。

所以说这次一旦接到这个通知，我非常高兴，积极地跟单位领导请示，积极参加这个学习班，因为不管工作多忙，我都积极地参加一次。

过去对拉康没有了解，或者说基本上只是听过一个人名而已。这次经过老师的介绍，我对弗洛伊德也非常崇拜！我感觉从老师介绍当中，拉康并不是从弗洛伊德分离出来，而是完全建构在它最基础的框架之上的。我不知道我的理解对不对？

那么这个是弗洛伊德的理论，拉康是在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上经过了发展，同时又有了一个提高。那么他的理论是不是又超越了弗洛伊德的那个基本的东西？也许他们有并行的地方？但是从我基本感觉来讲，我觉得应该更深了一层。

所以他的理论就非常深奥，我无法听懂。所以在这几天里感觉的不单单是累，实际上有时候跟大家的感觉都差不多，都是有点想知道更多东西，但一时又无法抓住很多东西。

所以在跟姚洁探讨的时候，说了一句，能不能把拉康的那些东西翻译更多？我们从了解拉康本身，了解他的基础知识内容之上再听？

反正我近几堂课的收获是非常大的。因为我感觉如果咱们国内继续精神分析的话，应该把之前所有的观念基本都颠覆了。至少在我身上是这么感觉的。

我不知道对咱们中国的精神分析有多大影响，但至少从我个人的角度来说，我整个可能更多遵循拉康精神分析的理念。

我想在今后的时间里，和大家共同学习的机会更多，非常想系统把这个课程学完。

虽然我这次没有提出任何问题，但是我想在今后的学习中，能更完善地把这个东西转化成自己以后学习生活中的一个关键的点。

最后非常感谢刘老师主办这么好的一个会议，同时感谢姚洁女士把法国的专家请到咱们这里来，给咱们一个很好的沟通。更感谢小组的同学，分享了很

多东西，在以后的活动中可能分享更多，希望我们更加地融洽。

我的理念就是说，大家能够团结起来，能把所有的事情为了一个目标更好。我不能占用太多的时间，今天就说到这里，谢谢！

刘华清主任：我觉得完全听不懂是不存在的。就像我记得老师说，他说我回答不了所有的问题。这是非常谦虚的回答。我觉得非常有意义，这么非常有名望的老师都回答不了所有的问题。在我们的咨询现场还会发生，确实我们就是不知道。我想作为晚上的团体活动老师，费小懿老师也是首次参加我们的这一期，请她谈谈她的感受。包括她听这五天课程，以及她带五天小组的想法。

费小懿老师：我想首先回馈一下，法国老师带给我们他自己说的“疯狂的五天”。我想从团体动力方面回馈一下。在晚上的团体里面，可以看到这种疯狂的动力。

中国人很喜欢和谐，于是在最后一天的时候我们就发现在我们的团体里面，有一个很圆很圆的圈，26把椅子，滴水不漏，一条缝都没有，很和谐。

26个人坐在温暖的教室里面，那么温暖，所有的人都到齐了。

中国人很热爱和谐，大家都感觉很好。但是我们还要干什么呢？

于是在接下来第一个小时里面来解构这个和谐。

我们用了一个小时的时间，基本上是女人干的活，找到了一个和谐的对象，具体不能说，因为这要保密。我只说动力。

我们用一个小时的时间去解构这个和谐，是因为等一下我要说一下，我发现中国人对和谐其实是又爱又恨的。

在第一个小时，女性用温柔的方式去解构这个和谐，为了想碰触到和谐里面有血有肉有眼泪的部分。一个小时之后，男性就按耐不住了，就想干点什么。但是问题出来了，当我们想干点什么的时候，好像缺点什么，想干又干不出来，于是焦虑就开始升级。

在结尾前的第 15 分钟，在那个时刻汇总与爆发了。团体在和谐之下其实压抑了很多很多情绪，26 个人，你想，只有一个半小时，终于爆发了。

老师的话就是“切”，法语的“切”怎么说？就是有一个很大的挣扎。

每个人他想发出自己的声音，但是我们不知道用什么语言发出自己的声音，不知道怎么表达自己的声音，大家又很想表达，因为压抑了那么多，又找不到表达的时候，并且只有 15 分钟就结束了，你们想象那个时候能发生什么？

我们就开始谈论什么是说人话，说了半天，这个说我听不懂你说的，那个说我听不懂你说的，就快要变成喧嚣的时候，很残酷的事实就是结尾的时间到了。其实我们还拖延了 3 分钟。

结尾时间到了以后，其实有的人已经很难受了，因为他们有的说我不想让别人替我说话，但是自己又找不到合适的语言的时候，可是时间又到了。

对你们来说，我是个带组者又怎么办呢？

有的同学说真正的工作才刚刚开始，有的同学说“切”在这里。最后就“切”在那里了。但是，这是一个很痛的“切”。

就是这种痛让我回去有了思考。

一开始那个圆让大家感觉很好，就像是球，但是这一切，尤其是找不着语言的时候，就是刀砍下去，球漏气就扁了。所以那个扁了的感觉很难受。这个跟我们这次的课程有点类似。

在这个时候我就觉得是这样的感觉，我们不想再要以前的和谐，表面上很好，但是内在太多。在挣扎着找不到表达自己的语言的时候，有种焦虑，有种困顿，在那里挣扎。所以有一种痛。

从我们团体第一天，就有同学提出究竟什么是精神分析。以前我们活在比较确定的东西当中，我们开始连精神分析都不知道是什么了，于是我们处于一种不确定性当中，一种焦虑当中。

这些理论有时候从德语翻译成英语，又从英语翻译成德语，其实我们在这中间丧失了很多东西。

有时候尝试看很多书，减少这种焦虑，寻求让自己踏实的方法，但是问题是这两天老师讲的精神分析好像又告诉我们说精神分析不是治疗，也不是病理性的东西，并且今天老师讲到了一句话：爱是给出我没有的东西。

当我听到这句话的时候，好像这五天我也感受到了类似的感觉，我的理解是，精神分析也是给出我没有的东西，至少给出的不是我有的东西，好像精神分析师给出一种没有、无。或者这么说吧，如果精神分析越是给出一种没有或无的时候，你可能就越能够去迎接或保证病人的在场。

对我们来说，仅仅是从外在吸取一些他者的语言和概念是很好的，又不是最实质性的东西，那么那些东西进到我们里面会发生什么？这个过程好像是更重要的，而困难的是，这个过程却是难以言说或是难以传授的。

（精神分析）是一种精妙的东西，所以我记得老师说精神分析的传授就是一种保持精神分析的危险，大概就是这个意思。

我还有一个分享就是老师讲课中让我特别感动的一段话。

我记得他说道：“他真正无法抗拒的是空对他的呼唤，而空不呼唤任何人，在这里一定有幻想在组织着什么，如果你聪明地灵巧地问话，你可能会发现一个小小的什么都不是，一连串的形象告诉我们怎么会主体觉得空在呼唤他，如

果只是命名那不是事情的本相，请允许我对恐惧进行更为本质的考量。”

我对这段话特别感动，他里面有些东西“如果你聪明地灵巧地问话，你可能会发现一个小小的什么都不是”。聪明灵巧地问话可能就是我们想学的关键，但是怎么聪明灵巧地问话，老师并没有说，我想功夫在那好多好多说不出的里面。

那我还感动的是他说“如果只是命名那不是事情的本相，请允许我对恐惧进行更为本质的考量”。那种是一种，让我感觉到一种柔和、谦卑、质疑和不确定，是这些东西让我觉得很打动我，是那种小心谨慎的状态，带着空的状态，带着没有的状态去进入对方的世界。去探寻的那种姿态，让我觉得很感动。

再说几句。这会让我想到我们处在一个挺尴尬的时代。因为刚好来的路上下大雾，什么都看不见，听课是云里雾里，路上也是大雾。

然后有时候看到周围经济建设、高楼林立的，就会觉得，因为老师说的象征符号，生活中带着我个人的象征符号太少了，标准化的东西太多了，不像以前的建筑，等等。

我们有时候习惯于确定性，习惯于很有力量的词语，这就是我会对那种轻柔的、不确定的、疑惑的、探寻的那种姿态特别有感觉，因为它可能是对我们以往习惯的颠覆和质疑。

所以这五天给我最大的感觉是动摇了一些东西，等待着我们去重建。

就像我们的团体，我们切在痛的地方，仿佛是一个省略号，等待着我们在痛的里面要继续去反思，等待着我们去寻找。

所以我很感激老师带给我们很不一样他者的生命。谢谢！

刘华清主任：还有没有老师或者同学想说的？

学 员：我很想说，其实我每一次都站出来说。

刘华清主任：你要不要坐着？

学 员：我为什么想说，因为会有很多我自己的感受会出来，而且是很真实的，也是想让老师知道的，这五天带给我的感觉。我在这五天听课的过程中，我相信有很多同学跟我有同样的感觉。不知道自己真的懂了还是没有懂。

我有一个很重要的感觉，就是我被一个知识的海洋托在上面了。然后知识是懂，也会很吸引我继续往下去探索，可是在想去探索的时候，在懂与不懂之间会丢失一些东西，我不知道是什么。

然后我想到，这个丢失的时候，没有上一次很空、很悲伤的感觉。

上次的空是我提出来的，这次看到这个丢失的时候我很自在很舒服。

这个大海的意象，一直在我的脑海里，我一直想告诉老师。可是老师回答了最后一个问题之后，我突然觉得心里的感觉是平静的愉悦，觉得这五天的课程他帮我松掉了很多东西，让我很轻松。

上一次分离有个不舍得，这一次课程的分离让我很舒服很轻松。我会很惊讶为什么这个课程给我带来这种感觉，我不知道我是怎么做到的。可是的确在我内心里发生了很多变化。

刚才听了费老师的发言也很感动。因为费老师是我们带组的老师，当她在说那个“切”，那个空的时候。想起来我在做个案的时候，来访者突然一下子的脱落，我有这种感觉。突然他不回来了，那个时候我会很痛苦的。

还有一种感觉是什么呢？当刘老师说这个团体我要停掉的时候，我是很不愿意的。我甚至在第三次完了之后觉得三个晚上不够，甚至五个晚上。如果刘老师把这个团体停掉的话，我会带着很大的失望。不管你怎么做我都接受，可是这个失望都在了。

我在听课的时候一直在想用法语跟老师说一声谢谢。

张琨波：我就用一分钟的时间，平时提问题也是比较短的。因为我还是重复跟老师的相遇。

培训之前的公开课我对老师的提问，老师对我的回答，认为我的提问很滑稽，之后我对老师的提问，老师对我的回答，课上课下，老师对我的回答不是大师的回答。这不是我要的答案。下面跟同学分享的时候，我说会不会我的问题尖锐把老师堵住了。后来这个问题也没有提出来。

最后老师回答我问题，我才知道我和老师堵在哪里了。

我觉得我这次来没有失望，非常幸运和大师的相遇，后来大师还主动上来和我合影，我非常感谢大师。好，谢谢！

刘华清老师：那我简单说几句。

第一，我想特别感谢我们老师来北京讲授五天的课程，他是拉康精神分析学校的大师，而且能够结合个人故事，深入浅出讲五天这么好的课程，真的是非常精彩的。

比如他说精神分析师症状的一部分，这是以前从未听过的。就像是马院长说的，真是对我们以前概念的重构。

第二，就是感谢我们的学员全程的参与，路梅介绍了很多优秀学员参与我

们的课程，还有辽宁锦州的马院长、北京的费小懿博士，孙春云副教授带领晚上的团体。

还要感谢我们医院的领导全力支持，感谢姚洁博士，第一期的刘洋，已经生孩子了，孕育了生命，孩子半岁了。第二期的李玖菊，已经怀孕好几个月了。第三期会是谁呢？

感谢我的同事徐仁、刘艳、胡娜、魏晨曦等大夫，他们会务组非常努力的奉献，他们是我们医院的优秀的心理治疗师，他们牺牲了很多宝贵的学习时间。

刘华清主任：那下面请我们的庞宇院长给我们讲话。庞宇院长参与了
我们医学心理学、临床心理治疗学的部颁教材的编写。
谢谢我们庞院长的光临，请他讲话。

庞宇院长：首先非常感谢来参加第三期的学员们。

我还依稀记得2012年的第一期。第一期的时候遇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大的暴风雪，当时发生了很多事，我也想了很多事，后来联想到我们中法班。其实中法班如期开幕，能够顺利进行过程中有很多不容易。

第二期是五月份，然后又到了第三期。刘洋，我们的同事，在我们第一期的时候，在孕育，她自己也不知道，玖菊也一样，上次做服务。其实这个课程很有魔力，以后大家会知道，这个魔力会继续，有一个人正在孕育。我想说这个课程非常好。

首先感谢纪·勒·构非教授不远万里来到中国，来给我们这些对于精神分析学派痴迷的同仁，向同仁们内心播撒一个种子，这是我内心非常感激的一个地方。

当然，也非常感谢在座的同仁，有我们第一期的，一直在坚持，希望第四期继续这样，见到这样的面孔不容易。

我也参加了很多的培训，我坐在这里，有种被分离的感觉，第三次了，我

的承诺仍然没有实现，很遗憾不能全程听课。大家在分享的时候，我有种被分离的感觉。

那么我还是想谈一下拉康结构主义的一些感受。因为大家都在谈感受，我也是一个学生，是大家的同道，大家谈感受，我也谈一谈。

说实话我最早对拉康的认识，源自拉康著作和学术，尤其结构主义这方面晦涩难懂。因为拉康是非常博学的人，老师是拉康嫡传的弟子，哲学、精神分析、符号学、拓扑学、数学的东西都能融入这个精神分析大师的著作和理念里。这是我感觉他的理论晦涩难懂的一个最主要的原因。

不是说内容不好，我感觉我的能力有限，当第三期知道这样的一个内容之后，我非常开心，因为在我们中国的这样的土壤当中，我们是发展中国家，能够有一个最前沿的知识，个人认为是一个高级的知识，又是嫡系弟子，在我们中国来说嫡系不是轻易叫出来的，是原汁原味的。我觉得大家是幸运的，包括我在内，我们应该珍惜这样一个机会。

当然了，拉康的思想虽然以前觉得晦涩难懂，我是从一个时间转点，不知道大家在第三期课程以后会不会去复习那些资料，当时看到拉康提到爱伦·坡的书——《被窃的信》，如果这点去看看的话，我相信对于我们这个课程，会有很多的益处。

我虽然没有来学习，但是我跟很多的老师有一些交流，老师能够把我自己认为晦涩难懂的知识讲解给大家，能让大家通俗易懂地去接受，而分享的时候又有很多感受，而且他自称是个制造麻烦的人。的确是这个样子。在这样一种“麻烦”的状态下，发挥我们的想象力，这是我们受益终身的。

所以我想和大家交流的是，最近大家在谈中国梦，可能老师不知道。我也想想谈谈关于课程的梦。因为精神分析嘛，我觉得和梦有不解之缘。我作为一个学习者，跟大家分享，真正希望三期培训不单单是这三期，因为有些事情，在

做的时候往往虎头蛇尾。但是这么好的内容知识真心地不希望它越走越萎缩。我也希望我们的组织者能去克服这样的困难，去做一些事情，想一些办法。

当然回到我的身份，作为回龙观医院行政上的一个领导，我能够做的事情一定会不遗余力地去做完、做好。当然，这需要我们共同努力，包括我们在座的同仁。

无论这个路走得多远，希望大家能够秉承我们助人自助的理念，回到我们的圈子里去继承老师传播的知识，能够运用到身边的人，播撒到身边的人，在我们全国生根开花。

这是我们要做的。

最后感谢姚老师，真的非常辛苦。再次感谢老师，感谢我们医院的团队，谢谢大家！希望我们在不久的将来还能再见！

当然了，最后我借着老师的话，再说一句。明年是中法友好年，我们医院也有计划，没有定，有一支访问团，要去巴黎第七医院，能够把我们的合作再去深入，做得更好。

刘华清主任：最后一句话。

来自广州的郭爱萍和方静因为要赶飞机刚刚提前离开。走之前悄悄告诉我一句话：“我挺喜欢这个法国老头的，告诉他我喜欢他，我爱他，我要梦到他。”这也是我的想法，谢谢纪·勒·构菲教授！

第三期中法分析班就结束了，尽管我们办得不那么完美，但大家的包容理解，是我们办第四期的动力，希望大家用微信、微博来宣传中法班。

好，谢谢大家，一路平安，再见！